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49.10. — 1957.12.)

目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1
关于铁路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十月）	2
給徐悲鴻的一封信（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2
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設工作的指示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员会頒发）	2
在苏联莫斯科大剧院的庆祝大会上的祝詞（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4
为爭取国家財政經濟状况的基本好轉而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	4
給馬××的一封信（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閉幕詞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7
給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題詞（一九五〇年）	9
×××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9
給徐悲鴻的一封信（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11
对志愿軍党委的指示（摘录）	11
对中国人民志愿軍指示的团结朝鮮人民四項原則	11
給徐悲鴻的一封信（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	11
与各中央局及大城市党委统战工作同志談話紀要（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	12
关于培养干部問題的指示（一九五一年三月）	14
关于政府、軍事系統审查旧人員中答复“包下来”問題的指示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	15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決議（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15
关于鎮反工作和肃反工作的批語 （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	16
对《秘書室关于处理羣众来信的报告》的批示（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18
批改《人民日报》社論应当重視电影“武訓傳”的討論（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18
在接見西藏致敬团时的談話（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	20
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詞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20
給馬××的一封信（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22
关于一些問題的指示（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十二月三十日）	23
在中央人民政府元旦团拜会上的祝詞（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24
对五反运动的指示（一九五二年三月）	24
对李×实践論解說的两处修改（一九五二年三月）	25
給李×的一封信（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	25

我們也应当会办經濟（一九五二年七月）	25
給李×的一封信（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26
視察黃河时的談話（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26
对民建方針指示的精神（一九五二年）	26
对劳动部关于召开全国劳动保护會議向中央报告的批示（一九五二年）	27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會議上的講話（摘要）（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	27
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及一些問題的回答（传达記錄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27
最偉大的友誼（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	30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高教、教育两部的請示报告时的指示（摘录）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七日、二十一日）	32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摘录）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33
对白××同志关于軍委卫生部情况报告的批示（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	34
对青年团二大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六月）	35
在接見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講話（一九五三年七月）	36
对軍事工程学院成立与第一学期开学的訓詞（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38
給中国人民志愿軍的慰問电（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39
关于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談話記錄稿）	40
在接見西藏国庆祝礼团时的講話（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	42
对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	42
給徐悲鴻的一封信（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45
对学校領導骨干、教材等問題的指示（一九五三年）	45
青少年的教育（一九五三年）	46
給李×的一封信（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46
关于国家預算的指示（一九五四年六月）	46
宪法草案公布时的講話（記錄稿）（一九五四年六月）	47
在宪法公布后的指示（一九五四年六月）	47
在阿尔巴尼亚大使呈递国書时的答詞（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三日）	47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在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央卫生部党組报告时所作（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48
关于学术思想批判的指示	
——与陆××、周×的談話（一九五四年）	50
对中医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	51
关于中医問題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講話（一九五四年冬）	52
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規定的五項任务（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52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會議開幕詞（摘录）（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日）	53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五年三月）	53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會議閉幕詞（摘录）（一九五五年三月）	54
在中央常委会上的指示（一九五五年春）	54

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一九五五年上半年）	55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	59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60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	63
对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同志的指示（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	68
中共中央关于贺诚同志的错误决定（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	68
在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一九五五年）	68
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	70
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一九五五年）	72
关于增产节约的讲话（记录稿）（一九五五年）	78
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	80
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81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85
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一九五六年）	86
在听取××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	86
对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准备情况报告的批示（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	87
在听取××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三月八日）	87
关于斯大林问题（一九五六年）	88
关于实行火葬的倡议（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七日）	89
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谈话（摘录）（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89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90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99
对《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的批评	102
接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夫妇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	102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107
在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晚）	110
在“八大”一次会议上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113

纪念孙中山先生

——在孙中山先生诞生九十周年紀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114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115
对发展轻工业设备制造工业的指示（一九五六年）	121
在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委员会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座谈会上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	121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127
给诗刊的一封信（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129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汇集（一九五七年一月）	129
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	134
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一九五七年一月）	136

在全国各省市書記会上的一次講話(摘錄)(一九五七年二月)·····	141
在頤年堂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	141
关于正確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147
在最高国务會議上的結束語·····	166
在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会上的談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	171
在七個省市教育廳局長座談会上对当前教育工作的指示(一九五七年)·····	176
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178
給周恩来等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185
在天津市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185
在山东省級机关黨員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	192
在上海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202
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206
在上海局杭州会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四月)·····	217
在接見共青团八大部分代表时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221
接見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的指示(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221
約集各民主党派負責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談話紀要·····	221
在上海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記錄要点)(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	224
在青島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	230
在上海听取整風情况汇报时的指示(摘錄)(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	233
在八屆三中全会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	234
中国共产党八屆三中全会總結时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237
在最高国务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240
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249
向莫斯科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实习生、使館机关干部的講話(摘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莫斯科大学)·····	250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上的发言(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252
回答記者关于中国前途的談話·····	255
在全国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下午五时于怀仁堂)·····	256
同科学家、文学家談人民內部关系(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	263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	265
关于主要矛盾問題(一九五七年)·····	26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的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会议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谭震林、饶漱石、陈嘉庆、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付作义、李烛、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谭平山、张先、柳亚子、张东蓀、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是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再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抄自《新华日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九五零年一月

关于铁路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十月)

解放軍打到那里，我們的鐵路修到那里。

(轉摘自滕××在全国鐵路會議上的講話，
見《人民日報》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給徐悲鴻的一封信

悲鴻先生：

表示敬悉，寫了一張，未知可用否？

順頌教祺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注：新中國剛剛成立，徐悲鴻先生敬請偉大領袖
毛主席為中央美術學院題字，此為主席復信。)

关于一九五零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頒發)

人民解放戰爭已在全国範圍內取得基本的勝利，人民解放軍除在几个戰綫上必須專心致志追歼殘敵以竟全功之外，已有大量軍隊進入整訓，或不久即將進入整訓。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在和平時間，在不妨礙軍事任務的條件下，應有計劃的參加農業和工業的生產，幫助國家的設建工作。”這里給了我人民軍隊除了保衛國防、鞏固治安和加強整訓這些偉大任務以外的一个光榮而巨大的任務。因此，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號召全軍，除繼續作戰和服勤務者而外，應當負擔一部分生產任務，使我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國防軍，而且是一支生產軍，借以協同全國人民克服長期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困難，加速新民主主義的建設。

這一生產任務是必須而且可能實現的。

這一生產任務之所以必須實現，是由于國內外反動派所發動的長期的反對中國人民的戰爭，給了人民以嚴重的災難，給了經濟以嚴重的破壞。我們今天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

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克服此种困难的方法，首先是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逐步的恢复与发展生产。而人民解放军则必须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种困难。

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以实现，是因为人民解放军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中间，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各种生产技能，并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担负过生产任务，具有生产的经验与劳动的传统。人民解放军的广大的干部们和老战士们都懂得，军队在参加生产之后，不仅战胜了困难，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改善了军队的的生活，并且经过劳动锻炼，还提高了军队的政治质量，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以实现，还因为在战争结束了的地区，人民解放军除了担负保卫国防，肃清土匪，巩固治安，加强训练等项任务之外，已有余裕时间参加生产建设工作。所有这些，都是人民解放军能够实现生产任务的条件。

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因此，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所属，从一九五〇年春季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约一部分国家的开支。此种生产建设工作，应形成一种运动，以利推广。此种生产运动应订出较长期的计划和具体的步骤。生产项目应在人民政府允许下，以农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各项建筑工程，各项可能从事的工业和运输事业为范围，禁止从事商业。军队领导机关应根据当地情况，调查研究，今冬做好准备。

根据过去的经验，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走私、囤积、投机，企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反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此外，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必须注意因开荒引起水患，不要因争地引起人民不满。

为了使军队正确执行生产任务，开展生产运动，兹规定：

(一) 在师、军以及军分区以上各级，成立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代表参加的生产委员会，其任务为掌握生产方向，审定生产计划，监督生产计划的实施，检查违法行为。

(二) 建立军队的生产合作社，建立合作社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军队生产委员会的监督 and 领导之下，掌管全部生产资金，生产活动和生产结果的处理。合作社系统和军队指挥系统平行，相互密切联系，但不相混淆。

(三) 实行公私兼顾原则，公平合理的分配生产红利，其中应有百分之四十为生产者个人所有，其余为该生产单位及国家所有，借以建立公私革命家务，一方面作到军队部分自给，一方面使生产者个人有所收获。此项个人收获，或自己留用，或寄回家用，或存储合作社备用，由个人自己决定。

(四) 在土地缺少地区，除参加各种可能的手工业，工业，水利事业，运输事业和建筑工程之外，军队首长可和当地人民政府商量并在农民自愿的原则下，参加劳力、资金、肥料、农具、与农民移种，使之增加产量，公平分配成果，但必须注意不得强制执行，不得与民争利。

(五) 各軍区部队的生产计划, 須与各大行政区和各省人民政府的生产计划相结合, 统筹生产资金。所有军队生产资金均作为投资, 必须计算利息和订定还期。所有军队生产事业均须照章纳税, 并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 不得违犯。

上述各项, 望各軍区首长严格注意, 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一九五〇年的生产建设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 并随时检查, 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和缺点。各地人民政府对当地军队的生产工作则有予以指导和协助的任务。

主席 毛澤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

(抄自新华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在苏联莫斯科大剧院的庆祝大会上的祝词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同志们, 朋友们:

我这次有可能参加庆祝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的盛会, 衷心至为愉快。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 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广泛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 深切地感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在这个盛会上, 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 祝福他的健康和长寿, 祝福我们伟大友邻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和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苏联万岁!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

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欲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大的发展, 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 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解放斗争有了发展。同时,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間的矛盾也发展了。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間的爭吵和英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間的爭吵也增多了。与此相反，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相互之間的关系則是很团結的。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約，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們能够放手地和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設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爭取和平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偉大斗争。帝国主义陣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險，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繼續团結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獲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謠言是欺騙人民的，是沒有根据的。

目前我們国家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級地方人民政府已經成立。苏联、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及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已經先后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結束，只有台湾和西藏还待解放，还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内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又組織許多秘密的特务分子和間諜分子反对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散布謠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結和合作。特务和間諜們又进行了破坏人民經濟事业的活動，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采取暗杀手段，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間諜，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解放軍自从一九四八年冬季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以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現在为止的十三个半月內，占領了除西藏、台湾及若干其它海島以外的一切国土，消灭了一百八十三万国民党反动派的軍隊和九十八万土匪游击队，人民公安机关則破獲了大批的反动特务組織和特务分子。現在人民解放軍在新解放区仍有繼續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人民公安机关則有繼續打击敌人特务組織的任务。全国大多数人民热烈地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內实現在全国范围的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领导，爭取了財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貨膨脹，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納稅、买公債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我們国家去年有广大的災荒，約有一万万二千万亩耕地和四千万人民受到輕重不同的水災和旱災。人民政府組織了对災民的大規模的救济工作，在許多地方进行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工作。今年年成比去年好，夏收看来一般是好的。如果秋收也是好的，那就可以想象，明年的光景会比今年好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統治，造成了社会經濟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失业羣。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旧的社会經濟結構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組，失业人員又有增多。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員的办法，以期有步驟地解决这个問題。人民政府进行了广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有广大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新知識的学习，或者参加了革命工作。人民政府对于合理地調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資关系，已經做了一些工作，現在用大力繼續做此項工作。

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符合于此种情况，凡在老解放区（約有一万万六千万人口），土地改革已經完成，

社会秩序已經安定，經濟建設工作已經开始走上軌道，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經有所改善，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識分子的問題已經解决（东北），或者接近于解决（华北及山东）。特別是在东北，已經开始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在新解放区（約有三万万一千万人口），則因为解放的时间还只有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还有四十余万分散在各个偏僻地方的土匪待我們去剿灭，土地問題还没有解决，工商业还没有獲得合理的調整，失业現象还是严重地存在，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一句話，还没有獲得有計劃地进行經濟建設的条件。因此，我曾說过：我們現在經濟战綫上已經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財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貨停止膨脹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財政經濟情况的开始好轉，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轉。要獲得財政經濟情况的根本好轉，需要三个条件：即：①土地改革的完成；②現有工商业的合理調整；③国家机构所需經費的大量节減。要爭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約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全国人民均应为創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可以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內爭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們就可以看見我們国家整个財政經濟状况的根本好轉了。

为此目的，全党全国人民必須一致团結起来，做好下列各項工作：

（一）有步驟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因为战争已經在大陆上基本結束，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情况（人民解放軍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争，勝負未分）完全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貸款方法去帮助貧农解决困难，以补貧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們对待富农的政策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的經濟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二）巩固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领导，巩固財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在此方針下，調整稅收，酌量減輕民負。在統籌兼顧的方針下，逐步地消灭經濟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調整現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資关系，使各种社会經濟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經濟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經濟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灭資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适合我們国家的情况的。

（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鎮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軍应在一九五〇年复員一部分，保存主力。必須謹慎地进行此項复員工作，使复員軍人回到家乡安心生产。行政系統的整編工作是必須的，亦須适应地处理編余人員，使他們獲得工作和学习的机会。

（四）有步驟地謹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爱国的知識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問題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錯誤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錯誤的。

（五）必須認真地进行对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識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驟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須繼續認真地进行对于災民的救济工作。

（六）必須認真地团結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們解决工作問題和学习問題，克服統一战綫工作中的关門主义傾向和迁就主义傾向。必須認真地开好足以团結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會議討論，并作出决定。必須使出席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們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

是錯誤的。

(七) 必須堅決地肅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務、惡霸及其它反革命分子。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實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即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不可偏廢。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於反革命分子的陰謀活動，必須提高警惕性。

(八) 堅決地執行中央關於鞏固和發展黨的組織的指示，關於加強黨與人民羣眾聯系的指示，關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指示，關於全黨整風的指示。鑑於我們的黨已經發展到四百五十萬人，今後必須採取謹慎地發展黨的組織的方針，必須堅決的阻止投機分子入黨，妥善地洗刷投機分子出黨。必須注意有步驟地吸收覺悟工人入黨，擴大黨的組織的工人成分。在老解放區，一般地應停止在農村中吸收黨員。在新解放區，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應在農村中發展黨的組織，以免投機分子乘機混入黨內。全黨應在一九五〇年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項工作任務密切地相結合而不是相分離的條件之下，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用閱讀若干指定文件，總結工作，分析情況，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等項方法，提高幹部和一般黨員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克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改善黨與人民的關係。

給 馬 × × 的 一 封 信

馬部長：

另件奉還，此事宜速解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增經費，學習和開會的時間宜大減。病人應有特殊待遇，全國一切學校都應如此。高教會已開過，中、小各宜開一次。以上請考慮酌辦。

毛澤東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閉幕詞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此次會議總結了過去時期的經驗，決定了各項方針。

這種總結經驗和決定方針的工作，是我們大家一齊來做的，是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集合在一起來做的。這裡，不但有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們，而且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及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許多工作人員列席參加討論，而且有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

員会的代表們列席參加討論，而且有許多特邀的爱国人士列席參加討論。这样我們就能集中廣泛的意見，檢查過去的工作，決定今后的方針。這種方法，我希望我們今後繼續採用，並且希望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採用這種方法。我們的會議在暫時還是建議性質的會議。但是在實際上，我們在這種會議上所做的決定，中央人民政府是當然會採納并見之實行的，是應當採納并見之實行的。

我們一致同意了全國委員會的會務報告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項工作報告。這裡有土地改革工作，政治工作，軍事工作，經濟和財政工作，稅收工作，文化和教育工作，法院工作等項報告，這些報告都是好的。在這些報告中，適當地總結了過去時期的工作經驗，規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針，我們這些會議所以有這樣多的議題，是因為我們的新國家成立之後，各方面工作都在開創，都在發展，全國人民正在蓬蓬勃勃地在各個戰線上開展真正人民革命的偉大鬥爭，在軍事戰線上，在經濟戰線上，在思想戰線上，在土地改革的戰線上都是從古未有的極其偉大的鬥爭，各項工作都待總結，都待指示方針，所以我們有了這樣多的議題。我們的會議按法律規定是每年開會兩次，其中將有一次為議題眾多的會議，一次為議題較少的會議。中國是一個大國。實際的人口超過四萬萬七千五百萬，又處在人民革命的偉大歷史時期，這種情況要求我們這樣做，我們也就這樣做了，我想我們是做得對的。

我們這次會議議題很多，中心的議題是將舊有土地制度加以改革的問題。大家同意劉××副主席的報告及中共中央建議的土地改革法草案，並對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若干有益的修改和補充。這是很好的，我為新中國數萬萬農村人民獲得翻身機會和國家獲得工業化的基本條件而表示高興，表示慶賀。中國的主要人口是農民，革命靠了農民的援助才取得了勝利，國家工業化又要靠農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階級應當積極地幫助農民進行土地改革，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也應當贊助這種改革，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更應當採取這種態度。戰爭和土地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時期內考驗全中國一切人們、一切黨派的兩個“關”。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麼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麼人只是口頭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動上則另是一樣，他就是一個口頭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個完全的革命派。戰爭一關，已經基本上過去了，這一關我們大家都過得很好，全國人民是滿意的。現在是要過土改一關。我希望我們大家和過戰爭關一樣也過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齊步伐，組成一條偉大的反封建統一戰線，就可以領導人民和幫助人民順利地通過這一關。只要戰爭關、土地關都過去了，剩下的一關就將容易過去的，那就是社會主義的一關。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那一關。只要人們在革命戰爭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貢獻，又在今後多年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中有所貢獻，等到將來實現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的時候（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人們是不會把他們忘記的，他們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的國家就是這樣穩步前進，經過戰爭，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改革，而在將來，在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為興盛了以後，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後，就可以從容地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我認為講明這一點是有必要的，這樣可以使人們有信心，不致徬徨顧慮，“不知道什麼時候你們不要我了，我雖然想為人民效力也沒有機會了。”不，不會這樣的，只要誰肯真正地為人民效力，在人民還有困難的時期內確實幫了忙，做了好事，

并且是一貫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廢，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在这个远大目标上，在国外，我們必須堅固地團結苏联、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絲毫的游移和动搖。在国内，我們必須團結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須巩固我們这个已經建立的偉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統一戰綫。不論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統一戰綫的巩固工作有所貢獻者，我們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確的；凡对于这个革命統一戰綫的巩固工作有所損害者，我們就反对他，他就是錯誤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統一戰綫的目的，必須采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时所用的标准，主要是我們現时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綱領。我們在这次會議中，即根据共同綱領，采取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內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確的方法。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說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时期內，不讓他們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們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們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們成为新人。对人民說来則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参与政治活动，不强迫他們做这做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进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取这种方法。

給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的題詞

(一九五零年)

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葯衛生工作人員，組成巩固的統一戰綫，为开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奋斗。

× × × 傳達毛主席的指示

一、打破封鎖，改变半殖民地經濟状态

力戒急躁，計劃要切实可行。

帝国主义对我們各种斗争直到封鎖，目的在迫我就范。打破封鎖之道，最重要的是軍事上迅速解放全中国，外交上及时主动一面倒，內部則強調自力更生，从长远建設着眼来提出問題。中央同意××局对城乡問題意見，应迅速进行，决心把农村工作做好，并認真动员和作出調动干部下乡計劃。另外，反封鎖要在政治上抓理，絕不可仅由共产党作决定，而应与各界共同决定。最好通过各界代表会討論决定。疏散难民应立即进行，疏散旧人

員應慎重，給以生活之道，做到仁至義盡。工廠內遷不是從解決上海當前困難着眼，而應從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長遠計劃來提出，作出計劃，分別先後、公私，對私廠內遷，必須：（1）與各階層共同討論決定，大家負責。（2）必須自願，不可強制，但應宣傳動員。（3）自願遷者予以真正幫助，不論公私工廠，均應求其內遷後有出路。（4）可遷而不願遷者，倒閉了責不在口。學校可內遷一部，國民党中央各機構，也應適當安置各地。精簡節約應即實施，無作戰任務之部隊可分駐農村，加強農村剿匪與羣眾工作，減少地方武裝。對精簡人員應注意安插，不可送走了事。節衣縮食以不病倒人為原則。最後，應充分認識半殖民地經濟不能希望一下改變，力戒急躁，一切計劃，必須切實可行。

二、工作上政策上要爭取主動，避免被動

對黨內應從理論上反復教育，說明必須團結黨外人士的重要意義，克服怕麻煩，不願接近民主人士，對招待民主人士較為看不慣，認為：“早革命不如遲革命，遲革命不如不革命”（毛主席說，一定還會加一句：“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思想傾向，使全黨了解團結爭取黨外人士，甚至把付作義、程潛、張治中之流爭取過來為我所用，雖有小麻煩，但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對人民非常有利。要學會算大帳，要善於批判地學習敵人的鬥爭策略，才能消滅敵人。今天我們力量強大，應有大氣魄，一切能用的人，都拿來用，虛心學習其長處，不怕他們造反。對大中學處理要非常慎重，不在人事上輕易更動，對資產階級學者要慢慢加以改造。在學術上必須採取老實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要不懂充懂，否則必然大失威信，陷於被動。對黨外人士要主動談“過三關”問題。第一關是封鎖，大約三個月以上；第二關是土改，要三、五年左右；第三關是社會主義。資產階級也知社會主義遲早要實現，但仍力爭時間，總要求心裡有個數才放心。

三、與黨外人士合作的幾種形勢

（1）人民代表會——大體上接收城市二、三個月，了解了情況就可召開，主動把黨的意見變成大家共同決定，共同負責執行。

（2）共產黨和各黨派，各界人士的幹部會議——約一月召開一次。除黨內祕密外，一般政策問題，要爭取主動普遍傳達。開會時應由主要負責人出席，才能使人家重視。這種會可減少黨外人士顧慮，並可以教育廣大中間分子，及時給進步分子以鬥爭武器，孤立右派分子。

（3）軍政委員會。

（4）顧問團。

四、改進工作辦法與領導方法

領導機關對必要會見的人要見，必要的會要開，但不可過多過長，陷於被動。要學會節約時間，集中力量解決重要問題，平時要充分利用通報、電報、社論來實現領導。對下面要定章程出“安民告示”（明確指出），經常給予任務，定期檢查，傳達經驗，表揚優點，批評缺點，使領導經常處於主動。

五、加强国际主义教育

向党内外反复说明一面倒的真理。对苏联朋友表示热情、关心、友好的态度；苏侨来往采取护送制度；主动向其解释不同习惯；对缺点也可经相关负责人正面讲清。帝国主义国家的侨民，愿走者尽量帮他们走，多走无害，但方式要讲究。

给徐悲鸿的一封信

悲鸿先生：

有×××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财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

順頌教祺

×信附陈

毛澤东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对志愿军党委的指示（摘录）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及其它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谊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指示的团结朝鲜人民四项原则

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指示的团结朝鲜人民四项原则：

- 一、拥护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
- 二、严格遵守朝鲜政府的政策命令；
- 三、爱护朝鲜人民利益；
- 四、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缺点，增进团结。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给徐悲鸿的一封信

悲鴻先生：

一月十三日給我的信并附×××先生所為書二本均已收到。同意先生的意見應×先生予以照顧。最好在先生所辦的學校予以位置，如不可能，則請持此信向中央文教委員會接洽酌定解決辦法。

此致

順致敬意

毛澤東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

与各中央局及大城市党委统战工作同志谈话纪要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

(×××簡述此次統戰工作會議兩項議題中第一議題〈反帝愛國統一戰綫〉的情況。談及工商界、上層知識分子及宗教界均已先後參加了抗美援朝運動時，主席指出——)

對佛教問題的处理，要研究一下，要使他們參加到運動中來。佛教改革如何作，要他們里面的開明分子商量一下。他們中有人說，他們沒有信佛教的自由，廟都被占了。信佛教的人也不少，不要不理會。北京市恐怕要給他們騰出幾個廟來，五台山關係蒙、藏兩個民族，恐怕要重修一下。

(主席問西北、西南抗美援朝運動的情況，回答此運動已在大城市中及部分小城市展開，主席指示——)

應該趁此時機展開，這是一個極大的教育。小城市如天水的商人最近曾有電報給我，說他們已經舉行了遊行示威。這次運動應普遍開展，普及到所有的工廠和農村，使得家喻戶曉，大家都參加進來。

(談到運動如何進一步開展時，主席指示——)

可找幾位這方面的負責同志談談，好好研究一下。

(有同志反映，朝鮮戰爭中，特別美帝在仁川登陸後，謠言較多，思想混亂，當時我們在宣傳上還做得不夠。主席指示——)

在宣傳上應當採取攻勢，對特務造謠，鎮壓一下好。

反美、土改、鎮壓反革命，是當前三大運動。

(中南同志反映，在土改中，農民進城捉人，影響工商業。主席指示——)

不可不捉，不可多捉。匪首惡霸是要捉的，但應合法地捉。

(中南和西南同志报告，武汉和西南設立了城市联络組和減租退押調处委员会，作为适当处理土改和減租退押城市联系問題的机关，主席指示——)

設立这样的机关好，在几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要設立(县城是否設立，可以考虑)，并且民主党派参加，由市政府管理，区别可捉者捉之，不可捉者则不捉，双方兼顧，合理解决，以免发生无政府状态。退押是要退的，也可經過这类机关商量。退多退少，适当处理，能多退则多退，不能多退则酌量少退。

(主席問到华东情况，回答苏南各地现在情况好一些。主席說——)

黃炎培先生准备去苏南看看土改，我向他說：你們去看看很好，可以听到各級领导干部、农民和地主富农三方面的意見。

(各地同志反映，地方上有些同志对民主人士去視察尚不免有所顧慮，主席指示——)

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視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贅。讓他們去听听农民的訴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們有些什么缺点和錯誤，也可以讓他們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載难逢，應該欢迎他們去看。

(地方同志反映，对于民主人士的視察和批評，缺乏积极的欢迎态度，主席进一步指示——)

分土地，鎮压反革命，发动羣众，都是好事。土改一項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沒有做过，我們才做。我們做了什么坏事情呢？有什么怕人家看的呢？十个指头有九个是好的，最多只有一个指头不好。你們对民主人士不要估計不足。要知道除了恶霸、匪首和特务分子以外，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員、开明士紳和爱国分子，我們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結和教育他們，决不能置之不理，而要采取积极态度。这个办法屢試屢驗，結果总是好的。一切消极态度都是不对的，有話应当讓他們說，写万言書也好，我們可以給大家看看，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釋。有人看到毛病要罵怎么办？共产党連帝国主义都不怕，还怕人家罵？对民主人士要进行教育，并讓他們参加活动。如果不进行教育，有事不讓他們与聞，这是不对的。

(关于統战會議的第二个議题，即各民主党派組織的发展問題，主席指示——)

这一問題要好好解决一下，不然我們所做的和所講的不一致，下面同我們不一致，就不好。去年說要巩固，今年說要发展，如果今年还只是一个巩固，那是不行的。因为社会上有他們的阶层和人物存在，所以就应当发展。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这个問題应当写出几条，指示一下，應該在运动中使民主党派进步，放手讓他們去做，好处多，坏处少。这是积极的有益的方針。

(各地同志反映，关于民主党派发展問題，有些地方干部思想上还有若干阻碍，如果没有党委有力的支持，就不易貫徹。主席指示——)

……應該使全党了解，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可以进步的。这次綏远二十三兵团已經調到冀中，这个部队的軍长师长都是原来的人，过去和我們打过很多仗，連这个部队都可以进步，为什么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就不可以进步呢？我們应采取积极态度去办，不要怕麻煩。要使他們了解抗美、土改、肃反是必要的，并且使他們参加。搞国家政权总是有麻煩的，怕麻煩就不要政权好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过去找他們来都不来，现在来了，你們

又怕麻煩。

(×××提到，有关統战部門本身的工作还缺乏一个章程，此次會議准备拟出几条，主席指示——)

对統战部的編制、任务、范围和作法均有所規定，这是好的。直到地委一級均应有統战部門的組織才好，是如何办，也研究一下。

(有同志反映，主席去年說过，注意統战工作的，在党内还是少数派，这个状态，今年在若干地区沒有多大改变。主席指示——)

这个少数派是正确的，只要坚持土改与肃反，这就不是右傾，这就是馬克思主义。要用积极态度去組織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教育他們，使他們参加斗争，帶領他們共同前进，这对劳动人民是有益的，对进入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少数派会慢慢扩大，主要依靠好好說服人家。应当每年开两次統战會議，一次大的，一次小的，各中央局至区党委都应如此。不要怪別人，只怪你們自己沒有招兵买馬、积草囤粮。不要使自己陷于孤立，要好好做出成績来給大家看。你們要很好地取得党委書記和組織、宣傳等部門的帮助，善于經過党委和党委負責同志，把我們的国家建設起来。你們当中要出些专家，要熟悉人物和历史，精通此中門道。

(中南同志提出鎮压反革命分子应与土改中反霸斗争有所区别。主席說——)

此一問題，×××同志已經发了指示。江西四十七軍向中央的报告，在一个多月中，二十多县里，杀了匪首×××人，得到老百姓的欢呼。(主席已将此报告批示轉发各大行政区傳看，并囑到会同志都看一看。)

关于培养干部問題的指示

(錢俊瑞同志傳达)

(一九五一年三月)

关于培养干部問題

- 1、旧技术人員是国民党的遺产，是很有本領，但还不能依靠，应爭取团结。
- 2、全国大中学生多是地主、資产階級的儿女，也是国民党的遺产，但給培养改造，其中有一部分能依靠，也有一部分不能依靠。
- 3、現在我們最重要的是培养技术干部的骨干，最重要的是培养我們党、軍隊中十多年的知識分子，还有一部分是参加土改的知識分子，可抽調大部分去訓練。另一部分从工农速成中学、从工农子弟中培养一部分，即是說要从这两类人經過培养后，团结上边这两种人。

(摘自徐方庭同志筆記本)

关于政府、军事系统审查旧人员中答复

“包下来”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各大軍区，并轉各軍区；中央各直屬部門，各特种兵团，中央政府各党組：

(一) 关于在政府系統中和軍事系統中审查旧人員和知識分子的工作，各地各部門現在开始着手进行。在答复“包下来”的問題时，我們看見有說得不适当的。例如，有的人說：“解放接收时原封不动包下来了，今天又来处理，是否有矛盾？”答复：“沒有矛盾。鎮压与寬大結合政策，并无变动。以前包下来是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安定工作，特务分子不积极生产，而积极破坏生产。今天既然已了解他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还不处理？”（滕代远同志在鉄路工会的报告）。这样答复是不妥当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革命軍事委员会发表約法三章的布告，內称：“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別录用。”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从来也沒有說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們包下来。現在审查旧人員（还有新知識分子），就是要將那些混入軍事系統和政府系統（包括公營工礦）中的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們清理出来，分別加以懲办或淘汰。同时对于那些并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的人們（这些人占大多数）則因为清出了那些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的人們，而使他們显得历史清白，或虽有問題但不严重，利于团结和改造。这后一类人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清白，沒有問題的；第二部分是有些問題，但不严重，只要坦白承認錯誤，可以繼續工作的（其中有些人須調动工作崗位）。

(二) 所謂有严重反动行为，包括恶霸、匪首、慣匪、特务、欺压过許多人的行政官吏（这些人多屬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重要分子），反动的軍官及反动会道門的头子等。

(三) 下面是李××日給中央的信，其中所說的工厂和矿山的恶霸应予懲办，这是毫無疑議的，請你們加以注意。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們，为了解决監獄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閒飯，必須立即着手組織劳动改造的工作。

經過此次全國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後，尚未破獲的特務間諜分子的活动，必須更加隱蔽。因此，公安部門必須進行更系統的偵察工作，並教育人民羣眾多方面的注意防奸工作。

× × ×

對於有血債或其他最嚴重的罪行非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和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必須堅決地判處死刑，並迅即執行。對於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雖然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但尚未達到最嚴重程度、而又罪該處死者，應當採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特別是對於在共產黨內，在人民政府系統內，在人民解放軍系統內，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內清出來的應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處決十分之一、二為原則，少餘十分之八、九均應採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如此，才能獲得社會的同情；才能避免我們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才能分化和瓦解敵人，有利於徹底消滅反革命勢力，又保存了大批的勞動力，有利於國家的生產建設。

× × ×

此外應明確的規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凡介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

× × ×

目前在全國進行的鎮壓反革命的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激烈的和複雜的鬥爭。全國各地，已經實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線，是黨委領導，全黨動員，羣眾動員，吸收各民主黨派及各界人士參加，統一計劃，統一行動，嚴格的審查捕人和殺人的名單，注意各個時期的鬥爭策略，廣泛的進行宣傳教育工作，打破關門主義和神祕主義，堅決的反對草率從事的偏向。凡是完全遵照這個路線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確的。凡是沒有遵照這個路線去做的，就是錯誤的。凡是大體上遵照這個路線，但沒有完全遵照這個路線去做的，就是大體上正確但不完全正確的。我們認為這個工作路線是繼續深入鎮壓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滿勝利的保證。在今後鎮反工作中必須完全遵照這個工作路線。其中最要者為嚴格審查捕殺名單和廣泛地做好宣傳教育。做到了這兩點，就可以避免犯錯誤。

關於鎮反工作和肅反工作的批語

（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

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鬥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一個不殺則特務敢於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則保衛機關只處理小部，各機關學校自己處理大多數。須使各地黨委堅持此種政策。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保衛工作必須特別強調黨的領導作用，並在實際上受黨委直接領導，否則是非常危險的。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請注意打得穩、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沒有話說。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

所謂打得穩，就是要注意策畧。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錯。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为了不致弄錯，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証据的特务及会道門头子，应当进行偵察，取得確証，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所謂胁从不問，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問之列。

(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

对那些已經实现了彻底镇压方針的地方，則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杀了。无论什么地方，都要有計劃，講策畧，作宣傳，不杀錯，这些也是当然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鎮反是一場偉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鎮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軍政系統旧人員和新知識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驟，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軍的某些最重要部門，特别是公安部門則須及时清理，將可疑分子須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員手里，則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請你們对鎮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務必謹慎从事，務必糾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們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錯杀錯。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細的有計劃的有步驟的，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凡工作好坏，应以羣众反映如何为断。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

鎮壓反革命必須嚴格限制在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反動會道門頭子等項範圍之內，不能將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國民黨團員、普通國民黨軍官也包括在內。判處死刑者，必須是罪重者，重罪輕判是錯誤的，輕罪重判也是錯誤的。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五日)

“緩期二年執行”的政策，決不應解釋為對於負有血債或有其它重大罪行人民要求處死的罪犯而不處死，如果這樣做，那就是錯誤的。我們必須向區村幹部和人民羣眾解釋清楚。對於罪大惡極民憤甚深非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必須處死，以平民憤。只對那些民憤不深，人民並不要求處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

除非我們採取步驟去肅清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否則人民的國家就會受到危害。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

看法妥當，讓他們活動，注意觀察，大有可為。他們是在如來佛手掌中，跳不出去的。你們應當當作一件大事去辦。積極而又藝術地去做觀察和偵察工作。

對《秘書室關於處理羣眾來信的報告》的批示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必須重視人民的來信，要給人民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羣眾的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採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如果人民來信很多，本人處理困難，應設立適當人數的專門機關或專門的人，處理這些信件。如果來信不多，本人或秘書能夠處理，則不要另設專人。

批改《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

(發表於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

〔為什麼〕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

在發表楊平同志“陶行知先生發揚‘武訓精神’有積極意義嗎？”一文時，我們說希望因此引起對於電影《武訓傳》的進一步的討論。為什麼〔要〕應當重視這個討論呢？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象武訓那樣的人，处在〔清末农民反封建革命〕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争〔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經濟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傳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階級〕統治者竭尽奴顏婢膝〔之〕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奴隶“文化”、奴隶“道德”，〕难道是我們所应当歌頌的嗎？向着人民羣众歌頌这种丑恶的行为〔奴隶“文化”、奴隶“道德”〕，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頌，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頌，这难道是我們所能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这种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历史唯物論的灭亡。就是承認超階級的“文化”“道德”的胜利；承認奴隶的愚民改革的胜利。〕污蔑農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别是对于武訓和电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們关于历史唯物論和新民主主义的学习还是极其肤淺的。这就給我們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利用《武訓傳》来学习，来清醒我們的头脑，来扫除我們思想中的唯心論和改良主义。〕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試看下面自从电影《武訓傳》放映以来，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中报纸和刊物上所登載的歌頌《武訓傳》、歌頌武訓，或者虽然批評武訓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頌其他方面的論文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录：

（目录說明）

〔因为武訓能有这样的意义和影响，所以我們認為認真深入这个討論是必要的，我們特别希望在这个問題上发表过意見的人来参加这个有重要意义的討論。〕

在許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階級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統治者，而是象武訓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階級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們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贊的地方。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鴉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經濟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經濟形态，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贊或歌頌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贊或歌頌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們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訓），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訓傳》及其他关于武訓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資产階級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嗎？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經学得的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緣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訓傳》及其他有关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問題上的混乱思想。

注：方括弧內是主席刪除的，黑体字是主席加的。

在接見西藏致敬團時的談話

(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

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和信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分地的问题，与宗教有所不同。在汉人区域已经分了土地，这里对宗教仍然是保护的。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去分。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

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儿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这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们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们：

我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现在开会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以外，应邀列席的尚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民解放军，工业劳动模范，农业劳动模范，老根据地代表，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工商业家，各种专家，宗教界，少数民族，华侨，妇女，青年，省市协商委员会及其它方面的代表人物，尚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出席和列席人员中包括了许许多多为人民所公认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者。我们这次会议的这个规模，充分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个战线上都有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

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們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外，即将于1952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从而鼓舞了朝鲜、中国、亚州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我们应当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表示庆贺和敬意！

由于上述三大运动已经取得的胜利，由于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的努力，我们国家已经实现空前未有的统一。西藏问题业已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国防力量业已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我们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发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农村中实现土地改革和在工厂企业中实现民主改革之后，工人和农民即获得发展其爱国增产的极大积极性，并改善其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可能，只要我们善于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我国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普遍高涨的爱国增产运动。

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会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年中，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胜利，我们是依靠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获得的。在国内，我们是依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

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一切愛國民主人士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之下的鞏固團結。在國際範圍內，我們是依靠了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的鞏固團結以及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由於這樣，我們就獲得了各方面工作的偉大勝利，這是我們的敵人所未有料想到的。我們的敵人認為：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前擺着重重的困難。他們又用侵略戰爭來反對我們，我們沒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難，沒有可能反擊侵略者。出於敵人的意料之外，我們居然能夠克服自己的困難，居然能夠反擊侵略者，並獲得偉大的勝利。我們的敵人眼光短淺，他們看不到我們這種國內國際偉大團結的力量，他們看不到由外國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的時代，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永遠宣告結束了。他們也看不到帝國主義稱霸世界的時代，已由社會主義蘇聯的成立，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成立，已由中蘇兩個偉大的國家在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基礎上的鞏固團結，已由整個和平民主陣營的鞏固團結以及世界各國廣大和平人民對於這個偉大陣營的深厚同情，而永遠宣告結束了。我們的敵人看不到這些，他們還想欺負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還想稱霸世界。但是，同志們，我可以斷定他們的想法是狂妄的，是徒然的，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與此相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能欺負的，以蘇聯為首的偉大和平陣營是不能侵犯的，全世界和平人民是不能欺負的。同志們，自從偉大的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世界上人民勝利的局面就確定了，現在則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成立而使這個局面發展和鞏固了。不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歷史時期中，曾經發生了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三個帝國主義國家企圖稱霸世界的事實，這種事實還是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許多人民民主國家沒有成立的時分，但是結果如何呢？難道還沒有證明這三個帝國主義國家的企圖是狂妄的和徒然的嗎？難道不是適得其反，想要稱霸的帝國主義却得到了被打倒的結果嗎？現在的場面完全不同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許多人民民主國家成立了，世界人民的覺悟程度提高了。整個亞州和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鬥爭蓬蓬勃勃地起來了，整個帝國主義體系的力量極大地削弱了，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是我們最親密的盟國蘇聯的力量大大地增強了。在這種時候，再有帝國主義國家企圖重走德、意、日三國侵略者的老路，則其結果不是完全可以料到的嗎？總之一句話，今後世界必須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國必須由各國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絕不能再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橫行霸道的世界了。我希望我國人民好好地自己團結一致，並好好地與我們的蘇聯盟友團結一致，好好地與一切人民民主國家團結一致，好地與世界上一切同情我們的民族和人民團結一致，向着爭取反侵略鬥爭的勝利，向着建設我們偉大國家的勝利，向着保衛世界持久和平的勝利而繼續前進。同志們，只要我們這樣做，我相信，勝利決定地是我們的。

給 馬 × × 的 一 封 信

× ×

關於學生健康問題前與先生談過。此問題深值注意，提議採取行政步驟，具體地解決此

問題，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我認爲（中共華東局一月十一日電報一件附上，請察閱，其中第三項談此問題，）是正確的，請馬付部長同志商酌處理爲盼。

毛澤東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中共華東局一月十一日電報

“健康第一，學習第二”

——節錄中共華東局一月十一日向中央報告關於學校工作的指示電文

“……

（三）轉入正常學習，又須防止過去加多課程硬趕功課的偏向。此次參加軍校學生之體格檢查中，即可看出，由於國民黨長期反動統治的結果，學生體質虛弱，患病者很多。但解放以來，各地也未能很好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之原則，因此造成公立學校之體格最差，大學較中學又差的現象還嚴重存在，這點應引起十分警惕。應按華東局高教會議的規定，適當減少正課時間，照顧學生健康需要。……”

毛主席批語：這是正確的。

關於一些問題的指示

把勞動力組織在“變工隊”、“扎工隊”、“換工隊”……等這一類的農村勞動互助組織里，有組織地進行耕種、鋤草收割，這比單獨耕種省工，又能多打糧食。

（《人民日報》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

只有中國工業發展了，中國在經濟上不依賴外國了，才能全部的真正的獨立。

（《人民日報》一九五一年七月）

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而欲農業社會化，必須發展以國有企業为主体的強大工業。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這個國家工業化的問題。

（《人民日報》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假如沒有蘇聯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假如沒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假如沒有各新民主國家的出現。……那麼，堆在我們頭上的國際反動勢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夠勝利么？顯然是不能的。

（《人民日報》一九五一年十月四日）

同志們，我們現在要和許多旧社会出身的人合作了。我們要小心，要預防旧社会的坏习气鑽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來。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元旦团拜会上的祝词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祝我們全体——人民政府工作人員，人民志願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員、战斗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們在抗美援朝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們在国防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們在土地改革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們在鎮压反革命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們在經濟和財政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們在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們在社会各界首先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

我还要祝我們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起来，大張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費、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同志們，我們在上述一切战线上，在一九五一年，都已取得了胜利，有許多是极其偉大的胜利。我們希望，經過我們的共同努力，所有这些工作，在一九五二年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人民日报》一九五二年一月三日)

对五反运动的指示

(一九五二年三月)

过去从寬，今后从严；多数从寬，少数从严；坦白从寬，抗拒从严；工业从寬，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寬，投机商业从严。

(《人民日报》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

对李×实践论解说的两处修改

(一九五二年三月)

一、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这即是说那时的中国人还……

二、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满清政府，当然就带有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而认为……

给李×的一封信

××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你！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请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不满足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回原。

我们也应当会办经济

(一九五二年七月)

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当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們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决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們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一定不拥护我們。

如果我們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經濟，也不懂得到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一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作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們應該反对这些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識。

轉引自李先念：《努力学好經濟工作》

（《人民日报》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四日）

给李×的一封信

××兄：

九月十一日的信收到。以前几信也都收到了。爰晚亭三字已照写如另紙。

矛盾論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無論什么矛盾，也無論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無論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刪，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字刪去。你写解說时，請加注意为盼！

順候敬安

毛澤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视察黄河时的谈话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老根据地的人民出了大力，我們要注意帮助他們。

这个大水庫（三門峽）修起来，把几千年以来的黄河水患解决啦，还能灌溉平原的农田几千万亩，发电一百万瓩，通行輪船也有了条件，是可以研究的。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是可以的。

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

（一九五二年）

一、私人資本在中国建設上是有贡献的，只要不讓它向坏的方面发展。

- 二、不能讓資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須兼顧国家的利，工人的利。
- 三、很好的團結他們、教育他們、改造他們，先学习并实行共同綱領。

对劳动部关于召开全国劳动保护会议 向中央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二年)

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須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事业；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記或稍加忽視后一方面，那是錯誤的。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摘要)

就全国范围來說，大陆上的軍事行动已經結束，土地改革已經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經組織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規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經成熟了，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得到的偉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揚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設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統一战綫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

(《新华月报》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

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及一些问题的回答

(传达記錄，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中国的拼音文字字母和七百簡体字材料这两个材料，已經送傅毛主席看过。他翻閱了簡体字。他認為这种工作不必太急，不要因为人家催就操切办事。事情关系很大，影响到几万人，是长远的事情。不要受了外界压力，輕易作出，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可以多征求意見。已經有了方案，可以作为繼續研究改进的材料。

关于簡体字：毛主席認為現在的簡体字不够簡，有些字与原字只差一两笔，有些字笔划仍多。笔划形状仍然不順利，写起来别扭。如“?”可以用“?”代替，有了写两点的

時間，就比點三點要快。作簡體字可以更多利用草體。草體難記。但是可以把一些草體字規律化，作為基本形體、類似日本的片假名，字的基本形體數目少，規律化，學習書寫起來就方便。這樣就和現在漢字的秩序不同，漢字的數量必須大大縮簡，那就要把兩三個漢字合併為一個，即一個字可以代用好幾個字。如圓周的“圓”即用“元”。一元、二元、花園也用“元”字。這樣才叫簡化，可以利用假借，以外利用簡單容易的草體，不用筆劃仍繁雜的草體。漢字的數目減少，字的筆劃也大大減少；難于減少的，利用假借；這樣就能做到的確是簡化了。筆化少，寫着就順利。

他舉了個例子：如“彳”字旁，用一筆作“丨”。要把字形規律化，就不能按原來通行的。因為原來的簡體字並沒有什麼規律。

關於拼音文字：毛主席認為我們用的拼音字母，筆劃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還難寫。

毛主席認為何必搞成方塊，方塊字千年來害人不淺。字母的筆劃要向一面倒，“永字八法”要廢除，那樣寫法不合現代化的要求。現在這些字母有的筆劃多，有的寫着不順，筆劃方向複雜，糾纏太多，向四面八方發展，所以難寫。漢字就因為筆劃方向亂，所以產生了草書。草本就是打破方塊體式的。

因為原來漢字筆劃可惡，所以非打碎不可。主席贊成把注音字母多改一些，也贊成改用兩拼，以便代替漢字。比如現在這套字母就不好代替漢字。因為有些字母和音書比漢字還難寫，比賽不過，這種拼音字母就要落選。

又如注音字母也不能代替漢字，三個字母寫不到一起，與漢字合，顯不出來簡單。拼音字母如果不比漢字簡易，在羣眾中立足就會有困難，主席對這套字母不滿意，無論如何要簡單，要利用原有漢字簡單筆劃和草體，筆勢要一邊倒，這樣才能為人民所接受。“注音字母”誰都沒考慮它作文字。要制作拼音文字，就是再費一年時間，也算是很快的了。如果照現在的樣子拿出來，恐怕人人會阻礙它。在制作字母方面要花工夫。

總起來說，主席希望文字要能真正作到簡單，如果不簡單，就不能推行。因為文字主要是要寫，不僅要數量少，而且要便于寫。例如，“云”不好寫，改作“士”也難寫，草書“㇀”稍順一點。我們的字母一定要比日本字母好，不要比他壞。現在的注音字母和簡體字，還不如日本假名，要多征求各方意見，加以改進。

這次郭沫若主任在莫斯科曾經謁見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很關心我們的文字改革，問到，“你們的文字改革搞得怎麼樣了？”郭老提到，在方言不統一情況下，漢字仍然有用途。斯大林說，這是我們知識分子的話，對於文盲，漢字是無意義的。郭老說一定要改。改革文字是費時間的，費十年時間也可以，不必求快，但一定要好。

……

現在無人要求廢除漢字，但也不能走到另一極端，替漢字辯護。漢字學起來還是困難。……我們的兒童學字的時間，要比拼音文字國家多兩年。我們的小學語文教學就發生問題。比如五年一貫制的語文課本第一冊的程度比拼音文字國家的淺得多，但是大家仍嫌生字多，教學起來，學生覺到吃力，各方面都提意見。我們小學生的語文水平和歐洲國家比相差太遠。我從大連回來，火車上看到李立三的孩子（三年級學生）看俄文大仲馬的小說“俠隱記”，三天可以看完。中國的三年級學生根本不能看這樣深的書。算術，外國小學一年級就有文字題，我們到三年級才有。這妨礙教育多大！如果我們的子孫世世代代都

比別人多學兩年，損失簡直無法計算。所以不能不改用拼音文字。如果考慮到打字、印刷、打電報等問題，而也使國家工作效率受到很大的損失。發電報，人家用電動打字機，排字，人家也用機器，在這上面耗費的時間的損失不能計算。至於字典難編，尤其餘事。

但是魯莽的方法，認為漢字可以立刻廢除，也是不對的。首先要有妥當的方案，其次要有實行的步驟，過去把文字改革想得容易，現在又反轉過來替漢字辯護，都是不對的。毛主席劇烈地攻擊方塊漢字，認為漢字千年來害人不淺，必須改革。《中國語文》出了半年，但是很少看到充分說明文字必須改革的文章。比如說，就沒有一篇比較漢字與拼音文字教科書等的優劣的文章。反對方塊字，要拿出真憑實據，漢字的電報，打字和印刷等都可以拿出來和拼音文字作比較。不這樣做，有時候連提倡文字改革的人都有點動搖。這主要因為我們改革文字的主要理由說的不清楚，文章的邏輯不強。

.....

我們的綱領是文字必須改革，決不能有不用改革或懷疑改革的話，但是如何改革，改革的理由是什麼，必須說清。

.....

提倡文字改革是對的，缺點在於沒有作詳細的調查研究和比較，在文章背後沒有事實來支持他。往往是議論多，科學的研究少。比如打字問題要收集最熟練的，相當熟練的，不熟練華文打字員的成績，拿來和英文、俄文的同樣的打字成績作具體的比較。這樣才能說服人。

.....

所謂字的筆劃要“一邊倒”就是筆勢要順。比如“水”字就不好寫，方向變化多。“三”字方向雖順，起頭太多，也不算好寫，象“水”則必須改造。

.....

一邊倒，不是每字筆劃都是一個方向，如“干”字就可以不改。因為它和阿拉伯數字“4”相似，比“干”好寫。主要是不要起筆太多。要寫起來流利，並不是說任何由右向左的方向都不要了。筆劃的組織也要簡單。

毛主席的意思是要大改，這樣的工程就要複雜一點，必須與代用字一起考慮。

拼音文字要和漢字配合得上，不能設想某日公布後立即就要實行，要準備它跟漢字摻用一個時期。拼音方案，簡體字中有些符號，就用拼音字母代替也好，特別是虛字，如“的”字就可以用字母代，虛字要極簡單，每字一筆兩筆，不一定必須有通行簡體的才簡化。例如“的”字本來就沒有簡體，但用的次數最多，必須簡化。

.....

有些難寫的地方名稱也要改，比如蠶屋、鄜縣、鄜鄜等，都可以用拼音字母代替。

（根據首都文字革命造反聯絡總部供稿）

最偉大的友誼

(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

當代最偉大的天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偉大的導師，不朽的列寧的戰友——約瑟夫·維薩里奧諾奇·斯大林同志與世長辭了。

斯大林同志在理論的活動上和在实际的活動上所給予我們當代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我們整個的一個新時代。他的活動引導蘇聯人民和各國勞動人民轉移了全世界的局面，這即是正義的、人民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事業在世界大規模的範圍內，在地球上人口三分之一——八萬萬人以上的範圍內取得了勝利，而且這種勝利的影响，正日益普及到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斯大林同志的逝世，使全世界的勞動人民感到了無可比擬的沉重的悲痛，激動着全世界的正義的人們的心。這就是表明，斯大林同志的事業和他的思想掌握了全世界的廣大人民羣眾，而且業已變成了無敵的力量，這種力量將引導那已取得勝利的人民由勝利進入新的勝利，同時也將引導那一切還在邪惡的資本主義舊世界壓迫下呻吟的人們能夠對於人民的敵人進行勇敢的衝擊。

在列寧逝世之後，斯大林同志指導蘇聯人民，把他和偉大的列寧在十月革命時期共同締造的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成了光明燦爛的社會主義社會。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這不只是蘇聯人民的勝利，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勝利。第一、這個勝利用最現實的生活証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限正確，具體地教育了全世界勞動人民應該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進。第二、這個勝利保證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類能夠有戰勝法西斯野獸的力量。不能設想，沒有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能夠有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勝利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是關係全人類的命運的，而這些勝利的光榮應當歸於我們偉大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全面地劃時代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把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推進到新的階段。斯大林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列寧關於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規律的理論和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首先勝利的理論；斯大林同志創造性地貢獻了關於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理論，貢獻了關於在蘇聯建設共產主義的理論，貢獻了關於現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的理論，貢獻了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論。斯大林同志還創造性地發展了列寧關於黨的建設的理論。斯大林同志這一切創造性的理論，進一步地把全世界的工人們聯合起來，進一步地把全世界的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使世界的工人階級和一切被壓迫的人們為解放和幸福的鬥爭及其勝利達到空前未有的規模。

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不朽的文獻。他所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蘇聯共產黨歷史》以及他最後的偉大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是百年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經驗的綜合。他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是給世界各國共產黨人的一篇寶貴的遺囑。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世界各國共

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偉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徑的。

从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們圍繞着他，不断地向他請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斯大林同志充滿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偉大号召。人們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認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問題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遵遁列宁斯大林的学說，得到了偉大的苏維埃国家和各国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而在几年以前獲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現在，我們失去了偉大的导师和最真摯的朋友——斯大林同志。这是多么的不幸啊！这个不幸所給予我們的悲痛，是不能够用語言来形容的。

我們的任务是要把悲痛化为力量。为着紀念我們的偉大的导师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名义下的偉大友誼将无限地加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更加紧学习斯大林的学說，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以建設我們的国家。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斯大林亲手教养起来的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經驗的和最有理論修养的党；这个党在过去和現在是我們的模范，在将来也还是我們的模范。我們完全相信以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是一定能够繼承斯大林同志的遺志，而把偉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并且发揚光大的。

毫无疑问，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陣营将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强大。

三十年来，斯大林同志的学說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榜样，推动了世界的大踏步前进。現在苏联已达到这样的强大，中国人民革命已獲得这样的偉大胜利，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設已有这样的巨大成就，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压迫反侵略的运动已有这样的高漲，而我們的友誼和团结的陣綫又是这样的巩固，所以，完全可以断言，对于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們都是不怕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将被我們所粉碎，一切卑鄙的挑撥都是完全沒有用的。

偉大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誼之所以是牢不可破的，因为我們的友誼是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偉大的国际主义的原則而建立起来的。中苏两国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全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及正义的人民之間的友誼，也正是建立在这样偉大的国际主义原則上，因此，也就是牢不可破的。

显然，我們这种友誼所产生的力量是无穷无尽和真正无敌的。

讓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战争販子們在我們偉大的友誼面前颤抖吧！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說万岁！

偉大的斯大林的英名永垂不朽！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高教、教育两部的请示报告时的指示(摘录)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七日，二十一日)

毛主席指出，办好学校，首先要解决学校的领导骨干问题，而且首先要解决大学的领导骨干问题。同意总理意见，从宣传部门与青年团抽调一批干部，去充实大学的领导。关于中、小学的领导骨干，应该由地方在几年内逐渐加以解决。毛主席认为训练与提高中学领导骨干很重要，东北的经验是好的。毛主席说：有了坚强的校长，就会产生好的教员。

毛主席对教材问题特别重视。认为目前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一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教材。确定补充一百五十个编辑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决配备。

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因此，应该改编教材，编辑教学法。

关于整顿小学问题，毛主席认为，“整顿巩固、保证质量、重点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很好，但是整不要整过了头。

××同志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也发展不平衡，不可能把全国小学都办成一样，不可能整齐划一，不应该过分强调正规化。农村小学可分为三类：一，中心小学；二，不正规的小学；三，速成小学，编速成教材。农村小学应该便于农民子女上学。

毛主席同意××同志的意见，并指出应该容许私塾式、改良式、不正规的小学存在。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只要不进行反革命宣传，就可以给他一本教科书去教。甚至和尚、尼姑，只要不宣传迷信，也可以让他们教书。

用多种多样办法办学，不强求一律。

关于超龄生问题，中央同志都认为不能把超龄生送出学校。毛主席说：“你们对七、八岁儿童这么爱好，对超龄生就可以不管？”并且说：“应首先把超龄生教好，让七、八岁孩子迟几年上学并不大要紧。”这就告诉我们先教育超龄生，对发展生产有利。适龄儿童迟几年上学，影响不太大。

小学城乡比例一样，不对。城市小学比例应该大些。

关于小学经费问题，毛主席指出，种种税率必须统一，收支也必须由国家统一掌管。不能象过去那样，搞什么教育经费独立，指定一定的税作教育经费。毛主席同意中央统一支拨，预算由省（市）县拟造。

民办小学，毛主席说，可以容许。不限定几年，能办几年就办几年，横直公家不出钱。学田，也可以允许留，但是要在有机动土地的地方，并有可能拿出来条件下，才能给学田。

学费也可以收。

小学教育，应该强调劳动教育。

关于五年一貫制問題，毛主席認為既（然）貫不下去，只好緩行。五年一貫制的文件，并不錯，只是实行过早，應該推迟。

毛主席对青年健康，非常注意，指示增加大、中学生助学金。学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伙食不好，卫生不好，功課重，課外負担过重，太忙。毛主席認為要增进学生健康，要增加营养，搞好卫生，減少負担，少緊張些。毛主席說，要吃得飽，学得太多，可少学点，要克服忙的现象。要一方面增加收入，一面減少消耗。因此，要增加助学金。改善伙食。另一方面克服忙乱现象。因此，决定大学生增加到十七万元，高中生除少数有錢子女外，一律发給助学金。初中生也增加助学金。

关于設置重点中学問題，毛主席認為要办，具体数字要按实际情况办，可以研究一下。留苏預备学校十所，要分配到各大区。办留苏預备学校，并不是說排除其他学校学生投考留苏；同时，留苏預备学校学生也并不一定全体一律留苏，还要經過考試和审查。重点学校一百五十至二百所。

毛主席指出：“培养工人出身的干部要特別着重一些。”周总理指示，可以从部队机关抽調干部学习。

初中招生，毛主席和××同志都認為，能多招一些，就多招一些。今年还是招六十五万人。

（根据前教育部党組一位同志記錄，未經核對）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摘录)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結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內，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灯塔，各項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我們的各項工作，应当遵循总路线，为总路线服务。离开了总路线就要犯錯誤。我們必須过渡，把社会主义看作“遥遥无期”是不对的。过渡只能是逐步的，企图“一步登天”也是不对的。

……

有的同志在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还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就农业来

說，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农业生产，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巩固和扩大我国的工农联盟。农业支援工业，促进工业化；工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合作化。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手工业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集体化，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有几种错误观点，是必须批驳的：

第一，有同志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的一切事物，一切社会秩序，时时刻刻处于发展变动之中。例如，我们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年年在变，月月在变，天天在变，不断有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第二，有同志提出，“确保私有财产”。这种提法，当然更是错误的。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在不断前进，农民的个体经济必然要被集体经济所代替，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生产资料方面说，我们不能“确保私有财产”。“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这个口号只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

第三，有同志提出，“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看来没有多大错误，但是不明确，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走向”社会主义就是还没有走到社会主义，只是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走。我们不能在整个过渡时期老是“走向”社会主义。事实上，我们的国营经济早已就走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了。“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可能使人认为我们现在并不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不能明确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责任。所以，这种提法也是不恰当的。

上面所说的是右倾性质的错误。

.....

对白××同志关于军委卫生部情况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

白××同志这个报告，深刻地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提議（一）請×、×主持，在军委例会上討論一次，邀军委卫生部部长付部长及白××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討論施行。（二）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付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不一定要学过医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部长付部长。以上請×、×酌办。

因为白××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

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见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这样一个人作出这样有条有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参攷白××的报告，严肃地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

无领导，无政府，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作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

对青年团二大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六月)

团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中，三十岁以下的只有七个，太少了，女的也太少了。老一点的成熟一点的党员参加领导是需要的，但必须增加些青年，不要搞成老年人专政，不要搞成青年老年团。

要一批一批地割韭菜，不割就不好吃了，老干部还有一万吗？可以再调出五千。

团代会的报告，有人反映有些空，是不是要求的高了。我看是满意的。三十岁以上的人不满意，二十五岁以下的看不懂。

几个文件党把的紧紧的，我看在党的领导下，团要有独立活动。几个文件都是讲中心工作，一天天干巴巴的，搞的太严了。纪律要有，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有纪律，那就不要用纪律了。

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中心工作，守纪律，青年向成年学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青年要有自由活动的一面。一方面老成，另一方面不老成，天天老成是不好过的。有严格的一面，也要有不太严格的一面。

要教育青年活泼点，不是少年老成，而是生动活泼，这是原则问题。这是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问题，不然要脱离群众。

太政治化了，太老成化了，变成青年成年团了。搞的下面没条件了（指系统领导），没有独立活动了。

今天我们指导你们搞独立活动，监督你们搞独立活动。

“向歧视妇女现象作斗争”，斗争太多了。婚姻法的贯彻得十年到十五年。要教育不要斗争。

“不要自由主义！”（文件中的一句话）社会上要允许自由主义，党内要反对自由主义。背后讲是发表意见的一种方式。在广大群众中禁止这一条是办不到的。

“对上级指示，不执行不发表意见”（文件中一句话）。指示要执行，至于不发表意见，我们这个会也有一部分发言，一部分不发言。

对青年不要管得太紧，小孩子打架，只要不打瞎眼睛，出点血没关系。鲁迅的儿子批评鲁迅说你象个爸爸。

叫我講什么？我就講打架、鬧。

在接見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主席團時的講話

(一九五三年七月)

鬧獨立性的問題不存在，我們沒有這個印象。現在缺乏的是團的獨立工作，過去缺點是這方面，而不是鬧獨立性。青年團要配合黨的中心工作，但配合黨的中心工作當中要有青年團的獨立工作。獨立性的問題早已過去了，×××有一點，但也不多。團的工作根據各地黨委反映都是滿意的，滿意就是配合中心工作，所以說滿意得很，現在要求來個不滿意。就是適合青年特點來些獨立的活动。團的領導機關要學會如何領導團的工作，黨的領導機關也要學會，就是圍繞黨的 center 任務，照顧青年特點，不斷的組織羣眾。

過去團的工作在黨的領導下，團的領導下，配合多方面的革命工作，得了很大成績，成績很顯著。無論城市、工廠、農村、學校沒有他們革命就不能勝利，他們是很有紀律的，他們完成了各項任務，現在革命不是天天革，朝鮮議和，土地改革結束，國內革命完成，現在轉到建設工作。建設就要學習，學習如何領導青年和成年一道在農村把農業做好，在城市把工業做好，在學校把學習做好，在機關把工作做好，在軍隊把國防軍練好，成為近代化軍隊。這些都是全國人民都要做的，除了小孩子。

但是十四——二十五歲是人們長身體的時間（二十五歲以上就不長了）。又是工作時間，又是學習時間，如果對長身體不重視則是很危險的。成年人也要學習工作，他已學了多少年；但青年剛學習剛工作，故與成年有不同，很多東西成年已會，而青年不會，例如種地青年就不如老年，如果十八歲會種地那是因為他以前學的好。十四歲——十八歲和十八歲——二十歲不能與成年人一樣的程度，不能按八小時工作制，不能挑重擔子，他們就是要玩。娛樂，不玩就不高興。十八歲以後就要戀愛結婚，這與成年人不同；成年人這問題解決了。

我提議，學生的睡眠時間再增加一小時，現在是八小時，實際只有六、七小時，開始有一小時睡不着，普遍感到睡不夠。要下一道命令，下一道命令就解決了。不要討論，強迫執行。教師們也要睡足，尤其是青年們要睡好。（周總理：青年團要帶頭。）我給青年們講幾句話：一，慶祝他們身體好；二，慶祝他們學習好；三，慶祝他們工作好，只有八小時睡眠時間，學生是不夠的。因為知識青年容易神經衰弱，他們往往睡不着，醒不來。如果九小時不行，就再增加一小時，一共十小時睡眠時間。

革命帶來很多好處，但也帶來一個壞處，就是太積極太熱心了，以致使大家疲勞不堪。現在要保證大家身體好，軍隊、學生、幹部都要身體好。當然身體好並不一定學習好，魯智深、李逵學習就不高明。學習要有一些辦法。

一定要規定九小時睡眠時間，只有九小時睡眠才能獲得八小時睡眠。初中現在上五堂課，多了一些，可考慮上四節課，一定要把娛樂、休息時間計算在內。現在積極分子開會妨

碍娱乐、休息、睡眠，应该减少这些活动。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要两方面兼顾。现在是学习太厉害了，后者却不够了。（周总理：还有工作太厉害。）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时间与娱乐睡眠二方面要相称，两方面要充分兼顾。

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睡眠、休息、玩也要抓。过去抓一头，那一头抓不紧或未抓（用手打比）。跟教育部的人说，要说服他们，你如果这样还是太松。工厂学校搞得紧，会太多，五多。现在要抓紧，减少会议次数与时间。一定要搞些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方面也来个抓紧。党中央已决定减少会议学习时间，你们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质问他为什么不执行？

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顾工作，而不顾青年的身体，则用这句话抵他一下。理由很充分，这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的成长，为了年轻一代更好地发展。我们一代吃大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有大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如果哭则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他们设想。

关于选青年干部当中委问题：周瑜那时当统帅，曹操下江南，谁当统帅那时成问题，就找个青年团员——周瑜，周二十九岁当统帅，要指挥黄盖等，老的就发生问题，大家不服，后来加以说服，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

现在“周瑜”当中委大家不赞成；党是否把年龄大的都挑选过来，年轻的不选呢？党中央选的就是年轻的，自然要挑选一批，不能统统按年龄，要按能力。原来九个三十岁以下的，现在六十几，超过四分之一，三十岁以上占了四分之三，还说少了。我说不少。六十余青年人是否称职，没有把握，如不称职则以后可改掉，可连选连任，有不连选的，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绝大多数以至全体会胜任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当然强，有经验，但其它方面却在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清楚，手脚慢，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充分相信青年人，可能个别不称职，不要怕不称职。

要说通那些不赞成的同志这样做：一是照顾青年特点，一是照顾团的系统工作，同时受各级党委领导，这总是不会错的。这不是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就这么讲。这是按事实，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搞青年团。这是普遍大量存在的事实。青年要长身体，因此工作情况就有不同。特别十四岁到十八岁。青年妇女与男子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你们不修改这一条，也许只有一百万拥护你们，八百万不拥护你们。

工作要放在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这样可能先进部分不过瘾，他们要严，但要说服他们。有人说团章义务多权利少，改了没有？（胡××：八条已改为七条。）还有七条之多？（李昌：已经缓和了些。）是要缓和一下，照顾几百万群众。不要只照顾几十万、一百万最活动的分子，要使多数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四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要自动退团，这个太严了。党章六个月，你们跑到党的前面去了。农村青年是比较散漫的，不能象学校、军队、工厂一样。搞六个月不行吗？

办不到的，厉害的，不要在团章上规定。“不要背后乱讲”也是这样，原则性要灵活执行。法律条文要执行，也还得几年。应当是那样，实际是那样，是有个距离的，如婚姻法彻底实行至少三个五年计划。许多条文是带着纲领性的。不歧视妇女，不打老婆，有一百万办到就很好了。把“不歧视妇女”划掉了也是因为办不到。反对自由主义是长期的，还是让人背后骂

罵，不准在背後罵一句話，事實上辦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有的人可以在房子里，有的在院子里，有的在中南海，在北京，在中國，走來走去還可以革命，只是不要到香港台灣。敵我界限要分明，搞掉自由主義就搞死了。有許多人只能搞這一套，黨內自由主義還不少。

威信是慢慢建立的。過去軍隊編歌謠罵人，我們就不禁也不查。軍隊還是未垮。我們只抓住一些大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慢慢上了軌道。羣眾對領導者真正佩服要靠了解，真正了解才相信他。你們團中央威信就很高。有些人不佩服，慢慢會佩服的。青年團只有四年歷史，×××剛上台不久，不是一個早上就會佩服的。小伙子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點批評不挨罵是不可能的。

小廣播是因為大廣播不發達，只要民主生活充分，當面揭了瘡疤，讓他小廣播，他就會說沒時間了。抓住大的，慢慢就會好了的。問題總是有的，不要以為一下子就都能解決，今天有，將來還會有問題的。

根據社會的發展，三個五年計劃基本上可以完成，工業化和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完成，不等於全部完成，三個五年計劃就是十五年，一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個大步就差不多了。國家工業化，就是說工業產值同農業產值相比較，是七與三之比。到了百分之七十，就可以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大概十五年可能達到百分之七十。講基本是謹慎的講法，世界上的事情謹慎一點好。

中國農業現在大部分是個人經濟，要有步驟的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能猛。發展互助合作組織，要建立在自願原則上。不去發展就會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是右傾。搞猛了也不行，搞猛了就是“左”傾。要有準備有步驟的進行。我們過去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只有準備但無把握也不打。你們這個會議是開得好的，你們算是有準備的。過去打蔣介石，開始犯主觀主義錯誤，後經整風，改掉了主觀主義，就打了勝仗。現在是打建設之仗。什麼叫建設？就是工業化，三個五年計劃基本上完成了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全國人民的總任務。青年如何執行，應有特殊規定，應照顧青年的特殊條件。

十年至十五年左右或者更長一點時間，時間不要公開宣布。在報上登載只說相當長時間。團內可傳開。資本家會不會吓一跳？吓半跳是會的。農民不怕者來，怕者不來，從少到多。現在組織起來的，東北是百分之八十，華北百分之七十，南方不同，要作一些精神上的準備和組織上的準備。北方，合作社也不能大發展，河北六千個合作社，一百四十六個縣。勸他們退社轉互助組的有兩千多戶。條件不夠，還是搞互助組。今年發展比去年多五倍，如果每年多五倍，那還得了。明年再加一倍，這樣速度是相當快的。發展合作社一要有羣眾自願條件，二要有幹部條件。要有許多辦法，才能做好。

對軍事工程學院成立與第一學期開學的訓詞

軍事工程學院陳院長和全體教授、助教、學院工作人員同志們：

當你們開學的時候，我向你們致以熱烈的祝賀。

在此時機，我并向熱誠幫助我們計劃與創辦這個學院的蘇聯政府、蘇聯專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的需要的是要有大批的能够掌握和驾驶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向苏联专家学习，这是我們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这点，对于你们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你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科学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专家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专家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骄傲。

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这在你们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能忘记的。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办好学院，尊重专家，努力学习，为完成人民军事委员会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1953年8月26日)

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了XXX、XXX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辉煌战绩及在这个基础上坚持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停战谈判，并获得朝鲜停战的光荣胜利，表示完全满意。中央人民政府感谢你们在这一正义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并对你们致热烈的祝贺和慰问。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在美国侵略军大举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逼近我国东北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地开往朝鲜，支援朝鲜人民军抵抗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两年零九个月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秉承着祖国人民的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在中朝人民的全力支援之下，在以伟大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各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同情和支持之下，顽强战斗，坚持谈判，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疯狂侵略，揭露了敌人残暴好战的真面目，使敌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道义上都遭受了严重失败而不得不接受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业绩，树立了中朝人民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辉榜样，表现了我們和平民主阵营的坚强团结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尊敬和赞誉。

朝鲜停战的胜利，根本粉碎了美国帝国主义併吞全部朝鲜进而侵略我国东北的狂妄计划，保卫了中朝两国及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打败了侵略者的凶焰，大大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争取持久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勇气和信心。中国人民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及其军队一道，以自己的胜利的榜样向全世界人民昭示了一个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阴谋是必须

击败和能够击败的；只要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侵略战争，坚持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问题的争端，那么，和平就一定能够得到保证。

朝鲜停战的胜利，是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运动的胜利。但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还只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问题在朝鲜人民自己处理自己问题的精神下的和平解决，尚有待于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去协商解决。中国人民是一贯主张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中国人民愿为和平解决国际问题作坚强的后盾。

鉴于美国好战分子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正在进行着种种阴谋，企图阻挠和破坏政治会议，并进一步破坏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全体同志必须提高警惕，继续努力，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加强战斗力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更紧密地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坚守阵地，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挑衅行动。

全国人民将以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加强国防力量，继续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将尽力来帮助英雄的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平生活。

我们深信：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同志在祖国人民的鼓舞和支持之下，必能不负祖国人民的期望，为保障朝鲜停战协定的彻底实施，为争取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而继续努力！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永久友谊万岁！

（注：本文是毛主席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起草的一份电报。）

关于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谈话记录稿）

办好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疆，无论大中小县，都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少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要分配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不要超过三个？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收兵。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十月开会后，十一月、十二月，明年一、二月，北方还有三月，有四、五个月可搞，明年三月开会检查。这次就交代清楚，明年二月是要检查的，看看完成的情况怎样。

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可以不搞。个别县，工作很坏的县，比如说落后乡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县委书记很弱，一搞就要出乱子，可以暂缺，不派数字，但

是省委地委要負責幫助整頓工作，准备条件，明年秋收以后，冬季要搞起来。

一般規律是經過互助再到合作，但是直接搞社也可以允許試一試。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較快的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級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社这件事，看做极为重要的事。个别农民，增产有限，必須发展互助合作农村陣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領，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領，难道說既不走资本主义，又不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時間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资本主义，如果又不去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总路綫，总綱領；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十月开会，你要講一下。

“確保私有財產”“四大自由”，都是有利益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又要守呢？（法律是說保护私有財產，无確保字样）法律不能廢除，現在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化，互助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化，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以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戶的大合作社代几戶鳏寡孤独，問題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可以带一点，应加以研究。該搞中的，就搞中的；能搞大的就搞大的，不要看見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戶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百戶。在大社之下設几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創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所謂办好，也不是完全都好。各种經驗都要做好，不要用一个規格到处套。

老区應該多发展一些。有些区可能比老区发展得快，例如，关中可能比陕北发展得快，成都壩子可能比阜平那些地方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觀點。东北其实不是老区，南海与关内后解放的地区也差不多。可能江苏杭州嘉湖一带赶过山东，华北的山地老区，而且應該赶过。新区慢慢来，一般可以这样講，但有些地方干部强，人口集中，地势平坦，为了搞几个典型，可能一下子較快的发展起来。

华北、山东，华北現有六千，翻一翻——摊派，翻二翻——商量，一翻半或两翻，华北也是这样。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額完成，情緒很高。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質高，成本低。所謂成本低，就是不出廢品；出了廢品，浪费了农民的精力，落个影响很坏。政治上蝕了本，少打粮食。最后的結果是要多打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沒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

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不能多产蔬菜也沒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集体农庄）。当然要搞的細致，种菜不象种粮，粗糙更不行。要典型試办，不能冒进。

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銷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現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均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要大大超过，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的矛盾問題。是私有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

个人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人所有制，必須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級的，土地入股；有高級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建。一个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經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合营，統一于社会主义）这才是提高生产力，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矛盾。

在接見西藏國慶觀禮團時的講話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

我們要和各民族講團結，不論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團結。例如鄂倫春族還不到兩千人，我們也要和他們團結。只要是中國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對帝國主義，主張愛國和團結的，我們都要和他們團結。團結起來，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區的不同情況進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點，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點，不論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沒有商量好就不勉強做。商量好了，大多數人贊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去做。商量辦事，這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不同的地方。國民黨勢力大就壓人。他們不僅壓迫少數民族，還壓迫大多數漢人。國民黨是做壞事的。壞事是不應當做的，我們的幹部有了錯誤就應當批評。我們在西藏的工作有什麼缺點和錯誤，請你們講，你們不同意的和你們認為不利於人民的都可以講，便於我們糾正。有了缺點就馬上糾正，這是我們和國民黨不同的地方。

整個中國現在還很落后，需要發展。這是因為過去有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壓迫的關係。他們現在已被我們趕走了，這四年來我們就有很大進步。在國家經濟恢復以後，今年開始了第一個國家建設的五年計劃。預計在三個五年計劃以後，我們的大工業就建立起來了。蘇聯在三十六年前趕走了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壞人，建設了三十六年才有現在的成績。我們建設起來比蘇聯還要快些。因為我們有蘇聯的幫助。中國人口很多，有五萬萬幾千萬，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土地也很廣大，有三個五年計劃就能建設得很好了，對西藏就會有更大的幫助了。

中央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助你們的一定會幫助你們。幫助各少數民族，讓各少數民族得到發展和進步，是整個國家的利益。各少數民族的發展和進步都是有希望的。

西藏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的發展，主要靠西藏的領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幫助。這點是在和平解決西藏辦法的協議里寫了的。但是要做還得一個時間，而且要根据你們的志願逐步地做。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數人同意了，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讓大家都高興，這樣反而就快了。總之，我們的方針是團結進步、更加發展。

對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

做一切工作，必須切合實際，不切合實際就錯了，切合實際就是要看需要和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條件，經濟條件和幹部條件。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現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潛力很大，如果不去發展，那就是穩步而不前進。（腳本來是走路的，站着不動那

就錯了)有條件成立,而去強迫解散它那就不對了,不管那一天這都是錯的。糾正急躁冒進,總有一股風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應該吹倒的,象大名府四百幾十個社只剩下五十多個了,倒了幾百個,其中有倒錯的,查出來講清楚,承認是錯誤,不然,那裡的鄉幹部、積極分子就要憋着一肚子氣了。

要搞社會主義,確保私有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影響。“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在個體經濟基礎上搞農貸,發救濟糧,依率計征,依法計免,打井開渠,小型水利,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步犁水車,噴霧器,六六六,反對五多等等,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會主義,只從小農經濟基礎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這些好事跟社會主義總路線聯繫起來,就不是小惠了,不與社會主義聯繫起來,就是小惠。至於“確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裕中農和富農。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有句古語“綱舉目張”,拿住綱,目才能張。綱就是主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且逐步解決這個矛盾,這就是主題,就是綱。提起了這個綱,那麼反對冒進,克服五多,以及一切幫助農民的政治工作,經濟工作,一切都有統屬了。

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內社外都有矛盾。合作社是半社會主義的,社外的個體農民是完全的私有制,這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個體農民在供銷社入了股,這一部分股金所有制上也有變化,他也有了一點社會主義)。互助組跟農業生產合作社不同,互助組只是集體勞動,並沒有觸及所有制。同時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個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農具入了股,在社內,社會主義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這個矛盾要逐步解決,到將來,由現在這樣半公半私進到集體所有制,這矛盾就完全解決了。我們所採取的步驟是穩的。由社會主義萌芽的互助組,進到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將來也叫農業生產合作社,不要叫集體農場)。一般講互助組還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

有一段時候,曾經有幾個文件沒有提到互助合作,我都加上了發展互助合作或者是進行必要的和可行的政治工作,經濟工作這一類的話。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因而就特別反對干涉農民過多,那個時候也確實干涉過多。上面五多,條條往下插,插得下面很亂。五多那一年也不行,不僅農村不行,城市也不行,軍隊也不行。主觀主義一萬年也是要不得的。發了幾個文件,反對干涉過多,這有好处。但什麼是干涉過多呢?不顧需要和可能,不切實際,主觀主義的計劃,或計劃倒合實際,但用命令主義的辦法去做,那就是干涉過多。主觀主義,命令主義,一萬年也要不得。不僅對於分散的小農經濟要不得,就是對於不分散的合作社,主觀主義、命令主義也是要不得的。不要把需要做,可能做的,做法又不是命令主義的,也叫做干涉過多。檢查工作,應該用這個標準去檢查。凡是主觀主義的,不合實際的,都是錯誤的。凡是用命令主義去辦事,都是錯誤的。穩步不前,右了;超過實際可能辦到的程度勉強去辦,“左”了,這都是主觀主義吧!都是錯誤的,檢查工作應該本著這個標準。冒進是錯誤的,可不辦的不辦也是錯誤的吧,強迫解散也是錯誤的吧!

“農村苦,不大妙,措施不符合小農經濟”,黨內黨外都有這種反映。農村是有一些苦,但是缺乏恰當的分析,其實並不是那樣苦,也不過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糧戶,其中百分之五是很困難的,鰥寡孤獨,沒有勞動力,但是互助組合作社可以給他幫點忙,比起國民黨

时代总是好得多了，总是分了田。农民是苦，但也发了救济粮。一般农民生活是好的，向上的，所以说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农村人口中间，有百分之七左右的地主富农对我们不满，其中地主和富农也有区别，就是地主中间，也有一部分他的子女在城市工作，一个月寄十多万块钱（按：指旧币）回去，他的生活也并不苦。“农村苦，不得了了”。我历来就不是这样看的。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互助合作搞合作社，这不仅是方向而已，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是解决总路线问题，批评薄一波的错误，也是关于总路线的问题。总路线，概括的一句话就是：国家工业化，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展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改革政策要交待清楚，交待政策这件事很重要。你们说“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没多大问题，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开展第二个战役。其中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讓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世界上有许多新生的正确的东西，常常是非法的，我们过去就是非法的呀！国民党是合法的。可是这些非法的社坚持下来了，办好了，你不能不承认嘛？还得承认他是合法的，他还是胜利了。积极领导，稳步发展，你们讲了，但是还要估计到会还有些乱子出来。你说积极领导，做起来他会不积极领导，或者不稳步发展。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数字控制数字，派任务，以后再检查完成没有，这就是积极稳步。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现在据检查，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社减产，办得不太好，这是没有积极领导的结果。当然有少数社没有办好，减了产，这也是难免的，但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多的社减了产，那就是问题。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都是合法的，但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区干部，县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他们不办社会主义之事，他们做什么，办个体经济之事吗？）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书记，中央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并不是要费很多唇舌。中央现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社会主义之事上。办资本家之事，也是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比如现在在全国工商联开代表会，也是办社会主义。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蔬菜的生产供应，主要是有计划供应，不仅大城市，象鞍钢，新发展起来的都市，人口很集中，没有蔬菜吃，那能行呢？东北局农村工作部要负责解决这个问题。在城市郊区蔬菜生产，搞互助组，有先后矛盾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合作社，甚至集体农庄，可不可以研究一下？

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以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五七年可到七十

万个。可是要估計到，可能有时候突然发展一下，可能是一百万个，也許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次会开得有成績。现在不开，明年一月再开就迟了，今冬就錯过去了。規定明年三月二十六日再开会，要檢查这次計劃执行得怎样。这次会决定了下一次會議的日期，并决定下次会檢查这次會議执行情形，这个办法是公安部提出来的，很好。明年秋天还要开一次会，討論規定明冬任务，早一点，九月二十六还要开一次会，提早一点，布置冬季工作。

给徐悲鴻的一封信

靜文同志：

十月間的信和徐先生所繪的奔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茲派×××同志詢問你們的情况，如有困难，請告知为盼！

順致敬意

毛澤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对学校领导骨干、教材等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

1、领导骨干：大专院校，中学必須有骨干。骨干配备大专由中央組織部負責，中学由地方負責，从宣傳部門，青年团干部下去。有了好校长就有好教师。

2、教材問題：集中力量編，語文、历史等原則問題，由陈伯达同志等解决。

3、整頓小学：防止过左，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要照顧农村特点。私塾也要讓其存在。小学有三类：（1）中心小学、完全小学；（2）一般小学；（3）速成小学。小学問題主要便利农民子弟入学。教师只要不是現行犯，不做反革命宣傳就可存在。对超齡学生不应赶出，首先教好。民办可办，不要求太严，羣众需要自愿，学費可收。五年一貫制暫緩执行，提早了。小学生不能都升学，这不叫失学，要加强劳动教育。

4、学生健康，高中大部分要有助学金，要增加营养，減輕負担。

5、教育工作重点和关键：重点，高等学校和高中，关键問題是师資。中学要重点办好一批。如何办好高中，这是我們的重点任务。

6、招生要注意成分。

7、速成識字法，在农村有局限性。应是羣众自愿的业务教育。

8、中央教育部任务：（1）方針計劃；（2）教材。

9、总的方針和工作重点：过去主要毛病是盲目冒进，不能适应建設，我們任务是培养干部和逐漸（适应）生产发展，目前在培养干部。

青少年的教育

(一九五三年)

魯迅有一篇文章，題目是“从孩子的照相說起”，魯迅很懂得这个事情，他提倡孩子要活潑，要頑皮。他說“馴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許簡直倒是沒出息。”（《魯迅全集》第六卷第84頁）在有些地方要讓我們的后一代学我們；但有些地方就决不要后代再学我們，再学我們就糟糕。我們总是中孔夫子的毒太深了，不仅学校如此，就是托儿所也要很好注意。現在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还好，一送到托儿所就“机械化”了。在这些方面，我們要下很大的功夫，用很多方法，把我們的青年、儿童变成朝气蓬勃，生龙活虎一样。有这样的人民，建立这样一个国家，那我們中国就了不起。要懂得人在幼年、青年的时候，正是性格、品質慢慢形成的时候，如果在这方面不会教育他們，将来的損失就很大。

给李×的一封信

××兄：

七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覺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讀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錯处，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張物質的第一性和意識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說的实用和效果，和我們所說的大体同样的名詞，需加以比較說明，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九句話，也須作明確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議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場合，加以說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几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都懂得一点馬克思主义哲学。未知以为如何？

順致敬意

毛澤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关于国家預算的指示

(一九五四年六月)

增产、節約、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預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綫。

宪法草案公布时的话讲(记录稿)

(一九五四年六月)

一、恰当地正确地总结了經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經驗；建国以后各方面建設的經驗；同时又总结了反面的經驗（历史上各种宪法），并且总结了外国的經驗，但以自己民族的經驗为主，资产阶级有革命的东西，也不能全部否定。

二、恰当地正确地結合了原則性与灵活性。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則貫徹在各方面。灵活性，統一战綫，逐步实行。不逐步就“左”，不实行，就右，社会主义的原則性与逐步实行的灵活性相結合。少数民族有他的共同性和特殊性，根据特殊情况制定单行条例。

宪法可以实行，而且必須实行，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員，不实行，要彈劾（共产党员犯罪，要开除党籍）。有了宪法，全国人民就有了清楚而正確的道路，这是全国人民的总章程。这在国际上还发生很大的影响，宪法有民族性，又有国际性。

究竟要多少年进入社会主义，这话不要講死了，十五年只能打一个基础。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国家主席的权好象太小了。有些条文沒有写进去，并不是谦逊，而是不科学。科学，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該多少就多少。对古人今人都不能迷信，对了就信，不对就不信，我們不提倡崇拜偶像。

在宪法公布后的指示

(一九五四年六月)

我們要纠正领导上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錯誤，革命人民一定要有請愿、罢工、罢課的自由，我們是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前进嘛！领导上有錯誤允許人民公开批評嘛！小字报、大字报、大辯論、大批判都是很好的形式。

在阿尔巴尼亚大使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三日)

大使同志：

我非常愉快地接受您所呈递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議会主席团任命您为駐中华

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的国書，并衷心地感謝您的祝賀。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勤勞勇敢的人民，它具有光榮的革命的歷史傳統。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后十年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一切破坏阴谋，满怀信心地建設着自己的美好生活，并取得了光輝的成就。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設和捍衛祖國的獨立和安全的斗争中所表現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比的劳动热情，使中国人民感到欽佩。

中、阿两国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五年来，我們两国人民已結成了兄弟般的友誼。我深信：在互派大使之后，我們两国之間的真誠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獲得进一步的发展，这不但有利于我們两国人民幸福的增進，并有助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加强。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中、阿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謹祝您在工作中獲得完全的成功。

对 卫 生 工 作 的 指 示

——在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央卫生部党組报告时所作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一、关于中央卫生部向中央的报告要点，和中医工作指示草案，毛主席指示，这个报告写得很好，特別指出这次檢查卫生部工作的方法很好，开了二十多次会，从下面提出許多意見，翻了个底，这样方能解决问题。单是上面講話还是不够的，必須靠自下而上的批評，这样才能解决得透，解决得好。单从上面解决问题，总有一定的片面性；和自上而下的批評結合起来，看法才能全面，解决才能完全正确。他說，这种办法在今年夏季的全国財經會議用过了，解决了大問題；文委也用这个办法来檢查卫生部的工作，結果也很好。这种办法應該提倡。

二、毛主席指出，卫生工作的队伍很大，单是国家卫生工作人員就有二十几万，他要管的是五亿多人口的生、老、病、死，这真是一件大事业，极其重要。因而我們的責任很重。

三、毛主席說，几年来全国卫生工作的成績很大，但是缺点也很多很大。他指出，卫生工作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政治工作少了，馬列主义、社会主义太少了。

技术是不是多了？也不見得。医疗、医病都有許多問題沒有很好解决。正因为政治太少了，技术也管不好。

毛主席最着重指出的是：党必須领导一切，必須领导卫生工作。他說，“卫生部党委领导同志認為卫生工作是特殊的技术工作，中央不懂技术，我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报告了中央也不一定有办法，因而許多重大問題沒有請示报告；認為文委是文化机关，尽是文

化人，不懂医学”，因此，“对文委领导有一种不够尊重的情绪”。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说，从这种逻辑出发，×总司令就不能当海陆空的总司令了，因为他不能开坦克，驾飞机，打大炮呀！但×总司令完全能当总司令，因为我们是用政治来领导军事。毛主席说，“你不懂这一门，你就不能管我”，这种思想是相当多的，也不仅卫生部门有。在我们的军队中，军事不服政治管的问题，是经过长期斗争才解决了的。卫生部门必须用最大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党要领导一切：要领导飞机大炮，领导生且净丑，领导生老病死，就是说，要领导军事、经济、文教卫生和其他一切工作。任何专门的东西，党都要去领导。譬如唱戏，党也要领导。毛主席说，×××唱戏唱得好，但他唱的只是旦角，不唱生、净、丑角，旦角中他只唱青衣，别的也不唱。他是很专的。他不能领导别的。如果他来当主席，就当不好。但是我们的党领导他，领导戏剧艺术的发展和提高。

我们凭什么来领导？毛主席说，我们要用政治来领导。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领导工作就是政治工作。离开政治就说不上领导。他们当卫生部长的，自己的职位就是作领导工作，也就是作政治工作。毛主席批评过去卫生部几位副部长的分工办法，谁管政治，谁管业务的办法是错误的。在旧中国，官僚们有所谓政务官，军事官之分。在我们这里，可不是这样，也不能是这样。凡是领导人都应该政治领导。作为领导人，只管技术，只记得技术，只管皮下注射肌肉注射，势必政治挤不进去了，没有政治领导了。作领导工作的人都要懂得党的工作，懂得作群众工作，决不能只管医务，不管政治工作。

卫生工作一定要受党的领导，决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毛主席问周总理，卫生部的重要文件经过政务院通过批准的多不多？周总理说很少。毛主席说，人家是独立王国，就不受你管！

四、毛主席也着重地批评了卫生部缺乏集体领导，并且指示了应该怎样进行集体领导。他说，××同志积极负责，就是说骨干是好的。但单干、盲干就不好了。盲干就是忽视党的领导，忽视政治对业务的领导。单干就是不要集体领导。大家知道，集体领导是我们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同志在自己的检讨中说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往往不经组织的认真讨论，即由个人决定，独断专行。毛主席指出，这种单干的作风就要把事情办坏，使自己孤立。这也不能说明个人的个性强，这不是真正的强，而是弱。毛主席指示，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耐烦地和人家商量问题，遇事和群众商量，和上中下三方面商量。自己以为什么都正确，这是完全行不通的。领导者必须讲道理，有说服力，这样才算真强。党组开会要认真准备，要虚心争取大家的意见，要学习中央开会的办法。

五、毛主席着重指出，我们的医务部门领导人员中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其具体表现就是那种不愿受党的领导，缺乏政治，群众观点薄弱，不要集体领导等思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全国卫生队伍中相当普遍，我们一定要加以批判。

六、中央卫生部工作经过检查后，已开始有所转变。但同志们信心还不够，这首先领导上要有决心。毛主席指出，中央卫生部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同志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挂在××同志一个人帐上，其他同志也应负一定责任。他希望中央卫生部的领导工作要有个彻底转变。他问××同志有这样的决心没有。××同志回答说有这个决心。……毛主席说，这主要要提高思想，转变作风，这次会议一定要开好，使大家有信心。

七、关于业务方针上的几个问题，中央对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任务基本上都同意。

关于中医问题，毛主席说，我认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项。中医是在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医是在近代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宝贵的经验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其不合理部分要去掉。西医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也有机械唯物论。将来发展只有一个医，应该是唯物辩证法作指导的一个医。看不起中医是错误的。把中医提得过高了，也是不适当的。中医医院可以试办。中医进修问题，让他们学一些基础医学知识是可以的，但应该加入中医临床经验课程。医院可以请中医看病，治好了要向他学习。中西医的名称是不妥当的。

八、城市、工矿卫生，城市医疗要改革，要革命。

关于学术思想批判的指示

——与陆××、周×的谈话

(一九五四年)

毛主席说：不是没有警觉性。我们有些党员就是保护那些仇视马克思主义的。自己不反对马克思主义。还反对别人反对。

俞伯平的唯心论是很明显的，把家谱孤立起来看，他的批评标准是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是客观唯心论和相对论。

对资产阶级合作，政治上是朋友，但不能把他捧为父亲，不能放弃原则，接受他们的意见是对我们有利的才接受。如共同纲领是在党的领导下搞的，而古典文学是他们领着我们搞的。

要在学术各部门清除唯心论。

整个学术界和文艺界主要是投降主义，光是反自由主义还不该，因为不能包括一个阶级思想反对另一个阶级思想。很多战线上没有战士，没有斗争。很多党员是吃、睡、休息。

第二个问题：学术界缺乏批评。“官书”为什么不能批评呢？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说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也还可以批评哩。鲁迅之所以使人感到亲切，就是把自己思想告诉读者。

怕批评后抬不起头是不对的，总是有些人抬不起头来。当然改正错误后他可以抬头。

进行批评应有充分理由，若一律抹煞、武断，这是军阀主义的，我们要这样就要失败。有些有待证明的都可以讨论。思想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见也可以坚持，也不一定是错误的，开始时对的总是少数。各家意见都可以暴露，特别是我们都缺少学问。红楼梦问题不要急于做结论。学术问题要开学术会议来解决，不能由中宣部来做。

第三，关于扶植新生力量。几个部门都不注意这一点，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老干部要好好帮助青年作战。老干部往往缺乏生命力。注意青年，招募新战士，这是领导的作用。

要注意“小人物”。任何有成就的人，过去都是“小人物”。在我们生活中，文化工作中没有“小人物”是不成的。……在大学中要培养助教，重点放在培养青年。要相信一代好似一代。

影片《清宫秘史》很多人以为是好的，毛主席以为是错的，到义和团时我们拥护光绪就是拥护帝国主义了。还有梁思成的建筑，既不经济，也不好看，穿西装戴瓜皮帽。印刷机和广播器没有民族形式。

文字是要拼音的，但现在注意字母的样子太不好看了。若用民族形式就好推行了。这有个民族心理问题。毛主席最后说：我今天讲的是个意见，不要看成不能动的。更不能用作打击别人的力量。

对俞平伯的斗争应该停止了，应转到批判胡适的思想。特别借此向全国人民宣传唯物论思想。唯心论，唯物论要作些通俗宣传。

这次斗争要分清敌、我、友。对敌要打击，敌方就是有些进步的东西也不要鼓励，我方的缺点也不要急于批评，对朋友要保护。不要把战线弄乱，一团混乱。

斗争由中宣部领导，郭老挂帅。

对中医工作的指示

(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

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人民所以能够繁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须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从有史以来的卫生保健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

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如对中医举行考试，内容有生理、病理等课程，考不及格就不发给证书。另外，还有中医条例，中医进不得医院等）。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也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就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思想要改变。

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一、要抽调一百名到二百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而且学习应当抱着很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二、各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院看病和会诊，允许住院病人用中药，并提出尊重中医的各种制度，从制度上加以保证，使中医到医院里作诊工作不感到困难和顾虑。三、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罪过。所以对各省生产药材应加以调查保护，鼓励生产，便利运输，改进推销。譬如，有些药材因培植时间较长，由种植到培

植收穫需二、三年以上，如白芍为四年生植物，黃連为六年植物，个体农民往往沒有力量种植，又如有利产药地区，如甘肅、青海交通不便，生产的药材不能及时运出，农民往往把药材当作燃料了。过去一些中药因加工設制的技术不良，浪费很大，包装和貯藏方法不好，霉烂损坏的现象很严重，亦应加以改进。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今后应采取公私合营，制药人員应按技术水平分別給予技术干部看待。至于对中药研究，光做化学分析是不够的，应进而做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特别是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

四、中医書籍应进行整理，过去由于难懂，再加不重視，无人整理。中医医書如不整理，就将絕版，应組織有学問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那些有用的，从古文譯成現代文，时机成熟并組織他們（总结）自己的經驗，編出一套系統的中医書來。

为了实现以上种种工作，首先在于糾正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只要思想上有改变，上述各种工作才能贯彻。

今后那一級卫生行政部門如作不好这个工作，就将被撤职……。

关于中医问题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四年冬）

我認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项。中医在手工业、农业的生产基础上产生的，对金、木、水、火、土的理论可以加予批判，宝贵的經驗必須加以保护和发揚。批判必須懂得，什么叫科学，正确的、系統的知識叫科学。西医是否科学，也带有唯心的，象机械唯物也需要加以改造。中国应有一个医，不应该长久的有两医，西医名称是不妥当的，应有唯物辯証的一个医。有的人看不起中医，看不起中医是錯誤的，也有人把中医強調得太夸大了，也是不对的。中医医院要有重点的試办，中医进修問題，对其进修基础課是对的，应加入經驗交流課程，講中医药理恐有困难。

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的五项任务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第一，协商国际問題。第二，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同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級組織組成人員的人选进行协商。第三，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生活中各阶层相互关系問題；并联系人民羣众，向国家有关机关反映羣众的意見和提出建議。第四，协商和处理政协內部和党派团体之間的合作問題。第五，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努力进行思想改造。

（《人民日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摘录)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所謂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給予我們的。我們知道，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們在我們党內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們則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們方面。对于他們，我們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想一想我們的历史就会懂得这个道理。我們在一九二一年剛剛建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样渺小，后来发展起来，居然把国内强大的敌人給打倒了。自然界这个敌人也是有办法制服它的。

※ ※ ※

不論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質來說，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他們的数量如何龐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們可以藐視而且必須藐視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放在“不在話下”的位置。这就是我們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們更多地懂得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話，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規律，少犯主观主义的錯誤，我們的革命工作和建設工作，是一定能夠达到目的的。

※ ※ ※

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圍着我們，我們必須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襲击。因此，我們在精神上 and 物質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致于措手不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殘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們必須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証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安全。如果我們在上述两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以避免敌人給我們的重大危害，否則，我們可能要犯錯誤。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三月)

对待一切犯了錯誤，有所觉悟，愿意进步的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看一看，等待他們改正錯誤，而且要帮助他們改正錯誤，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綠叶扶持。一个籬笆打三樁，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尤其是犯了錯誤，更需要別人帮。“看”，等待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是必要的，不过是消极的。必“帮”，帮

助犯錯誤的同志早日改正錯誤，这才是对待同志的积极态度，……必須懂得，集体領導和个人負責这两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結合的，而个人負責則和違反集体領導原則的个人独裁，完全是不同的两件事。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閉幕詞(摘錄)

(一九五五年三月)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說过：“共产党人認為隱瞞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我們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說是党的高級干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應該随时公开說出自己的政治見解，对于每一重大的政治問題表示自己或者贊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絕對不可以学崗高、饒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鑒于种种历史教訓，鑒于个人的智慧必須和集体的智慧相結合，才能發揮較好的作用和使我們在工作中少犯錯誤。

同志們：我們現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約三个五年計劃期間，使国家基本工业化。

同志們！我們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

……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們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讓路。”

但对待困难：

(一)在战术上必須重視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困难，我們都要采取認真对待的态度，創造必要的条件，講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將它們克服下去。

(二)在战畧方面，我們要藐視困难，就是說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們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謂困难，无非是敌人和自然界給予我們的，——而这却不过是垂死的力量，我們則是新生力量，真理是在我們方面。对于他們，我們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不論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質來說，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因此我們可以藐視而且必須藐視人世遭遇的任何巨大困难，把他們放在“不在話下”的話里，这是我們的乐观主义。

在中央常委会上的指示

(一九五五年春)

去年責成×××同志把中医工作總結檢查一下，今年发现下层对中医中藥有抵触情

緒。賁成××同志限期把中医中葯做出成績。

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有得到解放，中国六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数量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但很少向领导反映，原因是中医古野，西医当权。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历史証明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設立机构研究中医葯，中医进修西医化了，說中医不科学，是有其不科学之处，但不能过早的批評，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們，各机构中应有他們的成分。看不起中医葯，是奴顏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階級思想，几年来未做出成績是不对的。……

今后医科大学毕业生要学二年中医。

应当看到中医有本事，要当专家来看，按专家接待和待遇，因为中医功劳大嘛。反对中医間的宗派，加强中国医药的研究。（对賀誠說）河北不是有个祈州嗎？（賀誠說：有。）那是中葯的集散地，商业部門必須加以研究。

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

（一）理論

开会要先有精確的文件，不要凭口講，很危險，文件为凭，通过中央。“五一”“五二”均有文件，每一条均經中央看过，关系几亿人口，不可一轟而起、而念、而散，就了事。

（二）調查几个典型，找人派人来，太多了就害了事情。抗战时晉綏二十个乡典型材料不能做結論，（被批評过）形成一片黑暗。任弼时一个乡解决問題。

河北，解散百分之六，退出百分之七，貧农哭臉不退，还有一部分不愿意退。

不算大帳，只算問題件数，怎么行？你們鑽到工作里不出来。

粮食也是，春天很苦，秋天又好了。五三年春天都說苦得不得了，党内党外均叫，不謀而合，夫唱妇随。

今年又报告元帅，大势不好，我說再探，大事好，小事不好。麦子好，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四好，何以不好？这不是生产积极性，是消极性，我前后調查了十六个省，百分之九十八大体还好。你們心中无数，百分之八十五农民改善地位，大体好。这样講，半分鐘說清楚了。你不說大数，只說小数。

（三）中央五一、五二年均提出合作方針。五三年来北京的人，閉口不談改造，毫无影响，“言不及义，难以哉。”我抗这个潮流，四大自由，个体經濟。共产党羣居終日，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个体經濟的小惠，要达到护国利民的目的，难矣哉。五一年，总路綫傳到省，五三年无人講社会主义。我放屁，很臭，无人听。

（四）你們搞社会主义，是逼上梁山的卢俊义，不情愿坐第一把交椅。取消这个比喻，因为你們不是俘虏。不过，你們那么高明，尾巴挺那么高！对社会主义不热心。五三年，西楼講好行小惠。財經会，中山解决总路綫。以后不叫贯彻总路綫，說是打倒大老虎，高

饒橫切一刀，許多人說話不確當。中央孤在無援，搬來××。你們自己有資本主義思想，四大自由，穩定農村經濟，整整一個時期嘛！

社會主義不是中心。我說了几句有名的話：“過渡時期”你們無興趣。高級幹部中資本主義空氣，不準備搞社會主義，不信請重新看看五三年財經會議發言。

我們批評薄和高饒兩個目的。我們為了把工作做好，而他們借此攻擊中央。

我放屁，社會主義之屁，總是香的吧！

冬季鄧子恢通了，天下太平了。

今天談農村工作：

1. 陳伯達發牢騷，他這個人不直爽，說沒問題——有問題，說沒有一——有事。副部長為什麼不能過問？拉屎撒尿睡覺以外，無第四件工作，雜牌副部長，有理由重視他。你們馬克思主義好象比我們高一些，雖高也要請教，不恥下問，他起草了兩個草案呀！

2. 你們既已知道中央總路線指示，五三年為什麼不講社會主義？一點不露，證明腦子裡一點社會主義沒有，滿腦子資本主義。我專門害人，講了言不及義，挖苦一番。

財經會議，恩來宣布那几句话（總路線的几句话）。會議上資本主義反資本主義，發言中不見社會主義。

你們的話不合中央要求。我們是修理好×××，高崗是橫掃一刀，你×××和我同山同鄉同志，當時不能和我一致。四月黨代會才解決問題，從此才變成同山同鄉同志了。你們要再看看演說，很不成話，尾巴那麼多，天下第三第四，很不健全，不是馬克思主義風格。

蒸酒磨豆腐，不敢稱師傅，總之未準備進入社會主義。

農村會議（五三年）鄧子恢發言，只在自己發言中，夾着點我的意見，不成體系。

改造已四年了，五一——五五，我黨已建立了廣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商業、合作社。對資本主義改造，一部分合營，大部分加工訂貨。廣大的互助組，——大批合作社（五一年已有了），各省市的人對這些大事物不認識。如此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商業、合作社，新鮮事物好象沒有看見。當時我在每個文件中都添上合作社。反五多，對的，但言不及義。四大自由，穩定農村經濟秩序，則是不對的。

這說明革命轉變，經過中央宣傳，首先是高幹間的宣傳，那時大家聽不進去。除高饒等外，均是好人嘛！

前年七月八日財經會議，十月農村會議，有些同志對高饒鬥爭不積極，有些同志不願自我揭發。李先念老實，比如他對農民問題改了意見，我直接派人去調查，都說大為改善。五三年大區來人都說苦，要減稅反查田定產，我很搖擺，但不知為什麼要反，是怕侵犯農民利益？犯了什麼罪？現在又搖到原來主張了，因為站在農民苦，站在保護私有，才反對查田。建設費中，工人担百分之九十，農民担百分之十，誰苦？

個體經濟不能產生這麼一點，一個工人頂幾十人，你們都不生產，工农是生產者，工农是負擔者。間接稅當然農民是不少的，七算八算還是工人多，對中國農民，我們的政策是穩的。

搞一萬件材料（死人、牲口、搶糧、萬件黑暗）集合起來不過百分之六。（河北）人百分之七，百分之九十四是鞏固的，百分之八十是真的。安平細雨鄉材料，二條路線，請求不

入社一年，認為蔣介石路線，全年合作化，百分之四十五退出，雙方舒服。

河北一個小社六戶，三戶貧農要辦，三戶中農不辦，還辦下去了。中農是動搖的，互利政策也不那麼靈，不揩油，他還是不來，抵抗社會主義優勢。非大勢強迫不可，心甘情願不可能，不會象吊膀子逛街那樣舒服。

強迫就是對中農的問題，第一個五年計劃大体還是貧農，中農要第二個五年，要和農妥協，除非完全自由（半妥協，抽象的話，傳出去出問題，統購中某些人不能和他妥協，但不是用刀子，而是要吃飯，一定要搞社會主義，不能不干，我沒有說過不要互利自願。）就是說要做宣傳教育工作，社會主義對他們無損害。就是讓他們不自由，不自由問題很大，全妥協妥協不成。

百分之七十一——百分之八十是農民，沒有中共中央加上省市黨委堅持不行。六、七個人決定大事，七百幾十萬人聽他們的話就是吃一餐飯，靠七百萬個人來表示意見，不成功，因合作不自由。簡單宣傳“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他說我不需要，宣傳這個叫不識時勢。

要承認自己馬克思主義不夠，去年決定發六十萬，成功的，五三年“農民苦”，不對。底子薄也是農民苦，反查田定產也不對，講錯了話的人要聲明。

高說，估計大局有利於他，只西南未定，錯了！

你們聽見風不和我說，梅蘭芳到上海演劇，還要拜杜月笙，為啥不拜我。

我好說挖苦話，為使人不忘記，致成為明日黃花，我好不客氣，客氣不習慣。

人們說糧食，損失農民積極性，要須知，糧食購七百亿——八百亿，我搞了八百八十亿，不到三分之一，三百五十亿回到農村，供應和日本、國民黨多不了很多。共產黨來了，增加了人口，多數是農民自己生的呀！從前農民照這樣供城市，軍隊比國民黨少，浪費少。

多購了點，不良結果是影響牲口和豬，實際畧多了點，如影響豬、牲口二百萬，因素多種，自然殺也是一條。回民就是殺牛的，河南項城打起來了，打也是好事，得到教訓。延安很多了，還是殺，皮價太貴。二百萬，河南殺六十萬條。但河南總數量是增加的。事物要有分析。

瘦弱有之，不是多數。

不積肥等十幾個例子，一講形成觀念，不分析。損害積極性不符合事實。只豬牛有點損失，三年內可以恢復。

不用幹部去調查，我用的是義士。幹部你要什麼，他來什麼。上有所好，下必有勝焉者。對合作社估計不妥的（陳雲報告，吸收你們的材料吧），沒有說好話，你們沒有看出來。

人人說統購，戶戶說糧食，一股風需要專政，堵風想辦法，堅持方針。

五億多人，多數，能順倒我們社會主義，要專政。

浙江可否恢復一下，“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不好。

黃炎培，得意的不得了，整了他一下。

專政，實際無產階級專政。只听農民的，他就要自由。中農不揩油還是不來，到了時候，考慮進不進。進不進那好？寧要不自由。貧農不一定能完全照我們，不見得。基本做到使中農不吃虧。有全是中農的，有貧農雖多的，堅持十分之三的中農當委員，貧農中農利害輿論就不一致。

大体過得去，使中農過得去。牲畜，私有公有，歷來經驗如此，公喂不利養育。

工作方法

先搞好文件，不要长，长了反不好。

全国性的，不是个别的问题，要有文件，使中央有所凭据，先让中央看看。×也可以参加，事先中央知道全部内容，免得口径不对，损失威信。

一年两次会，此次会议，文件未发，已迟了，落在后面了，要发一个章程，根据章程发议论。

是否要等到秋后估计？用不着，现在完全可以估计，否则是不信积极性。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巩固，粮食叫喊不到百分之五，现在完全可以估计的。那一年也要如此估计，尽管有许多缺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五三年财经会议，说各部路线错误，几十个财经部门看成基本上不对的。应是基本上是对的，但有缺点，这就清楚了。）此次有反革命，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人心稳定。

我号召上顶下压检查，解决百分之几。心中无数，吃了饭，开留声机，随便讲，锢住自己，最近又说合作根本不好。你们经过几次革命，为什么出这毛病。农村会议开后，中央又开，内部吵起来了。预先有个文件就行了。

插 話

1. (谈到山东曹县错误时)把少量错误扩大为全体。

2. 你们不是不听话，而是听另一种话。

3. 过渡时期每天都动盪，每天削弱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要动盪，不要稳定，一动就要地震，有四大自由，反而不稳定了。

4. 农民怕冒尖是很好的事。贫农的力量，社会主义的空气，你们倒要解除，成为资本主义万岁。正要你们怕。

5. 稳定新民主主义秩序，是概括四大自由等口号的总方针。

6. 湖南洞庭湖社开了一次会，如同俄国工党第一次会议了，但也是个历史不能抹杀。

7. 反对者坚决，我们更坚决，自己不坚定，无法坚定别人。

8. 十二种人，缺粮户、灾民、经济区、乡村手工业者、小商贩、渔民、盐、牧、林、船民、城市、自足户（百分之二十）、余粮户（百分之六十五）。据社会经济法则，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统购是生产关系与所有制有关，带有强制性性质，没有专政手段绝对办不到的，不能靠资产阶级。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挑皮，抢粮暴动都是生产力要挑皮，各种办法（饿肚办法——示威性质）。有的是假不进会进，要求资本，有的是真的，要注意，不注意要报应。大体是适合的，开花、种麦、搞肥料等等，也有小破坏。现在措施是稳定的，购粮减、征不加。一万二千干部下乡说服。

专政，资本家、地主、富农、余粮户某种程度要反对，靠无产阶级，靠坚决的同盟者——贫农。

你们看看历史，共和国成立标志着过渡时期开始，内部是五二年，但延安时即有国营工业、互助合作社，苏区即有社会主义因素，那要到四九年！

9. 农村会议，解决了揩中农油，很好，还要互利，等价交换，现在贫农基础太少了，不能完全建在他们身上，家族之间不是风平浪静，舆论争执不少。

10. 贫农贷款不去，贫农必揩中农的油，揩定了。中农的油一定不揩，也不可能。再过两年，大风刮进来，两条路，非来不可。

11. 增加支援。

12. 干部(有人說)“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不一定，上层也有不好的，高饒坏人，中間也不少，“下层糟”，很不好，工农基础，坏上层倒。百分之几糟，百分之九十几好，资产阶级也是百分之几能改造呀，不能全部糟，这是片面观点，那几句好听，不对勁。工农总不是剝削者。

13. 打电话，抓住組織問題。

14. 防左，要有季节，研究一下。秋收以前大发展，让他吹起来再说，收割以后，再估计五五年数字定了，又要数量又要质量，我們已訂了条約，河南百分之三十，空白手，无事做，为什么閑起来？要填满！他怕他烂，他一个不烂更不好，烂了再办好。房子死了人，还不住人？让他垮一批，春季开会节制一下，开天把会，一个人十五分鐘。

註：本文似记录不全，飞白很多，較难懂。如能参考农工部的工作情况(統購、合作化)及党内斗争(反高饒)的背景，要好些。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的按语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

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記”的“我的自我批判”，我們到現在才把它和舒燕的一篇“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讓胡风利用我們的报纸繼續欺騙讀者。从舒燕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讀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視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讀者从胡风写给舒燕的那封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絲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嗎？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們曾經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聞”、“新聞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的一模一样嗎？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場”，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傳統反抗各种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場”，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綱領”，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話，能够使人相信嗎？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場”的知識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們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的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視和痛恨的态度嗎？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剝去。胡风反革命集团中象舒燕那样被欺騙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們应当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

料。隱瞞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轉变为退却(即檢討)的策畧，也是騙不过人的。檢討要象舒蕪那样的檢討，假檢討是不行的。路翎应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們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銷毀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剝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騙人的檢討。剝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按语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編者按：自从舒蕪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发表以后，人們被胡风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所激怒了。本报已經收到全国各地各界讀者写的大批文章和信件，他們一致要求彻底揭露胡风及其集团的罪恶，这种憤怒的情緒是不可抑止的。但是，有些同情胡风、或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們在說，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罢，現在請看第二批材料。

现在发表的材料，是从胡风写給他的反动集团的人們的六十八封密信中摘录下来的。这些密信都是胡风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在这些信里，胡风恶毒地污蔑中国共产党、污蔑党的文艺方針、污蔑党的負責同志、咒罵文艺界的党员作家和党外作家；在这些信里，胡风指揮他的反动团体的人們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秘密地有計劃地組織他們向着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綫猖狂进攻；在这些信里，胡风唆使他的党羽們打进共产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据点，扩充“实力”，探听情况和盜窃党内文件。在这些信里，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解放以后，胡风更加施展了他的两面派手法：公开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还要順着”党和人民；而暗中却更加紧地“磨我的劍，窺測方向”

“用孙行者鑽进肚皮去的战术”，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当他向党举行猖狂的进攻失败以后，他就赶紧指揮他的党羽布置退却，“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准备好每人一套假檢討，以便潛伏下来，伺机再起。这就証明了胡风及其集团的反革命阴谋的极端严重性。我們必須加倍提高警惕，决不可中了他們假投降的詭計。

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的通信，大部分采取了鬼鬼祟祟的、隱蔽的方法。胡风和他們相約，在信中使用了各种代号和隱語，信上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負責同志、文艺界負責同志和党员作家，都用了代号。收信人的名字和胡风自己的署名也很不一致，信封上的名字往往是收信人的妻子或其他人；信末的署名也經常变化或不署名。胡风的許多信用的是《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的信封信紙，許多信封上写的是“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罗寄”“上海青年报罗寄”“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張寄”或其他机关名称。

下面就是从这些密信中摘录出来的材料，按內容分为三类，每类大致按写信的时间先后排列，并加必要的注釋。信中旁点都是原有的。

按：胡风所謂“輿論一律”，是指不許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見。这是确实的，我

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一個社會，無論何時，總有先進和落后兩種人們、兩種意見矛盾地存在着和鬥爭着，總是先進的意見克服落后的意見，要想使“輿論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只有充分地發揚先進的東西去克服落后的東西，才能使社會前進。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於革命的反抗，制止他們的復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這就使胡風等類反革命分子感到“輿論一律”對於他們的不方便。他們感到不方便，正是我們的目的，正是我們的方便。我們的輿論，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內部，允許先進的人們和落后的人們自由利用我們的報紙、刊物、講壇等等去競賽，以期由先進的人們以民主和說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們，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種矛盾克服了，又會產生新矛盾，又是這樣去競賽。這樣，社會就會不斷地前進。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暫時歸於一律了；但不久又會產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須要克服。在人民與反革命之間的矛盾，則是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之下對於反革命的專政。在這裡，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專政即獨裁的方法，即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裡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這個問題上，胡風等類的反革命分子好象振振有詞；有些糊塗的人們在听了這些反革命論調之後，也好象覺得自己有些理虧了。你看，“輿論一律”，或者說，“沒有輿論”，或者說，“壓制自由”，豈不是很難聽的么？他們分不清人民的內部和外部兩個不同的範疇。在內部，壓制自由，壓制人民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的批評，壓制學術界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為。這是我們的制度。而這些，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則是合法的行為。在外部，放縱反革命亂說亂動是犯罪的行為，而專政是合法的行為。這是我們的制度。資本主義國家正相反，那裡是資產階級專政，不許革命人民亂說亂動，只叫他們規規矩矩。剝削者和反革命者無論何時何地總是少數，被剝削者和革命者總是多數，因此，後者的專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總是理虧的。胡風又說：“絕大多數讀者都在某種組織生活中，那裡空氣是強迫人的。”我們在人民內部，反對強迫命令方法，堅持民主說服方法，那裡的空氣應當是自由的，“強迫人”是錯誤的。“絕大多數讀者就在某種組織生活中”，這是極大的好事。這種好事，幾千年沒有過，僅在共產黨領導人民作了長期的艱苦的鬥爭之後，人民方才取得了將自己由利於反動剝削壓迫的散沙狀態改變為團結狀態的這種可能性，並且於革命勝利後幾年之內實現了這種人民的大團結。胡風所說的“強迫人”，是指強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們確是胆戰心驚，感到“小媳婦一樣，經常的怕挨打”，“咳一聲都有人錄音”。我們認為這也是極大的好事。這種好事，也是幾千年沒有過，僅在共產黨領導人民作了長期艱苦鬥爭之後，才使得這些壞蛋感覺這麼難受。一句話，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我們每年的國慶節，首先就是慶祝這件事。胡風又說：“文藝問題也實在以機械論最省力。”這裡的“機械論”是辯證唯物論的反話，“最省力”是他的瞎說。世界上只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最省力，因為它可以由人們瞎說一氣，不要根據客觀實際，也不受客觀實際檢查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則要用氣力，它要根據客觀實際，並受客觀實際檢查，不用氣力就會滑到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方面去。胡風在這封信里

提出了三个原則性的問題，我們認為有加以詳細駁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說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緒，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一九五零年說的。那时，在大陆上刚刚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軍事力量，还有許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装正待肃清，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和鎮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没有进行整頓工作，胡风的話确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沒有說完全。說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緒，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捣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

按：宗派，我們的祖宗叫作“朋党，”現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攤子”，我們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們，为了达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往往說別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則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沒有宗派的。胡风所領導的一批人，据說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階級理論”“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視”和“迫害”，因此，他們要报仇。《文艺报》問題，“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問題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統治的問題”，而且是“宗派和軍閥統治”。問題这样严重，为了扫蕩起見，他們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許多人認真一查，查出了他們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說是“小集团”，不对了，他們的人很不少。过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对了，他們的人鑽进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个部門里。过去說他們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們的人大都是有严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軍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陣营的反革命派別，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統治为任务的。他們随时随地寻找我們的缺点，作为他們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那个地方有他們的人，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問題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現在查出了胡风們的底子，許多現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釋，他們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

从以上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出：（一）解放以来，胡风集团的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更加有組織、更加扩大了，他們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領導的文艺战綫的进攻更加猖狂了；（二）如一切反革命集团一样，他們的破坏活动总是采取隱蔽的或者两面派的方式进行；（三）由于他們的阴谋被揭露，胡风集团不能不被迫从进攻轉入退却，但这个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仇恨革命达到了瘋狂程度的反动集团，絕不是真正放下武器，而是企图繼續用两面派的方式保存他們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胡风用“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的未来”这类的話来鼓励他的集团分子，就是証明。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們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們認為，这就是他們要等待的时机。

我們从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必須取得充分的經驗教訓，必須在各个方面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辯別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分子，把他們从我們的各个战綫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們已經取得和将要取得的偉大的胜利。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

编者按：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第二两批材料的公布，激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极大的愤怒。人们要求追究胡风集团的政治背景。他们问：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誰？关于这个问题，人民政府已经获得大批材料。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第三批材料”中发表出来。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在下面的材料中，人民可以看出那被胡风捧为“追求革命十多年的革命作家”的阿壠和自称追随革命二十年的胡风本人的真实面目。阿壠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什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壠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他们为什么这样坚决呢？原来胡风、阿壠等人都是别有来历的人物。

阿壠，即陈亦门、陈守梅，浙江人。原是国民党的军官，抗日初期混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读了几个月，不上前线，却到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做少校军事教官去了。这里发表的一封信是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从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写的，他已从胡宗南那里转到这里受训，毕业后任战术教官。“山洞”这个地方，是蒋介石的陆军大学所在，也是蒋介石本人在重庆期间的住地。

胡风，即张光人、又名谷非，湖北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经加入过共产主义共青团。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当时段祺瑞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把他吓昏了头脑，坚决要求党允许他退出了团。后在江西“剿共”军中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去日本混了一个时候，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以后，他在上海混进了左翼文化团体，从内部进行了种种分裂破坏活动。在武汉和重庆时期，他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从这里发表的胡风给阿壠的一封信里，也可看出胡风和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的陈焯的关系。胡风的这篇简单的历史是最近才查明的。因为他隐瞒得很巧妙，大家被他骗过了。

胡风集团在全国解放以前狂热地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反人民内战的胜利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失败上；而当蒋匪溃败，全国解放以后，他们就潜伏在大陆上以更加阴险的两面派手法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他们对解放后的新社会、对人民革命政权，表现了刻骨的仇恨，他们说“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他们诅咒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完蛋”！

当本报公布了第一、二批揭露材料之后，还有一些人在说：胡风集团不过是文化界少数野心分子的一个小集团，他们不一定有什么反动政治背景。说这样的话的人们，或者是因

为在阶级本能上衷心地同情他们；或者是因为政治上嗅觉不灵，把事情想得太天真了；还有一部分则是暗藏的反动分子，或者就是胡风集团里面的人，例如北京的吕荧。

现在，已到了彻底弄清胡风这一批反革命黑帮的面目的时候了，中国人民再也不容许他们继续玩弄欺骗手段！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

按：从这一类信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仇恨一切人民革命力量。胡风分子张中晓说，他“几乎恨一切人”。许多人认为“胡风不过是一个文化人，胡风事件不过是文化界的事件，和其他各界没有关系”，看了这类材料，应当觉悟过来了罢！

按：从以上两封信里可以看到胡风骨干分子绿原的真面目，胡风集团的骨干就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绿原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合办的由美国人替美国自己也替蒋介石训练和派遣特务并直接进行恐怖活动的阴森黑暗的特务机关，以残酷拷打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而著名。谁能够把绿原“调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够“调”谁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在最后一封信里，在一九四七年九月，绿原还在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力量是“万恶的共匪”，可是，一九四八年初他就由另一胡风骨干分子曾卓介绍为共产党员，打入了地下党的组织。后来绿原突然潜逃。武汉解放时又突然回到武汉，与曾卓一起自称是“共产党”，接收《大刚报》。一九五零年再度钻进党来（参看本材料第二十八条）。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就是这样来“追随革命”和钻进共产党里面来的。

按：由阿壠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分子是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的。他说：不要“在阵地未坚固前就放起枪来”。而“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再多一些条件！”要“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然后“就找大的对象”，即对准革命的要害加以攻击。在进攻时，要多同“朋友”“商量了做”，把“论点组织和考虑得更严密些，小东西和小事情最好不理。”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按：卢甸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后来胡风果然实行了，这就是胡风到北京来请求派工作，请求讨论他的问题，三十万字的上书言事，最后是抓住《文艺报》问题放大炮。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按：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

革命分子“深入到”我們的“肝臟里面”來了。這決不只是胡風分子，還有更多的其他特務分子或壞分子鑽進來了。

按：胡風集團分子和其他許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都採取方然在這封信里所講的兩面派策畧，特別是他的(二)、(三)兩條策畧，很可以欺騙許多人。但他們總有漏洞可以給人們找到，胡風集團的被揭露，就是一個証據。特別是在大多數人的覺悟程度和警惕性提高了以後，他們的兩面派策畧就更易被揭露了。

按：從這裡也可以看到我們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這一鬥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些人口稱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却不重視批判唯心論這一鬥爭，或者說自己沒有唯心論，或者說自己和胡適無關係，因而最好避開不談。但胡風集團却是重視的，他們在研究如何對付的方法。“這裡存在着矛盾和困難”。批判唯心論果然給了胡風集團以“矛盾和困難”，這就可見批判的對了。革命隊伍里的人，難道也有“矛盾和困難”嗎？

按：一大批胡風分子打入中國共產黨內取得黨員稱號這一件事，應當引起一切黨組織注意。綠原解放前曾經一度鑽進我們的地下黨組織，後因潛逃失去黨籍。在一九五零年，這個反革命分子又對我們的黨組織“用最大誠懇寫過三次報告，一次比一次詳盡而老實”，除了文藝思想而外，“其餘大體合格”，果然後來又被接受為“黨員”了。這樣的事，難道還不應當引起一切黨組織的注意嗎？這些反革命分子是在用盡心思欺騙了我們之後爬進黨內來的，他們把這當作“一場鬥爭”看待，他們鬥勝了我們，他們進來了！

按：共產黨員的自由主義傾向受到了批判，胡風分子就叫做“受了打擊”。如果這人“鬥志較差”，即並不堅持自由主義立場，而願意接受黨的批判轉到正確立場上來的話，對於胡風集團來說，那就無望了，他們就拉不走這個人。如果這人堅持自由主義立場的“鬥志”不是“較差”而是“較好”的話，那末，這人就有可能被拉走的危險。胡風分子是要來“試”一下的，他們已經稱這人為“同志”了。這種情況，難道還不應當引為教訓嗎？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錯誤的共產黨員，在他們受到批評的時候，應當採取什麼態度呢？這裡有兩條可供選擇的道路：一條是改正錯誤，做一個好的黨員；一條是墮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內。這後一條路是確實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在那裡招手呢！

按：從這一類的信里，應當引起我們的警覺，不要讓他們“滑過去了”。

按：從這類信里可以看出，暗藏在革命隊伍里的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風，可見整風是有益的。怕整風的人不都是反革命分子，絕對大多數(百分之九十几)是思想上或政治上犯有某些錯誤的人，對他們的方針是幫助他們改正錯誤。但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風，對他們的方針則是進一步挖出他們的反革命根子。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面目，是在解放前和解放後的幾次整風，即過去的幾次思想鬥爭中逐步地暴露出來的。由於那幾次整風，才產生了胡風集團內部的分化，才迫使胡風集團採取以攻為守的策畧——三十萬字的上書言事，才有最後的大揭露。

按：從這類信里可以看出，在強大的人民革命力量即人民民主專政面前，只要這個專政是提高了羣眾的覺悟，採取了正確的政策，那就不管有多少暗藏的反革命集團，也不管每個反革命集團的內部紀律如何森嚴，攻守同盟如何堅固，總有一些人可分化出來的，而這種分化是於人民有利的。舒蕪從胡風集團分化出來一事使得胡風集團大傷腦筋，就是一証。近日各地許多胡風分子們紛紛坦白，自動地或被迫地交出密件，揭露內情，是這個

斗争的繼續发展。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我們的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里是有人偷窃机密的。这种人就是混入这些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内的反革命分子，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則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该引起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严重注意嗎？

按：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文艺方向，极端仇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为党和毛泽东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要歌颂工农兵，要暴露工农兵的敌人，而胡风集团恰是工农兵的敌人，他們觉得暴露工农兵的敌人这会使得他們混不下去，就会“屠杀”他們这伙反革命的所謂“生灵”，就会“压杀了”他們这伙反革命的所謂“新的东西”。但是他們不敢公开地反对这个讲话，而且胡风还教唆他的党羽在表面上要“順着它”，有时并引用其中的一些字句。这些，都是胡风分子伪装自己的假面具。而在这封密信里，就完全暴露了胡风分子仇恨这个讲话和反党的真面目。張中曉說：“这書(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許在延安时有用，但，現在，我觉得是不行了。”“現在不行了”，在文艺界里面不是还有一些人也这样說过嗎？說过这种話的人，請注意讀讀張中曉这封信吧！当然，有些說这样話的人，他們还只是抱着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所以不能認識这个讲话的重要性。但是，張中曉这个胡风分子，凭着他的反革命的敏感，却深深地了解这个讲话在全国解放以后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掌握羣众，并对各种反动的文艺思想起摧毁性的作用，所以他們就急于想阻止和破坏这个讲话的影响的扩大。他們所謂“現在……不行了”，道理就在这里。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們的借口，他們的一种策略。他們的本意是“几乎沒有一块干净的土地”。由于这种情况，他們“就規定了战斗的艰苦性和长期性”。自从汉朝的吳王刘濞发明了請誅罪錯(汉景帝的主要謀画人物)以清君側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繼承了这个衣鉢。他們在三十万字上書中只攻击林××、何××、周×同志等几个人，說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有些在阶级本能上同情胡风的人，也照着这样替胡风瞎吹，說什么“这不过是周揚和胡风爭领导权的个人之間的斗争”。我們在肃清胡风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这一点也是应当注意的。

按：胡风集团在他們的三十万字上書和其他的公开言論中，好象他們主要只是反对共产党的作家而不反对其他的人。他們当然从来不反对蔣介石和国民党的其他人物(只在有时小罵几句以作幌子，即所謂“小罵大帮忙”)，但不反对其他的人則是假的。这一点我們从胡风們的許多密信得到了証实，原来他們对魯迅、聞一多、郭沫若、茅盾、巴金、黃葯眠、曹禹、老舍这許多革命者和民主人士都是一概加以輕蔑、謾罵和反对的。这种不要自己集团以外的一切人的作风，不正是蔣介石法西斯国民党的作风嗎？

按：如同我們經常在估計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經常估計这种形势。但我們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們是注定要灭亡的，他們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規律，他們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們的估計总是錯誤的。他們的阶级本能引导他們老是在想：他們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們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們的力量。我們亲眼看到了許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軍閥，日本帝国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蔣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們犯了

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动的錯誤，現在的一切帝国主义也是一定要犯这种錯誤的。难道这不好笑嗎？照胡风分子說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嗚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什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如果說，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議會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話，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剝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認他們的失敗的。这是因为他們不但需要欺騙別人，也需要欺騙他們自己，不然他們就不能过日子。

按：这个胡风分子是比較悲觀的。他說“也許”要“再过几十年”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沒有矛盾”，即是說，要有几十年時間，蒋介石王朝才有复辟的希望。几十年之后，蒋介石王朝回来了，一切人民革命力量都被压倒了，那就是“人与人沒有矛盾”了。“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损伤”，这个“人”指的是一切反革命的人，包括胡风分子在內，但是一个也不包括革命的人。“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上人指革命的人。下人指反革命的人。胡风分子写文章，即使是在写密信，也会有些文理不通的。这也是被他們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他們无法象我們替他們作注解的时候这样，把文理弄得很清楚。

按：这封信里所謂“那些封建潛力正在瘋狂的杀人”乃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我国人民革命力量镇压反革命力量的偉大斗争感觉恐怖的表现，这种感觉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阶级、集团和个人。他們感觉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觉高兴的事。“史无前例”也是对的。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剝削制度代替非剝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剝削制度为其結果的，他們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們，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剝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剝削阶级無論如何是要經由它們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則必須团結起来坚决、彻底、干淨、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只有这时，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斗争必然地深化了”，这也說得一点不錯。只是“封建潛力”几个字說錯了，这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語的反話，如同他們所說的“机械論”是“辯証唯物論”的反話一样。

按：还是这个張中曉，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較之我們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內，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鈍，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們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我們的人必須学习，必須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必須放灵些。如果說胡风集团給我們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对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同志的指示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毛主席接見一中队的全体同志时，向大家提出学习文化的任务。今年七月二十日，又作了具体指示，他說：“根据你們的任务特点，可以少学点制式教練，多学一些文化科学知識，多学一些地理、历史、数学、物理、化学。五年中学毕业。”……中学課程一結束，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指示，又办了业余大学。毛主席說：“你們不要单武，而且还要成为有文化的政治人員。你們在这个学校学习七、八年就成了工农出身的大学生。”

(摘自《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在职干部文化学习情况报告》)

中共中央关于贺誠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

几年来賀誠同志在主持中央卫生部工作中，在方針路綫上和中央有分歧，特别是团結中西医、医学教育、面向工农兵和干部政策等方面，賀誠同志犯了严重的原則性的錯誤。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賀誠的錯誤，已多次进行过批評教育，希望他切实改正。

在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五五年)

前途如何？趋向如何？你們为什么老是不相信？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問題？因为你們有一点财产，你們的想法和工农不一样。你們中有一部分人也不这样想。你們应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看清社会发展規律。現在社会主义的趋势和前途是肯定的，在改造两种私有制的时候(資本主义私有制和小农私有制)，許多人总心不定，总要問这个問題。这就是說，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們看社会发展，可以把握，可以安定，但还要常常講。

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不是少数人，統一战綫要不要，不是随便可以廢除的，不是中共中央要不要，而要看統一战綫对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建設有没有利，有利就要，无利就不要。从中国革命长期的經驗来看，有統一战綫比沒有統一战綫好。我們的事業和蔣介石日暮途穷恰恰相反，各項建設都在开始。大家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来替你減少吊

桶，增加抽水机。我們要使全国大为发展大为富强，我国是大国，但不富强。飞机大炮都不能自己造，談不上繁荣富强，但按照我們計劃办事，可以富强，这是大家的富，大家的强。

.....

听說各大城市工商业界有学习小组，令人高兴。要有几个核心人物，是先知先觉。有无可能？过去有些懂得政策方針的人，可以設想能組成这种队伍。

有人計算全国工商界和城市小資产者共約三千万人，这是很大的队伍。过去宣傳不够，我看总的这几年工商界是有进步的，这个总的估計是必要的；工商界有坏人，共产党內何尝沒有坏人。我上面的估計是有事实根据的(公私合营、买公債……)。否則就沒有信心，下文就难办了。講成績当然不抹煞缺点。要全面估計。

肃反也如此，一件东西总有这件东西的性質。老帳不要算，我們算新帳。

共产这件事，我看是好事，你們以后会看得見。經常說就不可怕了，私有制大大妨碍了全国統筹，妨碍我国走富强的道路。不要說了睡不着觉，要說好几年，不可能靠一个早上。我們商量来办事，現在只講宣傳，核心分子做宣傳，大家不要感到可怕，要感到可喜有利。

我們現在提出的改造政策，就是馬克思列宁提出过的“贖买”政策。大概十五年左右，这个期間，工人階級为資本家每年生产的利潤(一年几个亿)十年就有几十个亿之多，所以实际上是工人階級給資本家出錢收买了工厂。

我們在安排上做了工作及政治地位的安排，我們对資產階級采取和地主不同的政策。过去你們說共产党是洪水猛兽，現在你們不愿叫資本家，愿叫工人，这是可以达到的。我国地大物博，現在每年只有二百多万吨鋼，实在太不象話。我們要全国努力，工商界也要努力，四、五十年总行吧，我們要爭这口气，超过美国。李富春說超过美国用不到一百年，我同意。

领导好些，工作就好些，领导不好，工作就差些。我們要注意领导的规划，要考虑用什么办法使大家更愉快更起勁些。有朋友說有些小企业还漏稅，这是学习不好，也是沒有教育好。

宣傳問題，再講几句：不要一陣风，象台风一样不好，說馬上要共产，这会引起不必要的損失，因大、中、小进展不一。不要引起損失，要有准备，要有秩序有步驟的前进。为此核心分子很重要。我們是有成績的，柜台上沒有断过商品，这是了不起的。我看这是有国际意义的，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資本家走在前头，給世界各国資本家做个榜样，这是很光荣的。日本資本家很关心，認為我們搞得不好，人和物品都沒有損失。古話說：“做好事越多，前途越好”。不要你們是先进，就来一个高潮，不要只看到你們几百人，要看到几千人。农民参加合作社，有犹豫有怀疑。資本家也不例外，不要以为怀仁堂一会，就解决了問題。十五个吊桶是逐渐取消的，否則那来的这許多抽水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看这是一句好話。

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

民主人士下乡，提出粮食和镇反问题。

必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合作社必须互利才能自愿，没有互利就不能自愿。牲口不归公，假公道，投资平摊，贫农给。

停、缩、发。该停者停，该发者发，该缩者缩。

民主人士下乡考察，口径一对对，十几个省问题较多，他们提出来，我们抓住。

成绩、缺点，他们只讲成绩，不讲缺点。其实乱子不少，大体还好。看一下，好的、坏的、中等的，加以分析，清一清，多少没有乱子的。

反动势力猖獗，要讲一下。民主人士眼里没有反革命，借他们压一下有好处。

他们当民主人士也不好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合作社也乱子不少，大体还好。一日停，二日缩，三日发。缩，全缩半缩，少缩多缩，按实际情况。不干不行。

后解放区，一般就是发，基本是发。华北、东北也要有发。

该发即发，该停即停，该缩即缩。

自愿互利，互利换得自愿。取得中农入社，即有利于贫农。半，半有利，不能解释为中农吃亏。从马列都没有说过这种话。贫农给贷款，腰杆硬起来。

章程要完全不使中农吃亏。

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少杀，关改多。我主多抓，民主人士主大赦，不便反对。宪法有，可以讨论。赦好？抓好？我已大赦过，党团三反都赦了，战犯也赦了不少，也有赦了又作反革命。

手上还有一批，上校以上七百多，讲放不放，要张治中立状子，放出去能钓鱼。

大捉特捉是重点，大赦特赦不是重点，是人民的意见。七月开会时，大家都认为有大捉必要。

粮食问题，党内外有潮流，曰：大事不好。我说：大事还好，有点乱子。五年计划，要搞粮食、搞供销。

农民中缺粮户要粮，余粮户也要粮。从生产上解决。过剩粮不可买，空下来。

主要矛盾：个体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矛盾。

粮食工作五利：一利缺粮户，二利市民，三利灾民，四利城工，五利打台湾。

粮食工作无损自给户，稍损余粮户。

现在供应三亿人。

河南材料，缺粮户百分之一一点五，该叫。

统购问题，有人说定产高了，是偏低，是偏高？偏高多少？高有无百分之二十？弄清楚才能答复党内外的人。

會議上插話(廣西省匯報時):

一萬七千個社縮一、二百，小事。發展五千個社，少吧!

(湖南省匯報時):

怪不得湖南不叫。(指糧食工作)

發展四千個，這么少，不到一翻呀!

(江西省匯報時):

發展八千個，百分之三十四的鄉。再發展一萬四千個。

(湖北省匯報時):

周轉糧不能沒有，不放入計劃，好呀! 不買過頭糧，不計周轉糧。

(浙江省匯報時):

現在五萬五千個，已退七千個，再退三千個，尚餘四萬五千，空白鄉還要發展，其餘各省可否翻一翻。

• (江蘇省匯報時):

落后鄉百分之五有反革命，百分之十壞人，蛻化分子，這是反革命同盟軍，縣區鄉三級幹部要調查。不能讓中農作主，中農可以教育，他要按黨的政策辦事也可以。

三萬二千個不發展?! 要比一比浙江。

(安徽省匯報時):

不發達的省，要利用發達省的經驗。江蘇趕上去，湘鄂兩廣要放手發展。合作社多數要大發展，百分之九十較好，百分之十退。

(山東省匯報時):

死人真省糧? 湖南說死幾十人，只死一人。現象、本質分開，一股台風天黑了，不得了。一查，是假的，合作社百分之九十是好的，是經多次風的。再講幾點:

一、證明百分之三至五，機動幅度再研究，不決定。八百八十億，十一億重點減。湖南、安徽、山東要加一點。交糧食會議，為糧食需要者設。

二、層層負責有好处，但會形成無數獨立王國。二十多萬個要統一、分級。統一計劃下各省負責。

三、周轉糧、細糧、粗糧照舊。不要在糧食上舞弊，供應太廣。××缺是假缺。

四、合作社自願互利，如果自願，要拍板。承認了的，照着辦，保證百分之九十可靠。

五、習、法、公核有爭執，黨委統一，合法又敏覺，做好。饒、潘、楊案子，包庇三個反革命。用大叛徒胡京和。可以傳達到十四級以上。

胡風案子另發通知，那個字號不清楚。

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

(一九五五年)

一、这次会议牵涉面很广，是一次大的争辩

这次会议，解决了很多问题，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的一次大辩论。这次全党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牵涉面很大——重工业、轻工业、财政、金融、贸易、交通、文教、卫生、科学、镇反、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党、团、工会、青年、妇女、内务、军队等。应当有这次大辩论，总路线公布后没有展开过这样的辩论。应当使这次辩论到农村支部的同志中去展开。城市支部党员中也要展开。使各方面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各项工作都要有全面规划。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左右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同一时间内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个时候，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就能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巩固起来，才能彻底割断了农民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才能彻底孤立了资产阶级，才能在农村的广阔土地上最后根绝了资本主义的来源。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农业合作化，工人和农民还没有结成巩固的联盟。过去在土地改革基础上的工农联盟，正在动荡不定。土地改革的利益，农民已经不满足了，有的已经忘了；我们还没有给农民新的利益（新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起来，粮食和工业原料还不富裕，资产阶级还会找到岔子向我们进攻。

几年之后，我们将看到新的情况：工人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更巩固的联盟。过去土地改革基础上的工农联盟是暂时的，不巩固的。不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就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就不能共同富裕起来，阶级就会向两级分化，穷的、富的都不会相信我们，工农联盟也就不能巩固。农村合作化以后，穷的变富，富的更富，农民就会相信我们。过了若干年以后，地主、富农也会相信我们。全体农民一年一年富裕起来了，商品粮食增加了，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况，资产阶级的咀也就堵起来了。

我们现在有两个同盟：一个是和农民的同盟，一个是和资产阶级的同盟。这两个同盟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都是必要的。我们和资产阶级同盟，对他们实行利用、限制，暂不没收，是为了搞到他们的工业品，来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民和我们一样，爱吃饭，爱穿衣，很爱东西（工业品），光给票子还不行，还会藏粮不卖。我们利用和资产阶级的同盟，来对付农民的惜售思想。我们又利用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与工业原料，去制服资产阶级。要他们拿出工业品，接受改造。你不拿出工业品，就不给你粮食和工业原料。这样，就在经济上制止了资产阶级搞自由市场，在政治上孤立了资产阶级。没有这一条，他们不服。这就是两个改造的互相关系。

两个同盟，和农民的同盟是基本的，永久的；和资产阶级的同盟是暂时的。因为资产阶级是要被消灭的。将来无产阶级队伍中，要有几百万资产阶级里的人加入进来。但是，

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則是長期的。土地改革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它破壞封建所有制，不破壞資本家所有制和個人所有制。它使農民分得了土地，使工人和農民在民主革命的基礎上結成同盟，使資產階級第一次感到孤立。一九五零年三中全會曾經指出，沒有完成土地改革，不能四面出擊。土地改革完成之後，農民靠攏到我們這邊，我們才能搞“三反”和“五反”。農業合作化以後，是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最後鞏固了工農聯盟。這個新的工農聯盟，將使資產階級最後被孤立起來，使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国絕種。有人說我們太沒有良心了，我們說馬克思主義者對資產階級的良心是不多的，在這方面良心少一些才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了。我們要使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絕種，使資產階級成為歷史上的東西，這是很有意義的，是一件好事情。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是要消滅的，資本主義也是一定要消滅的。

現在的國際環境，有利於我們完成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再有十二年，就可以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每年可以產鋼一千八百萬噸到兩千萬噸，發電量七百三十億度左右，原煤二億八千萬噸左右，原油一千八百萬噸左右，金屬切削機床六萬台左右，拖拉機（折合每台十五匹馬力）十八萬三千台，汽車十二萬八千輛，水泥一千六百八十萬噸左右，化學肥料七百五十萬噸左右（這個水平相當於蘇聯一九四〇年的水平，單以拖拉機的出產來說，和蘇聯一九五四年的產量差不多），糧食達到六千億斤，增產一倍，棉花六百多萬噸，超過了一倍（均和一九五二年比較），拖拉機共達六十萬台，機耕地達到百分之六十一。再有兩個五年計劃，完成農業技術改革，機耕地達到百分之百。我們實現這個任務，需要一個和平建設的時間。這個時間能不能取得？我們外交部的同志，對外聯絡部的同志，軍隊上的同志，要努力爭取，才有可能取得。

在這個五年內，國內國外的階級鬥爭是很尖銳的。在這個鬥爭中，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多很大的勝利，將要取得更大的勝利。過去幾年，我們取得了四個方面的勝利：反對唯心主義，宣傳唯物主義；鎮壓反革命；糧食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這四個方面的勝利，都帶有反資產階級的性質，給了資產階級很大的打擊；以後還要給以粉碎性的打擊。反對唯心論，要繼續長期約稿，三個五年計劃把唯心論徹底反下去，建立起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隊伍。今年兩年，在一千一百萬到一千二百萬人中進行肅反。反革命分子看不見，但一查就查出來了。中央組織部，中央公安部都查出了反革命分子。全國已經在二百二十萬人中間查出了十一萬個反革命分子，還有五萬個重大嫌疑分子。搞反革命，要合乎規格標準，要高真的。漏一點是難免的（如延安整風，漏了潘漢年、劉雪羣），但要少漏。在糧食問題上，我們打了一個大勝仗。農業合作化問題上，也打了勝仗。在這四個問題上，我們對資產階級展開了巨大的鬥爭，打擊了資產階級，使它抬不起頭，取得了主動，否則，我們被動。

二、這次會議打破了許多錯誤觀點，破除了很多迷信

會議中的許多發言，破除了許多迷信，打破了許多錯誤的觀點。

首先是：大發展呢還是小發展？這一次解決了這個問題。羣眾要求大發展，農業適應工業也要求大發展，主張小發展是錯誤的。

新區能不能發展？新區也能發展。

山區能不能發展？山區也能發展。

災區能不能發展？災區也能發展。

落后鄉村能不能發展？落后鄉村也能發展。

少數民族地區能不能發展？除西藏、大小涼山外，少數民族地區也能發展。

沒有資金能不能辦社？也能辦。

沒有文化能不能辦社？也能辦。

幹部少能不能辦社？也能辦。

過去有人說：“建社容易鞏固難。”建社並不十分容易，鞏固也不見得難，要說難，都有點難，要說容易，都容易。為什麼偏要說“鞏固難”呢？就是不要辦社。

沒有機器不能辦社的空氣也不大了。

壞社、三等、四等、五等社，除解散外，還有什麼路可走？除開個別不解散不行的及富農搞的假社可以解散外，其餘可以不解散。經過整頓是可以辦好的。

中央農村工作部不光出謠風，還出道理。有人說：“如不趕快下馬，就要破壞工農聯盟。”我們是一字之爭。我們說：“如不趕快上馬，就要破壞工農聯盟。”

耕牛死亡，一部分是合作社的“罪過”，但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死牛的原因是糧食問題，牛皮價格問題、牛的年老問題、水旱問題等。

今年春季農村緊張，有人說是合作社辦得多了引起的。根本不能這樣講。主要是地主、富農的叫囂，富裕農民也叫囂，不缺糧的也爭着買糧。部分是糧食問題引起的，部分則是虛假現象。叫囂一下也好，我們把糧食問題摸了一下底：去年遭災減產，我們多購了六十億斤，今年增產二百億斤，又少購了六十億斤，在農民方面，就增加了二百六十億斤糧食。

“合作社只有三年優越性”的論調，也是悲觀主義。蘇聯搞社會主義幾十年了，還有優越性，我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總有幾十年，幾十年以後，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了，我們又搞共產主義。

最近幾年，應該不應該辦一批高級社？應該辦。辦多少，各地斟酌。

木帆船、牛力車也可以辦合作社，幾百萬勞動者應該組織起來。

三、全面規劃，加強領導

要有全面規劃，我的文章上講合作社規劃，除此以外，對農業生產，全部經濟規劃（副業、手工業、多種經營、短距離開荒、移民、綠化山莊——特別是北方的光山需要綠化，北戴河、香山都是石山，也可以綠化——供銷社、信用社、技術推廣站），文化教育（時事、掃盲、小學、中醫、唱戲、放映電影、收音機、出版物），整黨建黨，整團建團，鎮反（四川江津的落后鄉，鎮反搞得好，江津地委書記的發言，可以看一看），婦女工作（沒有婦女，就沒有兒子，我們都是婦女生的，輕視婦女就是反對母親，反對母親就是不孝），青年工作都要規劃。

每個合作社都要有自己的規劃，每個鄉要有全鄉的規劃，全國應該有二十二萬個鄉規劃。區的規劃有人說不要，我看要一個好，不然沒有責任。每個縣要有全縣的規劃。省、自治區都要有規劃。着重做好縣、鄉兩級的規劃，各省應該先搞出一兩個鄉、縣的規劃，發出去叫大家照辦。

發展速度：根據大家意見，分三種地區：一種是多數地區；一種是一部分少數地區；

一种是另一部分少数地区。

1. 多数地区：1956、1957、1958年，三个冬季，三个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波之間有一伏，两山之間有一谷，应该有，一个間歇。1958年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

2. 一部分少数地区(华北、东北、城市郊区)：分两个浪潮，即1956、1957年两个冬春(其中个别地区，也允許一个浪潮，一个冬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

3. 另一部分少数地区(西藏、大小凉山除外)：需要四个、五个甚至六个浪潮，到1960年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即使这样，也不能算机会主义。因为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是短不了的。总之，条件不成熟的不要搞。

什么叫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就是完成了百分之七十、七十五、八十。

太慢、太快都不好，都叫机会主义。有慢的机会主义，也有快的机会主义。

要加强领导。省、地、县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随时看到问题，随时解决，一有问题就去解决，不要放马后炮(半个省也可开会)。不要爱好事后批评，最好问题刚露头就批评，不要使问题成了堆再批评。情况不对，就要立刻刹车。省、地、县三级，均有刹车之权。

必须注意防左。防左也是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是光防右。速度有前边说的就行了，以后就要比质量，比规格。质量的标准：要增产，不要死牛(我没有说不要死猪，但是猪也不能死)。如何才能达到标准？(1)执行自愿互利政策；(2)全面规划；(3)灵活指导。这三条领导上要抓好。有人拿苏联犯过左倾错误来警告我们，我们要记取苏联的经验。

关键在于今后两年，主要在今后五、六个月(今年十月至明年三月)。这五、六个月，务必不要出大问题。

死牛之风，应该算过去了，不要再重复。牛也要讲衣食住，要有人管。作价入社与否，总之不要死牛。中国共产党如果有本领，今后不要发生死牛之风了。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

今后五个月之内，省、地、县、区、乡主要负责人，首先是书记、副书记，都要钻进合作社，成为内行。鑽不进去，就要改换工作，就不叫他鑽了。

五个月之后，中央也许又召开这样的会议。每省也许请个别县委书记参加，全国增加二、三十人。都要写发言稿，要有新的东西，讲新的问题，如全面规划、经营管理、领导方法(如何作到又多又快又好)。

领导方法的几个建议：

1. 一年开几次会，开大会，开小会。

2. 遇到问题随时解决，不要使问题成了堆。只要搞清楚几个合作社，就可以作出结论。捉一个麻雀，解剖开；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中国麻雀，外国麻雀都一样，不需要个个去解剖。

3. 打电报、打电话。

4. 巡视检查。坐吉普车也可以，坐马车也可以，两条腿跑也可以。

5. 改善刊物。各省的刊物我都看了，有编得好的。缺点是编辑不负责。不管内容如何，见了文章就登。刊物的字不要太小，行不要太密，不要用新五号字，要用老五号字，使人容易看。这次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央农村工作部看了一千二百篇。我关起

門十一天，看了一百二十篇，周游列國，寫按語序言。我看每個省，每個自治區，每年要編一本書，每縣要有一篇，公開出版。說是“黨內秘密”，我看毫無秘密。“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就叫人民出版社出版，給每個民主人士送一本。

6. 發簡報。縣委對地委、地委對省委十天一次簡報，緊張時五天一次。內部是：發生什麼問題，進度如何。省委對中央半月一次簡報，緊張時十天一次，內容要簡單明了，寫幾百字就夠了。

四、關於思想鬥爭

這次會議，在思想上交了鋒，這很好。歷來經驗證明：思想鬥爭要中肯，思想要交鋒，你一刀，我一槍。不交鋒就缺乏明確性、徹底性。交了鋒，就會幫助大多數同志把問題搞清楚，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

歷史上犯錯誤的人有兩種：一種是願意改正的，一種是不願改正的，要爭取願意改正的。對犯錯誤的同志有兩條：一條，本人願意繼續革命；另一條，別人也要准許人家革命。凡是不准許人家革命的就很危險。白雲秀士王倫，趙太爺不准許人家革命，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也是不准許人家革命，結果自己的命被人革了。歷史上犯過經驗主義、教條主義錯誤的人，大多數都能改正過來。一條是自己改，一條是要人家幫助，要有歡迎批評的態度。除極少數人如陳光、戴季英等人外，都是可以改正的。

中央農村工作部一部分同志犯了錯誤，首先是鄧子恢同志。錯誤的性質是經驗主義的右傾錯誤。鄧子恢同志已經作了檢討，有人說檢討不徹底，中央政治局認為基本上是好的。鄧子恢同志過去在長期鬥爭中做了許多工作，是有成績的。但不要把成績當成包袱。只要虛心一點，不擺老資格，就可以改正錯誤。

“四大自由”、“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是資產階級的綱領，是反二中全會決議的。提出這樣的口號，是綱領性的錯誤。“四大自由”應有限制，改為“四小自由”。經過利用、限制和改造，最後把它搞掉。不能既不限制，又不改造。要搞掉，需要有準備，要有代替的東西，沒有找到代替的東西，就要搞掉，就會犯“左”傾錯誤。

有些同志“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這些同志不好好學習，兩耳不聞窗外事，根本不聽黨的決議。自己不翻書本，也不叫秘書查一查。

有些同志很喜歡分散主義，要鬧獨立王國，要獨裁，不要和別人商量，或者口頭上擁護集體領導，實際上愛個人獨裁。總覺得獨裁舒服，受了批評不舒服，好像不獨裁就不象個領導的樣子。資產階級還有他們的民主，難道我們還要獨裁嗎？

有些同志只辦公事，不研究問題，不接觸幹部，不接近羣眾，不與人商量，不交換意見，老是教訓人。這些同志嗅不到政治氣候，雖然事物已經大量普遍存在，但感覺不到。這是得了政治上的感冒。

五、關於一些個別性質的問題

1. 改變富裕中農在合作社內的領導地位，要講步驟、方法。要使本人和羣眾都知道不宜作領導，並且要有較好的代替人。處理方法要分別不同情況，不要一陣風都拉下來。有些人可以拉下來；有些人可以降為副職，或者作委員。個別干得好的還要繼續存在，不要

动。不要把富裕中农当富农看待，他们对合作化的态度和富农不同，他们是动摇的，富农是反对的。他们是劳动者，不是剥削者。

2. 在支部和羣众中说明：我们分阶层，分上、下中农，并不是划成分。是因为上下中农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不同，对合作社有热心与不热心的区别。就是在一个阶层内，态度也有不同。所以要分期分批吸收入社。几年之后，所有农民都入了社，也就没有阶层的分别了。

3. 地主、富农入社，在基本合作化的地区，可以按其具体表现，分批吸收入社。过去说全国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才能吸收，现在有一个县基本合作化以后就可以吸收了。对他们中间老实的，可以给社员称号。对不老实的，有的不给社员称号，叫“候补社员”，劳动改造，经济上同样给报酬；有的不让入社。所有入社的地主、富农，三年、五年内，一律不准担任领导职务。地主、富农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可不可以当文化教员？我看可以，但不作结论，你们再研究。不要叫当会计，当会计是有点危险的。

4. 高级社的条件，请各地按实际情况研究。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办。

5. 合作化与粮食“三定”要两不误。粮食“三定”与合作化的时间如何安排，由各地自己决定。

6. 征兵，个别地方可以推迟到明年四月，但一般不要推迟。

7. 夏秋之间可以建社，不要完全集中到冬春。但在两个浪潮之间要休整。人每天都要休整一次，不休整，换不过气来。

8. “勤俭办社”的口号很好。城市反浪费，乡村也要反浪费。勤俭起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不要懒惰，不要豪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经济核算等等，都要这样办，但经济核算要逐步推行。

9. 明年四月以前，不要在县、区、乡三级搞肃反。去年结合建社搞粮食和征兵，工作就粗糙。今年要细法，不要搞得哇哇叫。

10. 国营农场问题，这次没有讲，是个缺点。下次要有人讲。中央农村工作部下去研究一下。将来国营农场的比重会一天一天大起来。

11. 继续地、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当然狭隘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首先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要真心真意地帮助他们。没有少数民族不行，他们占土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财富多，没有养福鼎、乌兰夫不行。

12. 在合作社中，要把文盲扫掉，不要把扫盲扫掉。

13. 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事物在时间、空间（特别是时间）中运动，人们观察事物如果不合实际情况，看过了叫“左”，看不到叫右。例如合作化大发展的条件成熟了，不去大发展，就右了；明年一年要全国达到百分之八十，就“左”了。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是说要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目的。好象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是右了。

14. 是否有发生“左”倾的可能？完全有此可能。如果领导上不注意发展情况，不注意群众觉悟，没有全面规划，没有分期分批，只喜欢数量，不注意质量，没有控制，就一定会发生“左”倾错误，一定会弄得人叫、牛叫、猪叫；叫了就会死，死人、死牛、死猪。这不是会要“倒宣传”，必须设想到一切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和各种困难，如可能减产，

死牛等。要公开向羣众講，使羣众有准备，当然也不要把羣众吓倒了。

在适当时机，在人們的脑筋膨胀起来的时候，压缩一下，不使它过分膨胀，是必要的。

是不是根本不要忧虑？必要的忧虑和清规戒律仍然要，不是完全不要。猪八戒还有三规五戒。必要的間歇、刹車、关閉是应该有的。当人們的尾巴刚翘起来的时候，就給他新的任务（例如明年要比质量），使他来不及驕傲。

15. 允許县一級有百分之十的机动数可不可以呢？我看可以，不作結論，建議你們考虑。

16. 煤油太貴，是否减价？陈云同志說可以解决。

17. 有人怀疑将来会不会翻案，我看大势所趋，翻不了案。

18. 有人問趋势如何？大約十五年左右即三个五年計劃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还要加一点：大約五十年到七十五年左右即十个到十五个五年計劃左右，可以爭取赶上或超过美国。在这个时期內，国际国内，党内党外，一定会发生許多严重复杂的程度不同的冲突和斗争，一定会有許多困难，例如世界大战，要原子彈，出貝利亚、高崗、饒漱石等。有許多事，現在还不能預料到。但我們是馬克思主义者，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一定会出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五十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

19. 決議和章程：決議會議通过，政治局修改后，很快公布。章程等于第二个宪法，还要国务院公布，征求意见，然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20. 所有发言稿都以可帶回去，但不要印。每个人留下一份修正稿，要換的稿子，十月二十五日前交中央办公厅。“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样本可以帶回。現在的文章，古文多，半文半白，“应该”只写“应”，“并且”只写“并”，“时候”只写“时”，“贯彻执行”只写“贯彻”。写文章，要講邏輯（文章結構有内部联系，前后不冲突），要講文法修辭（文字紧密，語言生动），应该請文章专家帮忙。

21. 如何傳达？討論工作中，把記得的用自己的語言說一說。決議和章程要学习。

22. 注意作好“八大”代表的选举工作。

23. 周总理給大家作一次时事报告。

24. 省、大区为单位开一次小会。

关于增产节约的讲话（纪录稿）

（一九五五年）

我們是人口众多經濟落后的大国，經濟水平生活水平平均很低，建設社会主义，十五年內是过渡时期，中心是工业化，打物质基础。在現有条件下，繼續贯彻党的艰苦奋斗傳統。資金唯一来源靠自己积累。第一个五年十个指头，只做了一个。二、三个五年資金需要更大，不厉行节约无法完成任务。如果非生产建設投資突出了，会破坏工农联盟和全国团结，农民为什么不进城？十五年內，不可能样样现代化，样样社会主义。是打基础阶段。非重点建設，非近代技术装备的工厂，第一个五年感到困难，第二第三个更要大。削国防不可能，

削行政人員，也非安置生产，非加强生产不可。不可設想削減建設国防人員解決問題。只有全面節約解決問題。

过去認識不深，貫徹不透。如工厂，福利設施均社会主义設施。已无福利可增加。先抓生产、开工。

农場也太近代化了。牛場120万平方米，先进社会。

工房、宿舍、高楼、大厦，百把万，住不起。长春汽車厂、烏拉尔厂，宿舍太漂亮了。廚房，西太后出来也要說話了。这是不了解建設困难，忘記傳統，違背工业化方針及与农民共艰苦患难的精神。

生产和生活不平衡。節約为了增加积累。

一、除近代化技术設備以及和設備必要配合的厂房（国外的按国外設計，国内的按可能削減），其它一律降低造价。和延安窑洞看齐，办公室、教室、农場、宿舍、車站等按过渡时期标准，用十五年、二十年。一律磚木結構，甚至土坯子，竹泥牆。

一类是現有大城市，可以磚木。

二类新的单独城市、厂矿，要用土坯。

办公室、学校 50——70元

宿舍 20——50元

不同宿舍不同房租。

仓库 40——50元

車站 50——70元

首都盖大楼装样子，須国务院批准。

工程部六——八月拟出标准。

二、新建工厂、鉄道、农場、福利、設施，根据生产、利潤、业务的情况，逐年設施。先抓重点，如宿舍、卫生所无利潤以前不建設。不可一下子社会主义，是远景，不是一下子社会主义。首先礼堂不可搞。

三、新建企业其它方面厉行節約。輕工业至多一年的筹备机关，以前筹备由部局直接筹备。

設計，照标准。重工业部門到苏联的人太多。

实习生的待遇要降低。

每个环节，严加控制。厂內办公室，沙发一律不准，也不买收音机。不要厂长和职工生活脱离太远。

四、現有新城，計劃均要修改，不要搞社会主义化，要利用旧城。工业要相当疏散。

(1)不搞高大建筑。一层两层。

(2)非工业集中的城市，根本不建城市。如职工用水，可用地下水，用自来水者公共使用水龙头。

馬路要，綠化面积慢慢来。

先工业化，后“社会主义化”。二十年后，再用新规划。

五、今年准备建筑的高楼大厂，未动工的一律停止。

六、地質勘探：

(1) 勘探量不必增加。

(2) 需要增加的，增加50%工作量。

七、建筑部六、七、八个月交出标准。

(1) 生产方面：

1. 降低成本：工业6%加到7.5%；铁路2.5—3.5%；商业2.9—13.9%；

2. 节约原料，轻工业、棉花、卷烟量。

3. 重工业完成新产品试制计划，上半年49%，不及一半。

4. 一律停止收新工人，先内部清理调整，现在都核不清。现在人多了。

5. 每一环节，直至清理垃圾。鞍钢月搞五万吨钢铁，指标到车间。

(2) 生活消费：

1. 除招待外宾外，一律只供清茶一杯，一律不请客、会餐。

2. 办公室不买沙发，首长办公室，两个小沙发，用会议桌。

3. 公文表报节约，非国家统计局批不可发。

4. 减少汽车使用。

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

“左”比右好，不对；右比“左”好，也不对。有些人思想落后在实际后边，头上没有角，没有斗争性。两条道路斗争，不进行批评，批评不尖锐。怕批评，怕丢选票，均右倾之表现，党内有反之必要。农村部经验主义右倾，六中全会做了批评，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是严重问题。资本主义改造、镇反、合作化均如此。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过去农业落后于工业，十七条出来赶上来了，压迫工业进步，如初级社，三、四年不提高，不利的。五九年可能会社会主义。十七条思想反保守主义，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基本措施，先进经验，半年前不考虑，现在变了。出现了极大变化，极大的生产力，象发现新大陆，大陆本存在，看不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五七年百分之九十，手工业也要快，计划太少了。五七年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工商业国有化原说六二年，也许提前。合营了，变国又不难了，合作化十八年改为十年，证明落后实际。群众潜力极大，可多办事，应该反右倾反保守，提前完成改造。建议，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改掉“大约”、“基本上”、“十五年左右”等不定语气。可争取的争取，如订货要求提早，利用在休战期间，加快速度，完成总任务。这就是“八大”思想。如做到提早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战场好办。赶快搞极有利，要打台(?)好打，但不完成建设任务则困难，要加快，各项工作均又快又多又好，较短时期得到较好成绩。办得到有条件，群众要求，办得多而好，即稳步前进。过去反盲目冒进毛病，反掉群众干部的积极性，不对的。扫盲，反冒进反掉了，正气不升，邪气高涨，干部群众均没劲。这样问题，中央未能及早提出，是中央失职。群众说：“跟共产党走，没错。”大方向说没错，但具体说，我们错了，群众也跟错了。前进有几条路，上中下三策，

比較正確的合理的路綫即站在前頭，鼓舞羣眾前進，而非站在後邊潑冷水。較短時間內取得較大成績，按這，即穩步前進。按常規辦事，時間長工作少，即保守路綫。要克服，有兩種方法：全面規劃，接近羣眾，非坐在辦公室辦法，要接近羣眾找出新事物、新經驗，先進經驗，推廣。不一定捉麻雀好多才知肝膽。知浙、皖可快合作化，即知全國可搞。保守主義不是那一個人的問題。抓先進的批評落後的，發現新的生產力，羣眾潛力，這是一個領導法則，是領導方法，才能說服人。坐辦公室，不接近羣眾，不抓先進，不行。公事要辦，但只辦公事是不行的，出去跑也要抓先進的，不能只搞落後的回來。一個負責人七至十周，接近羣眾。辦公室式，只能常規法。先進經驗是要突出常規的。客觀事物，天天突破，不平衡是經常的，平衡是暫時的，這是前進規律。平衡了不可改變的觀點是不對的，不平衡中抓先進的，帶動其他，才能前進。不怕突破、出矛盾。永遠太太平未必出錯誤。冲破而又求平，才是辯證法。這才能鼓舞羣眾積極性，提早社會主義建設，快、多、好，十五年以前超額完成，穩步前進。

我國和蘇聯比較：（1）我是二十多年根据地經驗，三次革命戰爭的演習，經驗極其豐富。勝利前，各個方面均有經驗，左右好幾次，很快組成國家，完成革命任務。（蘇是新起家，十月革命，無軍，無政，黨員少）。（2）我有蘇聯及其它民主國家之助。（3）人口眾多，地位很好，勤苦耐勞。不合作化，農民無出路。中國農民比英美工人還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進到社會主義，不要老比蘇聯。我三個五年即可搞二千四百万噸鋼，就比蘇快。現在是兩翼高漲，主體可能落后。兩翼易驕，但最易驕者為工業，首先是重工業。鞍鋼即有驕。很可能國家社會主義化了，但非工業化（比例不過六十，體系未建立），可否讓農民等一一下？那是不行的。農民社會主義化，并不妨害工業化。不能讓他們等。兩翼工作做了嚴格的檢查。此外，對工業問題，也應做一次嚴格的檢查，也按期過大大運動。財經、貿易、文教均要檢查。八大做一次總結性的檢查，這就是中心問題。反保守、右傾、消極、驕傲，發現先進經驗，改變領導方法，做到又快又好。動員羣眾批評，自我批評，克服保守主義，做出來更多成績，全黨準備，全人民準備。

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會議開得很好。听了各位同志的講話，很高興，可以看出同志們的水平很不低，很高，許多講話是很好的。

現在我要講的是領導方法問題。有兩種領導方法：一種是使事業進行得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另一種是使事業進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拿最近一年來農業合作化，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知識分子的問題等幾件事來看，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可以遲一些、壞一些，也可以早一些、好一些。我們在延安時，曾組織過先政促進會，現在沒有了；現在有人說中央是全國社會主義促進會，這次會議也是一個促進會，省、市委，各部門，也是促進會。領導機關可以促進，也可以促退，也可以有進有退。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就是國

民促退政治，它促使社会倒退。我們的领导机关應該促进事业的发展，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如农村工作部有一个时期就是农村工作促退部，因为它要砍掉些合作社；卫生部有一个时期也是促退部，把事业搞垮了。各地方、各部門是否也有这种现象呢？上层建筑不适合經濟基础，不能促进經濟发展，这就丧失了上层建筑应有的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基础，上面还有政府，党，各部門，这都是上层建筑，必須起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如果不促进，就丧失了它的职能。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为了使上层建筑能够适应基础，促进社会的发展。你們对客观情况的发展注意不够，估計不足。凡事都有两面性，一万年后还是有两面性，但是，今年和明年不是一样的两面性，如果一点不变化，就沒有馬克思主义了。但是現在是馬克思主义的，用馬克思主义来看，农民几年来对他們的落后性拋棄很多，最近几个月，农民跑得很快，几个月就改变了个体經濟。资产階級也是这样，我們总是說他們“唯利是图”，現在他們已經把工厂交出来了（变成公私合营了），“唯利”又怎样“是图”法？对知識分子也是尽說他們不好，可是这次会上同志們說知識分子中进步分子占40%左右，中間分子也占40%左右，落后的当然还有，但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應該促进这种改变。可是有的同志看不到这种变化，想到沒有对象的地方去决斗，对象沒有了，还要斗，这就变成唐·吉柯德了。当然，还有对象，但也在起变化，因此，我們应当欢迎这种变化。我們應該看到在生产关系改变后的新形势，去年上半年那样困难，到处罵我們，党内、党外都說我們不行，就是为几顆粮食，下半年不罵了。下半年有几件喜事，丰收和合作化是两件大喜事，还有肃反也是喜事。最近两三年，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化，这些情况反映在同志中間，人民中間和知識分子中間，我們應該認識这些情况，并且适应这些情况。

講到促进和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同时也應該注意不要搞那些沒有根据的行不通的事情。鑼敲、打鼓、报喜，这是好的，这正是促进嘛，这正說明中央是社会主义促进会嘛！但是現在已經可以看出，有些情况要引起我們注意，值得談談这一点。农村发展綱要中已把好些农业增产的指标去掉了，右倾保守思想存在于各方面，两种领导方法采取哪一种？我因为其中有些还没有研究，沒有充分根据，例如垦荒五亿五十万亩，据說用的錢要等于一年的預算，要多少人民币？垦荒仍是要垦的，但是否能垦那么多，要仔細研究。計劃一定要行得通，一定要建筑在有根据的基础上，不然又要搞成盲目性。現在有些同志头脑已經有些发热了。合作化快是好的，但不要无根据的快。各省同志要注意。高級化务必要做到在絕大多数人滿意条件下高級化，現在听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对放棄土地分紅还放不下，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如等几个月。北方可以到今年秋冬或明年春天再轉，明春最好。建議你們多考虑。陈云同志說公私合营，人家送上門来，不要不好，但問題是内心是否通，如不通，那就等几个月，等几个月并不算长。我建議这样，不要以为又是来阻擋你們，又是右倾机会主义！总要叫百分之九十的人高兴，不高兴的了百分之几就有問題。各部門計劃指标也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本来可以做的不做，是不好的，但无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就叫盲目性，就是“左”傾冒險，虽然目前这还不是主要的傾向，但已經可以看出，有些同志的头脑不那么清醒，不敢于实事求是，怕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难听。凡是經過調查研究，办不到的，要敢于說办不到，敢于停下来，把計劃放在可靠的基础上。

北京已进入社会主义，进入是进入了，但尚未完成，不要說已經完成。要完成，还要

做几年工作（比如說还要三、四年），资本家定息的尾巴哪年割掉，还要看情况发展。北京资本家清产核资用自評的办法，可以介紹，以后农村中地主富农入社，那些人好，哪些人坏，哪些人算社員，哪些人算候补社員，哪些人应当管制生产，可不可以也讓他們自己去評，我們加以領導，建議各地試試看，讓他們自己里头发生斗争。

再一点，有的同志引用我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說到的：“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句话，我說“不能完全按照”，这就是說大体上还要按照，否則五年計劃，岂不也沒有了。但是有的同志一改改成“已經不能按照”或“已經完全不能按照”，可見头脑已經有些发热了。

吳玉章同志的发言講得很好，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見，我都贊成，你們贊成不贊成？老百姓問題不大，識字很容易，但有些人覺得采用羅馬字拼音，好是很好，可惜羅馬字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发明，外国人学习，“用夏变夷”，沒有問題；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用夷变夏”，就有問題了。洋字比較好，吳玉章同志說的有理，字母少，写起来一边倒，汉字比不上。有些教授說：“汉字是世界上万国最好的文字。”我看不見得。因此我們采用羅馬字。例如阿拉伯字也是外国发明的，現在不是大家都用了嗎？羅馬字出現在羅馬，英、美、俄等国不也都在采用嗎？我沒有学过文字史，他們过去也都有自己的文字的。据說我們中国字是仓頡造出来的，我看不見得。社会主义不是出在俄国，俄国也学了。外国的好东西，我們要統統拿过来，变成我們的東西，要在一、二十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汉朝、唐朝就是这样的，唐朝奏乐、舞蹈有七种，有六种是外国的，唐朝很有名，搞久了就变成中国人的。

在吳玉章同志的講話中，其中有一条我是不贊成的。就是他說：“这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去年七月三十一日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严肃地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并用新的社会观点和理論来动員羣众和組織羣众的結果。”“这种新的观点和理論，只有当社会的物质生活的发展，已經在社会面前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产生出来，当新的观点和理論产生以后，它們就成为最严重的力量，就能促进解决由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过程所提出来的新任务，就能促进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样說来，好象农业合作化是新的事情，新的社会观点和理論。但是，这不是什么新东西，联共党史上就写到的，他們是地球上第一次做这件事，还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就已經講过了，三十多年前，俄国已經做了。我們現在講的，並沒有什么新的观点和理論。我們沒有什么新的东西，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过去在欧洲，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已經提出了新任务，产生了新的观点和理論，就是馬克思主义，以后列宁又加以发展。我們有沒有新的东西呢？有的，那就是在形式和細節方面，如互助組的普遍发展，全行业公私合营等，这是新的。关于过渡时期和資產階級联盟，在理論方面，列宁已講过了，只是我們实行得比較完全和有步驟，这很好，有必要加以发展。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鴨，云南火腿不好吃，（現在云南沒有火腿了嗎？）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鴨子應該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資本主义进步，否則我們在羊肉面前就沒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資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要注意情况的复杂性，善于分析，以适合各种复杂情况。許多工作，也还有发展余地，譬如肃反也要发展，現在肃反有一个准备阶段，大有文章可做，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好的。准

准备工作做好了，就能做到比延安、甚至比去年又快又好。准备工作做不好，底沒有摸清，就会把時間拖长，树敌太多。这都属于领导艺术，也都大有发展余地。去夏以来，几方面的工作，如反胡风、农业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领导艺术都是有发展的，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更发展一步，我們在理論上也应有所贡献，把前人講过的进一步的发展。但十月革命到現在还没有显著的新东西。

和平問題。和平問題是大家很关心的，是不是有可能讓我們有十二年時間，来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呢？看来是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經過二十一年，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經过去十年，还可能多些。現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已有不同，主要是德国和日本与过去不同，挑战不大可能。美国講究賺錢，蝕本他不干，沒有人抬轎子，自己不想用脚走路。現在美国軍队的摆法，就不象打仗的样子，它到处搞基地，就象牛尾巴捆綁在樁上，怎样好动呢？但是还要估計到也有可能突然襲击，世界上可能出瘋子的，必須估計到。所以我們的工作，越能提早完成越好，越有利。

現在我們的主动一天一天多了，如农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知識分子問題現在还没有主动，还要过一些时候才能主动。在工业方面也没有主动，大批机器还要靠外国，大的、小的（精密的），我們都不能制造，只能造中等的，“两头不行，中間可以”。我們吹牛皮吹不起来，工业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重要的工业装备和精密机器都不能制造。地大、人多，但是自制的汽車、坦克、飞机有多少，一輛汽車，一架飞机，未免太少吧？有什么值得翹尾巴的！有的同志說些不聰明的話，說什么“不要他們也行”，“老子是革命的”，這話不对，現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沒有他們是不行的，单靠我們老粗是不行的。這些話是聰明的話，要向广大干部講清楚，現在打仗，飞机要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騎着馬了，沒有高級知識分子是不行的，現在我們看出这件事，就可以开始主动，要有大批的高級知識分子，就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識分子，以后要使每人都有华罗庚那样的数学，都要能看《資本論》这是可能的，二十年不行三十年，最多一百年就差不多，否則叫什么共产主义？同志们回去要向各方面說清楚这件事情。中国應該有大批知識分子，先接近世界水平，过后赶上世界水平。我国地方大，人口多，位置也不錯，海岸綫很长，（就是沒有輪船）應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我們有社会主义制度，再加努力，是能够办到的。否則六亿人口，又是勤勞、勇敢干什么呢？几十年以后，如还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国，是不應該的。現在美国只有十几顆氢彈，一千万吨鋼，我看沒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應該搞它几万万吨鋼。

中国有个好处，一个是穷，一个是白（无知識），这也有两面性，穷就要革命，知識少是不好的，但好比這張白紙，这一面写过了，就沒有什么好文章可做，这一面沒有写过，是空白的，就大有文章可做，几十年后，就可以赶上外国。

（此記錄稿未經校对，好多地方沒有听清，仅供参考，勿公开引用）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目前我国正处在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轉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經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沒有完成的各項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闊的規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約再有三年時間，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範圍內基本上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轉变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獲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創造了社会条件。

我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內和共产党外都有許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們的疑問已經大体解决了。在我国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說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們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現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目前我們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經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許多困难情况現在已經基本上改变了，許多曾經被認爲办不到的事情現在也可以办到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計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額完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綱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高潮的基础上，給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項工作，也都必須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

我国人民應該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內，努力改变我国在經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偉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繼續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統一战綫，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团結一起，为維護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六年第四号)

(注：这次會議是毛主席为討論全国农业发展綱要草案而召集的。)

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

(一九五六年)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普及小学教育。要求做到一般的社有小学和业余文化学校，一般的乡有农业中学，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提倡勤工俭学。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合作社应当根据可能的条件，按照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原则，逐步改进和开展文化娱乐工作和体育活动。

(摘自《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改草案)》第三十一条)

在听取××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

改进或扩充生产设备，应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解决，不应使用企业奖励联金。

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当时张国焘在长辛店工厂办了一个工人夜校，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名叫李实的当校长，我还到那里参观过一次。

(当汇报到不少干部满足于现有成绩，缺乏从发展上看问题，满足于数字上完成任务，缺乏对国民经济发展及周围情况的认真研究，因而思想工作、组织工作、技术政策、干部培养都落后于发展需要时)

你会不会打麻将？打麻将要看三家的牌，还要看桌上已经打出来了什么牌之后，才决定自己打什么牌。

××人多，家底大，成绩也不小，容易骄傲，应该注意这一方面。

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找到的。苏区只剩下一个根据地，白区几乎全搞光了。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一律团结，也不是一律斗争，既不是只“团”无“斗”，也不是只“斗”无“团”。对于党内的关系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反从前的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是否主观主义会缩短一些。自从一九五三年反主观主义之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我们对现实的認識进了一步，但是带来了

一个右傾。当然你們是采取原諒的态度，你們說中央的領導是英明的，你們自己犯了錯誤。所以必須要在去年提出反对右傾的口号，先从农业开始，以后又在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也反对右傾。共产党要反过来反过去，多反复几次就要好些。

（当汇报確定部长、副部长每年至少下現場两次，每次一个月左右的時間）
对，我們这样的人，就是要常到現場去。
你們自己要办学校！

对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 准备情况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

除长江中下游六省外，其它已发现血吸虫病的省分如四川、广东、福建等，也应当請他們派代表参加，請与柯庆施同志商处。

會議除討論血吸虫病为主要任务以外，鉤虫病及其它最严重的疾病也宜加以討論。會議应当定下一次會議，下半年再开一次會議，即每年开会两次也就可以了。

在听取××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三月八日）

（当汇报基本情况时）

××部汇报，列了目录，一目了然，各部都要这样作才好。

你們可以搞点展覽会，把各种交通工具展覽一下。

学院学生太少了，可怜得很。

将来可能有一、两千万吨船，中国可能突出。世界海船吨位，我国不到百分之×，这表現我国太穷。

公路少，应多修。地方工业和修公路都要發揮地方积极性。

（当汇报第一个五年計劃执行情况与今后措施时）

运价高，束縛生产力，工农业产品交換不起来。

“一长制”刺眼得很，怎么不改个别的名詞？需要強調集体領導，分工負責制。降低运价問題，財政方面打小算盘不妥当，运价高，束縛生产，稅收減少，結果害自己。工农业都在发展，两方面交流，靠运输紐带，中間路太狹，通不过去，发生矛盾，就影响两方面发展。过去地方公路标准太高，修不起来。

有許多事，开始听，好象有道理。学习苏联經驗要結合实际才行，脱离实际就錯了。

地方交通會議后，情况有轉变，可見領導还是重要的，不然六億人有六億方向，不得了。開片會办法很好，一年一次，也可一年開兩次，先規定會期，下邊就動起來（如消灭血吸虫病）。各种鐵、木輪車改為膠輪車，要赶快改。

人力車已合作化百分之二十五。合作化当然得要得，怎样化法要注意，有些先挂个号也可以，不挂心不安，能組織就組織，不能則不勉强。

对資本家贖买政策，列寧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資本家无利益，現在資本家愿意不愿意？現在小資本家愿意，工人愿意，大資本家随潮流走。現在問題是怎样安插。中国資本家特点之一是許多資本家有經營管理知識，資本家思想不一定比高崗、饒漱石、潘汉年坏，比陈光、戴季英坏。資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領導地位。私有财产是否三年收归国有，还要考虑，将来可能給他們福利基金。

福建省委提的对个体車船改进意見，你們可以拿几个社試一下。每个省試一下，再下决心。

肃反，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錯。真反革命有技术的，已經知道了，在次要崗位上亦可控制使用。

灯光装猪法是怎么回事？可見强迫命令不行，猪尙不能，何况人乎？

（当汇报远景规划时）

一九六七年达到××万吨船，这还象个样子。中国地势比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統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

（当汇报几个問題时）

机关汽車統一管理方針很对。汽車，主要看需要，要与工农业相适应。

交通和輕工业如不能适应，有一天我們會挨罵的。

地方运价降低問題，开个会先商議透，看准后再决定。

簡易公路，要个标准，各地乱修，則不得了。

你們对的意見我都支持，我已經說过把事业办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关于斯大林問題

（一九五六年）

（1月在苏共二十大后不到两个月，先后对米高揚和苏联駐華大使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集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10月23日接見苏駐華大使时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們有不同意見。还有若干問題，我們是不同意的。

（11月30日接見苏駐華大使时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綫是正確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摘自《苏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关于实行火葬的倡议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七日)

人們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規律。人死以后，应当給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国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費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統治階級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許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殮和埋葬費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紀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現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認，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經普遍实行。因此，我們倡議，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領導工作人員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已有火葬場外，我們建議，国家还可以在有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現代化的火葬場。

我們認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們的自願。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須是逐步的，必須完全按照自願的原則，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絕大多数人都有土葬的长期习惯，在人們还愿意繼續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現有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經成为历史紀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屬的同意。

凡是贊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員，請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須保證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接見南斯拉夫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时的談話(摘錄)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原子彈并不比刀枪厉害，你們相信不相信？古人用刀枪打了几百年。汉代中国人口有五千万，一打只剩一千万。唐代又发展到五千万，安祿山造反，一打只剩下一千多万。用冷武器打仗拖延很久，死人很多。大片土地无人，欧洲历史上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后来拿破崙时代开始发展到步枪，可打八百米远，以后又发展到大炮，用热武器打仗。我們沒有試过原子彈，但可以算一算：全世界有二十五亿，原子彈就算杀掉一半，还有十多亿，也比过去用冷武器时死的人少。我們中国有六亿人口，原子彈杀死掉一半，还有三亿人口，有二、三十年又恢复过来了。

……每一个民族里总有坏人的，不可能設想只有一种好人。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因此，一万年以后戏台上还要演好人与坏人。假如沒有坏人，沒有好人与坏人的冲突和矛盾，那么就沒有戏可看了。

論 十 大 關 系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最近兩個月來，政治局分別聽取了中央的經濟、財政三十四個部門的工作匯報，交換了一些意見，政治局又討論了幾次，綜合起來，有十個問題，十個矛盾。

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為着一個目的，為着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動員一切可用的力量，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動員一切可用的力量，是我們歷來的方針。過去實行這個方針，是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現在為了新的革命，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不論在革命中間，或者建設中間，同樣應當實行這個方針。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有一些問題還是值得談，其中有些新東西。我們的工作也還有缺點，有不夠的地方。談一談，考慮這些問題，正確處理這些矛盾，可以少走些彎路。我先把十個問題念一念：

第一個問題，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的關係；

第二個問題，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

第三個問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

第四個問題，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

第五個問題，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第六個問題，漢民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

第七個問題，黨和非黨的關係；

第八個問題，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

第九個問題，是非關係；

第十個問題，中國和外國的關係；

這些關係，都是一些矛盾。世界到處都是矛盾，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現在我來講上面提的十個矛盾。

第一，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的關係。

重工業是重點，要優先發展，大家沒有異議。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工業和農業的關係問題上，我們並沒有犯過原則性的錯誤，我們並沒有犯過有些社會主義國家那種錯誤。他們片面地着重重工業，而忽視輕工業和農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生活品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於輕工業和農業都是比較注重的。我們市場上的貨物比較充足，同有的國家在革命以後的市場情況不同。我們的生活品，說十分夠也不那麼夠，但是我們有相當豐富的民生日用商品，並且價格是很穩定的，人民幣是穩定的。這並不是說，現在沒有問題了。也還是有問題的，就是對於輕工業，對於農業，比過去要更加注意，就是適當地調整一下重工業和輕工業、工業和農業的投資比例，要在工農業總投資中適當地增加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比重。

这样，是不是重工业不是为主了呢？还是为主。是不是对于重工业不注重了呢？现在这样提，投资的重点也还是重工业。

今后需要在轻工业和农业方面多投一点资，让这方面的比重加重一些。加重一些，是不是要改重点？重点没有变，重工业还是重点，但是轻工业和农业这方面要加重一些。

加重的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就是会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就是会更多更好地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发展重工业，需要有资金的积累。积累从哪里来？重工业可以积累，轻工业和农业也可以积累。但是，轻工业和农业能积累得更多些，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你究竟想发展重工业还是不想？或者想得厉害一些，还是想得差一点？你如果是不想，那就打击轻工业，打击农业；你如果想得差一点，也可以对轻工业少投一些资，对农业少投一些资；你如果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意发展轻工业，就要注意发展农业，使得生活品更多些，积累就会更多些，几年之后，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也就会更多些。所以这是一个真想、假想的问题。

当然，对于发展重工业，真想假想，在我们这里来说，不适当。谁不真想？就是想得厉害不厉害。你真正想重工业想得厉害，你对轻工业就应当多投一些资，不然你想得就不十分真，只有九分真，那就不厉害，那就是你对于重工业不十分注重。你如果十分注重，你就要注意发展轻工业，因为：第一是它能满足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它能更多更快地提供积累。

在农业问题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农业集体化了，搞得不好也还是不能增产，农业机械化了，搞得不好，也同样不能增产。有的国家的农业，不能增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有问题，在税收上使农民的负担很重，在价格上农产品很便宜，工业品很贵。我们在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同时，得把农业摆到一定的位置上，实行正确的农业税收政策和正确的工农产品价格政策。

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是很清楚的。解放几年来的事实证明，那一年的农业丰收了，我们那一年的日子就好过。这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

我们的结论是这样：用少发展一些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这是一种办法。用多发展一些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这又是一种办法。前一种办法，片面发展重工业，不照顾人民生活，后果是，人民不满意，重工业也不会真正搞好。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作法，反而会使重工业发展得慢些和差些。几十年后算总账，那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把重工业的发展建立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结果是，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好些。

第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发展内地工业是对的，是主要的，但必须注意照顾沿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根本的、大的错误。但有一些缺点。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一点不那么十分注重了，恐怕要改变一下。

原有工业，无论是重工业，轻工业，多少在沿海？

所谓沿海，就是辽宁、河北、北京、河南的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在这些沿海的地方，重工业的百分之七十

也在这些沿海地方，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

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事实，对沿海工业估计不足，如果还不充分地利用沿海工业的生产能力，那就很不对了。

我们应当尽量利用可能的时间，使沿海工业有所发展。我不是讲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应当建在内地。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比如鞍钢、抚顺就在沿海；比如大连有造船工业；唐山有钢铁工业，有建筑材料工业；塘沽有化学工业；天津有钢铁工业，有机械工业；上海有机器工业，有造船工业；南京有化学工业，还有其他许多其他工业；现在我们准备在广东的茂名（那地方有油页岩）搞人造石油，那也是重工业。

今后，大部分的重工业，百分之九十或者还多一点的重工业，应当摆在内地，使全国工业布署逐步平衡起来，使全国工业有个合理的布局。这毫无疑问。但是，部分重工业还要在沿海新建和扩建。

过去工业的老底子主要在沿海，我们如果不注重沿海工业，就要吃亏。充分的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好好地发展沿海的工业，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发展内地工业，支持内地工业。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的态度是不对的。这种消极态度，不但妨害沿海工业的充分利用，而且也阻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我们都想发展内地的工业，问题在于你是真想还是假想，如果是真想而不是假想，就必须多利用沿海的工业，努力搞好一些沿海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从现有材料看来，有些轻工业工厂建设很快，投入生产并全部发挥生产能力以后，一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这样，五年之内，除本厂以外，就可以增加三四个厂，有的五年可以增加两三个，有的可以增加一个，至少可以增加半个。这同样说明利用沿海工业的重要。

我们的远景规划缺少四十万名技术干部，可以从沿海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中培养出来。技术干部不一定要科班出身。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鲁迅，大学没有毕业。在旧社会，他只能当讲师，不能当教授。肖楚女同志更是没有上过学校。应当相信，技术工人，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可以成为很好的技术干部。

沿海工业，技术高，产品质量好，成本低，新产品出的多。它的发展对全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有带动作用。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这个问题。

总之，不发展轻工业就不能发展重工业，不利用沿海工业就不能建设内地工业，对沿海工业不能只是维持，而是要适当的发展。

第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把兵统统都裁掉了好不好呢？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敌人在“整”我们，我们还受敌人包围吼！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国防力量。在抗美援朝这一仗以后，我们的军队更强大。自己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起来。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制造汽车，不晓得制造飞机，现在我们开始能制造汽车了，也开始能制造飞机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先搞卡车，不搞轿车，所以我们每次只好坐外国的车子来开会，想要爱国，爱不那么快，哪一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坐自己的汽车那就好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我们过去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

了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的。我們已經相當強，以後還要更強，可靠的辦法就是把軍政費用擺在一個適當的比例上。使軍政費用支出的比重，分幾個步驟，降到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增加經濟建設費用，使經濟建設有更大和更快的发展。在這個基礎上國防建設也就能够得到更大的進步。這樣，在一個不長的時期內，我們就不但會有很多飛機，很多大炮，而且還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彈。

你真想原子彈嗎？你就要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就要多搞經濟建設。你假想要原子彈嗎？你就不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就少搞經濟建設。究竟怎樣才好，請大家研究一下。這是戰略方針問題。

在一九五〇年，我們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就已經提出精簡國家機關，減少軍政費用的問題，並且認為這是爭取我國財政經濟情況根本好轉的三個條件之一。但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軍政費用占國家預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即有三分之一的支出用於不生產的方面，這個比重太大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應當想辦法把這個比重降低下來，以便抽出更多的資金，投入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

第四，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

最近，我們跟各省的同志談，他們對這個問題談的比較多。

講工人。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每個工作日的產值增加了，工資也需要適當調整，不注意這點是不妥的。

解放以來，工人的生活有很大改善，這是大家知道的。有些過去家里根本沒有職業的，現在有人就業了。有些只有一個人就業的，現在有兩個人或者三個人就業了。我就碰到過這樣的家庭，過去他們沒有就業的，後來夫婦兩人還有一個女兒都有了職業，合起來生活當然就不錯了。我們的工資，一般的說，還不算高，但是因為就業的人多，又因為物價低而穩，生活安定，工人的生活水平同解放以前是根本不可比的。工人羣眾的積極性一直是高的。

上面講的，是要注意發揮工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工廠，整個生產單位也有一個主動性和積極性的問題。

任何事物都有統一性和獨立性，都有統一性和差別性。不能光有統一性，沒有獨立性，沒有差別性。比如，現在開會是統一性，散會以後是獨立性。有的人去散步，有的人去讀書，有的人去吃飯，各人都有各人的獨立性。如果一直把會開下去，無休止的開下去，那怎麼行呢？那不是會把人開死嗎！所以，每個生產單位，每個人，都要有主動性，都要有一定的獨立性，都要有同統一性相聯系的獨立性。

給生產者個人以必要的利益，給生產單位以一定的主動性，這對整個國家工業化好不好？應當是更好一些，如果更差一些，那當然不要。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起來，把工廠的折舊費也都統統拿走，使得生產單位沒有一點主動性，那是不利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經驗不多，在坐的同志們的經驗恐怕也不多，我們正在研究。那麼多工廠，將來還要多，使得它們的積極性能夠充分地調動起來，這對我們的工業化一定會有很大的好處。

講到農民。我們和農民的關係歷來都是好的。但是，在糧食問題上也曾經犯過一個錯誤。一九五四年全國因水災減產，我們多購了七十億斤糧食，這樣一減一多，農民就有意見了。不能認為我們一點缺點也沒有。沒有經驗，摸不清底，多購了七十億斤，這就是缺

点。由于我們发现了这个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購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加上丰收，一增一減，使农民手里多了一百多到二百亿斤粮食，所有过去對我們有意見的农民都沒有意見了，都說：“共产党真是好”。这个教訓全党必須記住。

农民集体經濟組織同工厂一样，也是生产单位。在集体經濟組織里面，集体同个人的关系必須搞好，必須处理得恰当。搞得不好，不注意农民的福利，集体經濟就不会办好。在这个問題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是犯了錯誤。在那里，集体經濟組織，有些大概办得好，有些办得并不是那么好的。办得不好的，农业生产就不那么发展。集体要积累，但必須注意，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除了碰到不可抗拒的災害以外，必須在增加农业的基础上，使农民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

我們跟各省的同志們談了夏收、秋收的分配問題。所謂分配問題就是：①国家拿多少；②集体拿多少；③农民得多少。以及怎样拿法的問題。国家是稅，集体經濟組織是积累和經營管理費，个人就是分粮食分錢。

集体經濟所有的东西，都是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費不必說了。管理費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再扩大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对生产費、管理費、公积金、公益金这几項，我們应当同农民在一起研究出一个確当的比例。

国家要有积累，集体也要有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国家的积累，我們主要是經過稅收，而不是經過价格。工农业品的交換，在我們这里是采取縮小剪刀差，等价交換或者近乎等价交換的政策，工业品是采取薄利多銷的政策和稳定物价政策。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集体經濟組織，国家和农民，集体經濟組織和农民，都必須兼顧，都不能只顧一头，这一条有一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大問題，是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問題，必須引起全党的重視。

第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更多的發揮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統一計劃下，讓地方办更多的事。

現在看起来，恐怕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地方的权利过小，对建設社会主义是不利的。我們的宪法上規定，地方沒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只要不違背中央的政策，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而情况需要，工作需要，地方也可以訂些章程，訂些条例。在这方面，宪法並沒有約束。

重工业要发展，輕工业要发展，就要有市場和原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須發揮地方的积极性，要巩固中央的領導，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現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天天給省、市的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是都說是中央来的，給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鬧得泛濫成災，这些都应当改变，都要商量出調整的办法。

中央的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們的領導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們設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們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針，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作主。

我們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盲目下命令。在这方面，我們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

先同地方商量，在商量好了以后再下命令。

我們要統一，也要有特殊。為了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各地都必須有適合當地情況的特殊，這種特殊，不是為高崗那種關獨立王國的特殊。而是為了整體利益，為了加強全國統一所必要的特殊。

省、市對中央部門有不少意見，要提出來。地、縣、區、鄉對省市也會有不少意見，省市也要注意聽，發揮他們的積極性。正當的積極性，正當的獨立性應當有，省、市、地、縣、區、鄉都應當有。中央對省市，省市對地、縣、區、鄉都不能夠也不應當框得太死。

當然，也要告訴下面的同志，不要亂來，必須謹慎。可以統一的，應當統一的，必須統一；不可以統一的，不應當統一的，不能強求統一。

有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不是從地方主義出發，不是從本位利益出發，而是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要為國家利益爭“地”，關其可關者。

中央准許的獨立性，是正當的獨立性，不能叫作“關獨立性”。

總之，地方要有適當的權力，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反而有利，把地方的權力縮的很小，恐怕是不那麼有利。

在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上，我們的經驗也還不多，還不成熟，希望大家好好研究討論。

第六，漢民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

這個問題，我們的政策是穩當的。得到少數民族的贊成。我們着重反對大漢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是有的，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要反對大漢族主義。按人口，漢人占大多數，如果漢人搞大漢族主義，排擠少數民族，那就很不好。所以，要在漢族中間廣泛地進行無產階級的民族政策教育。對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要來一次檢查。早兩年有一次檢查，現在應當在來一次檢查。如果有關係不正常的，應當加以調正，不要只口里講。現在有許多人講不要大漢族主義，口里講得好，實際上沒有做。

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管理體制，財政體制，究竟怎麼樣才適合，也要好好研究一下。

少數民族地區是地大物博，漢民族是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區的地下寶藏不少，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漢民族必須積極幫助少數民族進行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經過民族關係的改善，把一切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因素，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統統調動起來。

第七，黨和非黨的關係。

這是說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關係，這一條不是什麼新的，但是因為說到這里，應當把這個關係說一說。

究竟是一個黨好，有幾個黨好？現在看來，還是有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一直到一切黨派都自然消失了的時候為止。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有好处。

黨派是歷史上產生的東西。世界上的東西，沒有什麼不是歷史上產生的，這是第一條。第二條，凡是歷史上產生的，也要在歷史上消滅。共產黨是歷史上產生的，因此它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是這個命運。

無產階級政党和無產階級專政在將來都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非有不可，否則不能

鎮壓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國主義，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為了實現這些任務，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有很大的強制性。但是，必須反對官僚主義，不要機構龐大，我建議黨政機構進行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

話又說回來了。黨政機構要精簡，不是說不要民主黨派。

現在，我們國內是民主黨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對我們還有很多意見。對這些人，我們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要把他們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中國在形式上沒有反對派，所有民主黨派都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是實際上，這些民主黨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對派。在“把革命進行到底”，外交政策“一邊倒”，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問題上，他們都是又反對又不反對。對於鎮壓反革命，他們也還有意見。他們說共同綱領好得不得了，不想搞憲法，但是憲法起草出來了。他們又全都舉手贊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黨派中的一些人對許多問題的態度也是一樣。他們是反對派，又不是反對派，因為他們要愛國，常常由反對走到不反對。

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关系要有所改善。我們要讓民主黨派人士說出自己的意見，只要說得有理，不管誰說的，我們都接受，這对党、對國家、對人民、對社會主義都有利。

因此，我希望我們的同志抓一下統一戰綫工作，省委書記要抽出一定時間檢查一下，部署一下，把這个工作推動起來。

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麼因素呢？它是消極因素，它是破壞因素，它不是積極因素，它是積極因素的對立力量。

那麼，消極因素可以不可以轉變為積極因素？破壞因素可以不可以轉變為有利因素？反革命分子可以不可以轉變？這要看什麼社會條件。死頑固，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必然有。但是，在我們的社會條件下，就他們大多數人來說，將來有一天是會轉變的，當然，有些人或許沒有來得及轉變，閻王就請去了，有些人誰曉得他們那一年會轉變？

由於人民力量的強大，由於我們對待反革命分子採取了正確的政策，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這樣，有不少反革命分子變成不反革命了，他們參加了農業的勞動，參加了工業的勞動，有一些人還很積極，做了有益的工作。

關於鎮壓反革命的工作，有幾點是應當肯定的。比如講，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鎮壓反革命是不是應該的？似乎有這麼一種意見：那一次鎮壓反革命也可以不要。這么看是不對的。應該承認，那一次鎮壓反革命是必須的。

對待反革命分子的辦法是：殺、關、管、放。殺，大家都知道是什麼一回事。關，就是關起來勞動改造。管，就是放在社會上讓羣眾監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不捉，或者捉起來以後，表現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況，給反革命分子各種不同的處理，是應當的。這些辦法，都需要給老百姓講清楚。

殺了的那些，是什麼人呢？那些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債重的分子。六億人民的大革命，不殺掉一批“東霸天”、“西霸天”，對他們講寬大，老百姓不贊成。肯定過去殺這批人殺的對，在目前有實際意義。不肯定這一點就不好。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應當肯定的，在社會上還有反革命分子，但是已大為減少。我們的社會秩序很不錯，也還不能放鬆警惕。說一個反革命分子也沒有了，高枕無憂，那就不對。有少數

反革命分子，还在进行破坏活动，例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

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对多数反革命分子，要把他们交给农业合作社来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还不能废除死刑，假定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杀了人，或者炸了工厂，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第三点，应当肯定的，在机关、学校、部队里面进行镇反工作，我们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有些人不杀，不是他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掉了没有什么好处，不杀掉却有用处。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就让他去劳动改造，把废物变为有用之物。再说，人的脑袋不象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

机关镇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错误，可以保证犯了错误还能够改正错误，可以稳定很多人。不杀头就要给饭吃。所以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都有奔头。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长期的艰苦工作，大家不能松懈。

第九，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允许人革命，人家犯了错误，必须采取“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阿Q正传是一篇好文章，我劝看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一看。鲁迅在这篇文章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写他最怕人家批评，一批评就和人家打架。他头皮上长了几处癞疮疤，自己不愿说，也怕人家说，愈是这样，人家说的愈厉害，结果闹得愈被动。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也还是不准。

过去，我们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那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对不合他们胃口的人，他们总是随便给人先安上犯过什么错误的罪名，不许人家革命，打击了很多人，使党受了很大损失，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如果我们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那是不好的，已经进了党了，人家犯了错误，不准他改正错误，也是不好的。

我们应当容许人家革命，有人说对犯了错误的人，要看他是否改正。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只说对了一半，还有另外一半，那就是要向他们做些工作，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对犯错误的人，应当一是“看”，二是“帮”。对犯错误的人，要给工作，要给帮助，不要幸灾乐祸，不给帮助，不给工作，是宗派主义的做法。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其中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犯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谨慎了，可以少犯错误。我们希望所有犯过错误的人都有免疫力，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危险，更要警惕，因为没有这种免疫力，容易翘尾巴。

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会整到自己身上，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結果跌倒了爬不起來。好意對待犯錯誤的人可以得人心。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究竟是採取敵視態度還是採取幫助態度，這是區別一個人好心還是壞心的一個標準。

是非要搞清楚，分清是非關係，可以教育人，可以團結全黨，黨內有爭論，有批評，有鬥爭，這是必要的。按照情況，恰如其分的合乎實際的批評，甚至採取一點鬥爭，這是為了幫助他改正錯誤，是為了幫助人家。

第十，中國和外國的關係。

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這個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有一種國家領導人不敢提這個口號，也不願提。要有一點勇氣，就要把戲台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

我們願意學習世界上一切國家的長處，一切民族的長處。每一個民族都有他的長處，不然為什麼能存在，為什麼能發展。承認每一個民族都有長處，不是說就沒有缺點，沒有短處。優點和缺點，長處和短處，這兩點都會有。我們的支部書記、軍隊的連長、排長，他們都曉得，在小本本上寫着，今天開會不為別的，總結經驗有兩點：一個是優點，一個是缺點，他們都曉得有兩點，為什麼我們只提一點，只有優點沒有缺點？那有這個事？一萬年都有兩點，那個時候有那個時候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個人有個人的兩點。總而言之，是兩點，而不是一點，說只有一點，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們提出學習外國的長處，當然不是學習他的短處。過去我們這裡有些人鬧不清楚，人家的短處也去學，當着學到以為了不起的時候，人家那裡已經不要了，結果栽了一個跟頭，象孫悟空一樣，翻過來了。

有些人對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風”為準，今天刮北風，他是北風派，明天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後來又刮北風，他又是北風派，自己毫無主見，絕對主義，往往當這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我們不要這樣，不可盲目地學，要有分析，要有批判地學，不可以搞成一種偏向，對外國的東西一概照抄，機械搬用。

我們這裡曾經有一個時期搞過教條主義，對這種教條主義，我們進行過長期的鬥爭，但是現在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還是有一些教條主義，應當繼續做批判工作。

我們是這樣提問題的，學習普遍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体實踐相結合，我們要能夠獨立思考。

我們公開的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學習外國的一切先進的優良的東西，而且永遠地學下去，我們公開的承認本民族的缺點，別民族的優點。

要向外國學習，就要認真地學習外國文字，有可能，最好多懂得幾國文字。

我認為，我們中國有兩條缺點，同時又有兩條優點。

第一，我們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帝國主義壓迫，工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翹不起尾巴，驕傲不起來。但是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有點過分，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門寺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我國人民的自信心提高起來。要象孟子所說的“說大人則藐之”，把抗美援朝中所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我們的方針是：一切外國人的長處都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文藝的一切好東西都要學。

第二，我們的革命是後進的，雖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國早，但是，那時沒有無產

階級政黨，革命也失敗了。人民革命的勝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蘇聯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幾年，在這點上也輪不到我們來驕傲。當然我們比起其他一些殖民地國家來說，革命先勝利一步，也要防止驕傲。

前面這兩點，是缺點，也是好處。我曾經說過，我們窮得很，又是知識不多。一為“窮”，一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算那麼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不高。窮則思變，才要革命，才要發奮圖強。一張白紙正好寫字。當然，我是就大概而言，我國的勞動人民有豐富的智慧，而且已經有一批不錯的科學家，不是說都沒有知識。

一窮二白，使我們的尾巴翹不起來。即使將來工農業很大發展了，科學文化水平大為提高了，我們也還要把謙虛謹慎的態度保持下去，不要把尾巴翹起來，還是要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學習嘛。這有什麼不好呢？

一共講了十點。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因素，間接的因素，直接的積極因素，間接的積極因素，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為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為爭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勝利而奮鬥！

附：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組、黨委，總政治部：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作的《論十大關係》，是一篇極為重要的文件，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問題作了很好的論述，對現在和今後的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為此，特印發縣、團級以上黨委學習。

這個文件是當時講話的一篇紀錄稿，毛澤東同志最近看了後，覺得還不大滿意，同意下發征求意见。請各級黨委對文件的內容提出意見，匯總報中央，以為將來修改時參考。

中 央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發言中表現神氣不足，下級對上級關係像老鼠見了貓一樣，靈魂被吃掉了似的，有許多話不敢講。各省也有此問題，民主不夠，但勞動模範講話有神氣。我們財經會議與四中全會有副作用，因為有幾條規定，大家有話不敢說。財經會議有些同志發言不恰當，有些同志不敢說。

另一個原因是對情況了解不夠，講得不清楚，不深刻。財經制度××，先念同志都有意見。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制度改變了才能改變作風，要給下面一些權。

我們的紀律多从苏联来，太严了会把人束縛起来，这样不可能打破官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制度恰当。中央与地方分权問題，苏联制度的一长制是怎样来的，政治局与国务院均未作决定。各地要分权，不要怕說鬧独立性，中央并未作决定，均可講。各地可先搞条例、細則、办法，宪法規定是允許的。要使各地有創造性，神气活潑。从明年起每年搞一次大会。五一不要开大会了，可以开小会娱乐，苏联五一口号不要登。

× × × ×

四中全会以来我們有些呆板，不活潑。四中全会是应当开的，反高、饒是对的，決議是很必要的，否則再讓高崗搞一年，是不可設想的。但产生謹小慎微，有的不敢談国事，是不对的。四中全会前有些破坏現象，需要克服。高、饒破坏活动应当堵塞起来，但有些謹小慎微，莫談国事。應該分別清楚，有两种国家大事，一种是破坏性的国事，如高、饒应当反对，一种是建設性的国事，應該大談特談。財經會議时，有些同志講錯了話，受到了一些批判，但和高、饒之事必須区别。党在大革命时期，是生气勃勃的，后来陈独秀犯了右傾机会主义錯誤，再后又有“左”傾盲动，失敗后就不活潑了。八年中，“八·七”會議后的一个短时期，六次大会后的一个短时期，三中全会后的一个短时期是正確的。土地革命时期有三次“左”傾，抗日时期有右傾，二次“左”傾是自己的，第三次“左”傾与共产国际有关，第三次“左”傾的四中全会的決議是俄国人写的，强迫我們接受，特别是王明路綫，对革命力量損失最大，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鉴于这个教訓。应当分析批判地接受，張国燾是右傾，抗日时期又有右傾。三次右傾非常集中，不准講不同的話。失敗了，不准講失敗，鉴于历史教訓，后来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团结有斗争。抗日时期根据地独立性很大，發揮了地方积极性，但有点分散主义，有的鬧独立性，不应发表的发表了，这与王明路綫有关。为了糾正这种現象，中央作出了增强党性的决定，有了一元化，但保持了很大的自治权。解放战争时期拟定了請示报告制度，糾正了过于分散的偏向，最近几年不正常，集中多了些，究竟工厂、乡村，合作社、地方要有多大自治权，苏联四十年来还没有經驗，我們也没有經驗，要研究。有些东西既不是中央决定的，也不是地方决定的，就照办了。如一长制，雪峯同志提出来，中央才討論的。我們党历史上有王明路綫的过于集中，有第二次王明路綫过于分散，适当的集中是必要的，但过于集中也是不对的，就不利于調动力量进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請同志們很好地究研党的历史。

× × × ×

个人与国家、集体收入分配的比例問題。我同意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归社員，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国家和社，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四十，最好百分之三十。（包括农业稅、附加、合作社公益金、公积金、管理費等）

× × × ×

社会主义經濟体制問題：

党委制是無疑的，請研究列宁的指示。厂矿、合作社、商业流通过程、运输等企业要有一定的独立自主，独立到什么程度要很好研究。我們不是高崗的独立王国，但要鼓励公开合法的“独立王国”（不上宪法），才好办事，一点沒有是不好办的。国务院如何分工管理，要研究解决，中央設多少部，有多大权力，不久就要决定，地方設多少部門，管理哪些事，有多大权力，几个月內搞出个草案来。中央各部門要注意教育干部給下层解决問

題，地方來中央見不到人，拖延不決，有問題幾年得不到解決，應查其原因。這兩個問題要解決。用什麼方式既能見到人，又能迅速解決問題，請中共各部注意。

地方有權抵制中央各部給地方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實際的主觀主義的命令、指示、訓令、表格，多制止了多一些也不要緊，此權只給省、市委（政治上比較成熟），不給地縣委。

× × × ×

黨章要體現紀律和創造性，羣眾路線應體現在這裡，各省要研究一下，沒有紀律不行，但紀律搞得太死會妨礙積極性，妨礙創造性與積極性的紀律應當廢除。黨章草案中規定設一個副主席或幾個副主席，是否可以仿照人代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辦法，設常任代表五年一任，可起監督作用，請大家考慮。

在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春秋戰國時百家爭鳴），應作為我們的方針，這是兩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見。

× × × ×

全國的平衡是需要的，地方的獨立性不能妨礙全國的平衡，有全國的平衡，才有地方的部分平衡。沒有全國平衡要天下大亂。北京東西不上上海，怕上海貨來沖，所以要有全國平衡。沒有這個平衡，全國工業化搞不起來。鼓勵地方獨立性不要偏到一面去。現在強調獨立性是必要的。

經濟工作今明兩年要切實摸一下。每一省、市委都重匯報一次，搞些典型。我們沒有經驗，將要找些部、區、委、廠研究一下。別人說中央英明領導，我們是知道又不知道。

四天會不能什麼都談，肅反、統戰、少數民族、國際問題談得少，請各地注意部署一下反革命要肯定過去殺、關、管二、三萬是非常必要的，沒有這一手不行。民主黨派與我們有分歧意見的，現在反革命是少了，應該肯定還有反革命，今年肯定要殺一些，在機關學校口要清理，沒有清出來還要清，不能鬆勁，要進行艱苦的工作，半个月打一次電話督促。你們對各地委也可以採取打電話的方法。

黨內處分：縣、區、鄉幹部處分過多過重，高級幹部（包括處長以上）犯錯誤結論難做、處分一下去（對此要查清原因），過嚴過重都不對，除反革命外都要給以改正機會。

少數民族問題，井泉同志講了，四川是對的，雖有些報復已糾正，其他地區也要注意。

國際關係問題。一部分不要盲從，有的我們已有經驗。蘇聯已展開很大批評，有些在我們、在蘇聯都不適用，我們鑑於他們的垂直領導犯了很多錯誤，如對肅反，我們就大部不捉、一個不殺。一長制是軍事觀點，羣眾路線還是恩賜觀點、積累資金辦法是剪刀差還是徵稅都有問題，但不是說蘇聯沒有東西可學了，有很多東西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幫助我們建設的是蘇聯，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好，現在只有這樣一個國家，雖然有那樣多的錯誤，但是值得學習的多，我們不要盲從，應加以分析，屁有香臭，不能說蘇聯的屁都是香的。現在人家說臭我們也跟着說臭。凡是適用的都要學，資本主義好的也應該學。

對外國任何小國一律要採取平等對待的態度，不要翹尾巴，雖然我們不是帝國主義，沒有十月革命，開始翹不起來，但是過早學會了些東西就可能翹尾巴。要教育出國同志，要老老實實，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好的、壞的、中間的都給人家看。蘇聯有沙皇時代，我們有蔣介石，我國有小腳，別人要照相，讓他們照，衣服穿的不好，不怕難看，在外國人面前撒謊，總有一天會揭穿的。

傳達問題，有些東西任何地方都可以講，斯大林、第三國際作的壞事可以傳達到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也可以，不寫在文章上是為了照顧大局（這篇文章只寫了一句“出了些壞主意”）不準備在報紙上和羣眾中講。

对《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的批评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論《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緒》，是刘少奇命令陆定一由旧中宣部的人写成，刘少奇、陆定一審閱发表的。后来，毛主席严厉批評了这篇黑社論。）

六月二十日社論有原則性錯誤：既要反对保守傾向，又要反对急躁情緒。这社論講反右不到半年，就認為反右成績很大，估高了。不能說社論一点馬列主义沒有，但“但是”以后是反馬列主义的。社論的提法同魏忠賢的办法一样，君子小人。引我的話，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話，是秦琼买馬，減头去尾要中間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講少数如何，后面講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

接見危地馬拉前总统阿本斯夫妇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

主席：歡迎你們，中國人民歡迎你們。全世界都知道你們的鬥爭，很同情你們。恐怕只有帝國主義不高興，也只有美帝國主義，英國可能還好一些。怎麼樣？在美國干涉你們的時候，英國採取什麼態度？

阿本斯（下簡稱阿）：英國看起來沒有表示態度。在安理會上，對危地馬拉要求制止帝國主義干涉的提案，英國投了棄權票，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對。

在事件發生時，有一艘英國商船正在危地馬拉港口運貨，被美國大使館操縱的空军飛機打沉了。

主席：英國在危地馬拉有什麼利益沒有？

阿：英國在危地馬拉沒有任何利益。在上世紀時，英國取得了危地馬拉的一塊領土的讓與權，這一塊領土成了英國的殖民地。（主席看地圖）。

阿本斯夫人：就是地圖上的英屬洪都拉斯。

阿：我們一直在要求收回它。

主席：收回這塊土地還不是主要的問題吧？主要的還是美國對危地馬拉全國的侵畧。在事情發生時，你們的鄰國表示什麼態度？墨西哥採取什麼態度？

阿：墨西哥同危地馬拉之間的关系一直都很友好。墨西哥政府尽力表示中立。

主席：墨西哥屬北美洲嗎？

阿：是的。

主席：中美洲有那些国家？

阿：中美洲包括危地馬拉、洪都拉斯、薩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

主席：不包括巴拿馬嗎？

阿：不。巴拿馬原来是哥倫比亞共和国的一部分。由于巴拿馬运河区的关系，它才成了一国。另外，中美洲五国在独立后成立过统一的中美联邦。

主席：你們南边的国家态度怎么样？

阿：南美各国人民对危地馬拉都很同情。

主席：干涉是来自海上的嗎？

阿：不。侵畧是直接来自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来的，显然是美国国务院直接挑起来的。事情发生前，在加拉斯加召开了美洲国家的外长會議。会上，杜勒斯提出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干涉”的提案。这一提案是要一切美洲国家迫害共产党人和所有保卫本国利益、反对帝国主义侵畧的爱国人士。危地馬拉反对这一提案，因为这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并使壟断組織增加对其他国家的滲入的提案。

主席：这个会是几时开的？

阿：一九五四年三月开的。

主席：美国到处以反共的招牌为名，而达到侵畧别人的目的。美洲国家共产党人数很少，苏联离的很远；为什么美国那样急于反共呢？

阿：美国所以急于反共，是因为共产党坚决为本民族的主权，独立以及从壟断控制下争取解放而斗争，并且揭露本国政府的卖国企图。

危地馬拉代表团在加拉斯加會議上指出，美国是利用反共的旗帜掩盖着进一步滲入其他国家和加深殖民控制的企图。

美国提案的投票情况是这样的：墨西哥和阿根廷棄权，危地馬拉代表团投票反对，其他国家投票贊成。

危地馬拉的态度受到各国进步的革命力量的尊敬，因为它不仅表达了危地馬拉人民的意愿，也表达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意愿。

主席：我們知道的。

你們的朋友多些，美国的朋友少些，你們的朋友比美国的多。

美国的胜利是暫时的，危地馬拉终究是你們的，是危地馬拉人民的。一切民族都要独立。

美国到处欠賬。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还有欧洲国家的賬。全世界都不喜欢美国，包括英国在內。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它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沒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畧。日本、南朝鮮、中国的台湾、菲律宾、南越、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都受到美国的侵畧。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阿：国际形势最近两年的发展，有利于各国人民争取独立。亚洲国家就是这种例子。亚洲形势对其他大陆的斗争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现在听到了亚洲的声音，以后一定会听到拉丁美洲的声音。

主席：一切会有变化。力量大的要让位给力量小的。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思想上要求变，小的要求变大。美国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本国的人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主席问在座的人的年龄）我们这里有三个清朝的人，四个民国的人——四个国民党的人。（笑声）

满清，要推翻。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孙中山力量很小，清朝的官员看不起他。打仗总是失败。最后，还是孙中山推翻了满清。大，也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变大。几年以后，孙中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比如人民对土地的要求。不知道他晓得不懂得镇压反革命，当时反革命到处跑，后来就失败于一个军阀首领袁世凯。

袁世凯的力量比孙中山的大。但还是照老规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

而后，孙中山（后来是蒋介石）同我们共产党合作，把军阀都消灭了。

蒋介石统一中国，得到全世界各国政府的承认，统治了二十年，力量最大。我们力量小，当时五万党员，经过镇压只剩下几千党员。敌人到处捣乱。还是按照老规律，强大的失败，因为他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结果，也就是这样。

抗日战争，日本很强大，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都赶到了偏僻的地区，占领了中国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日本军国主义和希特勒也是按照这个规律，没几年就倒了台。

我们经过了很多困难，从南方赶到了北方，从几十万人到只剩下几万人。长征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

经过抗战时期，打日本，我们发展到了九十万游击队，枪炮不如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四百万。（阿本斯向夫人惊奇地说：四百万。）打了三年，国民党打不赢我们。强大的打不赢，弱小的总是胜利。

现在美国很强，不是真的强。美国政治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本国人民也不喜欢。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做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笑声）

整个历史都证明这一点。人类有阶级社会的历史已有几千年，可以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在美洲，美国要让位给你们。

阿：感谢主席先生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帮助。

主席：我们的经验，供参考，不能照抄。

阿：我们一定会使它适合我们的情况。我们感到很有信心。再过五、六年，我们愿意再到中国来看中国人民的成就。这种成就不只是为了中国人民，也是为了各国的人民，包括危地马拉人民。

主席：中国人民是你们的朋友。中国人民的成就中，有你们的一分；你们的成就中，也有中国人民的一分。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终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阿：亲爱的主席先生，能亲自向你致意，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极大的友谊，对危地马拉人民的极大的友谊。在我们的人民的心目中，主席先生受到极大的尊敬。（主席：谢谢。）我们祝贺主席先生在国家工作中的成就，祝主席先生的个人幸福。

主席：我们是处在同一种地位，做同样的工作，为人民办点事，减少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搞得好了，可以根本取消帝国主义的压迫。

要帝国主义干什么？我不懂。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志。

我们性质上相同，只是所在地区、民族、语言不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我们同帝国主义却有性质上的分别。看到帝国主义就不舒服。乔冠华在三十八度綫上的板门店同美国谈判了两年多，也是看到帝国主义就不舒服。

纸老虎，是从战畧上說。从整体上来說，要輕視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視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認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畧上說，完全輕視它。从战术上来說，重視它，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視。现在美国强大，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剝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怕，可以輕視它。但是它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吨鋼，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斗争，用力斗，一个陣地一个陣地地争夺，因此需要时间。在板门店谈了两年多才搞出名堂，搞出个朝鮮停战。现在又在日内瓦谈了快一年了，还没有谈出名堂来，也可能谈到二十一世紀去。只要美国拖到二十一世紀，你就得准备拖。

不要悲觀，不会拖那么久的。

同美国打交道，象我们中国所說的吃牛皮糖一样。看样子美洲国家、亚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

阿：现在各国人民的风雨正在打美国。

主席：对。

刚才你說五、六年后再来中国，是說五、六年后有把握取得胜利嗎？

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取得胜利。但我们相信最后总是要胜利的。

主席：你（指阿本斯）是从欧洲移去的？

阿：我父亲是从瑞士来的。母亲是……

主席：你呢？（指阿本斯夫人）

阿本斯夫人：我相信我有点西班牙血統。

主席：西班牙血統的占人口的多少？印第安人占多少？

阿：在危地马拉，印第安人占百分之七十。

主席：其他中南美国家的印第安人多嗎？

阿：墨西哥、危地马拉、祕魯、玻利維亞、巴西印第安人多。阿根廷、智利差不多全

是欧洲移民的后裔。

主席：有人說，美洲人是从中国去的？

阿：危地馬拉人很象中国人。

主席：現在还没有什么証据，也可能是从中国去的，也可能不是。南美、北美一共有多少印第安人？

阿：（犹疑）几千万吧？

主席：这是不是就出現了欧洲移民同本地印第安人的合作問題？

阿：工人和农民都受到剝削。尤其印第安人受到歧視，身上标着号碼，象牲畜一样。

主席：你們从欧洲移入的人，是不是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統治另外一部分人，那么你們这一部分被压迫的人就容易同本地人接近了。所处地位相同。

你們的政府实行了土改的政策，把帝国主义和地主的土地分給农民。外地来的人当总統，把土地分給本地人，一定会得到他們的拥护。

阿：我們确实把反动党派搞出来的压迫取消了一些。我們那里沒有种族歧視，黑人不受歧視。

主席：危地馬拉有黑人嗎？

阿：很少。

主席：不知道是不是你們的政策太进步了，也是一个缺点。是不是一切地主的土地都沒收？有民族資产階級嗎？地主中間有沒有不跟美国走的？人民不喜欢美国，对美国关系小些的地主，可以团結。这样就能組成强大的統一战綫。包括一些虽对本地人歧視，但又对美国不高兴的人。

阿：地主階級一般是亲美的。民族資产階級是同帝国主义的利益对立的。我們听了危地馬拉共产党的建議，改正了前任政府的一个錯誤。前任政府为吸引人民的支持，采取了一般有利于穷人不利于富人的政策，造成貧富对立。我們改变了它，支持民族資产階級的合理要求。

但是，我們犯了一个錯誤，民族資产階級、工业資本家和中产階級支持政府，我們却远离了他們。

主席：我們这里也有地主中間的左派，从地主階級分化出来的，反对蔣介石，和我們在一起。

除开逃往台湾的那些以外，我們接收了整个資产階級，接收了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員，大、中、小学的教师。教育他們，要他們为人民服务。

我們的工作中犯了一些“左”的錯誤，使他們感觉到不舒服，引起他們的反感。

大体上可以說，經過五、六年的合作，团結得更好了。

国民党的文、武官員，只要沒有跑到台湾，我們也接收了下来。但我們处理得不好，有些有职无权，掛个名。这些非切实改正不可。水利部有个参事郑洞国，掛个名，沒有事做。长期下去如何得了。文史館不做事情。有些地方政治协商會議也不做事情，这是缺点。

你在中国對我們的錯誤缺点要注意，要進行比較。（主席問培見人：还要为阿本斯組織些什么座談。吳茂蓀答：已組織了关于私營工商业改造問題的座談，还要組織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統一战綫問題的座談。）尽講好的，你就不要相信他。他不講坏的，你

就問他，有什么坏的。

还能在中国留多久？

阿：到八月十四日。我們因簽證問題，必須在下月底前回到法国。

主席：那么还可以到各地看看。多找些人談談，找共产党人，也找其他党派的人，找起义将领、资本家、宗教界人士。你們如有少数民族問題，也可談談，这方面我們有点經驗，也有錯誤。

張奚若：他們已參觀了民族学院。

阿：很感謝主席先生所講的話。我們將利用在中国逗留的时间来学习。我們已經學到了你們的政策靈活性，你們給每一个不同美国在一起的人以机会，使他們为人民服务，并在服务中承認自己的錯誤。

美洲的一些政治領袖，往往不是这样。他們對他們自己，也从来不承認有錯誤。

主席：你很老实，想到的就說了出来。

我們曾經犯過錯誤。在根据地的头几年，采取可以叫做“一切打倒”的口号。除工人、农民外，什么人也不要，通通赶掉。这样，蔣介石倒感到舒服了。蔣介石力量大了，把我們从南方的很多根据地赶到北方的一个根据地。这样，我們就“想”，批評、改正了这个錯誤。

我們的历史上犯过三次“左”傾、两次右傾——陈独秀、王明。此外，局部的、个别的也犯过右的錯誤，如張国燾、高崗。

犯錯誤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日本是我們的老师。我們有很多老师：日本、美国、蔣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張国燾、高崗。这些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們打过很多仗。英帝国主义、法国、德国、意大利，都很喜欢我們这块地方，都是我們的教授，我們是他們的学生。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有錯誤。如果你們有錯誤，你們也可以取得教訓。美国就是你們的教授。現任总统阿馬斯可以說是你們的第二个教授。

阿：在告別之前，我首先要表示感謝。我們占了你们很多時間。我們知道，这些時間並沒有白費掉。我們要把主席先生的話帶到我們的政治力量中去，来改进我們的工作。非常感謝。

主席：謝謝你們来看我。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在基本原理方面是相同的，在形式和风格方面又是互有区别的。社会主义各国的艺术都以社会主义为内容，而又各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有同，有異，有共性，有个性，这是自然的法則。一切事物，不論自然界、社会界、思想界，都是如此。好比一棵树上的叶子，看上去大体相同，仔細一看，每片叶子都不一样，每一棵树要找出完全相

同的两片叶子是不可能的。

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基本原理方面，各国都相同，而在基本原理指导下的一些小的原则和表现形式，各国又有不同。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在基本原理方面，两个革命是相同的，在表现形式上，两个革命却有許多不同。例如革命的发展，在俄国是由城市到乡村，在我国是由乡村到城市，就是两个革命的許多区别之一。

世界各民族的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否认自己的民族特点，盲目崇拜西方，以为一切都是西方的好，甚至主张“全盘西化”。这是错误的。“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是中国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艺术和自然科学不同。例如割阑尾，吃阿司匹林，这些医疗方法，就没有什么民族形式。但是艺术却不同，艺术就有民族形式问题。这是因为艺术是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的表现。同民族的习惯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它的发展具有民族范围的继承性。

中国的艺术、中国的音乐、绘画、戏剧、歌舞、文学，有自己的发展历史。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为了否认中国的东西。就说中国的东西没有自己的规律。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中国的音乐、绘画、戏剧、歌舞、文学，都有自己的规律。没有自己的规律，就不会形成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抱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只是没有去研究中国艺术的规律，不愿意去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这是对于中国艺术的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历史上的东西，有精华，有糟粕，混杂在一起，积累的时间又很长，要把它整理出来。分清精华和糟粕，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但是，不能因为困难就不要历史。把历史割断，把遗产抛弃，是不行的，老百姓不会赞成的。

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向外国学习。外国的很多东西，我们都要学习，而且要学好。基本理论尤其要学好。有些人主张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主张对不对呢？不对。所谓“学”，就是基本理论，基本理论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马克思主义这种基本理论就是在西方产生的，这难道能分中西？我们难道能够不接受？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是不利的，也没有不接受的道理。过去第二国际曾经企图否定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讲了一些否定、修正的道理，都被列宁完全驳倒了。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我们必须接受。但是这个普遍真理又必须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人民正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把它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就这一点说来，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是一样的。一切外国的好东西，我们都要学，学好了就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作独创性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例如，西方的医学和其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细菌学、解剖学，你说，不要学？这些近代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以便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識相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这样，艺术当然更是这样。要向外国学习。吸收外国一切好的东西。但是，学了外国的东西，要用来研究和发展中国各民族的艺术，否则就没有研究和发展的对象了。我们学习外国的艺术，学习他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巧，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中国各民族自己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艺术。

要承认，在近代文化上，西方的水平比我们高，我们是落后了。艺术方面是不是这样的呢？在艺术上，我们有长处，也有短处。必须善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以收取长补短之效。故步自封，外国的文学不研究，不介绍，外国的音乐不会听，不会演奏，是不好的。不要象慈禧太后那样，盲目排外。盲目排外同盲目崇外一样，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在学习外国的问题上，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吃过教条主义的亏。什么都是照抄外国，硬搬外国，结果是一个大失败，使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把中国革命的胜利推迟了许多年。其原因就是有些同志，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教条出发，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教条主义，假使我们不反掉，就没有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艺术方面，我们也应当吸取这个教训，注意不要吃教条主义的亏。学外国的东西，不等于统统进口，硬搬外国的一套。要批判的吸收。向古人学习是为了今天，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中国人。

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到，中国的好东西也要学到。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两边都要学好，两边都要有机的结合起来。鲁迅就是这样，他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两边都很熟悉。但是他的光彩，首先不在于他的翻译，而在于他的创作。他的创作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式的，但是他是中国的。我们应当学习鲁迅的精神，精通中外，吸收中外艺术的长处，加以溶化，创造出新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

当然，要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不容易的。这要有一个过程。中国的东西里面也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例如写小说，语言、人物、环境，必须是中国的东西，但是不一定是章回体。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非驴非马，成了骡子也并不坏。两者结合是要改变形象的，完全不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东西要变。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中国的面貌都正在大起变化。但是无论怎样变，中国的东西还是要有自己的特点。外国的东西也在变。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的面貌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变化又有新的发展。我们要注意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特别注意吸收社会主义世界的东西和资本主义世界的进步的人民的東西。

总之，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复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应当越搞越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在这方面不要怕“标新立异”。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国家，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更必须有适合中国各民族需要的“标新立异”。这种为中国各民族老百姓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了。土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中国老百姓所不欢迎的。

这里有一个对待受过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但对艺术事业不利，对整个革命事业也不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有几百

万人。他們人数不多，但是有近代文化，我們一定要團結、教育和改造他們。买办階級有文化，那是奴隶文化。地主階級有文化，那是封建文化。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由于长期受压迫，文化和知識还不多。比較起来，在沒有完成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以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近代文化技术方面有較高的知識和技能。只要我們政策正確，把他們教育和改造过来，就可以使他們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能不能够把他們教育和改造过来呢？能够的。我們在座的許多人，过去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从資產階級那边轉到无產階級方面来了，为什么他們就不能轉过来呢？事实上，已經有許多人轉过来了。所以，一定要團結他們，把他們教育和改造过来。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工人階級的革命事业，才有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

在座的都是音乐家，学西洋音乐的，你們有很重要的責任。整理和发展中国的音乐，要靠你們学西洋音乐的人，好比整理和发展中医要靠西医一样。你們学的西洋东西是有用的，只是你們应当把西洋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两边都学好，而不要“全盘西化”。你們要重視中国的东西，要努力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要以創造中国自己有独特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东西为努力目标。你們掌握了这样一个基本方向，你們的工作就是前途远大的了。

× × ×

我們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千万不能拿哨呐、胡琴去吹奏，还是管弦乐队。我們要提倡民族音乐，但西洋的管弦乐还是应当要，因为世界上都作兴这种东西。这等于我們穿軍服，还是穿現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和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当然我們的軍服同苏联的也不完全一样，有中国軍队色彩。

在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晚）

大家都沒有言发了，我来发个言。

今天是开个预备會議。（邓）××同志已經講了，要討論和修改几个文件。

（一）

这次大会的目的，要解决的問題是要总结七大以来的經驗，团结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使我們的工作作得更好些，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总结經驗和修改党章可以使我們的工作作得更好。

我們团结全国一千多万党员，要进行广大的教育、說服、团结工作。

过去，外国同志不了解我們对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和整风运动，后来逐渐地有了了解。現在全世界上都了解我們党是正確的，一般外国党的同志是了解我們的。我們作了两件事情：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資產階級也不能否認我們的

成就。

俄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反革命的阶级。同他他不干，他反对苏维埃政权，消极怠工，进行破坏活动，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

美国不让新闻记者来，就是杜勒斯也承认我们有这些好处，（即成绩、长处），以至他们不敢派人来。（笑声）

这次会议有四十九个国家兄弟党的代表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这很好。

过去我们没有执政，大家看不起我们。现在我们执政了，水平也提高了，大家看得起我们。外国同志很尊重我们的党。过去外国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不会打球，不会游泳，连月亮都不好，有辫子，有小脚，鲁莽得很等等。认为一切都不行。现在我们翻身了。但单有党不行，党是核心，必须要有群众，要依靠群众。百分之九十的工作是非党员干的，譬如梅兰芳，周××都不是党员。我就不会唱戏，在座的同志也许有会唱的。因此要好好团结全党和非党员。团结工作中还有许多毛病，要搞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国外要团结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全世界各国。团结全国、全党、全世界一切积极因素。为什么呢？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应该说是伟大吧？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党是伟大的，革命是伟大的，国家是伟大的，建设是伟大的。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点理由的。那时蒋介石只有几万吨钢，而我们现在就有四百多万吨钢，第二个五年计划可以达到一千万吨以上。在十一年以后可以达到一千万吨以上，变为世界上几个强国之一。世界上年产二千万吨以上的国家是不多的。不仅如此，再过几十年以后，我们可以超过美国，而且应该超过美国，否则，我们六亿人口干什么呢？美国在六十年以前也只有四百万吨钢，我们现在有四百五十万吨，比美国落后。如果我们几十年赶不上，就要杀掉一批人，要开除地球籍。否则，我们就对不起世界各国，对世界的贡献不大。

（二）

在思想作风方面——我们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还有很多主义吧？（问邓××）中央文件上还有个官僚主义，我们这里只讲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是经常扫清又兴起，又扫清又兴起，到一万年还是有的。

为什么斯大林会犯错误呢？就是由于主观主义，主观与客观不符，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但是很多文件没有好好谈到这一点。我们的文件，要尽量克服主观主义，一定要尽可能的合乎实际情况。过去我们中国革命，因为主观主义带来了很大损失，革命力量失掉了百分之九十，经过三九年整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政治与实践相结合，否则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宗派主义也是由于只看局部。现在只谈地球上。只要有利于团结，我们就要同意。要团结全党、全国、全世界的积极因素，要团结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首先是苏联，不能因为斯大林犯了错误就不学苏联了，这是不对的。人家搞了几十年，不能不犯错误，他的错误只是一部分，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这是主流。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有了马列主义，变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但是也不要认为苏联一切都是香的。苏联自己也说有的是臭的。我们过去也有陈独秀、张国焘、李立三、王明、高岗、饶漱石，他们是我们的教员。但是最大的教员还是蒋介石和帝国主义，他们用枪炮教育我们，——

必須要搞好團結。这里講的團結是自己的对手，打手，而且是錯誤的方面，（正確的对手就不要說了）罵过自己是机会主义的人，交过手的人，不是与自己意見一致的人。与自己意見完全一致的人，就沒有什么團結的任务。要积极地帮助教育犯錯誤的对手改正錯誤，旁觀是消极的作法。

（三）

八大中委多少人合适？我認为一百五十至一百七十比較妥当。苏共中委近三百人，他們的党年齡长一些，我們等两年再說。人太多了，也不好办。演連坏套就是人多一些，我看連坏套。七大七十人，再加一倍，多一点比較合适。

三八年是我們实际工作很主要的基础，但是人不多。不好安排，也是个問題。我看还是……吧！五年以后再談。

大家要提一百八十，一百九十，二百，都是二百人的，权力在代表身上，你們要提三百人也可以。我也是代表，只有一票也沒有办法。

上屆中央沒有辜負七大的委托，作了很多工作，有成績，沒有过大的問題。其中有个別同志的成績，也很难作如此估計，如王明有病，不能用脑筋，一写檢討就要害病，不能写。可能真有病，也可能沒有病。王明写过一次檢討，承認了中央路綫的正確，但是不久他又不承認了，我說不承認可以收回檢討，但是他不收回。李立三同志是比較諒解王明的。

王明和李立三同志提不提呢？大家可以考虑。王明同志这次有病，不能参加會議，七大是选了他們的。这次我們也可以象七大一样选他們。我們不选犯錯誤的人，那就是以他們的办法办事，他們就是把和自己斗过的人不要。

最基本的就是他們不是一个人，他們代表一部分小資产階級。小資产階級是动摇的，高兴起来可以发狂，愁起来垂头丧气。中国是个小資产階級比重很大的国家，我們党的农民的比重也是很大的。党内知識分子出身的就占一百万，这一百万黨員，放在資产階級不恰当，放在无产阶级也不适合，放在小資产階級最好，他們主觀主义多，宗派主义也不少。我們选他們两个人，是表示我們对这种犯思想錯誤的和反革命与分裂派（如陈独秀、張国燾、高崗、饒漱石）有所不同的。陈、張、高、饒等有政治綱領，王、李也有，但他們和高崗、饒漱石不同，这是有社会原因的。动摇分子，机会主义，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是无原則的。如王明，先犯“左”后犯右的錯誤。張国燾也有。他最近在香港听說想回来，回来也好，蔣介石少一个人。沒有党籍还可以有几个籍。

小資产階級在紧要关头就要动摇的。王明有时右得不得了，有时“左”得不得了，七大选了王明，李立三，十一年来對我們的工作並沒有什么影响。今天的水災大概不是因為他們仍然选上了中委吧？

选了他們，是不是大家都会去学王明呢？不会的。选了王明、李立三，就是讓出两个位子来，把两位正確的同志或有小錯誤的同志讓給他們。位子讓出来是不公的，是这样的。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是这样的。能不能說：“正確的不如錯誤的，犯小錯誤的不如犯大錯誤的”。問題不在这里。道理是他們在世界上出了名，我們选了他們，全世界都会說：共产党在等待他們。外国都知道，別的国家象我們这样对待犯錯誤的同志是很少的。

这次会议虽然筹备仓促，但还有十多天时间，一定要开好。……大家要兢兢业业，看文件，选举，发言，好好的加以组织。依靠大家努力，会才能开好。

在“八大”一次会议上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讨论候选名单)

七大开了一个团结的会，团结的结果，使得中国取得了革命胜利。现在是建设的任务，也要求我们团结。

我们中国革命时间很长，已经二十八年，这中间经过很多曲折复杂的道路，犯过多少路线错误。所以这样，还是个觉悟的问题。如果全党都觉悟很高，那些错误路线就执行不通。直到错误很明显了，才清楚。可是反对了这种错误以后，又犯了错误。不过，正是因为经过的时间那样久，我们才从中搞出一套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党外人士合作的统一战线。不经过那样许多挫折，是不能有这些建设的。现在我们搞建设，希望错误不那样长。那样长的时间，是牺牲了多少人，才让我们学会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与群众关系——走群众路线，才有了认识。我写了那些文章，没有几次斗争经验是搞不出来的。问题是，在建设当中，还要犯那样长的错误，栽那样多的筋斗吗？可以不必，主要的问题在于认识。我们六年学会很多，但是科学技术还没有学会，还要作很大努力。现在我国有十五万高级知识分子，第三个五年计划，要发展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我们就有许多科学家、工程师。……我们应当避免走那样多弯曲的道路，就要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更少一些。一般讲中央和高级干部中间主观主义还是比较少的，否则中国革命为什么会胜利了，我们在斗争中也没陷于孤立呢？但是我们还是有主观主义的，比如中央批转过一个地区的一长制经验，当时就是不清楚。现在清楚了，不如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制相结合好，团结全党关系很大，我们这次会议应该是一个团结的大会。

这一百七十人名单，是反映了革命发展过程的。比如上海、天津、鞍山、沈阳各处工人都没有，有的说那你还是工人阶级，还是马列主义？问题在于二十二年根据地，根据地里这批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你说我们不是，我们可是反对了帝国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呀！马、恩、列、斯都不是工人，他们不懂得中国农村先胜利，城市后胜利这个条件。城市胜利才几年，要等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会变了成分。

紀念孫中山先生

在孫中山先生誕辰九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紀念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

紀念他在中國民主革命準備時期，以鮮明的中國革命民主派立場，同中國改良派作了尖銳的鬥爭。他在這一場鬥爭中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

紀念他在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的豐功偉績。

紀念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的豐功偉績。

他在治政思想方面留給我們許多有益的東西。

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

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並且把這個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正在完成這個革命。

事物總是發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過四十五年，中國的面目完全變了。再過四十五年，就是二〇〇一年，也就是進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這樣。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

但是要謙虛。不但現在應當這樣，四十五年之後也應當這樣，永遠應當這樣。中國人在國際交往方面，應當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大國主義。

孫先生是一個謙虛的人。我聽過他多次講演，感到他有一種宏偉的氣魄。從他注意研究中國歷史情況和當前社會情況方面，又從他注意研究包括蘇聯在內的外國情況方面，知道他是很有虛心的。

他全心全意地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

(新華半月刊一九五六年第二十三號)

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講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經濟問題

經濟建設不是一點沒有進退地、四平八穩的前進着，建設也是有時多一點，有時少一點，有時馬兒跑得快一點，有時馬兒跑得慢一點，有時上馬，有時下馬，這種情況完全是可能的。因為，第一是我們沒有經驗，第二是我們的經濟建設要以形勢為轉移。比如過去經濟建設可能搞快了一些，那是因為當時存在戰爭形勢，如果馬上要打的話，重工業搞多一點，就有必要。經濟建設的進行是波浪式的，有起伏的，一波逐一波，就是說，有平衡、破裂。而破裂之後又恢復平衡。當然，波浪式的起伏也不能太大，不要一下子又反保守。可是循着波浪式的規律發展前進則是必然的。如果承認了這點，那麼今年冒進一點就不是了不得，明年搞少些也就沒什麼，總的來講，我們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正確的。

165項是決定中國工農業發展的重點工程，這些不能不搞，但少許搞快了一點。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至今已經四年了，總的情況是好的，生產前進了，工人收入有所增加，人民生活改善了一些，雖然社會上緊張一些，但也還過得去，基本建設成績也還是好的，建立了許多工廠，有很多過去不能自己生產的產品，現在已經能夠自己搞了，象過去那樣什麼都要依靠外國的落後情況，已經開始有了改變。在工業方面已經打下了一定的基礎。所以應該確定，第一個五年計劃是正確的。當然，錯誤也是有的，這主要是因為經驗不足，而且今後也可能會有錯誤。因此，不能說我們總結這四年經濟建設的經驗，就能夠完全掌握了經濟建設的規律，一點錯誤都不犯了，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中心項目是165個，而限額以上的項目一共是八百個，其中大多數是自己搞的，只有一百五十多個是蘇聯幫助設計的，其它有些是東歐兄弟國家幫助的，主要還是自己設計的，誰說我們不行呢？雖然我們自己搞的數量不少，但大的工程是蘇聯幫助設計的，小的才是自己搞的；如果大的都能由自己來搞，就行了。看來，如果第一個五年計劃有缺點錯誤的話，那麼最大的缺點錯誤，就是沒有經驗。建設工廠只有骨沒有肉，也就是說，把廠房、機器設備等搞起來，而對於附帶的設備——下水道、馬路、郵電、茶館、酒樓、宿舍、劇院等等都沒有相應地建設起來。實際上，真正要建設一個工業城市，不把这些包括進去是不成的。西北現在有很多困難，搞得很緊張，這是因為城市沒有基礎，工廠搞起來了，沒有理髮的、縫衣服的，馬路沒有，汽車不夠，物資運不進去。因此搞工業，只是設計工廠本身，那是不夠的，必須把工廠的許多附帶的服務性的設備和福利設施一併計劃進去，而過去我們沒有列入計劃。我們的八百個項目本身的投資經費是夠用了的，可是一旦發展下去，所需要的經費勢必會增多，而這些我們又沒有計劃進去，這將是一個很大的漏洞。今年問題並不大，而問題大的却在今後，如這次不發現建設工廠中骨和肉的關係問題，只是搞廠房、機器設備，不搞附屬設備，工廠是建立起來了，可是問題會有很多。

尽管我們在建設上，我們犯有主觀主義錯誤，然而錯誤不犯一點也是不行的，因為沒有經驗。犯了錯誤，也就可以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從而得到教訓，主要是把錯誤改了就行了，不要潑冷水，要保護幹部和羣眾的積極性，應當在這個前提下面，來批判工作中的缺點。對於羣眾要求而暫時辦不到的事，一定要公開告訴羣眾，反復地向羣眾解釋清楚。

以後搞預算，每年要搞兩次中央全會和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討論，三榜定案。因為預算是一個框框，經濟建設速度的快慢，主要決定於預算。×××同志在一次談話中講得很好，他說：現在到底哪一年的計劃是冒進不冒進，就看這年財政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今後要使建設速度能夠保持經常穩妥，搞好預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中央把它提到二中全會上來討論，是有道理的，是要大家關心這個問題。討論一次還不夠，還要再開一次中央全會和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討論，這樣做的結果，就會使得我們的預算搞得比較準確，同時也可以使得我們的經濟建設放在充分可靠的基礎上。

省委、市委及中央各部的負責同志，一定要抓財政經濟和計劃，而現在沒有抓的居多，要迅速改正這個缺點。各級黨委在改革已經完成之後，要搞建設，而黨委如果不抓財政經濟和計劃，建設如何能搞得好呢？黨委是外行就沒有辦法領導，要想成為內行，就要深入進去，抓起來。中央現在已轉向抓財政經濟和計劃工作。

糧食、豬肉這個問題很大。今年的糧食，雖然全國還是增產的。但災區面積很大，由於對糧食銷售沒有抓緊，半年来多銷了很多，浪費也很大，大家要好好把糧食問題研究一下，看看怎樣才能保證供應，又要不發生問題，不要浪費，不要多銷。豬肉和付食品供應都很緊張。這些都不是很簡單的問題，特別是談到農產品價格問題，鄧子恢同志在福建發了一個電報，他主要是講農產品收購價格低了，尤其是糧價，所以農民不願生產糧食，他主張提高糧價，同時，中央主張對生豬的收購價格也提高一些。現在解決糧食問題，一方面是節約，抓緊不要多銷，另一方面，還要使農民願意多生產糧食，這對於解決副食品供應，特別是豬肉，有密切的關係。因為農民不願生產糧食，沒有飼料，豬也就養不起來，如果糧食多了，再把生豬價格提高一點，發展生豬也就比較可靠一點。總之，農產品價格要定得恰當。有些同志希望把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價趕快搞平，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在的剪刀差的情況，是以國民收入為一百，剪刀差價占百分之三十，而農民直接的稅收負擔，全國平均不過百分之十左右，如果現在要求完全消滅剪刀差價做到等價交換，國家積累就會受影響。但是剪刀差價太大，使得農民無利可圖，那也是錯誤的。總之，在不影響國家積累的情況下，逐步地縮小工農業品的剪刀差價，以提高農民的生活，是完全必要的。

不管怎樣，我們的經濟建設，必須要提倡“勤儉建國，艱苦奮鬥”。我們用一角錢，不能只做八分錢的事，而要做一角一分、一角二分錢的事。在困難的時候，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就想着要國家拿錢來解決困難。當然，這也是必要的；但是，應該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在困難的時候，不依靠錢，靠我們的模範作用和艱苦奮鬥，也可以解決問題。為什麼這樣說呢？據說蘭州建設工廠，辦公大樓首先就建立起來，可是沒有工人宿舍，現在工人只得睡在棚子里。

搞經濟建設，還要靠報紙，要使報紙在經濟建設中，在整個工作中起很好的作用。要抓好報紙，有什麼困難可以向羣眾講清楚，提高羣眾覺悟，大家眼前都苦一些來搞建設，建設好了以後生活就可以好一些。如果只是提高生活，而不把羣眾覺悟提高，問題還會發

生。如：匈牙利的人民生活提高不多，但也不是很坏的。可是，由于沒有教育，沒有提高羣众觉悟水平，小資产階級、資产階級的思想影响很大，以致出的乱子很大。

此外，今后應該多強調与人民同甘共苦，首先是宣傳領導机关干部要起模范作用，然后才能要求羣众艰苦奋斗。建設社会主义是个艰巨的任务，只有艰苦奋斗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所以，必須要強調生产，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才有可能逐步提高，強調領導机关干部的艰苦奋斗，發揚过去艰苦朴素的作风。同时号召人民与我們同甘共苦。

二、国际形勢問題

目前的国际形勢，发生問題的地方是中东和东欧，看来都不是好消息，但也可以說是好消息。因为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就表明有問題，有矛盾存在，既然有問題就要暴露出来，而事件爆发，使得問題明朗化，清楚了，这样就可以找出原因，采取措施，改进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把問題能够解决好，使波兰、匈牙利能够搞得更巩固些。如果从这方面看，又是好消息。所以有問題，終究都要爆发，迟爆发不如早爆发，早爆发的問題可能小一点，容易解决些。“失敗是成功之母”，失敗之后，有好的一面就是可以接受經驗教訓，如果確实在失敗中取得了教訓，也就有所收獲，这就是好的。如波兰、匈牙利事件，教育了波兰、匈牙利的革命人民，也教育了苏联，同时也教育了我們。問題是会不断有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問題也还是不断发生的。“革命”这两个字，在字典上大概不会取消的，什么叫革命呢？就是說，有矛盾就会有斗争，解决矛盾的办法就叫革命。现在的革命，就是指消灭階級；将来的革命，内容和性質可能会有些不同，但是，有矛盾就有斗争，要解决矛盾就要斗争，这在将来同现在和过去的意义上，还是一致的。将来階級消灭之后，矛盾的性質可能同过去有所不同，但是矛盾依然存在。如今天的中国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决，当前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之間的矛盾，这个矛盾一般來講，本来它不是对抗性的，可是如果解决得不好，就可能变成对抗性的矛盾。

三、中苏关系問題

目前，社会主义陣营中，苏联的領導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如果动摇了苏联的領導地位，会使得整个社会主义陣营陷入更混乱的状态，我們拥护苏联不是因为别的，主要大家都是共产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資本主义，既然我們彼此有着共同的目的。苏联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为什么不拥护他呢？当然，拥护苏联也并不是对所有的东西都加以盲目的拥护。事实上，我們一向都不是盲目拥护的，有些东西不适合中国情况，我們是不采用的，我們中国革命和工作的方針、政策、路綫，都是我們党依照中国的特点、情况，独立確定和制訂的。應該說，苏联在社会主义陣营中居于領導地位，也是恰当的，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也是有基础的。苏联还是有不少先进經驗。虽然苏联过去也有些缺点，有些做法不够妥善，但是，这些都是可以改正的，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东西，而我們有些同志过去就是片面地把苏联看成十全十美，現在調过另一方面又看成什么都不好了，这是片面性的表現。

馬列主义者看問題不能片面，事物有真美善与假丑恶之分，而又是相互对立的。对苏联的看法，过去看不能什么都好，今天也不能認为什么都不好。实际上，近来苏联在許多工

作中和国际关系方面，都作了不少努力，也有了很大的改进，而且是向好的方向走。这说明苏联基本上是好的，过去是好的，现在是好的，将来会是更好的，当然，缺点也是有的，有些问题处理方法不够恰当，在理论方面也有些错误。

我们党一开始就学习苏联。群众路线、政治工作、无产阶级专政等，都是由十月革命学来的。列宁在当时是注重发动群众、组织工农兵苏维埃等等，不是靠行政命令。列宁派党代表进行政治工作。问题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斯大林的后期，虽然还是在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是他把列宁的一些东西抛弃了，脱离了列宁主义的轨道，脱离了群众等等。因此，学习斯大林领导后期的东西，教条主义地往中国搬用，我们是吃了一些亏的。现在苏联还有一些先进经验，也是可以学习的，然而，有些东西是不能跟苏联一样的，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经济建设的十大关系，都是中国的做法，今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应该从中国的情况、处境和所处的时代等特点出发，所以学习苏联的口号，还是要提，只是不能盲目、教条地生硬搬用。同样，我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些好的东西，也可以学习。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而我们主要是学习人家的长处。

斯大林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具体表现在否定矛盾，至今还没有彻底消除斯大林这种观点的影响。斯大林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但是，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他把个人摆得高于一切，否认集团，否认群众，个人崇拜，更确切地说，是个人独裁，这就是反唯物主义；斯大林也讲辩证法，实际上是行而上学，如联共党史中讲辩证法，把矛盾放在最后。应该说辩证法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矛盾对立的统一。由于他是形而上学，才产生片面的观点，否认事物的内在联系，孤立静止地看问题。讲辩证法则是对立的统一的看待问题，所以是全面的。生同死、战争与和平，是对立的矛盾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又有内在的联系，所以，有时这种对立又能统一。我们认识问题不能只看到一面，应该全面分析，透视它的本质。这样，对认识一个人来说，就不能一下子什么都好，一下子又坏得不得了，连一点好处都没有。为什么我们党是正确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认识 and 解决一切问题，都是从客观情况出发，这样就比较全面而不绝对化。其次，群众路线，被斯大林看成尾巴主义，没有认识群众路线的好处，许多问题都用行政办法来解决，而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承认群众是创造一切的、历史的主人，没有什么个人英雄，只有群众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实际上，列宁逝世后，在苏联却把群众路线忘却了。在反斯大林的同时，也并没有很好的认识和强调群众路线的意义，当然，最近已经开始注意了，但认识的还不深刻。再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为列宁所强调的。当时列宁第三国际同第二国际的分歧，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机会主义者则不肯承认。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教训之一，除了工作中有缺点等之外，就是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也就是说，没有认真地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以致使反革命分子乘隙捣乱。还有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我们一向主张应该是平等相待，国有大小，各有所长，各兄弟国家有着共同目标，所以一定要团结，平等相待，不能有任何优越感。我们的党自从遵义会议以后，是独立地执行政策，独立地决定方针，保持独立的地位，按照中国情况办事。建国以后，我们提出“一边倒”，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须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团结起来，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踏在社会主义

义方面，一脚又跨在西方资本主义方面。所以“一边倒”就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国家断然分开，打消一切对西方国家的幻想，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妥协，而是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中苏关系必须搞好，对于苏联为首的领导地位，不能发生动摇，否则，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是很不利的。应该肯定，苏联总的方面是好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必须以苏联为首，对于这一点必须向党内外加强教育，很好地讲清楚。

四、大民主与小民主问题

近年来，党内和党外都有人要求实行大民主。其实，要求在人民内部实行大民主的提法是错误的。究竟什么叫大民主呢？大民主是用来对付敌人的，从我们的历史上看，陈胜、吴广揭竿起兵以抗秦，王莽废子婴而篡汉，东汉灵帝时黄巾起义，汉晋之际曹操、刘备、孙权分争天下，清朝的洪秀全、杨秀清等搞金田起义……等等，是大民主的作法；我们搞革命推翻蒋介石的做法，也是大民主的作法，这次举行反对英法侵略埃及的示威游行，也是大民主。应该说我们是赞成搞大民主的，但是必须确定：大民主是用作对付敌人，反对统治阶级的，在人民内部是不能用大民主的。同样，帝国主义、阶级敌人对付我们也是用大民主的手段，这次匈牙利事件就表明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是用大民主来对付共产党和人民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对付敌人一向是采取大民主，只是在今天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对付资产阶级不是采取大民主，也不需要采取大民主，而是用整风的办法，微风细雨般地进行思想教育的办法。但是，在阶级矛盾没有解决之前，我们对于敌对阶级向来是采取大民主的。

当然，大民主也可以适用于对付官僚主义分子，因为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作中造成很大的损失、恶果，到了群众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大民主来反对官僚主义分子？成都有些学生罢课，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就要到北京请愿，两路进军，一部列车到了宝鸡，一部列车到了郑州，第二机械工业部知道这个消息后，就派人前去把这些学生劝阻回去了。应该让他们到北京来，你们事情做错了，又不肯承认错误，人家到北京请愿，还拦人家。你们没办法说服他们，我们向他们承认错误。不叫他们来，是不是怕影响不好？或者是怕增加我们的麻烦。其实，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来与不来，影响就是那样，来也不会增加，不来也不会改变，真的来了，就是再忙也要接见他们，并且向他们承认错误。

群众有道理的请愿是完全应该允许的，将来可以考虑在宪法中加上一条：允许工人罢工。这样对于改正工厂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有好处的，因为工人一罢工，就使厂长领导紧张，就不敢光坐在厂长办公室里指挥了，而要到工人群众中去实地看一看，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脱离人民，甚至最终为人民所打倒。

大民主，我们是赞成的，如果现在用它来解决问题，恐怕民主人士、大学教授、资本家和党内的一些人（如官僚主义分子）却不赞成，因为一实行大民主，群众就会起来清算和“整”他们，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这些人已经整得够呛，再来个大民主，又得挨整，可以想象他们是不会欢迎的。其实，虽然大民主是对付敌人的，也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分子，

但是，我們也不必害怕它，問題在于只要能够把工作做好，認真克服缺点，改正錯誤，羣众只会拥护，也就不会搞什么大民主来反对了。

五、少数民族問題

对于少数民族，我們一定要團結好，不能把这个問題看得太簡單，过去几年来，对于少数民族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解决了一些問題，但是現在的問題仍然不少。同时，民族問題将会在很长时期里存在着。看来，只要我們把工作做好，它的問題就可能少一些。这次波兰与苏联，匈牙利与苏联相互关系上的一些問題，也都包括有些民族問題沒有很好地解决。在中国，西藏地区的民族問題也沒有完全解决。因此，中央几次都提出要重視这方面的問題，不要以为團結少数民族是很容易的事。一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切实把少数民族團結好。

我們对于民族工作，过去存在一些缺点，对改正要有信心，不要怕人家反对，因为有缺点，人家才反，缺点沒有了，也就不会再反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党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們党的干部是土生土长的，这些干部有北伐时代的，有土地革命时期的，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也有建設时期的。而且都是在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不仅如此，我們党的領導也是完全正確的，我們的军队是忠实可靠的，因此，應該有信心，不要害怕造反，要做到“任从风浪起，稳坐釣魚船”，不要悲觀，不要怕大民主，但是必須很好地改正我們的錯誤，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否則，将是危險的。

六、整风和整編問題

我們要进行一次大的整风运动，主要是整主觀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貪污浪費以及下边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明年一月，中央对这个問題要发个指示，確定整风的方法和內容，动員全党作好准备，7月以后再开始进行。在7月以前，主要是作准备，作个人檢查，如果在整风之前已經改正了錯誤，那就不要再整了；对于还没有改正的，屬于一般的問題，还是采取教育的方法；只有对于那些錯誤比較严重而沒有改正的人，才做重点的批評。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正錯誤，不整就改了，不是更好嗎？中央的意思就是在这次整风中，一定要搞彻底，不是刮一陣风，不是搞突击式的运动，不要来个突然襲击，不要损伤元气，也就是說，不是采取暴风驟雨的大民主的做法，而是用微风細雨的小民主的做法，事先充分做好思想准备，以达到提高干部思想覺悟水平、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的目的。

过去整风，有些大民主的做法，特别是時間有限，搞得簡單粗糙一些，以致伤害了一些好人，这次有充分的時間，一定要做到治病救人，不仅對我們自己的干部如此，就是对一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也应当如此，都是用小民主的办法，耐心进行說服教育，提高認識，改正錯誤，改进工作。應該做到：既有保护，也有斗争，这样才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和平时期，是贊成減少一些军队的，要很好地进行整編。同时，地方也要大大緊縮編制。大家都要做思想准备。現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一講工作，开口就先要編制、要人，并且認為編制越大，人越多，工作才有办法，好象不这样就不能进行工作。实际上，并不如此，往往編制愈大，人愈多，就会增加我們的官僚主义，現在有些同志做工作，很

少考虑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挖掘各方面的潜在力量，相反地是：动不动就是得多少编制，多少人。所以这次中央下决心，要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军队要大大精简，地方的编制也要大大压缩。

同时，还要反对领导干部的特殊化。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并且取消特殊待遇，和群众打成一片，艰苦奋斗，不能脱离人民。看来，值得考虑的特殊待遇，一是物质供应，一是警卫太多，必须很好注意，加以改变，以身作则，才能号召人民艰苦奋斗，同甘共苦。

党内上涨的享受风气，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必须加强思想教育，来批判和克服这种不好的风气。 (完)

对发展轻工业设备制造工业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

在轻工业部汇报工作时，毛主席对发展轻工业的设备制造工业指示说：“专用设备有条件自己搞的就自己搞，不要依靠机械部门。”还尖锐地批评，“你们野心不大，斗争性不强，重工业部门都积极地抓，你们却推；凡是重工业部门不干的，你们都应积极地抓，将来移交出去也行。……”

在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委员会

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座谈会上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

我对经济是外行，我就讲一些外行话。你们提出很多问题，很好，对我帮助很大，虽然时间不长，我已听到一些。昨天我找了正副主任开会，听到了一些，了解了一些情况，详细的你们开会讨论。陈云、×××副总理还要给你们作报告。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政府要和你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能解决的，总要解决的，我还没有研究过，有些问题还不能解答，你们把问题都提出来，政府来研究，陈云副总理考虑，解决一些能解决的问题。

我看工商界这个时期以来，公私合营以后，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比过去更熟悉了，更加靠拢了。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只剩下定息问题，在社会上的名誉也不同了，并且学习的热情很高，学习政治，学习本事，学习技术和管理方法。听说各地都办了讲习班，每个城市几百人，上海一期几千人，十期就几万人，这都是很大的爱国主义。我们民族工商界的学习热潮，他们愿意为新的国家做工作，学经济，学本领，大中小都愿意学习。

对资本家有大中小，我对资本家的看法和要求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认为改造很困难，

你們自己也料不到这样快，学习高潮这样高。你們开展不开展自我批評？（答：开展的。）去年工商联开会时，許多人做了檢討，这个办法是我們共产党的办法，我們也想在民主党派中推行这个办法，但是沒有开展得很好。最近民建的會議，用了这个办法，开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这是人民内部解決問題的方法，提出意見，提出要求，解決問題，达到團結。

我們两次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过去了，沒有問題了，現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了，但是还没有最后完成，还有很多問題。象农业合作化問題、手工业合作化問題、公私合营問題。就是将来全部改造完成的話，还是有許多問題，問題是層出不窮的。所謂問題，就是矛盾，就是不協調，就是不平衡。生活問題，工作問題，國內外問題，总是矛盾，是充滿了矛盾的。从前有人問：俄国为什么出了一个貝利亚？后来斯大林也犯了錯誤，中国出了高崗，香港也鬧其事，还有波兰、匈牙利、苏伊士运河問題，世界上問題多得很，我們今天提的問題还是一个类型，是工商界的問題，大中小的問題。

我現在来談时局。

你們看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你們有沒有吊桶？是不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社会主义恐怕搞不成呢？社会主义陣营要崩潰吧？我看就是崩潰，也沒有大事，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我看是不会崩潰的，崩潰不了的。社会主义陣营主要是苏联和中国。中国和苏联靠在一起，这个方針是正確的。現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針，說“不要靠在一起”，还認為可以采取中間路綫的地位，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間，作个桥樑，就是南斯拉夫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两边拿錢，这里边也拿，那里边也拿，这样做法好不好呢？我認為站在中間，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不利，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們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間，看起来是很好的，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靠不住的，他会給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給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能給我們吃飽呢？，不会給你吃飽的，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压迫的。印度受压迫二百多年，从来不给他們吃飽过，帝国主义是一毛不撥的，帝国主义就是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这些国家，就是八国联軍，燒了我們的园明园，割了我們的香港、台湾，而香港是我們中国的，为什么要割走呢？万隆會議为什么能够團結亚非国家，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存心压迫人家，这个帝国主义是美国。拉丁美洲的人到了中国對我們很亲热。我今天还会見了一个巴西的代表。巴西是一个大国，有六千万人口，面积和中国差不多，巴西一直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那些幻想处在苏美英之間作桥樑，有所利得，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我們大工厂还不会設計。現在誰来替我們設計大工厂？例如化学工业、鋼鉄工业、石油工业、坦克、飞机、汽車工业，誰替我們設計的？英国从来沒有替印度設計过，最近因为苏联替印度設計了一个鋼鉄工厂，英国跟着也設計了一个，美国也設計了一个，他們为了爭取印度，才替他設計的。印度第一碱厂，是我們中国工程师候德榜先生替他們設計的。帝国主义要保守秘密，沒有一个帝国主义給我們設計过。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高級知識分子、宗教界、工商界的思想里，还有一部分无产階級中，还幻想美国会帮助我們，英国会帮助我們，我們大家要好好宣傳一下，究竟一边倒对不对？我們一边倒是和苏联在一起，我們的一边倒是平等的。我們不感觉有波兰、匈牙利所發生的問題，我們是信仰馬克思主义的，不是硬搬苏联經驗的，硬搬苏联的經驗是錯誤的。对工商业改造和农业合作化就与苏联不同，他們农业合作化后几年是減产的，我們农业合作化是增产的。对資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不仅所

有人包下来，作为阶级是消灭了，作为人都包下来。工商界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收入，过去曾经起了积极作用，他们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所以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人民政权建立以来和政府合作，企业又公私合营了，这些好事不能說资产阶级对我们没有用，而是有用的，很有用的。工人对这一点不太了解，因为他们在工厂里从前和资本家是有斗争的，我们应该对工人說清楚。特别是工商界学习高潮以来，你们愿意学习，工人对你们会改变观感的。对资本家要宣传把个人事情和国家事情联系起来，提倡爱国主义，总之要想到国家的事。河北省合作化，过去的口号是“要发家，种棉花”，结果大家只管家。后来觉得这个口号提得不好，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就把家和国家联系起来了。你们现在要把家和国家联系起来，这个国家你们也有份的。我们的国家是穷国，而且穷得很，今年只有四百五十万吨钢，明年才有五百万吨钢，日本是七百万吨钢，我们要赶上日本，要第三个五年计划，才达到一千万吨。

你们这个会的中心是讨论你们的事情，同时也要联系国家的事，回去宣传教育时也要联系到国家的事情。我们要几千万吨、几万万吨钢，要隔几十年、几百年。我们要提倡爱国主义。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们在经济上还是不独立的，大的机器不能做，小的精密的也不能做，只能做中型的。飞机还刚刚开始出厂，汽车还刚刚开始生产。甚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我们应该和苏联合作。我们的国家里没有象波兰、匈牙利那样的反苏潮流、反苏情绪，工商界中也沒有，青年大学生中也沒有，大学生百分之七十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子弟，我们要团结教育他们。因为是你们的子弟，解决你们的问题，对他们有影响，入学入团，助学金问题，戴红领巾问题，青年团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一视同仁，要看质量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如果够不上，就是工农子弟也不能取，够得上，资本家子女也应该取。补助金问题，应该看学习和家庭来决定的。大的不要补助，中小的寒微的就应该补助，入团入党都应以此为标准，在中国是完全可以实行的。颜色不一，思想不一，还有两面性，有先进一面，有落后一面，是符合事实的。因素有一个任务，就是学习，如果都是好的，那么每个人都是孔夫子。如果每个在街上跑过的人都是圣人，蒋介石、希特勒都在街上跑过的也是圣人吗？侵略埃及的人、特务分子也是圣人吗？人是有所不同的，整个讲资本家是爱国的，但是有缺点，有正面的东西，也有侧面的因素，因此有学习的任务，否则就不要学习了，变成圣人了。康有为自己說，他三十岁以前做文章很能发挥，三十岁以后学到了顶点，他后来变成复辟，不是沒有理由的。一个人不要满足，七十岁、八十岁，还是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世界上的事情还有很多不知道，我们要加紧学习。陈叔老，你是翰林，你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你是不是都精通的？你是翰林，我是不行的，我连秀才都不是，知道得很少。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缺点，是有好处的。你们中间有秀才，有举人，就要来一个学习任务。

匈牙利事件出得好，还是出得不好呢？既然有问题就不能不出，出了反而好。有膿包总要出膿。那些国家的工作沒有做好，一概仿套苏联的办法，沒有照顾到具体情况，出了毛病。因此得出一条教训，我们要根据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办事。我们提学习苏联经验的口号，从来沒有提过学习他们落后的经验。他们有没有落后的经验？有的，例如肃反工作，他们是公安部門搞的，我们是机关学校来搞的，是地

方党委来领导的，不是由公安部門負主要責任的，我們是全体動員，大張旗鼓地搞的，他們是神密地搞的。民主黨派自己去搞。現在是不是有人怕搞肅反？是不是搞到自己頭上？你們有你們的苦，工人有工人的苦。政府要听兩方面的意見。你們有就業問題，工人也有就業問題。你們有失業的問題未解決，工人也有失業的問題未解決。匈牙利事件證明，他們國家里面藏了許多反革命分子，成立了反革命的司令部，早幾個月以前就在布置了，和外國也有勾結的。中國完全不同，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肅清了，工商界也一樣，只有個別的。關於過去與國民黨有勾結，有往來，特別是大的，不勾結不行，那個不算。我們黨也和國民黨有過勾結，我也以社會賢達的身份當過參議員，我到重慶去參加過會。過去進過國民黨、三青團講一講就行了，可以不算。所謂反革命分子有現行活動，如果是現行犯不管是哪個階級都不行。我想是很少的。現在工商聯比較乾淨了。現在的工商界不是以前的工商界了，反革命分子少了，可以告訴大家放心，個別的是例外。在我們國家里面，匈牙利事件是不會發生的。從去年潘漢年、胡風事件以來，到今年審查了四百多萬人，搞出了十六萬嫌疑分子，查出了確實隱藏的只有三萬八千人是反革命分子，只占百分之一點二。過去估計只占百分之五左右，是估計不對，是主觀的，不符合客觀事實。實際上機關學校只有百分之一多一點，社會上更少了。這是細菌微生物，不把它去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在里面祕密搗亂，搞清了也教育了廣大的人。其餘十二萬多人，宣布無罪，搞錯了，我們賠禮道歉，那三萬多人，一個不殺，大約百分之一勞改，其餘的人都在原單位工作。今年又布置了×××人的清理，方法更講究，還剩下四千萬人要清理。主要工廠、私營企業現在不清，免得驚動大家，大家放心，將來清理要你們參加的，要工商聯、民建和共產黨城市組織都要參加，一道去清理，又是对個別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不能牽涉到過去和國民黨有過關係的，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的不算，過去做壞事後來做好事也不算。今天講的是政治問題，你們關心的是經濟問題，恐怕你們就听不進去。總的來說，中國和外國的形勢是好的。匈牙利的事情基本上解決了，但是亂子還會有的，世界上還會出亂子的，不要認為出了高崗，出了貝利亞，斯大林犯了錯誤就了不起，匈牙利事情了不起，大家都可以睡得着覺。十月十日香港的人有些睡不着覺，過去幾天就睡着了。你們有意見說政府幫助不夠，你們可以提出來，我們可以多幫一些忙，我們政府的性格你們都摸熟了，我們就是這些人，是跟人民商量辦事，是跟工人、農民、資本家、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商量辦事的，可以叫它商量政府，不是板起面孔教訓人的，不是意見提得不對就給他一棒子，打得他頭向下，腳朝天。我們叫人民政府，你們有意見儘可講，我們不會借故整人。

你們關心大中小問題如何解決，定息問題如何解決。大中小應分階層。我現在提一點意見，是否對，請你們考慮。把小的占到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不劃入資產階級範圍內，叫做上層小資產階級，過去這樣搞過。象醫生帶兩三個徒弟也是小資產階級，漁民、船民雇用十幾個人的也不叫資產階級。在土改當中，有種小土地出租者，不叫地主，這樣就使幾萬人得到好處，對於這頂帽子他們很感興趣。資本家代理人或定息少的，如果不願意干要老保，可以把他們劃出來，不是今年是明年、後年劃出來，以免使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要定息，使百分之九十的人過不去。剩下來的是所謂大的。照經濟學來說，美國也是這樣做法，三十人以上就算大工廠，二十人以下、十五人以下的願意放棄就放棄，不願意放棄就叫他拿下去。關於定息的時間問題大家很關心，有一個原則，就是要解決問題，不

要損害他們的利益，特別是不要損害大的利益。還是大的對國計民生作用大，還是小的對國計民生作用大？小的人數多，占百分之九十，但他們的經濟不決定國家的經濟生活，對國民經濟作用大的還是大的。你們說主席專門照顧大資本家，不照顧小的，是不是右傾機會主義？你們分析一下，是不是照顧小的。小的人數多，不注意安排是錯誤的，要替他們解決各方面的問題。大的因為他們就是大，沒有別的，一個大的抵幾千萬個小的。我們黨對資本家也有過中小路線，例如統戰部。這個路線應當承認是不對的。中小必然照顧，現在把他們放在小資產階級範圍里來解決。農民是小資產階級，是鄉村的小資產階級，城市也有小資產階級，現在小的定息只有幾包香煙的就是小資產階級，資方代理人也划過來。公私合營，國有化，大的國家意義很大，沒有工業，我們就不能活，沒有農業，我們就沒有飯吃。不把大資本家很好照顧，百分之九十都摘了帽子，剩下的只有幾個，面子上不光彩。別的都是紅色的，我們還是白色的，就不好看。

定息問題到底多少時間，中共中央談過，時間太短不好，贖買就真正贖買，不是欺騙的，花不了多少錢。有人問究竟還有多少年？“八大”文件里已有這個意思，還要和你們商量，可以不可以解決問題，小的會反對的，工人會反對的，工人會說太便宜了資本家。照工人的道理馬上取消，中、小的搞一、二年就行了，為什麼這樣長？有兩個抵觸，第一是工人，第二是百分之九十的中小，他們的眼睛都紅了，你們的生活好。這個就要說服，要贖買就贖買到底，不要半贖買半沒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重性，有革命的一面，但實際本錢不大，工業私股只有十七億，折合美金七億不到，只有這一點兒，我們國家怎麼會不受欺侮呢？帝國主義欺負我們是有道理的。民族資本只有這一點點，要贖買就全部贖買，不要省這個錢，要說服工人，不要損害大資本家的利益，對整個國家是有利的。不要吝惜幾個錢，不要虎頭蛇尾，有始無終。我們還可以拖一個尾巴，拖到第三個五年計劃。你們看怎麼樣？人還有個尾巴痕迹。七年是虎頭虎身，如果還不能解決問題，還可以拖一拖，還可以再拖到第三個五年計劃，只要人情講得過去。中小人數很多，要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大資本家人少，但他們的資本大，比中小作用來得大，所以中小路線是不對的，應該是大中小路線。民建是大的路線，以大的為主是對的。工商聯大會代表中小占多數，要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同時要向他們說明，不要損害大的利益，因為大的對國民經濟起很大作用，損害他們的利益對工人、農民，對國家、中小都不見得有利。中小的利益是儘早摘帽子，大的想拖長。你們可以各搞各的，要早摘就早摘，老虎頭身七年，中小願想拿還可以拿，這樣做還可以不可以？現在沒有法律規定，大家可以商量，到了七年如果不能解決問題，再拖一個尾巴也可以，因為老虎總是有尾巴的，我們第一個要照顧到工人的利益，資本主義工業有一百六十萬工人，資本主義商業也有九十萬店員，合起來二百五十萬，還牽涉到國營的工人、店員，他們會不贊成的，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和黨是有矛盾的。是否有右傾機會主義？是不是變成了資本家的黨？要對他們說明，這對整個民族是有利的，對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中小工商業者都是有利的。這個“利”他們一時是不懂的。大學生百分之七十是資產階級的子弟，他們是不要繼承權，但是對於政府這樣對待資本家，他們是會滿意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少數民族上層領袖，宗教界是會同意的，很快的取消定息，他們會不滿意的。還有外國人，外國人到中國都到上海看看榮毅仁先生，看看他有幾部汽車，一部還是兩部，房里有沒有鋼琴。法蘭西有個資本家看過以後說，只要法國

共产党这样做，他就放心了。对亚非国家和西欧一些国家影响也很大，所以急于取消定息是没有好处的，而会损失很大，实际上没有几个钱，一年只有一亿二千五百万，有人说只有一亿一千万，七年共計八亿。这个钱没有送给日本人、美国人，是送给中国人的。总之，“肥水不落别人田”，是“楚馬楚得”是国家的购买力，也是公債抵銷的对象，还可以开工厂，从各方面可以考慮。你們會議代表中小占多数，就要解决得說明問題啦。对中小要說明道理，要中小的代表負責說，大的不好說，如果大的說出几个好处，就要七年，这是不好說的，要××、×××副总理去說，在座的代表中小的也要去說人家共产党是不是要取消大的定息。荣毅仁先生的資本要抵到一个半北京，大家都看着他，全国十多万资本家，大約大的只有几千户人家，只看这几千户，不看那十二万中小户的。我們要整大的很容易，来一个高潮，敲鑼打鼓就敲掉了。中小摘帽子不要一陣风，不要登报，一登报就来了，不搞高潮。这次會議如果报导，只說工商联、民建会代表团长都参加了，我講了国内外的政治，作了分析，对經濟問題也講了些話，內容不要講了。如果內容宣布了，工人和中小都要罵我，共产党就是要共产的，那有不共产之理。人家說共产党三头六臂很凶，实际上我們只有一个头，两只手，我們做事要“順乎天理，合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人民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坚决行之，則未有不成功者也。”这是偉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說的。我們两次革命就是繼承孙中山先生的工作，完成了资产階級民主革命，然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革命都是为建設扫清道路，都是方法問題，要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識形态法律、政治、經濟、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是还没有解决基本問題，目的不在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目的在于发展生产，七年来发展了一些，但是很少，吹牛可吹半天，实际上只有四百万吨鋼，明年只有五百万吨，再五年只有一千多吨万，在我們国家六亿人口不算事，比日本、法国可以超过，但赶上美国一亿万吨鋼要四、五十年才有希望。請大家把目标轉向这个方面。陈云同志看到一个瑞典朋友，瑞典只有几百万人口，每人平均有二吨鋼，照我們人口算，要几万万吨，美国現只有一万万吨，要达到瑞典的数字要超过美国几倍，所以过去搞民主革命，現在搞社会主义革命。工商联开会，民建开会，大家学习什么呢？都是为达到这个目的，几万万吨鋼，还要办学校，收音机都要，全国一切人民，至少要初中毕业，再过多少年，扫碼路，廚師所有的人都是大学生，要上知天文，下通地理，一切工作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蔣介石該打，就是因为他一件好事也没有干，二十年才搞了五万吨鋼。我們八年（算到明年）就有五百万吨鋼，他是心不在焉。我希望各位朋友引导这一千多万人向着生产方向，再几十年功夫，才能在文化上翻身。所以我們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今年一月里，在最高国务會議上，我說过社会主义革命大約再过三年左右可以基本完成，这句话引起了很大波动。有人说这样快嗎？“大約”、“基本”、“左右”，我用了这么多的形容詞。什么是“基本”上呢？就是指公私合营还没有取消定息，还有一个尾巴。全部完成就是取消定息。我認为時間定的长一些，早一点完成是好的。全行业合营誰也沒料到这样快。現在国有化就不这样快了，快了对国家对民族不利。我們照顧大资本家，对整个民族有利，花的錢不多，講的話要算数。可以影响外国的资本主义，对改造世界资本家有利。尼赫魯、苏加諾、吳努以及法国资本家百代公司都在看我們，看荣毅仁……。現在的情况和我春天講話是一致的，我只是講“基本”上，那是指公私合营，全部完成还要七年，

除了今年，還要六年。國內各方面都要照顧，對資產階級、無黨派民主人士，對工商業者、手工業、機關學校、工作人員講清楚，不了解是不好的。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同志們：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幕了。（全體起立，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從我們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的十一年間，在全中國和全世界，為了共產主義和人類解放事業而英勇奮鬥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們應當永遠紀念他們。（全體起立，默哀）

我們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熱烈鼓掌）

在七次大會以來的十一年中，我們在一個地廣人多、情況複雜的大國內，徹底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的勝利。在兩個革命的實踐中，證明了從七次大會到現在，黨中央委員會的路線是正確的，我們的黨是一個政治上成熟的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熱烈鼓掌）我們的黨現在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加團結，更加鞏固了。（熱烈鼓掌）我們的黨已經成了團結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力量。（熱烈鼓掌）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績。我們的工作是做得正確的，但是也犯過一些錯誤。在這次大會上，需要把我們工作中的主要經驗，包括成功的經驗和錯誤的經驗，加以總結，使那些有益的經驗得到推廣，而從那些錯誤的經驗中取得教訓。

就國內的條件來說，我們勝利的獲得，是依靠了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並且廣泛地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進行偉大的建設工作，在我們的面前，擺着極為繁重的任務。雖然我們有一千多萬黨員，但是在全國人口中仍然只占極少數。在我們的各個國家機關和各項社會事業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黨外的人員來作。如果我們不善于依靠人民羣眾，不善于同黨外的人員合作，那就無法把工作做好。在我們繼續加強全黨團結的時候，我們還必須繼續加強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團結，繼續鞏固和擴大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綫，必須認真地糾正在任何工作環節上的任何一種妨害黨同人民團結的不良現象。

在國際範圍內，我們勝利的獲得，是依靠了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熱烈鼓掌）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熱烈鼓掌）現在，國際形勢的發展對於我國的建設事業是更加有利了。我國和各社會主義國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國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戰爭、不要和平的，僅僅是少數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發財的壟斷資本集團。由於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不斷努力，國際的局勢已經趨向和緩。（鼓掌）為了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們必須進一步地發展同社會主義陣營中各兄弟國家的友好合作，（熱烈鼓掌）並且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加強團結。（熱烈鼓掌）我們必須爭取同一切願意和

我們和平相处的國家，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和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以及世界上一切國家的和平運動和正義鬥爭，我們都必須給以積極的支持。（熱烈鼓掌）我們堅決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蘇伊士運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動，堅決反對任何侵犯埃及主權和對於埃及實行武裝干涉的企圖。（熱烈鼓掌）我們必須使帝國主義的製造緊張局勢和準備戰爭的陰謀徹底破產。（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繫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許多年來，特別是從一九四二年整風運動以來，我們在加強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現在，比起整風運動以前，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已經提高了一步。但是我們還有嚴重的缺點。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間，仍然存在著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作風，這就是：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這些觀點和作風都是脫離羣眾、脫離實際的，是不利於黨內和黨外的團結的，是阻礙我們事業進步、阻礙我們同志進步的。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隊伍中的這些嚴重的缺點。（鼓掌）

十月革命以後，列寧給蘇聯共產黨提出了這樣的任務：學習，再學習。蘇聯的同志們，蘇聯的人民，按照列寧的指示做了。他們在不長的時間內，取得了極其燦爛的成就。（長時間的熱烈鼓掌）蘇聯共產黨在不久以前召開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又制定了許多正確的方針，批判了黨內存在的缺點。可以斷定他們的工作，在今後將有極其偉大的發展。（長時間熱烈的鼓掌）

我們現在也面臨著和蘇聯建國初期大體相同的任務。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必須善於學習。要善於向我們的先進者蘇聯學習，（鼓掌）要善於向各人民民主國家學習，（鼓掌）要善於向世界各兄弟黨學習，（鼓掌）要善於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鼓掌）我們決不可有傲慢的大國主義的態度，決不應當由於革命的勝利或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績而自高自大。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熱烈鼓掌）

同志們，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經得到解放的中國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我們又有偉大的盟國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家的援助，（鼓掌）我們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黨的支持，（鼓掌）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鼓掌）我們並沒有孤立的感覺，這樣，我們就一定能夠一步一步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熱烈鼓掌）我們這次大會，對於我國的建設事業的前進，將要起很大的推動作用。（鼓掌）

今天在坐的有五十幾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勞動黨和人民革命黨的代表。（長時間熱烈的鼓掌）他們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和我們有一種共同的語言。（鼓掌）他們走了很長的路程來到我國，以崇高的友誼參加我們黨的這次代表大會。這對於我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和支持。（熱烈鼓掌）我們對他們表示熱烈的歡迎。（全體起立，長時間的熱烈的鼓掌）

今天在坐的還有我們國內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熱烈鼓掌）他們是和我們一道工作的親密的朋友。（鼓掌）他們一向給了我們很多的幫助。（鼓掌）我們對他們表示熱烈的歡迎。（全體起立，長時間的熱烈的鼓掌）

（《新華半月刊》一九五六年第二十號）

給詩刊的一封信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同志和各位同志：

慧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請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澤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在省市書記會議上的插話汇集

(一九五七年一月)

一、思想斗争問題

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对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要有说服力，不是简单骂几句。如果简单粗暴，则歪风越刮越大。

今年五月人代会，七月政协会，怪议论一定会多。一个是法制，一个是农民苦，一个是没肉吃。总之是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要准备打这两仗，在座的代表要出马参战，每人准备一篇，要有分析。

同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富裕中农思想作斗争，要反复斗争多少年，富裕中农的影响很大，特别厉害，应当注意。

光搞业务工作，不搞思想工作，就会闹乱子。

每个省要有一、二个马克思，一、二个鲁迅。你们应该写文章，六十岁以下的都应该写。

每个省要培养理论家。现代有培养唱戏的，画画的，没有培养搞理论的。这也是个体制问题，你们靠中央，中央并没有不让你搞。

二、鬧事問題

对闹事怕不怕，我看还是不怕，闹更多的事也不怕。年年会闹事，以后会更多，怕有何用？矛盾要揭露，问题才能解决。社会是对立的统一。教授、学生与我们总会有矛盾，总会有吵架。再过廿年，老的死了，新的还会有问题。苏联革命四十年还有闹事。工厂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大学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他们闹事不要怕，闹到北京来也不怕。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不要采取消极态度。格罗从南斯拉夫回到布达佩斯骂群众，一下丧失威信，被轰下台，卡达尔则不同，既不骂群众也不跟纳吉跑，要准备出大事，可能就不会出大事，出了事要采取积极态度，正确方法，争取分化。有本领的人，就是要在波兹南、匈牙利那样的情况下，搞出一个局面来。

但愿天下太平。但要放在最坏的方面，准备出大事。我们从延安来，准备再回延安。过去没有看过梅兰芳的戏，现在看了七年，第八年准备回延安。无非是打原子弹，打世界大战，犯错误，出匈牙利事件。只要思想上从坏的方面作准备，一切不怕。不准备就会哭鼻子。“七大”提出十七条，“赤地千里”。现在得了七亿人口的国家，出点事算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可奈何。

一、罢工、罢课、请愿，宪法上有的规定了，有的也未禁止。因此，第一，不要提倡，第二，不管合理不合理，要罢工请愿，就让他罢工请愿。提的合理的要纠正，提的不合理的要解释。教授要发议论让他发，以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为好，不要一棍子打死，如果总是压，结果一定会总爆发，就会变成拉科西，也不能一味迁就，如果一味迁就，又会变成纳吉。

小资产阶级想专政，把你搞下来他专政。想搞匈牙利的，要整一二十年。各省要开群众大会，演讲会，辩论会，展开争论，看谁胜利。但事前要作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社会发生分化，我们争取大家。大家认为臭，他就被孤立了。

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看清是非。不管怎样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

全国大乱不可能，那里有脓包，有细菌总是要爆发的，大者五万，中者三万，小者一万，准备闹事。年终结账，如果达不到这个数字，就算工作作好了。

对闹事要开县区委书记会议作准备，区委书记、区专以上要有精神准备，先太平无事，消极怕闹，结果闹起来了，被动。先思想麻痹后事事答应。

不打问题不能解决，矛盾要经过斗争解决。河南回民杀牛受限制，起来打干部，一打就解决了。打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就是不合理的，也是好的，有脓总得放。

对于坏人的处理，一律开除好不好？我看不要急于开除。也不要杀掉（反革命刑事犯除外）利用他作工作，把他当做政治教材，剥夺他的政治资本。简单处理就是思想工作不承认对立统一。对肖罗、丁雪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对学校闹事的党员，讨论清楚再开除党籍，不要急于开除党籍。也不能开除出校。陕

西关于工人成份摸清楚，搞的调查很好。匈牙利没有调查，乱子出来了还不知道什么原因，鉴于这个教训，必须把工人成份摸清楚，了解可靠的、中间的、有问题的各有多少，现在调查可靠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五，要增加工人的比重，过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逐渐改变这种情况。大学生成份再过廿年才能改变。现在招许多工人、农民，在学校还办不到。

苏共二十次大会，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痛快的很，现在斯大林又活过来了。摇过去是
本心，摇过来不是本心。帝国主义一棍子，社会主义几棍子，又摇过来，开口波兹南、闭口
匈牙利，不说不是本心。

三、哲学问题

懂得分析，就是懂得辩证法。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单的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又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统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平衡是暂时的，不断地在破坏，有的几天几个月就破坏了，刚平衡，马上又不平衡。同一者即是一致、同一、合一。党内有意见，开个会统一了，过两个月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又开会。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也是对立的统一的，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主观主义。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对立统一的。哲学永远有斗争。有人讲哲学只讲一面，百花齐放，只讲放香花，不讲放毒草。我们承认社会主义有对立的东西。斯大林就有形而上学、主观主义。苏联不承认有对立，法律上不允许，实际许多错误的东西，都是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面掩盖着。

列宁认为单讲唯物主义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就要和唯心主义做斗争。要斗争就要研究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就是研究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斗争出来的。

哲学领域里两个对立的東西在斗争，世界观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方法论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我们与蒋介石是对立统一；与民主人士也是对立统一。各种事物有矛盾的两个侧面联系，斯大林在辩证法上有错误，“否定的否定”，十月革命否定了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会被否定，我们认为天下是稳定的，又是不稳定的。社会主义有一天也会消亡。如果说有一个社会上层建筑不会灭亡，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同宗教一样了。

四、农村问题

丰收很重要。苏联去年丰收，许多情况好办了。我们有了一年的经验，今年要来个丰收年。如果今年大家努力丰收了，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很大，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历史上社会主义合作化都减产，我一九五六年增产不大，一九五七年要大增一下。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是个目标，看三、四年能否达到。湖北是丰收，还有百分之十五的社员没有增加收入。应该向党政军民讲清楚，合作化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历史，我们搞了一辈子革命还犯错误，人家只有一年多的历史为什么不错呢？要有三年的历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是可能办到的。

农民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人生活苦，笼统的说农民苦是不对的，要有分析。所谓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收入减少了，有一部分老干部家里富了，反映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的思想。

四十条在今年党代表大会上讨论过，宣传一下，亩产四、五、八百斤，争取提前一年完成，十二年计划十一年完成。

头三脚难踢，办事有三折，今年完成了才一折，要三个五年计划才好办。

自古以来，凡是先进的东西，一开始没有不挨骂的。进化论、马克思、孙中山、共产党都挨过骂。

只要有一个合作社有优越性，就可以驳倒一切胡说，以此做宣传。

五、经济问题

化学肥料，各省自己开厂。

要注意搞粮食，不搞粮食很危险。有了粮食，就有了一切，罢工、罢课也有饭吃，天下不会大乱。油料和猪肉由合作社包干。国家只要不给。收来粮食也是这样（经济作物区除外），国家只管统购，不管农村统销，社包社，队包队。

两年后，不是与民争粮，而是怕国家不买，只要统购，不要统销。湖北省孝感县，现在情况就是如此。

新工矿区，要开国营农场，解决粮、油、肉、菜等问题。

大的工厂是必要的，小的要以有原料和销路为原则，大的要以国力有多大则搞多少为原则。

六、学校问题

初中要加农业课。

各省市要派干部加强学校，把学校抓起来。整个文教工作都应如此。

省委、地委、县委同志要分区分片向学生进行教育。

各省开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教师代表大会，一年一次，先准备好。一天报告，三天讨论解决问题，对学生工作没有安排应当安排。一年开一两次会，讲一两次话。要注意发现问题，不要等问题大暴露了再解决。现在好管了，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就是这么些单位。

七、文学艺术问题

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头、蛇身、鬼子、王八都出来。各省要注意，对重大成熟的问题，以一个人为主，组织些人写文章，准备一个月写一篇，把邪气压下去。

种牛痘可以产生免疫力（给你身体内部埋点对立物），为什么文学艺术不可以种牛痘？

宣传部，一、二个月召集记者谈一、二次，两个月谈一次也可以，现在是一年谈不上一

次。

八、干 部 問 題

干部尽往上提，提上来又没事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现在只得下放，不准上提。领导机关，人越少越好，无非是写文章，打电话。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能由少数人组成国家。五亿人统统变成国家，那能行？大学教授有什么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教授？工人农民如何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当一世工人农民？不是不提拔，死了就得补。

极端民主，绝对平均，总是不行的。颜渊没有评级，是第二级圣人。

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要调整一下，县委委员中，可以外来与本地各一半。

九、領 导 問 題

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部长，每年都要到工厂、农村去跑一跑，了解情况，才不变成拉科西。

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对各部看到等于没有看到一样，往工厂、合作社里钻。

真正的知识，出在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越是上面，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是要下去，二是调人上来汇报。北京这个地方不好，搞不到很多的知识，省里好一点。一定要下去，工业部长下工厂，农业部长跑农村。

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部长，每人一年一定要有一些时间下乡，研究问题。搞一个县、一个乡，两个月可以搞清楚，两个月不看电报还能看懂。现在听说大家都不下去了，机关里事情多了。

省委书记可以兼一个县（市）委书记，把原来的县（市）委书记压成第二书记。省委书记下去了，地县委书记也会下去。市委书记可以兼厂长、校长、党委书记。这样就可以深入实际，吸收知识。

区委书记会议，一年开两次好。逼的你研究问题。

上面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包括北京在内），一定要嗅一嗅。

各省要注意，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农村依靠贫农，学校依靠左翼，总要有个依靠。

胡志明在依靠贫农的问题上有错误，不是纠“偏”，而是纠“正”。对土改不肯定成绩，光讲错误，发了一个罪己诏——告农民书。地主一变为农民，民主党派反对一党专政，知识分子反党。有人提出要学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让学，说过去学中国学错了。结果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现在改变了。

十、其 它

精简各省自己搞，有出路的先搞下去，尽可能转回生产。无出路的设教养院，听候出

在省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一月)

記錄要點

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三个问题，即思想动向问题，农村工作问题，经济工作问题。还研究其它一些问题，如增产节约，法制（包括肃反），编制（主要是精简），中央与地方分权，税收，统战，少数民族，灾区，学生（大中小学），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今年的困难，粮食、山区、整风等问题。

思想动向问题，党内思想动向，社会思想动向应该抓住。

有的是家里的事，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党内有很大的发展。提一级不起床，提二级还哭鼻子，提三级才起床。党内不是比艰苦奋斗，比多做工作，而是比待遇，比地位。过去国民党有一个唐绍义，由内阁总理做广东省中山县县长，我们共产党还没有一个部长去当县长。总而言之，升得降不得，比高不比低，比阔气不比艰苦。

再一个，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看法问题。合作社究竟有没有希望，究竟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听说重灾地区和丰收地区都没有问题，就是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那些地区发生问题。一部份人没有增加收入而减少了收入，于是议论都来了。这也反映到党内，北京有些部长下乡回来说：“农民无精打采，生产情绪不高”。有的干部议论：“合作化大有灭亡崩溃之势”。“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地方上有的宣传部长也不敢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受批评，三面挨骂。农业部门开了一次会，农村工作部，农业部两个系统泄了气，四十条有无必要，能否实行也发生了问题。

前年反右倾，出了冒进。去年反冒进，又出了右倾（右倾主要指农村，别的方面未究竟）。这里有一股风，各地可能都有，只是大小不同。好象台风有八级，有十二级。在干部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大部分干部家庭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富裕中农是动摇的阶级），听了家里的话，就说合作社不行。合作化无论如何会化好的。但一年两年不可能办好，我们合作化实际上只有一年半的历史，要有三年历史就可以基本稳当，有五年历史就吹不倒了。

学校办了，毕业生不能分配工作，不满意。地质部在石家庄专区正定县有一个地质学校，有一千多人因为没有分配工作而罢课闹事，要上北京，他们的标语口号有“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落后，没有优越性！”北京大学有一个学生公开说：“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去讲话：“你要杀人，我要专政！”北京高等学校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大中小资本家子弟，工人、贫农子弟不到百分之二十。哥穆尔卡原来反对教条主义，他的话在学生中很吃得开，现在转过来反对右倾，也不行了。铁托、卡德尔的演说也受一部分人欢迎。听说农村中地主、富农到相当守规矩，城市中的民主党派、资本家也比较守规矩。因为这些人脚底下是空的，没有本钱。至于天下有变，上海、北京打下来原子弹，这些人变不变就很难说。现在这些娃娃们没有经

驗，沒有他們老子長于世故，所以就冒了頭，大喊大叫一氣。

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我們黨內大多數人是正常的，穩定的，少數人有波動。下雨之前總會有螞蟻出動，中國也有少數螞蟻想出洞活動。現在赫魯曉夫改變了，螞蟻也縮回去了。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後，發生了兩次大風潮，許多國家的黨受損失，英國黨搞掉四分之一，瑞士搞掉一半，美國黨搞得天下大亂。東方黨、中國黨受影響較小，斯大林問題牽涉到整個共產主義運動。有些人批判斯大林不加分析，過去擁護斯大林最厲害的人，現在反對斯大林也最厲害。突然轉了一百八十度，不講馬列主義，不講道德。黨內有些人台風一來就動搖，動搖分子一有風聲就動搖。有的搖一、二次就不搖了！有的永遠搖。小樹、稻子高粱、包谷、墻頭上的草，總是見風來就搖，只有大樹不搖，台風年年有，政治台風不一定年年有，這種現象是社會政治的自然現象。

中國黨是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的黨，但有許多黨員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出身的。有的黨員雖然艱苦奮鬥多少年，但馬列主義沒學好，思想上、政治上經不起台風，應當注意。黨內有些人，別的都過了，只有社會主義關不過。河北省委付書記薛迅，是“九·一八”後學生南下請願的代表，統購統銷中動搖了，堅決反對統購統銷。全國合作供銷社付主任孟用潛也上書言事，堅決反對統購統銷，其實統購統銷是實現社會主義的重要步驟，他們這些人就是社會主義這一關過不去。我們黨內這些現象，還沒有結束。再過十年可能還不會結束。十年之後，是否所有的人真心相信社會主義，也不一定，一遇到問題，有人就會說他早就想到了。

軍隊幹部對農民的生活反映要分析。有合理的部分（如薪水高），也有不正確的部分，可能有些人聽了家裏的話，替農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梁瀨濱也替農民叫過苦，黨內也有人叫，好像黨中央省委不代表農民，只有他們代表農民。江蘇有一個調查，叫苦的人，大多數是家裏有餘糧不賣。軍隊有同志反映說：“鄉村左了，城市右了。”這種說法根本是錯誤的。舉例說，一個農民一年收入六十元，工人一個月收入六十元，但一個工人養活四口人，平均每人十五元。以戶來算，工人每年拿七百二十元，農民每年拿二百四十元，但城市費用大，農村費用少。農民生活的改善，要靠自己生產，國家不能給他們發工資。農村很多付業沒有抽稅，稅收取了農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再從剪刀差取了農民一部分，不到百分之十二，兩部分最多不超過百分之二十，比蘇聯百分之四十五少的多，至於統購，只按市價買的。國家幫助農民主要是肥料、水利（小型水利農民搞，大中型水利國家搞）城市看來好象右了。過去資本家每年拿去一億五千萬，六年拿了九億，現在定息七年這麼給他八億，共十七億。那時候還要看情況，這关系到國際問題。出這一點錢買了這麼個階級（包括它的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共約八百萬人），他們是知識比較高的階級，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乾淨，辦法一是出錢贖買，二是出位子安排。共產黨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舉手不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他們的子弟要學匈牙利，挪到他父親那里就要打屁股。

大學生給你助學金，請你讀書。你要擴大民主我不怕，一遇大民主，第一歡迎，第二分析。對的我接受，錯的我揭露。我無理就承認錯誤，堅決改正。你無理就抓住你的小辮子。地質學校罷課鬧事，一討論就分化了，七十個代表贊成三個口號的只有十幾個人，反對的五十幾個人，放到四千多人中間去討論，都不贊成，十幾個人被孤立了。擴大民主是好事，匈牙利沒有大民主，就不能鎮壓反革命。出了亂子是好事，淹潰了膿包就解決了。不要怕事，

过去帝国主义蒋介石我们都不怕，难道还怕大民主吗？共产党怕大民主太不象样子了，不如段祺瑞，现在的党和政府是革命的，这一点上了宪法，娃娃们发疯乱叫：“打倒法西斯”，“要战争”，是违犯宪法的。中国改革不会被这些娃娃们冲垮的。如果几个学生娃娃把我们冲垮，那我们就是饭桶。

去年一年是多事之秋，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最激烈的一年。

我只讲一个问题。

其它问题，增产节约有一个文件。

肃反必须坚持，有反必肃，缩手缩脚是不行的，但法制必须遵守。

精简一定要坚持搞，一条是减人，一条是安排。一定要先把人安排好，再透出机关。

中央地方分权，你们感到不“过瘾”：“一没钱，二没权”。你们要什么请尽量提出来。

统一战线工作：有重安排不重改造的偏向。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对知识分子不敢改造。马寒冰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苏联下面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上面有人说：“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见，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让他放，但是他要用革命的面儿放，就得让他放，里面有禾有草，只准放禾，不准放草，事实上办不到。草翻过来，就是好肥料。我们作家的任务就是要和杂草作斗争。年年长草、年年除。没有国民党，就显不出共产党好。没有唯心主义，显不出唯物主义好。没有对立就没有斗争。只有斗争出来的，才经得起考验。矛盾不断发生、不断斗争、不断解决，一万万年如此，学了正面的，还要学反面的。只讲唯物主义不讲唯心主义，只讲辩证法，不讲形而上学，你就不知道反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也不能巩固，因此不仅要出孙中山全集，蒋介石全集也要出，黑格尔、康德、孔子、孟子、老子、二程、朱、王都要讲。你没看过蒋介石的文章，要反对人家就反不好，有人说，自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文学衰落了。×××的报告才只有五个月。就算文学衰落了，哪儿那么快。大家伙要长期准备，短时间写不出来的。作家要做工作，不做工作不给饭。作家坐在家里不到外面去，肚子里没有货，怎能写出好东西。

干部不提级，减薪问题要研究。

学生问题有入学、就业两个问题。

少数民族问题相当严重。

想尽一切办法的问题，我很赞成。（柯庆施的一个大发明）

在省委書記會議上的总结

（一九五七年一月）

都是老话。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夸大不行，过低估计要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胡志明把土改成绩估计低了，下了罪己诏，地主没有了，引起各方面（天主教、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进攻，现在纠正了。

去年一年，成绩是基本的，这个问题，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但民主人士和一部分同志的看法还有问题，认为错误缺点不少，所以有讲的必要。不足够估计成绩，合作社就有泄气之势。

我们历来的方针，赞成公共食堂，不另起炉灶，但要给管饭。一九四六年重庆大公报王芸生写社论说不要另起炉灶。我说“蒋委员长”要管饭才行，但“蒋委员长”不管饭。现在我们管事了，我们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把各党各派，民主人士都包起来，把国民党的人也包起来，这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条战略方针。这条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少。统购统销，就是把六亿人口的饭都管起来，公社缺粮户，城市无粮户都管，反革命也够一份饭，人长了肠胃就要吃饭。苏联办法不是这样，不是都给供应。统筹兼顾，学生也不可能都进大学，但要都给适当安排，或补习，或到农村去，或去边疆，或给救济，这个思想，要在不清楚的同志中说清楚，不能把人饿死，所有的人都要给以安排，这一方针乱子少。

想尽一切办法搞增产节约，解决困难。想尽办法困难可以解决。这点困难没有什么，比长征过草地好得多。草地没有房子，只有空气，过了大渡河后何处走？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现在没有想出几方几计来，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是千方，九十九计加一计是百计。

国际问题。艾森豪威尔给蒋介石的信，先泼冷水，后打气，要蒋冷静，不要冲动。希望寄托在我们内部出乱子上。

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这是一个怪事件，出了纳赛尔，要收回运河，艾登出了兵。英国资产阶级老子世故，老奸巨猾，出这样乱子不乱。这次艾登冲昏了头脑，犯了错误，把中东给了美国。主要矛盾在美国不在纳赛尔。文章都是美国对付英国的，美国想把中东夺回去。世界的矛盾基本的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借口反苏反共争夺亚非中东，两派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最大的帝国主义是美国，第二是英法。殖民地出了一股民族独立运动。美国对日本、台湾是用武的，对中东是有文有武。他们闹对我们有利。

我们是“保守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把九亿人口霸起来，易北河，三八线，十七度线一步不让，出了这个界线，让他们去闹，但我们可讲话。双方都搞颠复活动，我们之中，有他们（地主、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更不要说劳改犯），他们里面也有我们（共产党，工人，进步人士）。消灭阶级要很长时间，资本家变成工人要几十年，基本消灭只是讲大规模的斗争。苏联的同志不愿意接触这个问题。帝国主义内部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大，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这是条战略方针。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迟几年跟美国建交比较有利。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一九三四年跟美国建交，经过十七年，当时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罗斯福上台，中东事件，苏联一封信，美国三军下令戒备，究竟谁怕谁？双方都怕。谁怕谁多一些？我的倾向是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些，这样估计：如果大家一睡，三天不起，就有危险。还要看到坏的可能性，帝国主义会发疯。

世界大战，现在打起来不容易，打起来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我和苏加诺谈，我们不急于进联合国，不急于和美国建交，使它在国际国内没有道理，把它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使它孤立，以后总有一天会建交，一百零一年以后建了交，他更无能为力，后悔莫及。我们房子已经打扫干净了，四害除了，找不到他们的朋友了，如同他们在苏联一样，后悔莫及。帝国主义不怀好心，战败国不怕，主要是美国。

中苏关系。皮总是要扯的。不要设想世界上没有皮扯，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主义，因为总有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有点皮，但不大，比以前更靠拢更团结了。他们的方法与我们不一样，要等待，要做工作。党内各种意见，对党员也要做工作，要谈话，要开会，要谈心。南下渡江，蚊子多，天热，没有馒头，江是渡了，但是思想没有渡。组织上入了党，思想没入党。思想工作就是麻烦，不能怕麻烦。党内语言不一致是常有的，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形势比人强，形势逼得苏联同志不能不适当有所改变。照老样子统治下去，在国内国外都不利，二十次代表大会还是可以利用的。帝国主义利用，铁托利用，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要帮助他们，但不要忙，要慢慢来，当面讲，法宝不要一次使用干净。“利令智昏”，无非是五千万吨钢，三亿吨铁，二千万吨石油。这点东西算数，加一倍，加十倍也不算数，不这是地球上擻那么点东西，官当大了，也可能昏头昏脑，昏了要臭骂一顿。这次周当面尖锐批评，当面抬杠。十个指头九个一致，一个指头不一致，中央和省市也有不一致的，矛盾总会有，求同存异。

国际宣传要压缩一点，文工团，展览会要缩小一点夸张宣传，把尾巴夹紧一点。

还是要学习苏联。他们有很多好东西可学。要有选择的学，先进的、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学，错误的东西也要批判的学。三个五年计划把他们的基本东西学到手，对别的国家也要学。周出去的口号是找和平，找朋友，找知识，要到处找，单找一个地方太单调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对的，真理是同错误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同丑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事善人是同恶事恶人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是同毒草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是同唯心主义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许多人恨蒋介石，但蒋介石是个什么王八旦，大家不知道，所以要出蒋介石全集，还出孙中山全集，康有为全集。禁止人们同丑恶、同谬误、同唯心主义、同形而上学见面，是很危险的政策，这将引起人们思想衰退，思想硬化，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我们共产党人对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比较单调，因此讲不出几句有说服力的话。马恩列都不是这样，他们都努力学习当前和历史上各种东西，并教人们也这样学。斯大林差些，否定德国哲学（康德、费尔巴哈），因为德国打了败仗，也否定德国军事学。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祖宗。斯大林实际上是形而上学，不承认对立统一。哲学词典上是形而上学的说法：“战争不变到和平，和平不变到战争。两个东西是割断的，没有联系，不互相转化，只斗争没有同一性。”列宁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特殊手段，和平是战争的结果，政治是平时期的斗争。战争时期酝酿和平，平时时期酝酿战争。斯大林教坏许多人，他们有很多形而上学，不承认对立统一，思想硬化，因此政治上犯错误。偶尔有不同意见就排斥，反革命只有杀头，谁对苏联有不同意见就叫反苏。实际生活使斯大林不能这样做。斯大林并不是都杀头，都关，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杀得多，一九三八年杀得少，一九三九年杀得更少。有不同意见就杀头行不通。我们就和斯大林有不同意见，我们要签订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我们报上，对一些有害言论没有反驳，登了一些不该登的文章，例如：“难免论”就可以不登。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有个大难免论。谁愿意犯错误？犯错误都是以后才知道的，开始时总是百分之百正确，但做的结果总是要犯错误的。这是历史经验，方针是少犯一

些错误，报纸在做了准备之后，有了充分的说服力再回答，没有充分准备不忙于回答。有些作品要十几年才能产生，如大型文艺作品。有些在一个时期不可避免，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现在一放，牛鬼蛇神都出来了，过去你看不到，现在看看也无妨。不要一出就骂，这对增产粮食棉花影响不大，也不影响财政，爱情戏演一点也可以，让观众去判断，不忙禁止。

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东西，必须力争是鲜花，折一把都是臭的也不好，毒草占次要地位就没有害了。好象共产党为主，民主党派为辅一样，好象原子核和电子一样，原子核虽小但很重，拉开原子核要几个火车头的力量。核子外围的电子则很轻，它是自由主义的，但没有电子也不行，这也是对立统一。

准备发行四十万份参考消息，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东西发出来，替帝国主义尽义务，其目的是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毒草放在同志们和党外人士面前，使大家得到锻炼，否则，只知道马克思主义，不知道其他东西，不好。但要加强领导，好象种牛痘，使人的身体内部做斗争，产生免疫力。看参考消息，搬出唯心主义，出蒋介石全集，就是种牛痘。

人民闹事，很值得研究，这是新问题，我们过去和人民一起对敌人作斗争，我们和人民是矛盾的一个方面，敌人是矛盾的另一个方面，现在阶级快消灭了，要搞建设，反革命快搞完了，没有敌人了，对外虽有帝国主义，但它没有动，所以问题就来了，人民鼓起眼睛看我们，必须准备有一小部分人年年闹事，只要有精神准备，不会陷于被动。书记同秘书，部长同副部长，书记同书记要经常谈这些问题，分析交换意见，我的经验，这种研究有很大益处，匈牙利事件，拉科西、葛罗没有精神准备。河南临汝县三万人闹事，是最大贡献，下了一道赦令，把所有地主帽子都摘掉，推翻了乡政权，这就是打了一次防疫针，种了一次牛痘。石家庄步步放弃阵地，毫无精神准备，甘肃林校学生三百人闹得天翻地复，无可奈何。共产党不怕蒋介石、帝国主义，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是新问题。两种可能，要放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如西藏不出问题，两个可能，达赖一跑到美国，二留在印度，达赖不回来，中国大陆也不会沉，闹事原因：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犯了错误，工作方法生硬，反革命分子存在，所以要完全避免闹事不可能，只要不犯路线错误，不出全国性乱子。即是犯了路线错误，全国大乱，占了几省几县，甚至打到北京西长安街，只要军队巩固，我们也不会亡国，国家更会巩固。要象卡达尔一样，在国会大厦有一个月不能睡觉，要有这种思想准备。历史走回头路，反复也是可能的。辛亥革命革了皇帝又出了皇帝，我们的制度是否最后巩固了呢？两种可能性，也可能逐步巩固了，也可能犯错误出乱子。出了乱子总有英雄豪杰出来收拾局面的，最后总会巩固的。

对闹事如何处理？闹对了，承认错误，满足要求。闹得不对的不能迁就，要给予批评，争取群众。孤立坏人。除行凶杀人外，不能乱捉人，不要挫伤学生的积极性，要逐步引导他们。要有领导艺术，他要闹，让他闹够，不闹够不收场，否则还会闹。不要急于开除坏人，剥夺干净他的一切政治资本。甘肃捉了六十人，处理简单了，石家庄闹事要放假，我看就是不放假，把是非闹清楚了再放假，利用他们当教材。

对人民绝对不要轻易开枪，捉人，要开枪只能向天上开几枪，不要怕闹，有理由应该闹，没有理由也闹不长。闹不出一二·九来，我们过去也是闹出来的。

各部长、各省市要研究思想动向，过去忙于业务，不研究思想动向是不好的，要改变。

必须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不要学习国民党的办法。甘肃的办法近乎国民党，除非真正的反革命暴乱，才可用武力对付。

我们要加强工作，改正缺点，要加强对工农兵商学的政治工作，现在大家都忙于业务工作，不搞政治工作是危险的。×××出马到大学作报告，大家都要出来到学校作报告，重要的是学校和军队。有的说军队政治干部政治思想衰退，这还得了？！必须在增产节约和整风中好好整顿，把干部意志振作起来。四川学生要上北京请愿，不让来不好，来有好处，生活复杂一点好，不然太单调了，清一色的麻将难打。

青年团要加强学校工作，工会要加强工厂工作，民主人士让他们去批评，唱对台戏，批评不过两种：对的补我们的短处，错的越错越好，上台一讲就揭露了，梁瀨滨、彭一湖、黄炎培也叫过，以后又检讨了，章乃器批评我们统战部，放手让他们批评，一批评就反倒把他们孤立了。民建会一斗，还给他们饭吃，部长还给他当，错误犯得越大越有教育意义。不要怕他们批评，不要跟国民党一样怕批评，对批评要分别情况，有些采取主动，有些采取后发制人。又团结，又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从斗争中取得益处，得到锻炼。坏人坏事有两面性，埋伏着好的作用，很多同志弄不通这个道理，表现在选择王明问题上。坏事包含好事，好事也包含坏事，出了事就认为不好，不加分析，是形而上学观点。去年大胜利，包含消极的东西，头脑膨胀。

我们在建设时期，对阶级斗争（是部分的），人民内部斗争（就主要的）经验不足。这是一门科学。应当很好的研究。一万年以后也会有人闹事，我们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内要取得经验。

法制问题，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肃反，一定要肯定成绩。守法是守社会主义的法，不能破坏法制。法是劳动人民制定的，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保护生产力，保护经济基础，一定要守法。没有完成肃反的继续搞，一年完成。肃而不清的看来不少，要在事变中逐步肃清，肯定过去成绩，给肃反干部撑腰。民主人士骂，让他去骂，不能因为他骂就不敢动手了。敢于闹事的人，改造过来可能是有用之材，徐懋功十二岁闹事，以后做宰相。肃反中的错误要严肃批评。按着法律要放手放脚，不要缩手缩脚。

争取今年丰收，稳定人心。合作社可以巩固，从初级社算起五年巩固下来。农业首先关系到五亿人口的吃饭问题，非商品的产品很大，三分之二是自给经济。五亿人口自给，天下就稳定了。其次是轻工业的原料市场；第三，农业大部分是工业市场，如化肥、农具、铁路、几乎全部公路、电力、煤炭、石油、大型水利、建筑材料等，重工业的市场主要在农村。美国没有封建制度，市场广大；第四，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业，农产品变外汇。支援工业，农业即工业。第五，发展农业是国家积累的主要来源。所以要说服干部到农村去，要工业化就要搞农业。积累要搞出一个比例来。斯大林把积累搞多了，反而影响工业，究竟比例多大，还必须研究。总之要使合作社扩大再生产，能得到更多的积累，不能竭泽而鱼。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搞经济核算，利用作价法则计算成本，商品粮价格到一定的时候提高百分之五。现在全国商品粮一千万斤，十二年要提高到五千万斤，商品粮增多了，如果价格太低谁还种地？我不是说现在就要提价，但价格政策要研究。

合作社积累一年比一年增多一点，但仍不能太多，让农民吃饱一点，如果今年丰收，增加部分可多留公积金，丰收年多积累一点，与歉收年平衡。

一切事情都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走路、开会、电话、声波、唱戏、说话、我写字，都是波浪式的，赞成学辩证法。

在全國各省市書記會上的一次講話(摘錄)

(一九五七年二月)

再一个思想动向，在学校里青年学生值得注意，学校办多了，就不能就业。一不能就业就请愿，石家庄三千人示威，全国大专学校一千五百多所，有三十二所发生了问题，同时许多学校出现了一些典型人物，清华大学的武天保，西北大学的朱伯诚，武汉大学的陈伯华，鞍山的武俊卿，他们说社会主义不行了，他们要上台，现在在大学里百之七十至八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欧洲来了一股风，大讲民主，这些人跟着哥穆尔卡的棒子转。现在是乡村的地主到城市去，规规矩矩。我们要分析他们脚下是空的，没有群众，天下如有变，他们也要起风浪，青年人是沒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晓得，下雨之前，蚂蚁总是要活动的，思想动摇的人，一有机会就要动摇。从去年到现在，帝国主义对我们刮了两次大风浪，英国先搞垮了四分之一，美国搞乱了，五洲党影响较大，反斯大林牵涉的面比较广，我们要懂得外部情况和内部阶级动向，有些人永远是动摇的，有些人摇了几次就不摇了，台风年年有，大家都要注意，这是社会的自然现象。

——摘自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共中央、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关于青年工作的指示》第二部份第55—56页

在頤年堂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

今天谈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等百家争鸣的方针问题，文艺有了缺点，应当如如对待。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正在讨论，问题在于批评态度。小说揭发官仔主义，很好，揭发得不深刻，但很好。刘宾雁的小说并没有批评整个的官仔主义。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正面的积极力量写得不夠，要批评。应该有批评，也应该有保护。正面人物林震写得无力，而反面人物很生动。)

我们的官仔主义就是沒有整垮，应该批评。过去有一个片子(指《荣誉属于谁》)沒有演，那不是因為批评了老干部，要保护老干部，而是因為在那个片子里，那官仔主义沒有整垮。

《星星》（四川的诗刊）里面有几首诗还是好的，有几首是不好的，要酝酿一下，不要骂。

〔《星星》在叫喊，不要忙，沉住气，酝酿一下，不要仓皇应战，不打无准备之仗，过去的“批评”文章，群众投我们的票少。〕

对那些写了坏作品的作者要帮助，要调查。

对起义将领傅作义，对荣毅仁，我们都是帮助、改造。这样做了，他们就同我们合作。

坏小说，无非里面资产阶级思想，唯心论，只要作者在政治上同我们合作，就和胡风有区别，不能一棍子打死。

王蒙是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写不好。写不好，有生活的原因，有观点的原因。

李希凡说王蒙写的地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在中央。难道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

中央里面就出过坏人，象张国焘，高、饶、李立三、王明。坏人多了怎么办？照他们的办法就要用油锅煮。

〔李希凡的文章不能说服人，认为中央所在地的区委不会有官行主义，是不对的。中央都出过高、饶，区委（有官行主义）更不希奇了，“难免论”吗。（对林震也有些“难免论”。）〕

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错误的方针，很多同志实际没懂。对这个方针，十个部长大概有九个反对。

〔问题是作者（王蒙）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搞清楚，所以小说有消极影响。我们也没有搞清楚。因为写北京，（地方）太具体，就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样（批评）不能说服人。〕

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

是有官行主义。我们党的威望大，靠党的威望，官行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小资产阶级一共有五亿五千万之多，……这也是客观实际。

〔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大王国，党内也不可能没有小资产阶级。〕

说共产党的缺点不能揭发，这种观点不对。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实际赞成的人很少，真正懂得的人很少，“整”，不能服人。

〔干部中真正搞通统一战线思想的人不多——要帮助人家改造，达到真正的团结。怎样帮助改造人家思想，很不够。办法常是整一通。“整”，很容易，但不是好办法，应不用。“整”，不能团结。〕

现在王明还是有选票，他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不是一脚把他踢倒。

“一脚踢倒”是老办法，那很容易。喜欢用这办法的人，最好开枪，开机关枪，那是国民党的办法。

.....

〔小资产阶级大王国是客观现实。工人阶级只有二千四百万，其中产业工人占一半，干部也占一半，这是一头；另一头是地富和资产阶级，大约有三千万；中间五亿五千万都是小资产阶级。一千二百万干部也并不都是无产阶级化，真正化了的大约有二百万。所以，看文艺问题要从这现实出发。〕

现在是大变的时期，有的人不满。农业合作化，富裕中农就不满。

〔大学生中地富和资产阶级子弟占80%，都是非工人阶级，青年问题多，并不奇怪。其中要搞匈牙利事变的极少，多数是拥护共产主义的。〕

但是，不满的人过去还是拥护抗美援朝，他们不搞“匈牙利”。当然，个别想搞匈牙利事变的人也是有的。

我们的同志就是怕，怕匈牙利事件。我看匈牙利事件也没有什么不好。要讲辩证法，要懂得事物的两面性，不这么一闹，就没有真正好的匈牙利。

〔……矛盾总要表面化，闹一闹还是好的。闹是片面性，我们用片面性去反对片面性，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的同志有教条主义，用片面性反对片面性，用形而上学反形而上学。

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厅主义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

〔许多批评文章，立场对，但简单化。〕

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光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文章的头半截，使人读不懂。

马寒冰是什么人？也是一个什么官长，总是一个什么军长级的干部吧，他在《文汇报》的文章就写得不好，教条主义。

〔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立场很好，人民日报也可以发表，但是说服不了人，似乎百花齐放以后都错了，这是教条主义，朵朵香花是不可能的。教条主义是没有力量的，它所以滋长，原因之一是共产党当了政。马克思、恩格斯批评杜林，列宁批评卢那卡夫斯基，所以要下功夫，驳倒了他们。斯大林不同，（他当了政），所以他们批评不平等，很容易，象老子骂儿子。“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批评不要利用当政的权力，需要真理，用马克思主义，下功夫，是能战胜的。〕

〔用教条主义不能批评人家，因无力量，请看一下列宁是如何写《经验批判论》的。斯大林后来就不同了，不是平等讨论问题了，不是搜集大量材料发表意见。有些东西写得好，有些东西只坐在山岗上，拣起石头打人，使人看了后不大舒服。〕

陈其通、马寒冰等四人联名写的文章，后讲清楚原因，没有办法。陈沂，你写了几篇文章？有没有教条主义？出一个选集吧！全面检查一下。

教条主义的文章干巴巴，简单化，不能说服人。

教条主义滋长，是因为当了政。

马、恩驳杜林，很用了一番心思。但是当了政的斯大林就不一样了，他骂人，不平等，没有说服力。

应该研究分析人家的文章。

当了政，骂人象骂儿子一样，不好。

当政党同人民的关系，不应当是老爷同人民的关系，不应该骂。

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过去批评胡适，取得很大的成功，开头我们说，不能全抹煞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

胡适说，我是他的学生。他当教授，我当小职员，工资不一样，但我不是他的学生。

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

〔过去因为是斗争，所以讲缺点，今天也不必平反。今天他是帝国主义走狗。到二十一世纪，历史上还是要讲清楚的。〕

〔对地富、资产阶级要安排、改造，何况对小资产阶级？我们写文章常常笔下不留情。教条主义的本领是戴帽子、骂人、片面性，不是从团结出发，目的也不是团结。不是帮助改造缺点，达到真正的团结。〕

〔对人民内部的错误，要同对付敌人的错误严格地区别，（错误的杂文也是不区别）。对敌人无情斗争，对人民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团结，否则就容易杀人。〕

应当“刀下留人”。

.....

过去延安整风，我们不是说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吗？我们有些同志不喜欢治病救人，而是庸医杀人。对小资产阶级应当用适当的方法将他们改造。（那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靠他们吃饭，要把他们改造为工人阶级。）

我们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同志不了解中央这个方针：批评团结，治病救人。

他们就是怕闹事。

清华有个学生，说要杀几千万人，这太多了。这个学生也不要开除他的学籍。

学生闹事有理由，但也不提倡大罢课。他们反国民党反成了习惯。

不允许工人罢工是不正确的。宪法上没禁止罢工。贴标语是言论自由，开会是集会自由。

对闹事的人不应当通通叫他们写悔过书，也不要写检讨。

因为有问题，还是闹一下好。

学生闹事，不等于造反。

六亿人，一年有一百万人闹事是正常的，六百分之一。

闹事的人根本不能说是反革命，可能其中有个别反革命。

对付官僚主义，最好是罢工、罢课、打扁担，因为老不解决问题啦！

当然，我也不登广告，提倡全国罢工。

这些矛盾是暂时性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矛盾。

出了事情，要看两面。（闹事的人也有两面性，警惕我们。有脓疮，出脓就好了。）

说老子是“老革命”不能反对。国民党也是“老革命”，比我们更老。我们不能采取国民党对人民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都是同敌人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从资产阶级思想内，取合理部分，发展起来，这样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

现在的危险是以为天下太平了，因此看见王蒙的批评就不高兴。只是打，是锻炼不出文

学艺术来的。

是不是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存在？（百花齐放应允许毒草存在，允许风格不同。）

毒草是毒人的，但是香花是同毒草作斗争才发展起来的。

粮食地里有许多野草，庄稼是同野草作斗争才发展起来的。苏联建设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地里一样有野草。有野草不要紧，一翻过来，就是肥料。

是毒草，可以说明，有的人主张写：“此是毒草，不许尝试”。苏联的办法是只要香花，不要毒草。其实许多毒草是借香花之名以生。我们的主张是：毒草与香花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

斯大林有唯心论，有唯物论，他有片面性。（形而上学，有唯心也有唯物，斯大林两者都有，有辩证法，也有形而上学。正因为这样，所以有功有过，功大于过。）

苏联同志转不过来，喜欢采用高压的办法。

教条主义的方法，就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对王蒙作品赞美、骂，都是片面性。

王蒙有两重性，一是好处，一是缺点。

一点里有两点，一个事物包含有两个不同的侧面。

商品有二重性，王蒙也有二重性。

《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好。（《教条与原则》很有说服力。）

不能说以前都是教条主义。国民党曾经一家独鸣，所以打倒他们后，共产党也有一阵一家独鸣，这个一家独鸣是必需的，现在就不同了。

（东欧出乱子，就是这原因。现在情况变了，必须百家争鸣。）

要争鸣就要有准备。通过鸣来教育改造，而不是自由主义。一切不要一脚踢开，对错误要批评，也要承认二重性。）

可以对大家讲清楚，不要仓促应战，不要仓促写文章。打仗，不是说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吗？没有把握的也就是无准备的。现在打的仗也就是无准备的。

有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残余，有从那里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思想斗争，有对他的教育责任。

我们现在是以少数教育多数。

不要用简单的办法开除。

他们可以当教员，很难找到这样的教员。

马寒冰、李希凡的文章也有两重性，是教条主义，但可以促起注意。他们实际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实际，一万年以后还有非马克思主义。

而且，有一天马克思主义自己也要完毕。五百年以后怎样设想？现在五百年当过去多少万年。

将来的世界，阶级斗争完了，马克思主义有些东西就没有用了。

宣布自己是永恒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将来没有阶级斗争，但有新的斗争。那时社会科学领域内总会有新的学说出来。

当然，有些东西是不能推翻的，如同说地球旋转而太阳不旋转，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

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但是地球有一天还是要烂的。

人类也会被否定。有一天这样的人类不适合了，就一切毁灭，但这样对宇宙进化有好处。

三千年前，人类还用石头，以后进化到用铜铁，一直到用机器。人类历史五十万年，章太炎在“书”就讲过。铜器时代否定了石器时代，人类在地球上就是挖地皮过日子。谁也没有选举人类当地球的主人，许多动物，野兽没有选，细菌也没有选。大概只有植物才不反对我们。我们死了，可以供给植物养料，我们排泄的东西也可以供它们补用。

人类本身要进化，马克思主义者也要进步。

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大国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新问题。如何少走弯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六亿人口，马克思没有想到，列宁也没有想到，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几年。

我们六亿人口，将来有一天上街，在大街上走都得排队。将来在街上会挤杀人，怎样分配报纸，怎样看电影，怎样逛公园，都会成问题。

不能说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还有很多问题要发现，要解决。

不要怕歪风。风总有两种，一歪一正。

吉林今年大水灾，就是下多了雨。两股流，一股寒流，一股暖流，不在黑龙江上空相遇，也不在辽宁上空相遇，偏偏在吉林上空相遇，作战，就下大雨。雨下多了，不好。但是如果不下雨，就是旱灾。两股还缺不得一股。

越斗争，越丰富，就会出现新道理。

（××：现在有一种倾向，写爱情多。）

没有爱情，人类就绝种。

（××：杂文有“难免论”。）

“难免论”要多登几篇，这样就引起注意了。

掌握政权也有两重性。许多人就是怕“放”，怕“鸣”。

（我们应特别（注意）到，掌握政权之后，想用简单的办法把人打倒。百花齐放为什么（有人）怕放？怕饭票子过河。

青年人反对官厅主义不那么怕，因为他们还（没）有当事，官厅主义还未轮到他们头上。）

最近这种压法，缺乏说理，不大妙，应给人家出路，帮助。

（××：王蒙要求谈。）

谈两点：1. 好，反官厅主义；2. 文章还有缺点。

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

现在就是碰不得官厅主义，好象骂官厅主义就是骂自己，好，你自己既然承认官厅主义，就得骂。

不能讲北京不能批评，不能讲不能写党的缺点。

（××：说不搞工农兵了。）

不搞了？全国就剩下工农兵加知识分子了。

（××：工农兵搞得不好，大家还是欢迎。）

是啊，我们反杜林反了许多年，还不知道杜林是怎样的，可不可以找到杜林的书？

(××：谈到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

〔黑格尔、马赫。新建设周谷城论大逻辑，有点道理。〕

〔学校只听校长意见，不听学生意见不对。〕

- ① (翻印说明：这一材料是根据三份传达记录稿整理而成，以一份记录稿为主，〔 〕内是根据另两份记录稿插入的。)
- ② 这是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之前主席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对文、哲、教育界谈文化思想问题，着重谈文学批评问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

我讲这么个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占我们很多的时间，问题很多。当然嘛，两类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事实是要谈这两个问题。并不只是谈一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想讨论第二个问题，重点不放在敌我这个问题上。谈的时候，两个问题都要谈。这两类问题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过去我们都谈过的，叫做两个口号：分清敌我，分清是非，要分清敌我，多年来我们谈这个问题。要分清敌我，什么是敌人，什么是自己。要分清是非，这就是讲人民内部的啦，人民内部的问题是是非的问题，不是敌我问题，那么敌我是不是也是是非问题？也是是非问题。比如我们跟蒋介石，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是性质不同的一类是非问题。我们普通说，就叫做敌我问题（我们普通说的习惯说法，两个比较更清楚）。一类就是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就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人民日报，写了文章，叫做《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讲这两类矛盾，是说国际方面的事。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做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制度，与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这两个制度的区别。专政干什么呢？专政管的事情它属于那一种范围呢？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就是压服别人，这里不完全是什么镇压了，比如讲不给选举权，比如讲他们不能自由出版报纸。敌对阶级，比如我们对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分子不能在我们这里出版报纸，台湾不能在我们这里出版报纸，地主阶级不让它出版报纸，剥夺他们这些言论自由，剥夺他们选举权，都属于这个范围之内。要行使专政，也要用民主集中制了。谁人去行使专政呢？就是要人民啦。阶级专政，就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你要去管制他，要去杀他，你要去捉他，当然要经过人民政府，要经过人民去作。现在我们讲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只适用于人民内部范围的。只要不是敌人，那么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

的要求。

大民主，小民主。

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似乎高兴这个事件。这是少数人所谓的大民主。刚才说了，专政就是要人民去专政，要用阶级去专政，阶级对阶级的专政，自古以来的历史上，所谓大民主，群众的民主运动，都是对付敌对阶级的。我们有些党外的朋友，当然是少数人，他们也搞不清这个；另外有少数人，他是带着敌对情绪，他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怎么样整一下，那也有的。“那一天学波兰一样，学匈牙利一样，把共产党整一下，我就开心了。这个共产党实在使我们混不下去，专制的太厉害了。”有一个大学生他发表声明，他要杀很多人，要杀几百人。几百人少了，要杀几千、几万、几百万、几千万。那当然，这也是有些过甚其词，真要他杀，也不会杀这么多吧！但是表示了他的一种心理状态。另外也有一些人是属于幼稚的，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以为我们这个也太少了。他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主张外国样的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民主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但是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说，归根结底，人类这上层建筑（民主是属于那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那么一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那么就觉得不是那么舒服，一定要讲民主是目的就高兴一点。

自由，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们就跟他们讲，外国那个自由也不那么多，他那议会自由，做样子给人家看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看什么阶级的自由，什么集团的自由。英国保守党有保守党的自由，工党有工党的自由。保守党的自由要打苏伊士运河，工党就宣传不要打苏伊士运河。保守党里头分裂出一部分人，比如艾登的那一个助手，外交部付大臣，叫做纳丁，他就宣传，写文章一篇来宣传他的观点。所以艾登有艾登的自由，纳丁有纳丁的自由。阶级有阶级的自由集团有集团的自由，甚至于少数人、个别人的自由。至于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这过样的东西。

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够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来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样一些思想是错误的。企图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压制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这样的方法是无效力的，是有害的。你比如宗教，不能以行政命令来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家不信教，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不相信。凡属思想方面的问题，应用讨论的办法、辩论的办法、批评的办法、教育的办法、说服的办法，使人家相信你。

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放在那一类，放在第一类，还是放在第二类矛盾？我们中国这个问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没有谈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那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他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官僚资本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有这样的不同，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跟资产阶级就是说跟民族资产阶级嘛，是一个对抗性的两个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是對抗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不對抗，

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由第一类矛盾转变为第二类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采取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走向对抗。我们要把他放在第一类，那么就变成敌人了。不按这个实际情况办事，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反帝国主义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新问题。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谈到，简单地谈到，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那是说的所谓对抗消灭了，资产阶级打倒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存在。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关于对抗，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的？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十月革命以后嘛，在斯大林负责这个时期，他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本来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比如讲，讲政府的坏话，说政府，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但是批评有两种，有敌人批评我们，有敌人不满意共产党，有人民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共产党，这应该分别，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不加分别的，差不多是不加分别的。有一些在苏联作过很长时期工作的给我说，那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这两类矛盾本来容易混淆的，容易混起来，我们也有时不免混起来。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怀疑他是反革命去斗，有没有呢？有的，从前有，现在还有。问题是，我们就是有一条了，分清敌我。八年来，有些斗争斗错了，错了，我们就平反。并且机关学校，在延安时期就有规定，机关、学校、部队、企业、人民团体的反革命，真正的反革命也不杀，小反革命不杀，大反革命也不杀，实际上执行这一条，虽然法律上不规定这一条。因为法律上有例外的，少数例外还是难说的。但是我们实际上不杀的，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容易混淆还表现在两派，左派，右派。有右倾思想的人，他们不分敌我，认敌为我。不分敌我，这样的人还有，我们现在这还有。在我们看来，在广大群众看来是敌人，在有些人看来那是朋友。比如我这里有份材料，有位同志写信给我，现在发给大家了，是反对释放康泽。在他看来，康泽是敌人，这个人去年十二月出席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代表，是襄阳地区的，康泽过去在襄阳那里工作过。杀过他的儿子，他是襄凡市的叫王和卿，他就反对。但是跟康泽过去是朋友的人就不同了，他那思想感情就不同了，所以这跟人民有很大的差别。敌我不分。美国月亮跟中国月亮没有分别，有人却说美国月亮比中国月亮还好，我赞成美国月亮跟中国月亮是一个月亮。但是说美国月亮比中国月亮还好，我就不相信。为什么你那个月亮比我那个月亮还好一点？

“左”派，“左”倾机会主义者。所谓“左派”是打括号的“左”，不是真正的左，这些人过分强调敌我矛盾，强调敌我矛盾过分。比如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也有这样的人，强调过分，有把第二类矛盾，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误认为第一类，误认为敌我。这是肃反中屡次出现。我已经说过，这是“左”的。在延安时期，一九四二年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叫做团结、批评、团结，用这样的一条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找出这么一个公式。讲详细一点，就叫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后来那个时候，我们为了解决党内的矛盾，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与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鉴于以前所采纳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从西天取经取来的。那个“西

天”就是斯大林，就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鉴于那个不妥，后来我们批评教条主义的时候，就不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改用另外一种办法，另外一个方针，就是团结他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针，好象是一九四二年整风提出的，经过几年，到一九四五年，共产党开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达到了团结的目的，中间经过批评。为什么要有第一个团结，要有团结的愿望呢？如果没有第一个团结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垮斗乱了，一斗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因为你就没有想，主观上没有想，没有准备去团结他们，所以要有第一个团结。经过批评、斗争，最后达到团结的结果。这么一个过程，表明从这个过程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后来才推广到党外，逐步推广到北京。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批评的方法，不是你死我活，——“要么就是你，要么就是我”后来果然也就明白了，后来民主党派也明白了，工商界也明白了。比如讲，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在北京开的一次工商界的代表人物的会议，他们就是批评了一个月，结果批评得很好，并没有伤感情，而把问题解决了，资本家可以采用这个批评的方法，资本家即剥削者可以采取这个方法，我看要台湾采用就比较困难啦。因为这也是剥削者，这是两类剥削者。蒋介石采用就不行了，蒋介石和胡适就是另一类的，二个人的斗法。比如我们要批评杜勒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不可能的。（笑）但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宗教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推广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学校、工厂、合作社、商店都可用这个方法。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敌人已经解除武装的，比如过去我们对于俘虏，就是这样。在已经解除武装后我们对待俘虏跟没有解除武装之前，是两种态度。没有解除武装之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对这些劳改犯的人，我们也用这个方法对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俘虏，解除武装的敌人，特务解除了武装，就是认清他是特务，决定不杀了。怎么办？改造他。改造就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你还叫他活嘛，不要消灭他嘛。去年，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我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所讲的十条，在那个会议上讨论了一个十条。十条里有两条（今天在座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会），一条是敌我，一条是是非。一条是敌我关系，一条是是非关系，所谓是非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人民内部的矛盾。

以上我讲的是第一，是开坊。两类矛盾问题。

第二、讲肃反问题。

肃反问题就是第一类矛盾的问题。我说，比较起来，我们这个国家的肃反工作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是很坏，还是很好？我看缺点是有，但是跟别的国比较起来，我们做得比较好。比苏联好，比匈牙利好。苏联太左，匈牙利太右。我们有鉴于它，我们也不是特别聪明。因为苏联已经左过了，我们在那里学了一点经验。我们自己也曾经左过。在南方根据地的时候，那个时期就不懂得，吃了亏，每个根据地没有一个根据地他不用，就是学苏联那个办法。后来纠正了，才得了经验，延安才规定了九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到北京有所进步，当然还有缺点、错误。现在进步了，比起苏联来，就是两条路线（指过去，不是现在，就是斯大林当政时期，他那个东西搞得不好）。他有两面，一面是真正反革命肃清了，这是一面对的；另一面杀错

了許多人，重要的人，象共產黨代表大會的代表，殺了百分之幾十，中央委員殺了多少？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抓起來，跟殺掉的占百分之八十，而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選出來的中央委員抓起來殺跟掉的占百分之五十。我們沒有干這件事，是有鑒於他了。殺錯了的人，有沒有呢？也有的。大肅反的時候，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那三年的大肅反也有的。殺土豪劣紳在五類反革命里面也有。但是根本上沒有錯，那一批人應該殺，一共殺了多少人呢？殺了七十万，从那以後大概殺了七万多，不到八万。去年起就根本上不殺了，只殺少數個別的人了。人們就說：你們這些人，就是這麼反復無常，你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現在又不殺了。後來這四、五年只殺了幾萬人。去年起差不多根本不殺了，殺得很少，個別的。在五〇年、五一年、五二年殺了七十万，香港的報紙把這筆賬給擴大了（當時我們也不需要和他對賬），他說我們殺了兩千万，用減法來計算，二千万減去七十万，委實等於一千九百三十万，他那個多了一千九百三十万。“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哪兒殺了兩千万人呢？七十万則有之。那一批不殺，人民不得抬頭。人民要求殺，解放生產力。他們是束縛生產力，“惡霸”——五霸天：東霸天、南霸天、西霸天、北霸天、中霸天，五類反革命的骨幹分子。不殺掉怎麼解放生產力？

現在有些人想翻這個案，有些朋友想翻這個案，翻那時候的案也是錯誤的，我看不要翻的好。如果翻人民會起來打扁担，農民就要起來打扁担的，工人也拿什麼武器，拿鐵條打我們的。

比匈牙利，匈牙利對於反革命根本上沒有肅，殺了拉伊克，他倒是把革命分子殺了幾個，而反革命就殺的很少，所以就出現了匈牙利事件。從我們國家看。匈牙利這樣事件以後，人們說中國局面很穩固，外國人在這裡看了也是如此，我們自己也這樣覺得。

匈牙利事件以後，中國有沒有什麼風浪沒有呢？有那么一點小波浪，“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那春水是吹皺了，但是七級台風引起那樣大的波浪是沒有。為什麼道理，好幾個原因。肅反把反革命分子根本上肅掉了，剩下的沒有幾個，還有一點少數，極少。這是一條。第一條還不能講這個咯。第一條是幾十年革命鬥爭鍛煉出來的根據地，解放軍，共產黨，民主人士，幾十年鬥爭，鍛煉出來，我們的黨是生了根的；我們的軍隊是有戰鬥力的；我們是經過根據地逐步發展的；不是突然占領全中國。民主人士也是經過鍛煉的，共過患難的。學生們，有“一二·九”、“九·一八”、“五卅”運動、抵制日貨，“五四”運動。“五四”運動起，各種學生運動也是在反帝國主義鍛煉出來的這個傳統。什麼民生隊，這是第一個。第一個是我們從反對帝國主義，官竹資本主義、封建主義長期鬥爭中鍛煉出來的。人民有教育，包括知識分子也有教育，知識分子的自我教育，就是自我改造。而匈牙利沒有。再有，我們的反革命肅得差不多，當然還有別的因素了。比如講經濟措施，比如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團結民主黨派。現在我們大學生的成分怎樣呢？百分之八十左右還是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子女，而匈牙利大學生百分之六十是工人、農民的子女。工人，農民的子女大罷工，大遊行，聽“裴多萊俱樂部”的命令，我們的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子女，我們也沒有“裴多萊俱樂部”，當然嘍，可是他們愛國，除了個別少數人說怪話，講閒話主張大民主，主張要殺人之外，絕大多數是愛國主義者，是贊成社會主義的，是要把中國建立成一個強大國家的，有這樣的一個理想，所以我們比匈牙利好。比較起來，我們的肅反沒有蘇聯那麼左，沒有匈牙利那麼右。我們的方針是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有反革命就要肅清，有錯誤就糾正嘛！

有沒有過火的呢？有。有沒有漏掉的呢？也有。過火的、漏掉的都有。我們採用的是群眾肅反路線。採用群眾肅反路線，這個路線當然也有它的毛病，但是主要還是比較好的，比較由公安機關，學蘇聯那樣的公安部門單槍匹馬地肅反那比較好，群眾得到了經驗，群眾在

斗争中得到了经验。犯错误，群众也得到了犯错误的经验，叫做犯错误，搞对了，得到了搞对了的经验。我们希望在肃反工作中这些毛病要加以纠正。中共中央已经采取了步骤去纠正这些缺点。我们提议今年明年（如果时间来不及有这两年，搞的好今年就可以搞完）来一次大的检查，全面来检查一次，总结经验。中央由人大常委跟政协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协同政协主持。个别的检查，不见得会有效力的，有人写一个信，说他有问题，就去检查一下，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要作好这个工作，第一，不泼冷水；第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泼冷水是不好的。“都错了”，“就是你们搞错了”，结果所有干部都抬不起头。一，不要泼冷水，二，有错必纠，一定要改正那个错误。这个包括公安部、监察部、法院工作、劳改部门都有许多毛病。由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主持，并且我们希望这些常委，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还可以参加，身体条件许可的都可以参加检查，全面的检查一次，这对于我们的法制工作会有帮助的。地方有地方人民代表跟政协委员去参加。“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这是完整的一句话。表明两件事。第一条，还有反革命，有人说没有了，天下已经太平了，我们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的。这个不合乎事实。在地球上有个中国，中国就有个北京，北京就有个航空学院，航空学院里就有一个共产党支部，共产党支部就有个支部付书记，此人叫做什么名字？这个人应该给他扬一下名吧！（台下：叫马云凤！）马云凤就写标语一个：叫什么“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他又不跟党委商量，你一个支部付书记，他秘密写了很多标语，到处都贴了。他这实际上这位共产党员就赞成反革命暴动，赞成西方国去“援助”匈牙利。所以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过火的，漏掉的都有。这种人不一定是反革命，他有反动的思想，这个人后来开除了党籍。但是还留他在那里读书。因为他有反动思想，也有反动行为，但是说他是什么蒋介石派来的人或者怎么样也不是的。发现反动标语还不少，在北京的学校里头，工厂也有，学校也有。所谓“无反革命”论，天下太平没有反革命了，这个思想是不对的。第二条：但是不多了，就是反革命很少。这两条都要肯定。如果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其结果就会要搞乱。至少，我说十个指头，除了九个，至少剩下一个。不是还有十分之一的反革命，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把反革命当成一百，可能只有千分之一，总之不多了。

是不是应该大赦？大赦的问题，很多朋友有兴趣。我对这个总不那个积极，消极分子（笑）。所以未免跟一些朋友有一点小小的摩擦。大赦可赦不得。宪法上规定了，那你当主席，你又不遵守宪法？我说，应不起这个名义。实际上也可以大赦，但不定要用大赦这个名字，一下把反革命都放下去。如果大赦就必然包括康泽、王耀武、宣统皇帝、杜聿明，这些人放出去，老百姓势必反对。现在这时候，犯人劳改者就反映，“大反革命你们都赦了，我为什么你们不赦呢？”所有犯人都这样讲，法庭无事可做，检察机关也不要了，因为康泽可以赦嘛，有人说：“台湾都可以赦免。蒋介石都可以赦掉他，为什么康泽这些人不可以赦呢？”谁赦蒋介石了呢？没有那个赦他，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决定赦蒋介石！我们是向蒋介石建议，你如果起义，你变成起义将军，就可以取得赦免的权利。台湾方面的人，你们要起义，我们现在不说蒋匪，“蒋介石匪帮”了，可是他可不同，天天叫我们为“共匪”，对民主人士也不客气，叫做“逆”，比如说“张逆治中”之类，在报上发表了。所以放不得。那么是不是永远不放呢？那不是。我看慢慢放，阴放一个，阳放一个，今天放一个，明天放一个。反正是 不登报，也不下一个命令。少数著名的分子将来考虑。比如宣统皇帝怎么处理？人家是个皇帝，我的顶头上司（笑）。上了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是他的部下，都是他的百姓，但是这位宣统皇帝他是得罪了人民，将来也可以放的，但是现在还不能放，现在还

不能大赦，赦出来对他没有益处，对康泽也没有益处，对杜聿明也没有益处。对这些人放出来，人民不谅解。请他们参观，看看天安门，看看武汉大桥，看看工厂，看看农村。宣统皇帝也看了，康泽也看了。学习、教育、看报纸、研究、是不是可以找点工作给他们做，也可以考虑，就在班房里放点工作。逐步放掉那些改悔比较好的那些犯人。改悔较好的，罪又不很重的，逐步放掉他们。以后这样放就是，不要在报纸上登报，因为这个是人民的问题，农民要拿起扁担来，工人要拿起铁条来打，我们是受不了的，我们的手无缚鸡之力。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主义改造。讲这么几点，一个问题就是合作化。去年下半年以来，上半年那个热潮过去以后，人们冷静地想一想，又发生了一些问题了，上半年优越性就很大，合作社一到下半年好象优越性就小了。来了一阵风，不是台风。而是有那一股小风，说合作化不行了！今天发的文件里头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请各位看一下，这里缺少一个坏的，一个坏的典型。将来要找几种类型，这是一个好的典型，是很艰苦奋斗的。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什么事情都是有困难的，新生事物的成长是要经过曲折的，要经过批评的。人们不习惯集体生活。人们对于集体生活不习惯，特别是富裕中农。富裕中农是最不习惯。拥护合作社的什么人呢？就是贫农跟下中农。对于合作化不满意的是什么人？地主、富农以外是富裕中农。表示很不满意的有些地方大概占全体农民百分之一，有的地方百分之二，有的地方百分之三，有的地方百分之五，总是百分之几。因为富裕中农在合作社头几年，是不如他的理想，比他单干时候要差，因为不能请工了！不能雇长短工了！那末，要多少时候合作社才能巩固呢？现在的合作社绝大多数全国还只有一年的历史，就是去年这一年，前年一个冬天。一年多一点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好，这个就不行的，是要逐步才能巩固的，大概需要五年，去年一年，今年起还要四年。比如王国藩合作社，他有五年了，在河北省遵化县，靠近长城，靠近热河有那么个县叫遵化县，这个合作社完全巩固了。农民生活有没有改善？有所改善。七年以来，一九五〇年起，七年以来增加了一千四百亿斤粮食，一九四九年只有二千二百亿斤粮食。全国农民生产的粮食，而七年以来增加了一千四百亿斤。现在有三千六百亿斤粮食了。去年我们有三千六百九十亿斤粮食。因此农民生活有相当大的改善，所谓农民生活没有改善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有一部分农民还没有改善，缺粮户大概还有百分之十左右，有的地方百分之十五，有的地方百分之几。缺粮户在逐步消灭中间，我看大概过三年到四年。我们不是说合作社巩固要五年吗？有五年缺粮户就消灭了，以后统购统销就只统购不统销，农民我就不销粮食给他了，准备几年之内，我们不增加购粮的数目，增产不增购。现在农民手中有多少粮食呢？有三千六百亿斤，国家征农业税一小部分是小部分，大部分是买来的，购来的。征同购，征农业税和购粮这两部分共计去年是八百另二亿斤。三千二百亿斤中，国家手中拿了八百另二亿斤，统销在农村有多少？全国农村缺粮户和灾区农民，如种棉花的农民，只销三百九十亿斤 四百亿斤。八百亿斤中，城市及出口，出口只有三十八亿斤、四十亿斤，城市人口吃的后备粮合起来只有四百亿斤多一点，如果还有两年三年只征这么多粮，那么农民就会富起来，就可以养猪，养牲口，农民可以储备一部分，所以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叫农民苦，一片苦声是不对的。我们有些干部，也这么叫，有一些他们实际上是代表富裕中农。因为干部有了几个钱，寄点钱回去，今年寄点，明年寄点，几年之内他家里有了，就成了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叫的最厉害，就影响我们的干

部，民主人士也受影响，大概也有什么亲戚朋友之类。这个就要加以分析。也有民主人士，也有共产党，有非共产党，跟着一起喊：合作社没有优越性。我看还是有优越性。不信，请看王国藩合作社就是一个典型。为什么匈牙利，波兰合作化搞不起来呢？波兰只有百分之六农村人口加入合作社，一阵风吹掉了大部分。哥穆尔卡一篇演说就崩溃了。一万多个合作社，只剩下一千多个，吹掉了十分之九。在我们国家里能够有这么快的合作化，这是有好多原因：第一的最基本原因就是由于地少人多，多的要命，每人的土地很少，集合起来就比较好。第二是我们党，人民政府所采取的步骤。采取有步骤的，分几步，分几个步骤。因此我们与苏联的合作化的过程不同，他们的合作化几年不增产，而且减产，我们的合作化是增产，如去年我们增产二百亿斤。除了富裕中农叫，因此影响党内外同志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农民真正苦，就是刚才讲百分之几的缺粮户。还有一个是农村和城市的比较，城市工资比较高，现在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六十块，有高于六十块的，有低于六十块的，比如五十块，四十块还可过，三十块就差了，还有二十块、十七块的，一家四口，十七块。四七二十八，六十八元要过一年，那是最苦的，但是高的也有高达一百多元的，有没有二百多元的？有二百多元的。有的一个人一千块，家的四个人就有四千块，几年之后，你们看，农民要比工人富，你们看吧！工人除了一部分粗工、临时工、工资不适当，一到城里来八十块一个月，有部分工资是不适当的，这跟农民一比较起来，刺激他们。但是城市跟乡下是两种生活，乡下如果每人有五六十元钱，一年一家就有二百四十元人民币，那就很可以过生活了。有个地方算了账，有四十八块钱收入，每人四十八块收入，一家四口每人四十八元，那生活很好了。乡村很多东西不要花钱买，城市样样要钱，所以是两种情况，把两种情况混合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关于资本主义改造。我没有研究，但我鼻子闻到那么一点东西，也在这说两句。在资本主义改造方面，也有那么一股小小的风，也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说是资本家就不用改造了，跟工人差不多了，甚至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有些人这么说，当然可能是少数人，有这么一种思想，“如果要改造，工人阶级为什么不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是要改造。在阶级斗争中间改造整个社会，也改造了工人自己，这是恩格斯说的。在阶级斗争中间，改造了其他人，也把自己改造了，并且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那他自己就不能解放。这是一个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拿我们中国来说，如果不解放六亿人口，那工人阶级就本身不能解放，所以阶级斗争中间都有改造的，比如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我们每年都有进步，这也是一种改造。我这个人从前也是个知识分子，各种思想都有。喜旺嘉错先生，你那个佛教我们拜过菩萨的，我朝过南岳山，为我母亲还愿。我信过无政府主义。嘿！那个无政府主义很好，又信过康德的唯心论，你看我这个人多复杂。马克思主义后来才钻进去，把我脑筋改了一下，名之曰改造，主要是在阶级斗争中。这几十年来，资本家就那么高明，一点不要改造了？我看不然，我都要改造，你不要改造了吗？（笑）你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了？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只有一面性对事物不能分析，总有缺点，两点论，优点缺点，而且资产阶级的根子还没有脱离，资产阶级还没有摘掉帽子，摘掉帽子还有一个时期思想改造。取消论这种观点如果胜利，那么资产阶级的学习任务就没有了。现在我们大家都学习嘛！政府工作人员都要学习嘛！反而资产阶级不要学习了。那短期训练班就不要开了！这不符合工商业者多数人的愿望的。他们是愿意学习的，学习四十天回到工厂，面目一新，有了共同语言了，跟公方代表以前是格格不入，你是资本家，我是公方代表，两个人客

气的很，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现在你算是资本家，还算我是资本家？我算是资本家吗？我进了四十天的训练班，回来时有了共同的语言。生怕听改造两个字，我们有些人。改造这个东西，美国人叫洗脑筋，我们叫改造。我看美国人确实是洗脑筋，美国人可洗得凶，我们这个还文明一点。照这种议论，那宪法就要改了，因为宪法上说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那都一样了，工人不仅和农民一样，而且与资本家一样，那工人阶级的领导就要取消。我刚才声明了这不是多数人的意见。这是有些人在说。

第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这个问题。前面说的，我们六亿人民有很大进步，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进步，工人有进步，农民有很大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有很大进步，但是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现以后，有一些怪议论，我已经说过，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说将来可以赚薪水，无非是为吃饭，此外还有一个讨老婆，讨老公，大概是这两件事，一个叫吃饭、一个叫生儿子。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这个东西不着重，好象这个马克思主义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行了！也有缺点，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在我们的青年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进一步改造自己，还是要提改造，不要避免这个改造。过去那些改造思想改造有点粗糙，有些地方伤了人，现在不要搞那样的改造。努力学习除业务之外，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进步，学点马列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就学那么一行专业，一辈子吃不完。没有政治工作，不作政治工作。最近一个时期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行政部门政府应该管。从前叫德育、智育、体育，现在我们变成两育了，智育专搞智育，此外还搞点体操，就叫体育。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学点这些东西。

第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又来了！不是反过了吗？现在又反铺张浪费。共产党就是那么一套，而且摸得共产党不过就那么一套，几个月完后就没事了，现在有那么一种议论，这个是不是真的？我看也有点真，真正反一次的时候是三反。三反时把铺张浪费，把贪污腐化反了一反，后来没有再反了。有一年提倡过一次节约，那是节约什么东西呢？那是讲节约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降低标准，就是前年节约了二十多亿，很大一笔钱。但有些地方节约不当，节约结果工程不好，节约过了。另外，在生产方面节约原料，以至降低了质量。就是基本建设降低了质量、生产降低了质量，这些是那次的缺点，但成绩很大，节约出来二十多亿。很大一笔钱别的一般没有搞节约，机关、学校、工厂、合作社、商业系统、运输系统都没有搞，现在要提倡节约，现在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对铺张浪费。这样一来，现在就开始见效，桌椅板凳都不买了，地毯没人要了，我有一批地毯出卖，在座的没有受主。我看如果你们不要，我就没有办法，大家提倡增产节约，我有那么多地毯可不得了，现在反到我身上来了！这一回比较要搞彻底些。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来。我打个比喻，象洗脸一样，你们各位是怎样洗的，一个礼拜洗一次是不是？（笑）据我所知道的许多人的洗脸是一天洗一次，至少。有的一天洗几次。为什么道理？为什么一付脸要天天洗，干什么？那无非不是增产也节约？无非是为了面貌要漂亮一点，为了使尊容漂亮一点。每天洗一次面，这无论是共产党非共产党都搞这事嘛！并非共产党员提倡才洗脸，从古以来就洗脸嘛！现在反对贪污浪费，这东西就等于我们洗脸。人就是经常要洗脸。人不是别的动物，别的动物它就

不洗。人是高级动物，所以他就要洗脸。我们的党，民主党派的一些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阶级、农民、手工业者这天亿人口，我们来提倡一个节约。现在搞的不象样子，许多人无非是升官发财的思想大为发展，去年这个评级评出毛病来了。评级无非是争名夺利。争名于朝，夺利于市。

第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是一条战略方针。所谓统筹兼顾就是六亿人口。同志们都是负责同志，替国家负责任的。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总要从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多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就有这么多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我看人类他对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大笑）这样子搞下去，我看人类要提前火拼的，就是趋于灭亡。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要快接近灭亡了。没有东西吃，加以提倡卫生，卫生工作一做，防疫针一打，娃娃那么多，可不得了，大家都是年高德劭，（大笑）我今天不着重谈节育问题，因为我们邵力子先生他是专门名家！（大笑）他是大学专科毕业的，（笑）他比我高明。还有我们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产计划部门好不好？（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这一点现在不多讲，我讲还是用战略方针。比如我们的一些事。救灾，全国每年都有灾，有很多灾民，要给他们粮食。比如统销，苏联就没有这样做，我们是把一切城市乡村，无粮户、缺粮户都计算在内。比如安排工商业就业，安排失业人员就业，统筹工作，各方面的统筹工作，所有这些都算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去年这一年差不多有三百多万人就业，麻烦，问题也很大，按照计划，原来计划八十万，而实际上差不多增加到三百万人，多了二百多万，工资支付就多了。不仅这八十万增加了，原有的一千八百多万人的工资都有多多少少的增加，去年新增差不多三百万。这个负担很重了。但是失业是不是完全消灭了？还没有。比如广州现在还有相当多的失业人员，他们说要想办法，不能一律而论上海也有一些失业的人，其他地区还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是这失业的人已减少了。有人提，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个办法很值得考虑，宁可薪水低一点。比如我们这些人十年八年不增加薪水，我这一提出来，可能你们大多数要反对，也许你们赞成的。如果十年不增薪，高级人员十年不增薪，我看死不了人。不会死人的！以不死人为原则年还可以高，德可以劭，为什么德劭？不增薪水就是德嘛？（笑声）再增让下面去增一点。

学生问题怎么办？有百分之四十的学龄儿童到了年龄没有学校，这人民政府并非万能政府，人民政府办事不能一步登天。现在还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没有学校进。另外还有个事，这叫四百万，今年这一年有四百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中学，没有法子升中学，没有地方，没有经费，除了应升的之外，今年计划升的之外，有四百万不能升，高小毕业生就要回到生产队里头去，包括农村的。有多少初中毕业生不能升高中，有四十万，有多少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大学？一说四万，一说八万，一说九万。（周总理：初中是八十万，不是四十万）啊！初中八十万，不是四十万。这个早晚时间不同（笑）。八十万初中生不能升学，好多人就业也是问题，要等候就业，八十万这么多嘛！有九万高中生不能升大学，这也是发生一个就业问题。等候也是一种安排。比如买猪肉，一条长龙在后面等候，前面已经卖完了，只好回家，买不到了嘛！这个问

題是相当大的問題，要請大家考慮，政府也考慮。總而言之，今年這計劃就是那麼多錢。一句話叫：錢就是那麼多，只能辦那麼多事。休息一下吧。（休息十五分鐘）

第八：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問題。這個人民內部的矛盾，列寧不是說過嗎，人民內部是有矛盾的，社會主義社會對抗消失了，矛盾存在着。我說列寧那個時候，他不可能全面來考察這個問題，缺乏經驗，他就死了。斯大林在一個長的時期就是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他是一九五三年死的。五二年的時候，他寫了一本叫做“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書。在那本書里承認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是有矛盾的。兩者處理的好，矛盾可以不發展為對抗性矛盾，處理的不好，那就發展為對抗（周總理：他是用“衝突”兩個字，實際上是對抗）就發展為衝突，他已經看出來這一點了。我們鑑於蘇聯差不多四十年，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者領導革命鬥爭，從他搞根據地開始——一九二七年，也是比蘇聯同志遲十年。他們是一九一七年勝利，革命勝利，革命開始勝利。我們就是一九二七年開始在一些地方建根據地。一九二七年，三七、四七、五七年，我們也有三十年的經驗了。應該肯定。社會主義社會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是這樣的矛盾，就是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都是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因為這個時候，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剝削者，所有制是全民的所有制同集體所有制，沒有私人的資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廠所有者，企業所有者。所以斯大林，我們講斯大林相當缺乏辯證法，不是講沒有辯證法。我們在人民日報的文章里說他：部分的但是嚴重的違反辯證唯物主義。是那麼說的。在他的影響下寫的一本書，叫做“簡明哲學辭典”，是兩個人寫的，其中一個就是蘇聯大使尤金，這是在斯大林的影響下，在講同一性的條件下。他有一個題目叫同一性，說了半天，駁了形式邏輯的同一性，根本就沒有分析清楚形式邏輯的同一性跟辯證法的同一性是不是一回事，然後就引用恩格斯說，恩格斯講沒有什麼同一性，實際上什麼都存在變化，客觀實際上沒有什麼同一，然後他就來個形而上學，他說對立的東西，相互排斥的對立物，不能說他有同一性，你比如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階級在一個社會中，他們是沒有同一性的，只有互相排斥，只有鬥爭。戰爭和和平沒有同一性，生與死沒有同一性。如果說這些東西有同一性就是錯誤的原理。斯大林死了以後，蘇聯哲學家，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開始有所變化。我看的東西不多，但是看到他們開始有所變化。斯大林在哲學上有相當嚴重的形而上學的观点。所謂形而上學的观点，就是沒有變化。戰爭就是戰爭，資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就是無產階級。我們的說法不同，資產階級它變化為無產階級，被壓迫的無產階級轉化為國家的主人這樣的無產階級。戰爭轉化為和平，和平轉化為戰爭，生轉化為死，死也轉化為生。他在同一性中，引了恩格斯的話之後（恩格斯那話是沒有形而上學的）就來了一個形而上學，這兩個東西它是不變化不能統一的，不轉化的，但是斯大林在“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上他說到社會主義存在矛盾的，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中間處理得不好，而且可能成為對抗的。這東西說得好，不過不徹底。我說他的辯證法是個害羞的辯證法，是個羞羞答答的辯證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辯證法。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問題，應該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着矛盾，基本的矛盾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政治法律、宗教、哲學這些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它是要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要符合於經濟基礎，如果不符合就發生矛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這幾個口號是怎樣提出來的？就是承認社會上各種不同的矛盾，在藝術上，文學上它就是表現為百花齊放。這個百花齊放里头

包括这些东西，就是各种不同的花，但是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比如讲百家争鸣里头有唯心论。百花齐放，可能胡风虽然坐在班房里头，胡风的灵魂却活在世界上，写出胡风那类作品还是可能的。但只要他没有破坏行为，胡风他为什么？他就是组织秘密团体，那东西不好，只要他不搞秘密团体，你开那一朵花，我们中国面积很大，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开那么一点花有什么要紧呐？开那么一点花给人家看看，人家也可以批评他那种花，说你这花我不喜欢。就是讲野草香花。有些是毒草。你如果只要粮食，只要大麦、小麦、包谷、小米、大米，根本不要草是不能实现的。每年农民都要除草，你们不信，今年春耕你们去看一看，那土里就要长草，不晓得那草从哪里来的。总而言之，年年长草，等于人天天要洗脸一样。农民年年要除草。禁止一切野草不准它生长，这行不行？事实上不行，它还是要长，你锄就是了。如果什么人下一个命令，所有的野草都不长了，那当然省事，那农民很感谢。但事实上有那么多的野草跟粮食竞争，其中有毒草。一株香花，一株毒草，我说你当然是要香花。但是教条主义也并不是香花。教条主义是什么花？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也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东西。教条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孤立性，搞片面是不加分析的。形而上学，这个学问古代就有了，但是特别在资产阶级时代发展。在外国，中国也有。难分香花毒草。曾经在人们眼睛看起来，很多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许多新生事物，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都是要被打击的。比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曾经被人们认为是毒草。国民党、同盟会，那时候清政府看孙中山认为是毒草嘛！把共产党叫做匪党嘛！共匪嘛。跟共产党往来叫通匪嘛。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这是由毒草变成香花了；但是在台湾那个地方，他还说我们是毒草，还叫共匪。孔夫子也是不被承认的。孔夫子这老先生他一生不得志，他的道理人家不听。耶稣，在开始也是社会不承认的。佛教怎么样，释迦摩尼怎么样？也是经过那么一个过程，受压迫，社会不承认。耶稣教到了马丁路德新教也是社会不承认。孙行者为什么被封成弼马温？把孙悟空封为弼马温就是不承认他，他自己的封号，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干部鉴定），他自己的鉴定叫齐天大圣。玉皇大帝给他的鉴定搞他个弼马温，就是说是毒草。薛仁贵当火头军，薛仁贵不是当过火头军吗？这是张士贵给他鉴定的。此外，哥泊尼的天文学，长期不敢出版，死了以后许多年，然后才被人家承认。意大利的伽俐略，他的物理学，达尔文他的进化论，在开始人家都不承认的。我看了一本科学小册子，安眠药的历史。安眠药是什么人发明的？是德国一个卖药的店员发明的。德国不承认，法国人承认，把他请到法国去了，以后被承认了。中国人有个李烈钧，国民党中央委员，此人死了，他是第一次从中国到马沙（译音），从马沙坐火车到巴黎，他吃安眠药，他说这东西是好，能使人睡觉。英国一个跳舞的，舞蹈家，叫邓肯，她生孩子，生头一个孩子非常痛苦，等到生第二个孩子用安眠药。我是说世界上一切发明，政治的、科学的、文学艺术的开始都不被承认。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也不被承认嘛！他是准备要“藏之名山，传诸其人”，不能出版，当时没有出版机关，大家抄几份，那么大一卷一卷的，运输也困难。总而言之，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我们这社会不同一些，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还有很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究竟什么叫香花？什么叫毒草？斯大林曾经百分之百的香花，赫鲁晓夫一棒子，毒草，现在也香起来了。

最近有一些批评。我这都是讲共产党，共产党里也有右派和左派。中宣部有个干部叫钟惦斐，他用假名字写了两篇文章，把过去说了个一踏糊涂，否定一切。这篇文章现在引起批评了，引起争论了。但是台湾很赏识这篇文章。另外几位左派，就是我们军委政治部文化部

部长陈沂，他的部下陈其通、马寒冰几位同志，在一月七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四个人署名，实际上是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所谓自从这个方针提出来，就没有大作品了。这个结论作的过早了一点。因为×××那篇文章是六月写的，发表是去年七月了。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等到这四位同志写文章是一月七日，只有五个月，几万字的作品怎么写得赢？所以只说没有大作品，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来没有搞大作品了，不搞马克思主义作品了，不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尽搞些坏的了。到现在这么久了，我们人民日报是什么态度我也不清楚。在一月中旬和下旬开的省市党委书记会上，我把他们四个人的声明文章印出来给大家看了。当时有人民日报的同志在坐，他表示了什么？没有表示什么态度。现在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了，究竟怎么办？你们发表这个东西是赞成还是反对？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人民日报的？你总要处理一下嘛，或者是商量一下，自己没有主张，你们找中央同志研究一下嘛，看如何处理。我现在表示我的态度，我不赞成那篇文章，那文章是错误的。但世界上的东西各有不同，各人喜欢各人的，钟惦斐的文章台湾就喜欢。陈其通、马寒冰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很喜欢，真理报登出来了，真理报就不登×××的那一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喜欢陈其通、马寒冰四位同志的。此外捷克登了，罗马尼亚登了，很有市场（台上有人说：是文学报登了，不是真理报）是文学报？不是真理报？那还好一点。（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欢各人的东西，气味相投。教条主义就喜欢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就喜欢机会主义。恐怕现在要批评一下子吧，有一青年作家叫王蒙，不是王明，大概是王明的兄弟，（笑）写了一篇题目叫做“组织部新来的人”也发生事情来了。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后头研究这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是共产党跟共产党打架，讲的他一点好处也没有。其中有马寒冰的批评。还有人批评，说北京是中央所在地，北京有一个共产党区委有官仔主义，因此就说他的典型环境放的不好，大概设在上海最妥当。我们的这个地方就不行。××的这个地方就不行，因为是中央所在地。不晓得这个道理是从那里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我学的很少，但是我沒有看到过（笑）说中央所在地就不出官仔主义？中央还出官仔主义，所在地为什么不能出？中央出过什么人物呢？中央出过陈独秀、出过张国焘、出过高岗，饶漱石，还出过李立三、王明，那么多哩！这么一条道理，也是批评不对。

马克思主义还有发展，马克思不是已经学过了就完了，还要继续学的。情况是发展的，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六亿人口，我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是个大王国。农民有五亿，手工业者一千多万，小商小贩，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大概有五千万人口，小资产阶级有五亿几千万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你要这些人一点意见都不发表，统统口上打封条，只有吃饭时才开一下，吃了饭就封起来，那怎么行？我说口有两个作用，一为吃饭，二为讲话，把它堵住那很难办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意识形态一定要反映的，而且也要自己表现自己，用各种办法，顽强地、千方百计地要表现自己。我们不能用压制的办法不让它表现，只能在他表现的时候跟他们辩论，说：同志，你的话里有点不大妥，加以分析，写文章批评。这些文章不是教条主义的文章，不能使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而要使用辩证的方法。要有说服力，要有充分的说服力。老干部能不能批评？这个批评的问题，从马克思以来，沒有说过一次要分清老干部，说只能批评新干部，不能夠批评老干部。我们宪法上规定，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那么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在犯错误这个问题上，错误思想上，也应该是平等的。有一批人比如是共产

党的老干部或者是民主党派的老干部，因为他老，他就享受一种不受批评的权利，可不可以？我看不可行的。你活着不受批评，你死了人家还要批评你，我们就批评过死人，批评过孔子、打倒孔家店嘛！人家死了几千年，还批评他嘛！现在孔子又好了点。斯大林也是死后批评的嘛！活人也能批评，死人也能批评，这个不分官职大小、老稚长短。是不是你越老越享福，避免批评呢？犯了错误以后，总是要批评的。凭老资格吃饭可以不可以？你老资格可以，这一方面承认。因为他老，活了那么大，他也不死。于是他有点资格，有点作用，还可以起跑龙套的作用，摇旗呐喊，拍拍巴掌帮助人家。我看梅兰芳就跑到龙套，跟人家合作，拿个刀站在那里。今天在座的有没有梅兰芳？我看你到了八十岁还可以起作用，至少跑龙套还可以跑。我这个人的作用，只能起一点跑龙套的作用，至于唱主角我是不唱了，那是我们周总理这些人物的了，（笑）你们各位啰。“西厢记”是那个唱“红娘”，我是不能唱了。我的角色是什么角色呢？我是那个老太太的角色，（笑）“西厢记”里头那个老夫人，她出来唱上那么几句，转那么几下就进去了，你如果尽唱，唱的多了，人家会赶你走的，（笑）而且老资格不管你怎么老，你事要对，要正确，你活到九十九岁是正确的，到一百岁那一天，你做了一件大混蛋的事，那你也是不可行的。拉科西曾经作过什么好事，我也不知道，假若拉科西他没有作什么坏事，但在最后做了一件大坏事，你就不能因为是老资格而不受批评。新干部当然也是一样，也要受批评。列宁讲过上帝原谅他们青年人因为他们年轻，上帝还可以原谅他们。老资格的人就应该严格。老干部是这样，青年干部也应该严格，也要帮助他们。如果对青年干部严格，老大爷就特别舒服，我看那不见得好。要做长期耐心的教育。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这个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的。是不是我的话讲过了？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只是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面的方面，比如讲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应该给予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我说，要有批评，要有适当的批评，就是要有说服力的批评，而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这是人们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要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生长起来，那些跟马克思主义不符合的，有些不符合的少，有些不符合的多，有些甚至是敌对的。这些统统都长起来的香花和毒草，它长起来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可怕，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年年长草，中国已经长了几十万年，现在不过是继续长嘛！如果你下一个命令，禁止什么花不准开，什么草不准长，其中可能不好的花里有好花。如历史上的进化论，伽俐略，哥白尼，这样一些花草。戴着马克思主义帽子的花草，有时不见得是真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就是七分是马克思主义者，三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三分资产阶级，七分马克思主义。这些基本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我们现在继续生长），是跟不同的事物作斗争。在一块互相批评，在批评斗争中才能发展。现在我们的同志把这些观点联系不起来，不晓得讲了多少次，多少年。统一战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教条主义这一套，一等到写文章、演说、开会作议论的时候统统忘记了，没有治病救人的意思，没有帮助别人的意思，一棍子打倒。我们不说这方面，从这个问题我想到种牛痘的问题，为什么种牛痘？你们出过没有？我是出过的。出的不是牛痘，是类似天花的一种病菌，

使它在人体里生病，人体跟这种病菌作斗争，作斗争的结果是产生免疫，不跟疾病作斗争就不能免疫。所以一辈子不害病的人是很危险的，经常害病那是好事，可以产生免疫。

第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大概同志们的文件中有几个关于这类问题的。昆明航空学校为什么没有闹事？（这里缺乏一个闹事的材料，最好找一个闹事典型的材料印一下）这是没有官行主义的。如果办学校的人都照这个办法办，那就好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办学校的办法。认识青年当前的思想状况，青年团中央曾供了一个材料。去年二十八个城市里头，大学、中学，听说二十几个学校有七千多学生闹事。这个材料分析相当好，无非是官行主义跟学生幼稚，青年、工人、学生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艰苦奋斗；同时，学校当局、办事人，各种的欺骗他们，又不跟他们同甘共苦。还有一个是工人罢工、请愿，总工会的报告中，部分的统计，有五十几起罢工，其中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多，最大的一次是一千多人的罢工。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我说人民内部矛盾，经常不断的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说匈牙利事件以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你看有几千个学生闹事，有部分工人罢工，游行示威怎么办？这个问题我搞了几条，提出四条看对不对。

第一条，努力克服官行主义，那么人家就不罢工了嘛！努力地克服官行主义，恰当地处理矛盾，那人家就不罢工了，就不闹事了。

第二条，官行主义没有克服，他要闹怎么办？让闹不让闹？有两个方针，一个是不让闹，凡闹事者就说是反革命，就说是造反。我已经先讲了，反革命是有的，但是很少了。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让闹还是不让闹？我说还是让他闹。罢工他要罢，农民他要闹，学生要罢课，农民要打扁担嘛！

第三条，闹起来草率收兵好不好？又有两种方针。刚刚闹过两三天，闹事的人还没过瘾，当局就急于想结束，这就发生矛盾。这怎么解决？我说让他闹够。施复亮先生就闹过事（好象在浙江），我也闹过事（在学校里）因为问题不能解决嘛！并且要让他闹够，一星期不够，二星期；二星期不够，三星期，三星期不够，四星期，总而言之，闹够了就不闹了。把闹事的过程，当成一个教育的过程，作政治课的过程，我们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够，思想工作没作好，官行主义应把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工人打铁条，看作是我们改善工作、教育工人、学生的一个过程。闹事的头子、领导人物要不要开除？我看不应该开除，除了个别的以外，如他拿刀子杀人，那他就得到公安局坐班房。因为他杀人、行凶。如果你又不打人，不杀人，没有那么严重，就不要开除。开除罢工、罢课的领袖人物，这种办法是资产阶级的办法，一般的不应开除。领袖人物，正确的应该留下，错误的也应该留下。错误地留下干什么？留下当“教员”。因为犯错误，有些个别的清除了特务分子，是不是让他离开学校？我看让他学习，只要他不是现行犯。一个学校里有几个特务有什么不好？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你就舒服了！所以清华大学那位学生要杀几千万人，现在留下，他就是“教员”，因为他发表了这样一个有名的宣言，这是难得到的。我讲的这四条，第一条，努力克服官行主义，使之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闹得不够，让他闹够；第四，不要开除，开除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要一反国民党之道而行之。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人民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想法不同的，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学校负责人、工厂的负责人、合作社的负责人、机关里头的负责人，乃是来自五湖四海，许多人文化不高，

就是文化高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也不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比那些文化低的人犯错误还大，那些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可厉害。我们党“左”倾和右倾都犯过，知识分子多，陈独秀，知识分子；李立三，知识分子；王明，知识分子；张国焘，知识分子；高岗不算，饶漱石，知识分子。

第十，闹事出乱子是好事还是坏事。

讲这个问题，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示威，我看又好又不好，有两重性嘛！商品都有两重性嘛，罢工、罢课这种事情也是两重性。匈牙利事件有两重性。你们说匈牙利这个事情好不好？我说又好又不好。当然不好，因为他闹事，但匈牙利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反革命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肃清了反革命。匈牙利事件停下来，比过去巩固，现在的匈牙利比过去不闹事的匈牙利要好，社会主义阵营都取得了教训。所以匈牙利闹事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反苏反共的风潮全世界来了，第一次发生，特别是最近的一次全世界范围的，我们怎么看？我看当然不好。第二条，这是好事，因为帝国主义反苏反共，锻炼了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把机关报打烂，瑞士共产党搞的非常不好，总书记躲在山上，躲在我们大使馆里不敢见面，不敢出去，见面就打，大批党员脱党，荷兰、比利时很多脱党的，英国知识分子，知识愈高愈要脱党。脱党好不好？又好又不好，所以知识分子有两种，愈是大知识分子愈不赞成共产主义，混了几年、几十年的老党员也要脱党。这种知识分子留在党内有什么好处？主要的还是好，你脱出去了为什么不好呢？我们中国有胡适这位先生，现在他大作文章。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他提倡过“万花齐放、万家争鸣”。（笑）批评斯大林这件事情怎么看法？我看也有两重性。批评斯大林有两方面的性质，一方面实在有好处，一方面是不好。揭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揭掉盖子，使人家解放，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他揭的办法不对，没有做过好的分析，一棍子打死，这么一方面引起全世界去年这几个月的下半年的几次大风潮，后来又引起匈牙利、波兰事件。所以他有错误的方面。我们在公开的文章上虽然没有指出二十次代表大会，但实际上讲了。我们与苏联同志当面讲了。讲什么呢？对斯大林事件处理不当，讲他们的大国主义。美国不承认我们，我看也有两方面，不承认我们当然不好，联合国我们不能进去，他说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应当被承认而他不承认，这当然不好。但是有个极大的好处，美国不承认我们，我很舒服。我与许多朋友交换过意见。总而言之，我没有说服他们就是了。我觉得美国现在不承认，最好过六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至少过六年后承认，这样比较好。最好过十一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使他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对我们利益不大，没有他，我们也能建设，等我们建设的差不多了，请他们来看一看。（笑）他们就是悔之晚矣！（笑）还是美国把尾巴一翘，硬起来，说不承认，我很高兴。美国差不多要承认，我有点发愁。但是美国的事情。美国的参谋长是美国人，不是我们这里的聶崇臻，或者那一个跟他打主意，但是也有准备，如果承认的快怎么办？还是接受一定要承认，我说也行，但是有个台湾问题。台湾必须归我们，这个东西有文章可作，不归还台湾，你承认我不算，英国是承认了我们，但我不跟你建立外交关系，建立半外交关系，不派正式代表，只派代办，因为在联合国他投蒋介石票。

我们有文章，可出现了几篇错误文章。刚才我不是批评了几位同志吗？同时要感谢他们，错误文章也办了一件好事，因为给我们根据，使我们批评有了对象。有教条主义文章、机会主义文章，这文章出了几篇，还要多出现一点，他的性质不但不好，不单是错误，另外有个作用，另有一种给我们反批评的可能。没有大作品，没有好影片怎么办？我说这是坏事，因为没有吗？长期没有终究就要来了的。物极必反，坏事做的愈多，好处就要来了。这个辩证法不是马列

主义才发明的，在我们中国的老子，那个老子天下第一的老子（笑）早就曾这样说过。他说凡是坏的里面，要看成有好的；好的里面，看成有坏的，祸就有福，福就有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失去马，有人反而去庆贺他说：马失的好，失的好，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从前有人烧了房子还去贺喜的。日本人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大半个中国占去了，中国就叫失败。但是中国这个失败包含一个胜利，日本人的胜利包含着失败。占领大半个中国，还有菲律宾、印尼、东南亚许多国家，胜利包含失败，结果果然胜利转化为失败。而被占领国家，象中国的失败转化为胜利。难道不是这样吗？希特勒兵临城下，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整个欧洲被占领了，就要胜利，但是包含着失败，而被占领的欧洲，苏联大半个国家却包含了一个要胜利。

现在要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们看，这个等会儿再讲。我们中国有两条，一条穷，二叫蠢。说中国人聪明，但中国人不识字。一个生活水平不高，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生活水平很低，文化水平很低。这件事情也要看作两重性。我们革命就靠这两条，一个穷，一个文化水平不高。如果说中国人富起来，象西方世界那样的生活水平就不要革命。西方世界富，有他的缺点，其缺点就是不革命。生活水平那么高，其缺点是不革命，还不如我们文盲，我看还是文盲好。（笑）当然文盲还是要消灭。我这里不是来提倡继续保存文盲。我们社会主义改造这么快，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中国太穷了。如果打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样？马上就打。比如讲，我们散会后听广播，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怎么办？你们都不想？有没有精神准备？我看要作准备，要打就打，象学生闹事那样，要闹就闹，那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敌我矛盾。要打就打，有什么办法？全世界再打一坊。第三次世界大战，把人类消灭一半，有人说，要统统消灭干净，我就不相信这个道理。尼赫鲁和我辩论过，巴基斯坦总理苏格瓦底也和我辩论过。我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第一条是不欢迎，第二条是也可以（笑）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社会主义许多国家，九亿人口，三次世界大战，大概至少十五亿二十亿，来个赤化全世界，帝国主义人口剩下就不多了。所以战争有两面性，有破坏的方面，同时也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使人民精神状态紧张起来，使人民觉悟起来，使革命爆发。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们怎么主张？你们怎么处理？又象日本占领中国一样，又把北京、天津、郑州、武汉、广东占去了怎么样？大家就是嚎陶大哭，我们那种情况来了，我们只是一个哭脸，连蒋委员长还不及，蒋委员长并不哭脸，我们大家都经过的，没有哭脸。三次世界大战要打就打，你有多少原子弹？我们是一个也没有，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是打的结果归根到底，你是要打败仗的，因为你是反动的落后的，虽然经济先进，文化先进，可是政治是落后的。你是违反人民志愿。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灭不了，一个苏联，一个中国。地势苏联靠北冰洋，我们靠崑崙山，（笑）灭不了。所以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看也有两重性。日本人跟我谈话，说很对不起，侵略了你们。我说朋友，你们做了好事。他给我搞糊塗了。我说，你们不打进来，不占领这么多地方，中国人民就教育不过来。我说你们当教员，调动了全中国人民来反对你们，这就是你们的功劳。国际间的事情相互影响，互相渗透。从前有人写过一首诗的：“二个菩萨，一齐打烂，用水调和，再捏成两个菩萨。你里头有我，我里头有你。”现在世界也是这样，世界也是两个泥菩萨。资本主义的泥菩萨里头有我们，社会主义泥菩萨里头有他们。于是你这个里头就有我，我这个里头就有你的。现在世界也是这样，世界是两个泥菩萨。那个匈牙利就多了。听他们的话就多了，东欧各国听他们的广播，苏联也喜欢听美国之音，欧洲电台的。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人，受他影响。还有特务，那是天天计算他们来了。有些

地主把地契、田契保存起来，有些国民党把党证保留，等到那一天他们来了做证明。我们有党证嘛！向坏处去想，打大仗，一个打，一个不打，第一条准备他打，他要发疯嘛！当然最后我们取得胜利。现在我们已有九亿人口，加一倍就是十八亿人口。第二条我看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可能给我们十几年时间，或者更多一点。先说打败仗，不完全是坏事。甚至是好事。建设怎么办？建设停止。专门打仗。但是现在情况这个帝国主义他对我们搞什么？对社会主义阵营搞互相渗透，他们希望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现在世界上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是帝国主义争殖民地，争亚非。美国与欧洲帝国主义，英、法之类，这个是他们主要矛盾。三种力量，一种叫社会主义力量，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力量，一种叫帝国主义力量。这三种力量斗争。而这第二种力量，民族独立运动力量，纳赛尔等可以和我们合作，在某些问题上，在和平问题上，在反帝国主义问题上，程度不同，可以跟我们合作的。打仗对帝国主义利益不大，打仗结果对他们好处不大。不打仗呢？用抢地方的办法，美国人与英国人争亚洲，与法国人争非洲。我看采取这个办法。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他的方针就是我们的估计，好象我们叫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他的主要目标不是进攻我们，而是整英法。洛克菲勒把所有这些国家分成三类，一种是巴基斯坦亲美的，已经和美国签订定了军事条约；还有一个是中立国，象印度这类，他们采取和平中立，要拉拢他；还一种是殖民地，完全没有独立，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这些国家。要假装帮助他。洛克菲勒这封信是去年一月份写的，今年不知什么地方找出来在德国（东德）报上登了，我们现在公布发表了，很值得看一看。

第十一个问题，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关系问题，西藏问题。少数民族中国有几千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很广大，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人口占百分之六。所以我那个十大关系里头有一条讲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主要是解决大汉族主义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是没有解决好。共产党准备今年开一次会，开一次中央全会，来专门讨论统一战线同少数民族问题。一定要改变这个大汉族主义作风，思想情绪，包办代替，不尊重少数民族。西藏有一派，他们想搞独立王国，现在这个当局有些动摇，这回印度请求我们允许达赖到印度去，他已经去过印度，现在已经回到西藏。美国就作工作。印度有个地方叫哥仁堡，那个地方就是专门对西藏搞破坏工作。尼赫鲁自己跟总理谈，那个地方是间谍中心，主要是美国、英国。要是西藏独立，我们是这样，你搞独立就搞，你要独立我是不让独立的，我们希望按十七条协定办事。我们劝达赖，你还是回来好。你若在印度，后到美国，不见得有利。总理跟他谈了几次话，又跟其他搞独立运动的人，有这么一堆人住在哥仁堡的，也跟他们谈了话，还是回来。至于改革，十七条规定是要改的，但是改要得到你们同意，你们不改就不改，你们最近几年不改就不改。我们现在这样说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不改，第三个五年计划看你们的意思，如果你说改就改，如果你说不改还可以改。为什么要那么急呢？

最后一条，第十二条，中国可能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逐步改变面貌。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个。我们现在走的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几大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轻、农的比例。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采取比较过去有相当的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百分之九十比百分之十，就是说百分之九十是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同农业。对于农业有点刮得太多，当然刮来的钱是搞建设，不是进腰包。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重工业的市场在轻工业、农业。市场就是这几亿人，其中有五亿是农民。我们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八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苏联不是九比一吗？重工九，轻农一。我们是重工业八（周总理：没有农业，就是重、轻比），没有农业，加上农业那这个比例要重新考虑一下。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总而言之，轻工业、农业使他发展起来。轻工业、农业这两个东西差不多是一个东西，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没有轻工业就没有农业。一个是原料，一个是市场，农业供给原料，轻工业就以农村做为市场。重工业是不是优先发展，那么六比一还是优先，这边占六，那边只占一么，还优先。重工业还优先，但走新的道路，是否比苏联那样工业化的速度反而快一些。看起来慢一些，反而快一些，现在希望寄托在那上头，我看反而可能比他快一些。因为苏联在二十一年内，以钢为例，老底子四百万吨，我们九十万吨。一九一三年战争的时候，苏联钢是四百万吨，一九一七年革命，一八、一九、二〇这三年不算，打内战。从一九二一年算起，一九二一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这个时间有二十一年半，二十一年半里头由四百万吨钢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合起来一千八百万吨。我们老底子九十万吨，不是讲一九四九年，而是讲最高年产量，主要是日本人的。至于蒋介石，那是很少，只有几万吨。我们从那年算起，从一九五〇年算起，二十一年是那一年？假如帝国主义给我们二十一年时间，可不可能？我前面说到，可能的。有两种可能，一种不给，一种给。不给就打起来了，打个天翻地复，天下大乱了。结果赤化全世界，即使不是全世界，也是大半个世界，打了以后再建设，这也是一个办法。他要打有什么办法？更大的可能是他不打，很有可能给我们时间。二十一年照苏联那样，一九五〇年，二十一年么到一九七〇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到一九六七年，六八、六九、七〇年还有三年。我们现在说工业化三个五年计划或者还要多一点的时间，我看差不多。二十一年，钢九十万吨，可以断定不止发展到一千八百万吨，可能有两千多万吨。如果我们采取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针，迂迴一点，在市场方面多做点工作，使农民吃饱，使农民有购买力，轻工业加以发展，农民生产更多的工业原料，生产更多的粮食，农民增加购买力，轻工业又有了原料，又有了市场，重工业也就有了市场，化学肥料有市场，卡车有市场，水利投资要用钢，钢材有市场。用于轻工业、农业的电力事业要发展起来。关于经济问题，不准备多讲了，也没有时间。这个问题我们还缺乏经验，才搞了七年。革命比较有经验，如何作革命斗争，政治斗争比较有经验，我们翻过筋斗，犯过错误。而搞经济这个东西，就没有多少经验，我希望不要学革命斗争翻那么大的筋斗。把南方根据地丧失干净，来个万里长征，剩下一个陕北根据地，军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党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一定要有那样的教训才把我们教育过来。那么在经济上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时间？相当缩短一点，不要那么长，犯错误所受的损失不要那么大，在革命中取得经验，花那样大的代价，要求这么一点。但是我们现在还缺少经验，究竟怎样恰当，有许多事情，还要积累经验。

苏联要不要学习？苏联好不好？现在似乎不好了。我看还是好的国家。谁能给我们设计、装备这么多工厂呢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日本给我们没有？法国给我们没有？都不给。谁人给我们设计军事工厂、飞机、大炮、坦克？还是社会主义苏联。苏联有缺点这是一件事。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跟他们一类型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他也是社会主义。只有这么一个国家援助我们，是不是？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一点是肯定了的，单学苏联不是这样讲的。一切国家都要学，英文也要学，法文也要学，德文也要学，日本文也要学，单学俄文不够。但主要我们不是学苏联。因为只有他们给我们这东西，只有他们委

派工程师给我们设计，教会我们的人能够设计，只有他能够给我们装备。科学合作也是一样，原子能除了苏联，那个国家能帮助我们来搞。所以苏联是学习重点。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一切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经验都搬来，好的坏的一起搬来，这是一种态度，这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学习落后的经验？我们并没有提出口号要学习苏联落后的经验，报纸上也沒有登过。但是有时候实际上有些经验是落后经验，标签上写了个先进经验，实际上是落后经验，不应学习而我们学来了，也不少，这一部分要避免。要跟苏联团结，跟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这是个基本的，因为我们就是这么一堆人比较可靠。第二才是亚非国家。至于帝国主义，那些人是沒有良心的，良心有疑问的，杜勒斯就那么多良心？我就不相信，你又不给帮助，不搞机器来，有什么良心？天天骂我们，霸占着台湾不走、不放。

同志们，谈多了么。几点钟了？七点了。三点、四点、五点、六点、七点，不讲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結束語

同志们：我没有多少话讲了，有几点说一下。

批评的问题。这个问题刚才有人谈到老干部批评的问题。还有人提到（在小组会的时候），马列主义能不能批评？马列主义，这个马列主义是不是可以不规定为领导的思想，或者叫指导思想？因为规定他为指导思想，使得有些人有点害怕。关于这个问题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有个很大的改变。我是讲由过去的那种领导，旧社会国民党，蒋介石嘛，那么一种领导，改变为让位于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为我们的国家制度。这个工人阶级为领导末，他就是有个党，现在还是有党派的时代。这个党、这个阶级，这个党有一种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咯。那末，问题是他如何领导，如何指导。并不是说让一切都进共产党，都相信共产党的道理，去讲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这些东西，如讲世界观这个问题，只能夠是逐步地使人了解，开头是很少的人，以后多一点人，以后又多了一点人，不能一下子要求很多人相信，就是不能强迫人相信这一点嘛！不能强迫人信什么东西，前天我提到了。精神上东西不能强迫人家相信，也不能强迫家人不相信。比如强迫人不信教就不行咯，强迫人要信这种教不信那种教是不行的。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行不行呢？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行的。但是马克思世界观是在一天天发展，相信的人一天天更多一些。但是无论怎样，几十年之后，我相信总还有许多人不相信的，不那信那个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的，有神论者不信。甚至几十年后，多少年后，还有相当一些人不信怎么办？原来就是在马列主义领导里头应该安排的，就是应该认识有些人不相信，事实上或许要如此，也只能如此。

能不能批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夠批评倒他就沒有用，能夠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么这个东西就不行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还怕批评，那就不行了。所以不发生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事实上唯心论他就批评马克思主义，宗教界也就批评

马克思主义，有些人不说就是了。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说成为与他那个宗教结合。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是该批评的，你一批就倒嘛，你是纸糊的、棉扎的，纸糊棉扎风一吹就倒。应该是不怕批评的。所以这时候，提出怕批评，就是有弱点就是了。这个弱点有没有？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当批评，无论那种干部、政府，缺点、错误应该接受批评的。并且成为习惯，人民政府成了习惯。批评就没有事；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嘛！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不要把这个权利交给反革命，宪法是应该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言论出版。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我讲的不夠。讲的这种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大讲这个问题，今天有朋友讲到咯。什么叫长期？我想这个问题答复比较容易，长期么就是你共产党有多长，他就有多长，就是，照办就是了。共产党有多少寿命么，就是民主党派有多少寿命。今天郭老说我们这些人统要向他看齐，无党派寿命最长咯。共产党有天要灭亡的，我们希望这一天不迟不早地到来。大概太早不行，太迟了没有必要。凡发生的事物，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发生的，因此都有他一定的寿命，共产党就是一个事物。如何督监？就是属于批评、建议，用这些方法督监嘛。我们有各种机会嘛，比如今天就是机会，还有各种机会进行批评，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批评缺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说，你又讲大民主不适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但是又说可以罢工、罢课，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样一个问题。所谓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这是我们过去所做的，包括肃反中间的某些作法。现在有人建议不要大民主了，现在的作法已经改了，现在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是老的。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大民主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不是大民主咯，都是小民主咯；有些一个“小”字还不够，再加一个“小”字，叫做“小小”民主，就是和风细雨比较好。现在所讲的就是那个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那样的地方，那样的工厂，那样的合作社，那样的学校，那样的商店，那样的机关。那样的单位怎么办？它任何的民主都没有，大民主没有，小民主没有，小小民主也没有。简直是官行主义，一万年也不能解决问题，就是问题不得解决，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对这种官行主义，如果不允许他我看是不好的，应当允许他，虽然宪法上没有罢工的条文。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全国内提倡罢工、罢课，我们不提提倡这个，我们提倡反对官行主义，提倡人民范围之内所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罢工算不算一种斗争？也算一种斗争，用批评斗争，没有办法的时候，对严重的顽固的官行主义者，用这种方法是应该允许的。那么，先生管不了学生怎么办？应该是有纪律的，无论工厂、学校、商店都应该有政治思想教育。我们中国人民是有纪律的，是很守纪律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进行工作，政治思想教育很缺乏，很多方面缺乏。官行主义非常严重，有些地方，相当多的学校不能解决，没有教育。纪律也应该进行教育，应该先生学生打成一片，工厂厂长与工人打成一片，关心他们。那么这样一来的时候，那么还有什么罢工呢？凡是这样做了，就不会有罢工的。所以第一条是反对官行主义。以后下面三条，就是第二条咯，如果个别地方、局部地方、个别工厂、个别合作社、个别学校，官行主义十分严重，这个时候，不问事实上有罢工，事实上有罢课，就是因为连小民主也没有，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有些地方的同志，回到各个地方，不要说北京开了会的，从此全国可以大罢工（笑声）全国可以大罢课，说是我说的，就不是这样的。我们以军队为例，军队我们曾经进行过尖锐的批评，战士批评军官，使军官很难受，战士批评连长，干部会批评军长、师

长。大批评以后，这个师长、这个军长、这个连长他的工作更好做了。战士们是拿着枪的，可以用这样的批评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你就要检讨，你当连长的要检讨，你犯了错误！不能打人，官长不打士兵。军队这样做了，我们解放军里头有很大的民主，为什么我们学校不能做？我们工厂不能做？我们合作社不能做？我们合作社现在的时候，许多地方命令主义很严重。为什么我们机关不能做？是不是这样一做，天下就会造反，天下就会大乱？为什么军队没有乱，还这么打胜仗？那么打胜仗靠什么？一没有原子弹，二没有氢弹，洲际导弹，一个也没有，飞机也没有，那个时候武器不如敌人，如何团结起来？就靠肃清官厅主义，减少官厅主义，跟群众打成一片，走群众路线。

至于要服从领导，工厂要服从厂长的领导、指挥，学生要服从先生的指挥，要有学习的纪律，但是先生与学生要打成一片，关心学生解决学生的问题。现在学校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课太多，学生负担太重。我看我们中国人民就是这样，要么一个字不认识叫文盲，要认识字一天给你堆一大堆。所以讲到这个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个事情，我们要作调整社会秩序的方法之一，一种补充方法，经常的方法应该是克服批评官厅主义，但是如果办不到，用这种方法调整我们的社会秩序作一种补充方法也是可以的，也是应该允许的，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要见世面，要了解国际情况、敌人的情况。我们准备发行一个刊物《参考消息》，在座的大概都看到了，《参考消息》过去发多少？发二千份，现在准备扩大到三十万份一个大报纸，比如《大公报》他是发二十万份，这个报纸发行比他多，有三十万份。由二千份准备跃进到三十万份，发到县一级，就是要花钱买就是咯。凡是愿意购买这个刊物的，党内党外都可以看这个刊物，那么人们就要说替帝国主义出钱办报纸，共产党、人民政府替帝国主义无条件地办报纸。我说这个话也可以这么讲，那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要把你们骂我们的话，如何骂我们，你那里发生了的乱子，登在报上，作为内部刊物，有三十万人可以看到，一份不止看一人，还不止，什么“不得遗失”，那个东西人家遗失了怎么办？那有什么要紧（笑）（周总理：现在没有了）没有了，不要那么禁令，就是要我们的人见世面，要懂得外界的事情。至于是不是受他的宣传，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变成他们的人，我看也有可能一、二个变，变一、二个，我们中国人多，刚才马寅老也讲了六亿人口嘛，变那么几个有什么要紧。蒋委员长这个问题，蒋介石他讲了许多东西，有许多著作、演说，听说有这么多长，我就赞成出全集，有人反对出全集，这个当然不公开发行，公开发行不行？现在还不好公开发行吧，图书馆里里头愿意买，愿意看看，你要研究研究历史他是历史人物，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反映，他的意识形态，蒋介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我们要批判那些东西，他的文章都没有读过，那怎么批判法？那是不是读了他的文章统统就要到台湾进他那个党呢？是不是有这个危险呢？我看没有这个危险。有那么几个人要进也可以咯！这一条就是要见世面，要见风雨，不要坐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那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更加懂得咯！为什么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里面总要放出一些祸出来就是咯！要鸣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应该怎样看？我前天说了，不好的东西他另外有一个作用，一方面是不好，一方面是好，毒草有他的好处。它不单是一个毒，我举了种牛痘的那例子，这个细菌，病毒是坏东西，有些也有好的作用，它能使人产生免疫。

其他的东西还有什么？

比如匈牙利，有人批评我，说我讲的不夠，沒有讲清道理。匈牙利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什么错误那天也讲了一点，沒有时间讲那么多，我们也不太清楚。过去那个拉科西，那个同志干了些什么事情也不大清楚，苏联许多东西我们也不太清楚，苏联比较好，拉科西那个时候搞得岂有此理。大概有这么几条，无非有官行主义、教条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那天我不是讲了吗？工业方针沒有原料，沒有销场，办大工厂，工人的薪水降低百分之二十，资本家简单地打倒。如讲我们的荣毅仁先生把他打倒，到申新九厂当工人，一个匈牙利事件一起，他就出来组织工人委员会，组织什么会？组织工人委员会。他就那么简单，简单明了。（笑）知识分子沒有改造，根本不谈知识分子改造，于是乎裴多菲俱乐部，记者协会，学生联合会就出来了。还有反革命分子沒有镇压，沒有群众跟反革命作斗争，而是少数人在那里斗，大批的真正的反革命沒有受损伤。匈牙利来了大民主啦！这一次，大民主时间不长，可是要恢复要多少时候呢？有人说要三年，他们自己讲，他们的人跟我们讲要三年才能恢复到过去十月二十三日，一二个月的大民主，大民主好是好，可是要三年才能恢复元气。波兰的大民主就减产一半，十月十一月，十月减产一半，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多少恢复一点吧！所以还有搞小民主好。搞大民主，我们在座的人相当多的人也受不了，是不是。

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笑）这是一种假设，就是讲有一个时期，比如讲条件沒有具备，无非是粮食、衣服、房子、教育等等，现在每一年生一千多万，你要他不增，很难讲，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嘛！必然王国还没有变自由王国咯！在这方面这个人类完全不自觉，沒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这个问题，应该研究。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那天我讲了，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想出办法来，人类总而言之要自己控制自己就是了，有的时候使它能夠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笑）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老讲得很好，今天讲的好哇！我跟他是同志，以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沒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说是不让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但这个问题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有一些办法。人民会不会有这个要求，还是我们主观的，人民是要求这个东西的，不是每个人要求，而是很多人要求，比如农民要求这个，人口太多了家庭，他要求节育。城市里头农村里头都有这个要求，说沒有要求是不适当的。邵先生咯！嘿，你们两个坐在一起了。（笑）

不要向科学泼冷水，这一条好不好？我看好，不要泼冷水，科学家怎么能泼冷水。向科学家泼冷水这当然不好。一切家，政治家、艺术家、文学家也不要泼冷水。科学家不要泼冷水，积极分子只要他积极，有时候工作做的不好，我们也不要泼冷水，帮助他改正错误，只有那个别的、极顽固的、无可救药的分子另外处理，无可救药的，科学家不要泼冷水。参观科学院，今天郭老将了我一军，这个恐怕沒有办法，你既然将起我的军来了，不然你已经封了我的封号叫“官行主义者。”（笑）

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同志们说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得好，应该教育我们的干部、科学家、技术人员、技术干部，学生们不要单纯技术观点，技术观点是好的，应该有技术观点，沒有技术观点怎么搞技术？观点还没有哪有技术？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热心。但是单纯就不好咯！可以搞到替社会主义可以服务，替资本主义也可以服务，因为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对于新的政治关心，对于新的大局关心，但是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工作。这不能完全怪他们，这是我们的工作沒有做好，有些东西他们不

能接受，就是我们所谓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他就沒有兴趣来接受你这个东西，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沒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在学校里头，在科学研究机关，在工厂，一切有科学技术人员存在的地方，学生们中间加强并且改善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

关于邦有道怎么样？贫且贱焉耻也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确不是个别的问题，这是所谓安排问题。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有些人沒有安排；一个是安排不适当。所谓不适当者就是有职无权沒事做，或者就是安排的位置跟他那个学问才干不适合。人们承认邦有道，这个好；邦有道，邦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是什么东西呢？无非是社会主义嘛！辩证法嘛！（笑）贫且贱焉贫就是薪水不夠；贱就是沒有工作，大概是不要讲他不注意劳动呐，沒有工作或者安排得不恰当。他是用孔夫子来批评我们。所以孔夫子有时还有用处，（笑）这个是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缺点的问题，这个缺点很多，中共中央准备今年开一次会，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门讨论统一战线方面的问题，希望各党派无党派的同志们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有所准备，提意见给我们，什么话都说。那一些人搜罗起来贫且贱焉的有多少，其人姓甚名谁，何方人士。（按：）

还有我们有许多缺点，我们在前进中间有很多困难，但是不要忘记外国也有困难，比如讲美国他有他的困难。红楼梦里头著名人物王熙凤有言“大有大的难处”。因为人家给她借錢，他就说（诉苦）“大有大的难处”，刘老老借錢，因为他这么一说，刘老老就冷了半截，的确大有大的难处，美国的事情并不那么好办，据我看，我看，经济危机要来了，美国、法国、西欧、自由世界、西方世界，西方国家他们都矛盾很大，经济危机要来，这个东西恐怕不可避免的。美国的月亮恐怕也不一定那么好，还是要证明。有时刻他们的那么几个原子弹，多了几斤钢铁，他现在强点，这一点要不要承认，要承认，我们骂他纸老虎，人们不了解，为什么人家有那么多东西，我们说他是纸老虎呢？就是说他这个东西是建立在很不稳固的基础上，谁人的基础比较巩固，还是我们的基础比较巩固，还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阵营不那么巩固，我们也有毛病，也有缺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有许多不满意，我们的经济还落后，文化还落后，我们的人民对我们有许多不满意，我们的经济还落后，文化还落后，整个社会主义跟他比较起来我们还落后，可是他们是建立在一个矛盾更多更大的基础上的，不要忘记这一点。

最后我这个讲话，前天这个讲话，有些地方补充一点，修改一点，今天讲的同志们提了许多意见，这个东西不准备全部公开发表，因为有些问题比如讲罢工罢课这个问题，一公开发表，那好吧，全国就罢起来了！（笑）而我们的干部沒有准备，我们的同志沒有准备，地方来的同志开过会回去的时候，請你们要使他们有准备，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好讲，我们坐在这里好讲，身当其冲的是他们，要使他们有准备。局部的、若干个别的，是那些极端的官僚主义长期不能解决问题，是指那些范围。最后如果修改一下子，调整一下子，我讲的这一篇，准备发到县一级，党内党外都可以看到。几天之后我们准备开一次宣传教育会议、宣传会议、宣传工作、报纸的会议，准备跟他们再谈一次，完了！（鼓掌）

在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的談話

(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

(关于会议开法，听了主席录音报告，内容很丰富，要好好消化，最好多开小会，少开大会。)

好，开一星期，不够，再多开二、三天，开到解决问题为止，多开些小会。

(各地到会有党外人士，我们来的是清一色。)

党内也不会是清一色。

(对陈其通等四人文章，听报告录音与前次省市书记会议所传达精神，不同。)

他们是以卫道君子的面目出现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宗派主义的情绪，是达不到卫道的。过去讲的是插话，可能听漏了什么了。

(关于党委各部门应分管政治思想工作及政府各业务部门不抓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第一书记要抓思想，回去告诉他们，希望第一书记把思想工作抓起来。第一书记才行，第二也不行。光是宣传部，孤单单的不好办。管业务管得很好，不管思想工作，结果来了大民主，就会把你搞掉。各部门、各党组一定要管思想工作。省委要抓好思想工作，特别是第一书记，各庐局都要管思想工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问题很多。)

问题是多的，要放手，有好处。

(批评工作没做好。)

打大仗往往不可免先要打几次败仗，有了经验就会胜利。

(康生：团结，批评，团结，但往往一批之后，没达到新的团结，是批回去了，急得很，主要是仓促应战。)

领导要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才能解决问题。

(上海反映，党员与党员在报上斗。)

党内思想也很混乱，不要害怕，要放手，怕什么，难道地球会炸了？！

(康生：党外也怕，怕宗派主义，不让人争鸣。)

(有人反映老教授对“争鸣”还有顾虑，写文章不容易，第一天文章一登，第二天给人一批，学生对自己也不尊敬了。)

那第三天再写一篇批回去就是了。

(有人提出，陈其通文章问题是否省市书记会议强调一面，国务会议又强调一面，因国务会议有党外人士？)

党内党外要一起谈，关起门来，对外又一套，或单独对党外谈也不行，要党内外一起谈。

(闹事问题)

特殊的、个别的犯法分子当然要按法律处理。一般闹事的不要开除，总开除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去，他总要有个立脚点，还不是到学校、机关、工厂、合作社去。西安抓了一百多个流氓，社会很高兴，但学生中“流氓”跟社会流氓不同，知识分子不是社会那样“流氓”法，如不犯法，仍不要开除。……

（希望讲讲上层建筑与基础关系问题。有图画家讲，花草没有阶级性，还有自然科学问题。）

自然科学不是上层建筑，但它要靠人去搞，就可能渗进一些人的阶级意识进去。

（当前思想斗争，是否可概括为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

马寒冰文章是教条的，钟惦棐则是右的，两派我们都要批评，……“电影的锣鼓”文章基本方向是不对。

（周×：所提的一些缺点，的确是有的，但“中申”一些同志情绪不对头。部里是不同意该文的。）

无产阶级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不错的，但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百花齐放中，资产阶级思想出现会多起来，但并非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并非无一可取，扣帽子会把人家吓倒，不必每篇文章一出现就马上驳倒。

（陆××：大将不要先出马，不要打冲锋，先让党外人士发言。）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中国知识分子少，要他们信马克思主义不容易的，如三个五年计划，有三分之一知识分子信了马列主义，就是很大的胜利。知识分子可以接受社会主义，因他没办法，不能不接受，但思想上不是很服。（××：北大哲学系系主任公开说相信唯心论。）他们政治上可以跟我们走，但要信马列主义不容易，有的搞康德，黑格尔几十年，可以逐步改变；有些一辈子也不变的。

（××说：百家争鸣还有顾虑，怕把是非问题弄成敌我问题。）

怕升级。

（有的人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暴露出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好象过去工作白费了。）

不暴露好象没有，暴露就很多，是否过去工作白费，解放才六、七年，资产阶级思想就没有了？他们说出来是好的，我们得到机会去教育。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些文章还没有说服力，企图压服。压是压不服的。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要几十年，批评人家一定要有研究，想打几棍子不是办法，不能解决问题。过去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那是大风暴，是粗枝大叶，基本解决分清敌我，分清拿刀子杀人的，这是有数的。现在是分清是非，就要具体地讲，仔细一件一件的讲，如数学、物理等等……，还有一派派，必须具体讲是非。（有人问：这个是非怎么分？如新闻工作等就有争论，请主席讲一下。）我不是新闻家，你们是内行，××就是专家，我们要讲的是大是大非，要分清敌我。不是特务，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用的。

（湖北反映初级党校科级干部酝酿上街游行有五条理由，反对官仔主义。）

官仔主义改了，人家就不游行了，因此要加强党员教育。

（现在思想混乱，究竟原因何在？有的说是官行主义，有的说是要民主、自由、个性，不要集中、专政、共性。领导要纪律、共性、集中，被领导的干要另一面，有的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等等。）

如果动不动就说“反对社会主义”，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是不妥当的，因为学校存在问题没解决，所以闹事。如湖北党校是什么问题呀？要分析。

（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官行主义？……）

都有，不能用一个简单口号去套一切。现在与过去反对帝国主义不同了。合作化要搞好几年，个人与集体是矛盾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要改造，这就叫过渡时期。（……）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兰州原要开除几十个学生，现在不开除了，又有点草率收兵。）

开除几十个学生是国民党办法，事情结束如不解决问题，将来还是要闹事的，如讲到兰州林业学校、护士学校招生骗人家，学生闹事，我是站在学生这方面的。你欺骗人家么？

（康生等：欺骗就是犯法，可以告到法院，有罪的。）象这样学校，你说是什么问题？这两校都是官行主义，欺骗，又有官行主义。……共产党员工作这样，要整！不要课怎能整掉官行主义？！学生中很多成分不好，但他要说“对，我是地主成分，但你为什么骗了我？”我们要向党内外宣布，在人民内部无所谓专政，在人民内部讲专政是错误的！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人民自己专自己的政？个别犯法是例外，不犯刑法就不能法律制裁！

（党校讲课都用大纲，党内关于马列主义教育能否争鸣？）

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家，如果有不同解释，就是曾经有第二国际，列宁的第三国际，斯大林有马列主义，也有教条主义。

（教学大纲以前叫“法律”，后改为“参考”了。）

以前叫“法律”，现在叫“参考”，可见这“法律”就不太严肃了吧。

（四川曾想封《星星》杂志社。）

《星星》还是不要封。这次会议一开，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又会冒出来，不要急，我们不忙于理它，它大有劲头了。你们不是反映有些教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诱敌深入”吗？我们对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两条：（一）必须批评，（二）必须批评得好，因此必须要有准备，要有说服力，毒草在中国长了几千年，再长七、八年也不要紧。而且我们还是要做事情的。他们一肚子气，可以让他们讲，毒草不可怕，如用压下来的办法，还是要翻的。（有人说，《星星》所谓七君子中二个有杀父之仇的。）这样，《星星》出现那些东西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如何对付不正确思想：要有办法，不要急躁，不要简单，应该研究方法。中国有几千万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高等学校80%学生是他们子弟，那些有杀父之仇的，能不恨，不骂我们。但应估计到，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可以争取的，现在高等学校工农子弟还不多，在中小学。匈牙利高等学校60%学生是工农子弟，照样闹事，反苏反共，我们80%是那样子弟还没闹事。专业学校官行主义为主，还有欺骗。在工厂里也有官行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毒草是有的，但不是多数，占百分之几？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是小资产阶级，……现在是转变时期，大变化时期，在观念形态上一定有所表现的，但99%或还要多一点是能够教育过来的，问题在方法，在于

有说服力的文章，学校的教员，工厂的干部能讲得清道理，能说服学生、工人。光压，压得服人？

（百家争鸣中党内外有人动不动就说庸俗社会学。）

简单口号压不了人的，我们应当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要有说服力的文章。如果大家看来都对，只有一人说是教条主义，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多数人都说你是教条主义，那就不成了。地、富、资产阶级及其子女、知识分子是可以教育过来的，问题在于方法。极少数的人会教育不过来的，大约只有千分之几，但如果他们不拿起刀子来也不要紧。《星星》的“草木篇”是应该批评的，如不批评真是让毒草长起来了。钟惦棐的文章也是毒草，是机会主义之花；马寒冰的文章是教条主义之花，马寒冰文章中有这么一种气味——你是什么人？江山是老子打来的，你就乱放？！我们要取得经验，要学会如何掌握。我们对付蒋介石、帝国主义是有经验的，掌握得好的，匈牙利的问题我们也掌握了。因此对问题必须研究，要用脑子，要学习，重要的是在斗争中取得经验。有两点：（一）对毒草估计过分了，几千年来，人民就这样容易毒倒啦？！人民是有分辨能力的，不怕！让他放一下吧！党员（领导干部）不要先讲话，先让民主人士写文章，让党外充分讨论。（二）过去搞阶级斗争，我们是有办法的，现在是思想斗争，不能再用老办法了，打倒蒋介石，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土地改革等等的办法，现在是思想斗争，是不同了。思想斗争是动口不动手，而且动口要恰当，不是采取专政的办法。不要将敌人夸大而小估自己，没有什么可怕的。去年一些专业学校采取欺骗办法，有17个学校7000人罢课，全国有500万中学生，中学校长和党委书记要好好研究如何办好学校，500万学生闹起事来，也不好办啊。

领导思想斗争的方法要研究，过去是对敌斗争，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现在问题是复杂的，有科学、文艺、高等学校，还有“草木篇”，他能写，我就不能写，诗经、楚词是什么呀！大部是草木篇。他们和我们作对，不怕，四川是大国，有几千万人口。陈其通四人文章，老干部十之八九是同情的，但党外不赞成，党就孤立了。

要发动知识分子讨论“再放”。

（航空学院付支书张云凤写反动标语问题。）

他写“苏军滚出匈牙利”，我们要他“滚进”，他要“滚出”，学校里同意这意见究竟有多少？千分之一大概会有的。（有人提糊涂思想还很多）这是显明的敌对问题，大概就是千分之一，糊涂思想不算，世界上多得很。（××：支部表决开除张党籍问题，5人赞成，4人主张留党察看，是在负责同志讲了要开除以后表决的。）九个党员，五个赞成四个不赞成，说明时机未成熟，何必急，张有意见可在支部中公开讲，为什么要秘密写标语？这是恶劣！我们还可以研究经验，是否要开除？如要开除，什么时机开除？

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的儿子也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说来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少了些，象张云凤这样的少。（××：象张东荪那样的人，几年了，现在还放在那里教书，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害。许多教授公开说：“共产党会胜利是无天理！”我们也还是采取严肃批评与耐心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最近他自己公开检讨了，这说明还是有效的，对党无损害。去年还参加了知识分子会议。）还加了薪呢。思想斗争是“文”的，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统一战线，团结批评团结，我们是当医生，开刀是为了把人救出。（……）

（有些教师认为不需要继续改造了。）

不要改造？我60岁了，还要改造，一万年还要改造。人要前进，就要改造，这是合乎规律的。如果还是老一套，象过去骑在马上打蒋介石那样，就不行，就要改。共产党还是有点人情，是做事的。说到学术，人家说我们“不学无术”，我们这方面的确也是不多，所以需要学习研究。

（有高级知识分子说你们政治是为业务服务的。）

对，政治是为业务服务的。（××：在一定范围内是应当这样说的。）政治是上层建筑，为基础服务的。我们提出“向科学进军”、“十二年规划”，至于半导体、原子能等就应该由你们去搞，我就不懂，过去我们是阶级斗争，是种攻势，他们没办法，但不舒服。现在要建设，知识分子就以改造之身出来讲话，批评我们的官僚主义。他们批评是好的，为什么不可以把尾巴夹起来呢？要学习，要研究。（……）

（知识分子中的新老问题，老的怕新的批评。）

规律就是如此，后一代的人学过前人就批评前人。马克思就是如此，如果后代跟我们一样，什么好处？

（他们不公开宣称唯心，而是把唯心唯物搞在一起，搞乱了，借反教条主义之名，以抬高唯心，是他们百家争鸣之目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有各的目的，但结果是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有人提出，“百家争鸣”没有“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那么明确，是否加上“去伪存真”或“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 ）方法，唯心主义者是虚中求是。

（有的科学家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

党能不能领导科学？能够，办办看，如领导不起，还是不行，我们是从政治上来领导科学，搞十二年规划，向科学进军，这个我还领导不得？（××：去年我们搞照顾等等，做了总务长的工作。）我们，总务长加李富春（计划），第一给饭吃，第二计划。现在科学研究，我们就是没那么多党员去充当所长，难怪人家说，这点不要去争，自然科学我就不懂，要请他们当先生，李富春加总务长，我一点都不领导？自然科学，先生还是你。

（苏联是否过渡到共产主义？）

还没有。

（陈伯达同志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讲话所提知识分子通过两条道路达到马克思主义问题。）

自然科学家是通过自己业务实践道路来达到马克思主义的，这是指他个人通过的道路，并不是说不要领导。有些知识分子口头说党不能领导，但实际上我们领导了。列宁懂得半导体？但还是领导了。自然科学部门那么多，科学家自己也是懂得这个不懂得那个的。梅兰芳能领导京戏，还能领导话剧？他是旦角，难道能领导丑角，他领导得了程砚秋？结果还是外行领导内行，政治就是领导。他们事实上是说这么一个问题——“共产党还没有科学家”。苏联情况和我们不同，他已有大批党员科学家。

（教授说：政治为教学服务。）

政治为教学服务，整个人民政府就是为工农服务，也为科学技术服务的。也是的，搞得好一点就发展得快一点，就是为其服务，并且全心全意地服务。

（对闹事学生、工人中共党员该怎么办？有困难。）

有困难，应当看有理无理。如果有理，党员应该站在群众方面，对十分坏的官僚主义，要反对。当然首先要极力争取和平解决，不罢工罢课，对于无理的，就不卷入。有理的，党员、工会、学生会应该站到群众方面。

（报纸要不要干预生活？）

报上的宣传要看对人民有利无利。没有抽象的言论自由，只有什么阶级的自由，阶级中集团的自由，有阶级的时候，是阶级办报，如果把报纸当作没有阶级性的，将来是对的，现在可不。

（有人提出省里传达说，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是对的。）

我是先后插话谈过“这几个同志对党是忠心耿耿的，为了党的事业的，但文章则不堪领教”，下面这句话没了。

（康生：可能反映到会同志的一些思想，上一截容易接受，后一句就容易忽略。）

他们的文章反映出对敌对思想的仇恨情绪，没有这也不得了，也要保护。问题是他们是教条主义，方法是错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当然在放之中任何错误的东西都应该批评。现在放够了吗？鸣够了吗？不够的。人家还在猜我们的意图。认为我们是“诱敌深入”，因此必须再放。现在开宣传会议，大家同意这方针，要很好研究这方法。（一）党员不忙于写文章，让党外先写，当然要领导。（二）党员也应该写，但必须是要有说服力的，有研究的，有分析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方法，有分析就有说服力，我们应采取帮助人家改正错误的态度，而不是一棍打死的态度。

（关于八大决议，制度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所引起的争论。）

矛盾有，但不大。但保护生产力发展的，不能拿将来与今天比，也不能拿美国与中国比，这是不妥的，50年后的中国会有不同，生产关系在50年内变动不多，苏联已经过40年，现在还是适应的。矛盾吗，现在有，将来更大，现在小一些。这一句话在决议中本来已经删去，但给照原样印发了，临开会才知道。

在七個省市教育厅局長座談會上對當前教育工作的指示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主席于三月七日晚间在颐仁堂和天津、山东、江苏、河南、湖南、四川、陕西七個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当前普通教育问题。参加座谈的有：康生……等。

首先由主席询问学生闹事情况。经河南、山东两省同志汇报后，主席指示，学生闹事，应当重视，也要具体分析。如许昌学生向视察的人民代表提了一百多条意见，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你们应当很好地解决问题，不应当拖。你们都看过“困难重重的昆明航空工业学校为什么没有闹事”的参考资料（中宣部办公室印发）吗？学校负责同志如能象该校校长和教师那样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主动地给学生讲清真实情况，师生同甘共苦，战胜困难，不是解决了问题吗？

主席又问去年由于合作化，办了很多学校，但出了很多问题，戴帽子的学校怎样，好不

好？经各省同志反映情况，一般群众都欢迎，同时也提出困难问题，如校舍、设备、师资、领导等。然后主席指示，戴帽子学校是先进经验，群众是欢迎的、拥护的，不愿搞掉，这就是好的。要继续办下去。你们专家要求过高，并要正规化，这就不对。有困难，可以补充一些教师，发一些经费，要求放低一些；先使普及，便于生产，课程可简单一些。这时主席又问×××需要多少钱。经初步估计约八千万。主席说，一亿行吗？只要贯彻增产节约的方针，节约一亿并不很难。

大家又请示主席，这样的办法，将来学生可以升学吗？主席指示，这种学校是为了满足人民对文化的要求，学生将来主要的是参加农业生产，课程简单一些才容易办，学生学得好的，同样可以升学。

主席又问学校就学有什么困难。大家都说很多学生交不起费，要依靠助学金来解决困难，特别是农村学生，但是助学金又不夠分配。主席指示，合作化不过一年，合作社还没有巩固，增加生产，增加收入，还有困难。三、五年后，合作社都象遵化县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中宣部办公室印发参考资料）一样，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因此，在三五年内，农民子女就学，要帮助解决困难，助学金不宜降低，还可增加一些。这时主席又问需要增加多少。经大家反映情况，×××提出高中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初中增加到百分之十八，可以解决问题。

主席又问每年初中高小毕业生升学是不是很紧张呢？同志们一致反映紧张的情况。主席指示，全部解决是不可能的，但可以略增加一些任务，适当地解决群众迫切的要求。戴帽子学校可以继续办下去，民办小学也可以提倡。群众需要而又能办的可以办，这时×××也提出厂矿企业机关办学的问题，主席表示同意。

大家又请示主席，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多少、快慢应该如何掌握？对初中、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参加生产劳动，应该如何宣传教育？主席指示，对群众宣传，可就国家经济情况来说明。李富春同志已在全国政协讲过，你们可以听听他的说明。（三月十日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录音）。

同志们又提出若干关于教学计划和教材方面的问题，如科目多，分量重，内容深，教师水平又不高，师生负担都很重，教学质量都不高，特别是文学课学习苏联办法更感困难。主席指示，学习苏联要结合中国实际，不能有教条主义。中国是六亿人口的国家，情况很复杂，不能采取划一的办法。科目要减少，七、八门，九、十门就可以，教材要适合各地方情况，要允许各地方自编地方教材，如地理（如湖南省）、文学（当地文学家的作品）、动物、植物……。现在这样的文学课本不好，要改编。这时候×××说：大家意见还不一致，要再研究。

同志们又反映，政治课取消后，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困难。这时×××说明，政治课教学效果不好，因而学习苏联，不教政治课，只教宪法。主席指示，高初中要增加政治课，教材要另编生动的，包括基本知识和做人的道理，隔二、三年要修改一次。宪法课这样教不行。当时就指定×××、×××、×××负责编。并指示，要教育学生艰苦奋斗，招生时就要说清楚艰苦奋斗，不要讲得太好。师生要同甘共苦，共同办学，发挥创造精神。要劝导青年迟婚。各省市宣传部长、教育厅局长，要有一人专管政治思想教育。当时又指定×××拟发指示。

大家又反映，基层教育工作繁重，干部力量不足，又常常抽调搞其他工作。因此，要做工作，完成任务，必须充实人力，健全机构，如县市教育局，乡文教委员。教师忙乱，侮辱教师，占用校舍等问题也要解决。主席指示，要加强地方教育行政领导，并指定×××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最后主席指示，教育工作是政治工作，很重要，省地市委第一书记要管政治思想教育，我就是第一书记，要管政治思想教育。如果忙，每年开几次会，就可以解决问题。

(一九五七年)

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三月十日下午三时至七时，毛主席在他的办公室和新闻出版界代表举行座谈。参加这次座谈的有：上海《新闻日报》和中国新闻社代表全仲华，《大公报》代表王芸生，上海《文汇报》代表×××……

谈话开始，主席先请上海方面的光外人士发言。主席问上海的《申报》是什么时候取消的？听到答称解放后《申报》就没有出版，主席便说：《申报》取消没有道理，人家是出了几十年的老报纸嘛！现在改做什么报呢？（有人答道：改做《解放日报》了。）主席说：改了就不好吧，如果把它改回来又好象是复辟了，但是这问题好好研究一下。

接着《文汇报》的×××提出问题。他说去年七月《人民日报》改版后，上海的报纸也改了一下，但是改了之后，问题也很多，大家都感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

主席说：现在心中无数，但是慢慢就会心中有数。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打游击战，未打之前，我们就连想也没有想过，逼上梁山，非打不可，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当然，打仗这件事情不是好玩的，但是打下去慢慢就熟悉了。对于新出现的问题，谁人心中有数呢？我也心中无数。就拿朝鲜战争来说吧，打美帝国主义就和打日本不相同，最初也是心中无数的，打了一两仗，心中就有数了。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象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一切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谈社会主义的书，虽然出了那么多，教我们怎样去具体搞社会主义的书，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也有些书把社会主义的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但那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事情没有出现，虽然可以预料到，都不等于能够具体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办法。

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当然，学是要自愿的。听说有些文学家十分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说有了它，小说就不好写了。我看这也是“条件反射”。什么东西都是旧的习惯了，新的就钻不进去，因为旧的思想把它顶住了。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小说不好写，大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跟他的旧思想抵触，所以写

不出东西来。

我们中国有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坏在成堆。《人民日报》就是这个样子，知识分子堆在一起，毛病就多起来了；但是堆在一起也有好处——知识集中。在知识分子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它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的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好的。

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陈其通、马寒冰他们几个那一类的教条主义，一种是钟惦棐那一类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听说陈其通这人还好，马寒冰就很霸道。他拿了文章跑到《人民日报》，一声“圣旨到”，邓拓就双膝跪下了。（××插话：当时他写了文章来，一进门，就说他们有些意见，要想争鸣一下，希望文章不要改动。）马寒冰的文章十分教条主义，我就看不下去，简直强迫受训。钟惦棐这名字很古怪，他的文章倒能看下去。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当然，要完全避免片面性也很难，但是思想方法片面、孤立，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主席说到这里，叫×××再说下去，×××说：现在报上开展批评也有困难，反批评往往简单化，太粗暴。《文汇报》上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初时老演员、老导演参加讨论十分热烈，后来电影领导部门的同志写文章，一枪把批评打回去，他们就很后悔，认为自己出头发表意见，是上当了。

主席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能一批评很有益，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不能改进。你们报上（指《文汇报》）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他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益处。听说撤钟惦棐的职是不是？（××答：是他自己要辞《文艺报》评论员的职。）主席说：我看也不必撤职，电影的问题本来就很多，老演员，老导演一肚子气，应该让他们发洩发洩。

（×××说：报上登的东西，读者意见不一致的，有些青年说《文汇报》登些琴棋书画之类的东西，他们不要看，写信来抗议。

主席说：你们的报纸编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不爱看，青年不爱看可以不看。各有各的“条件反射”。一种东西，不一定所有人都爱看的。

（《新闻日报》金仲华提出意见说：日常生活问题出现紧张现象的时候，人民群众提出意见的很多，报纸一封也不登，群众有意见，报纸登了，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人又有意见，说是刺激群众，造成更加紧张。不知该怎么办才对？

主席说：可以试试看。（意思是说，也可以登一些出来看反映么样。）政府和有关的业务部门有意见，报馆可以和他們研究商量一下，在报上加以解释，再看结果如何，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官官主义，不去改进工作。

（主席问到上海报纸的销路怎样？金仲华答：《新民晚报》扩大报导而之后销数增加了很多。这时座中有人提到“心中有领导，编报无自由，读者不爱看；心中无领导，编报就自由，读者就爱看”这句“怪话”。王芸生接着说：这个说法是原则性的错误。）

毛主席说：这也要具体分析。报纸是要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情况办事的，情况就是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有正确的领导，有不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按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中国革命也是这样。第三国际不灭亡，中国革命不会胜利。列宁在生的时候，第三国际是领导得好的。列宁死后，第三国际的领导是教条主义的领导，（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就不大好。）只有季米特洛夫那一段领导得好。季米特洛夫所作的报告，是很讲道理的。当然，第三国际也有功劳，就是帮助各国建设党。后来教条主义不顾各国的特点，一切照搬俄国，中国就吃了大亏。我们用整风方式搞了十多年，批判了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事，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列宁也是不承认第二国际的，结果十月革命胜利了。我们不要再搞国际了。情报局成立之后，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批评了南斯拉夫。（康生：还批评了法国和日本。）但也不是从此不要，但要就要象第三国际初期那样，各国独立自主，按情况办事，不要干涉别人。这些话，我和许多苏联同志谈过，和尤金、米高扬都谈过。

（有人问到报纸应不应该专业化的问题。）

主席说：有些专业化也好。好象《大公报》那样，开放自由市场的时候，我就爱看他，因为他登这一类东西的多，又登得快。但是太专业化有时很枯燥，人家看的兴趣就少。专业的人也要看专业之外的东西。

（有人提到现在报纸上的东西太硬，反映了最近上海对于报纸问题讨论到的一些意见，例如说“思想性多了，报纸就不活泼”，又有人提出“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口号等。）

主席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好。香港的报纸虽然没我们说的思想性，但也没有什么意思，说的话不真实，夸大，传播毒草。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现在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的。俗语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

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说到这里，主席问《光明日报》的代表，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那位同志回答说，“是共产党员”。）主席说：“共产党员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嘛”。主席又说：你们的报纸还可以看看，副刊多。

跟着，主席问新华社总社的朱穆之同志，你们的新闻受不受欢迎？听说你们那里有人提出通讯社的消息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朱穆之同志回答之后，主席说：在阶级未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抑或报纸新闻都有阶级性。说：“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报导是没有的，美国的通讯社和报纸现在也报导一下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形。原因是它想做生意，所以故意做些姿态出来给人看，因为经济危机压迫着它。必要时，蒋介石不也会做出些姿态来的，他也放和谈空气。因为美国压迫他，要用更加亲美的人如胡适等来代替他，他放出和谈空气，使美国不敢压他压得太厉害，现在美国学了我们过去那一套，过去我们联合民主党派孤立蒋介石，现在美国联合胡适等去孤立蒋介石，拆蒋介石的台，倒过来，却由我们去“保护”蒋介石了。蒋介石不垮比垮了好，垮了，胡适等更加亲美的分子上台，那更不好。蒋介石放和谈空气，是为了抵住美国的压力，我们不要揭露他的批评他。他放我们也放嘛。当然，蒋介石还是反共的，还是要骂我们的，他不骂就没有资本了。

中华书局的舒新城（已退休3年，最近复出）反映了目前出版界的情况和他到湖南长沙一带视察所见的情况。他认为人们说目前出版的书又“缺”又“滥”，其实缺是主要的。因此他要求中央设法解决纸张供应问题，他又说目前中央各部都搞专业出版社，编辑，出版等整套业务都各搞一套，是否有此必要，可否只负责本部专业书刊的编辑工作，其他业务拨出来统一搞，以节省人力、物力，又各地大量搜集档案、旧书回炉，把大量资料性的档案、书报都毁掉了，文物保管委员会只管文物，不管资料，这样下去，将来要找过去的资料也困难。

主席对纸张供应问题说：轻工业部是否考虑多投资一点，这是不会赔本的。（文化部有一同志说：已请示过总理，计算了一次，增加投资无可能。）主席打断他的话说，人家谈的是要纸，你说没有纸，大家不要听，不要说吧。对于档案，旧书回炉问题，主席说，这是焚书的新形式，一看这样，别省也这样，恐怕浙江一带更多了，（向××说）这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下。

谈到这里，×××发言。他说：主席今天和出版界的谈话，将使中国报学史开一新纪元希望主席对于新闻工作的根本性问题给予指示。×××认识目前报纸工作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开展批评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过去长期存在，但是会后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报上开展批评搞得好不好，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系很大，因此可否想出几条准则来规定一下？康生同志也搜话说，现在报上开展批评碰到很多困难，不是有人反映说，“批评真军人，说你压制新生力量；批评老干部，说你立场不稳；批评民主人士，说你破坏统一战线”吗？

主席说：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来的。“三反”初期，说打出那么多老虎，后来一查，又说只有2%到3%了。肃反也有类似情况。“三反”实际上是整共产党，“五反”才是整资本家。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

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如果你推翻人民政府，蒋介石就要回来。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末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整风运动明年正式开始，今年先发一个指示，让大家有个准备，有一个非正式时期。在这个非正式时期，你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自己检查出来，把它改了，以后就不追究。不久以前，陈伯达同志回到他的家乡福建搞基层选举，就是这样的，有些干部贪污了，叫他把钱吐出来，向群众认错，结果群众批评了他之后，干部仍旧当选，这个经验很好。共产党整风免不了会波及民主人士，但是千万不要整死人。要用小小的民主的方法，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共产党整，大家就谦虚了。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就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我们拿手好戏是打仗，专政，文艺有一点，人也不多，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譬如地质学，共产党是不懂的，但是国民党也不懂。国执政20多年只造就200多个地质人材。我们解放七年，就选了一万多。行政领导就是“一个李先念加一个李富春”，一个管吃饭，一个管规划。现在是过渡时期，只好这样，这个情况，将来是要改变的。现在要争取80%以上的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个初步的了解，而不是要求他们一下子贯通。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是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会全部贯通的，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开始，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成。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说懂得马克思主义，其实懂得的程度也不相同。我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多，不晓得他们写了多少，大概我们翻译过来的还不到一半。（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同志说：翻过来的47%）作为专家是要读多一点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功夫，读少一点也可以，主要的是注意研究方法。现在很多干部都没有读书的习惯，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打扑克、看戏、跳舞上面去。大家不应该把时间浪费掉。

你们这次提出的问题很多，大家回去研究一下，试试自己来求得解答。开会的时候，就是要党内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合起来开有好处，这是辩证法，可以把两方面的意见统一起来。（康生同志插话：这种开会方式大家还不习惯，党外人士有些顾虑，党内的人有些吞吞吐吐，主席说的是好办法。）主席说：你们回去试试行不行得通，行不通我就来个强迫命令。至于人数问题，我看党外人士可以占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二。

马寒冰他们几篇文章，方针不对，方法也不对。他们的方针是反对党中央的方针，他们用的是压的方法，不能说服人。（康生：现在对于中央的这个方针，也有三派，陈其通、马寒冰他们的文章代表“左”的一派，怀疑这个方针不好，认为以后不要宣传这个方针。右的一派则不管三七二十一，认为在报上闹闹有好处，闹闹有好处，但是要看如何闹。还有中间的一派，承认方针好，但是心中还不大心中有数，有畏难情绪。）主席说：怕什么呢？如果批评青年人帮助了青年人，批评老干部帮助了老干部，批评了民主人士巩固了统一战线，这样不是很好吗？（康生同志又说：现在部队干部对这个方针思想混乱，认为部队进行

的正面教育，只能开香花，不能放毒草。）主席说：事实上也有毒草，只不过不以毒草之名出现罢了。因为每个人都是把自己的意见当作香花开的。当然部队应该和其他部门有所不同，部队是下命令办事情的。但是我们的部队本来就有民主讨论，士兵可以批评军官，答复不满意可以再批评。部队不是也有贪污浪费和军阀主义吗？因此部队也要整风，不过搞得很乱就不成，要有领导的来开展。过去三反的时候，戏院“打虎”可以挂个牌出来，停几天不演戏，报纸可不能这样，有缺点可以开个会讨论，但是不能夠明天不出版。（康生同志插话：对部队来说，应该“开言路，讲效果”。）主席说：这很好，各处都要这样。

关于新闻的快慢问题，在这次宣传会议上，新闻工作者参加了讨论。对于这个问题，主席说：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譬如禁烟运动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的问题。因为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污蔑我们卖鸦片，我们登了，不是正好供给他们宣传资料么？土改新闻也是这样，我们在报上不宣传，免得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新华社一播，（新华社总社朱穆之同志说，是广播电台先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又如匈牙利事件中纳吉登台这件事情，我们不明情况，又沉不住气，早登了三天，结果第一天登出的消息，没有说他好和坏，第二天的消息说他好，第三天又说他坏，群众弄得莫明。所以，本来情况不明，根本可以不登，这点法共就比我们高明，《人道报》在巴黎出版，四面都是资产阶级报纸，它未弄清情况，就是不登。

谈到再培养一些人写文章的时候，主席说：一定要找出能够写文章的人，而且现在已经找出了一些。谈到批评人民内部事情的文章应不应该尖锐？主席说：对人民内部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

对于当地有关政策性的可不可以批评？主席说：有些也可以批评。听说新疆有一个县城，商业系统就开了24间公司，《大公报》你们不是搞商业报导的吗？你们就可以搞几个典型来批评一下。

（《人民日报》的××说：报纸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得不好，影响就不好。但是我们过去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文风生硬，现在情况不同了，文风不能适应。）主席说：过去就不适应了，有些文章使人看了不舒服，不讲道理，一出来就要压人。（××接着说：这个当然和我们报纸工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有关。刮风往往是由报纸刮起的。报纸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极力设法避免刮风，避免片面性。譬如这次宣传节育和晚婚，《人民日报》一开头就注意到防止片面性，可是消息、文章一登多了，下面就发生问题。）主席说：文章一多了，就以为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实在难办，在旧社会里，报纸上的东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现在报纸上一登情况可不同。（××又说：譬如百家争鸣问题，有人以为争鸣的主要限于学术思想，实际工作不好讨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很容易混淆，譬如关于劳卫制和因材施教的讨论，报上文章一多，有些学生和教师的思想就引起混乱，恐怕要划个范围才好。）主席说：完全学术性的，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如果一发现节育晚婚的宣传产生一些不良后果，那么报上可以写文章来解释说明，我们的文章，就是往往不及时。至于范

围怎样划法，各报可以自己回去研究。

（新华总社的朱穆之同志说：现在问题很多，是否可以专门开一次会来讨论总结一下呢？）

主席说：这次只是提出问题，过一会还要开会讨论。这次会议也是“五湖四海”，效果如何，将来再看。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所谈的问题，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其通、马寒冰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谈谈的必要。因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只解决了国际问题，现在我们国内（大规模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于是就有一股风，说批评多了，说人民闹事，惶惶不可终日；另外有些人又觉得还不过瘾，有些人要收，有些人要放。中央的方针到底怎样，大家都要来摸底。其实中央也没有什么另外的底，方针就是那么一个，不过有了新问题。罢工罢课都是人民内部的问题。罢课是因为去年招生太多，一招多，有些人恐怕招不够，于是就骗人。骗人，学生自然不满意。问题凑起来，就显得严重。这样的事情，今后还有。人民内部，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有许多民主党派，还有无党无派民主人士。现在是社会大变动，思想混乱就是反映了这个大变动，不反映出来倒是不可理解的。官僚主义是闹事的直接原因，因为官僚主义不肯改，群众就会闹事。中国人民是最守纪律的人民，上海副食品供应那么紧张，我们把情况摆出来，把道理说清楚，叫大家想办法，结果今年的春节不是过得很好吗？现在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每天都会发生大小问题。（×××说：我们过去和新闻界也联系不够。）主席说：不是没有联系吧？今后我们每年都要开个会。我们今天还是过得比较好的，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到了1927年还很乱，文学艺术更乱，他们更穷，知识分子更叫，到现在已经搞了三十九年，商品也不见得比我们多。

谈到这里，有人提到过去对苏联的宣传是否存在片面性的问题。

主席说：当然苏联有缺点，我们不要登，印度的缺点，我们也不登，现在就是两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宣传。对于这些，我们就是要片面性。有人说西德的生产比东德快，你们为什么老是说西德不如东德。可是我们在宣传上还是不要说西德比东德好，不过也不要说东德什么都比西德好。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缺点的，因为我们历史短，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在资本主义链条薄弱的地方突破，取得革命胜利的。我曾经对德国的同志说过，现在马克思在东方很忙，暂时还不能回去，所以他们那里的革命不能成功。现在亚洲政治上比英美进步，因为亚洲人的生活比英美的差得多。我们过去受剥削，很穷，穷就要革命，他们生活水平高，文化水平高，就是不革命。自然，美国也有好处，历史短，没有历史上的负担，他们学起历史来，就不象我们那样费劲，也用不着去讨论历史分期的问题。有时坏事也会变成好事。现在是东方先进，西方落后，以后再过几十年，东方国家把西方的帝国主义赶走精光，到那时候，他们没有殖民地可以剥削，油水就不多，而我们东方国家却富起来了。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人民就会进步。现在亚洲闹起来了，非洲闹起来了，如果拉丁美洲也闹起来，那就好办了。

給周恩來等同志的一封信

恩来、××、××、××同志：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減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成批得力而又适宜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請中央讨论几次，并作出决定。我已到天津。

毛澤东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中央传阅文件，五七年寅月一百零六号）

在天津市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黄火青、吳砚农、×××、李耕涛四同志陪同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全体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

黄火青：同志们，现在請毛主席给我们讲话。（鼓掌）

毛主席：你们有什么问题？

黄火青：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主席解答的，可以写出来，现在主席先给大家讲。

讲什么东西？同志们，你们有什么问题？

很多同志没见过面，今天和同志谈一点事情。希望同志们提一点问题给我，你们的问题还没有来，那末，还有时间，我就先讲几句咯 就讲“百花齐放，百家爭鸣”吧！好不好啊？（鼓掌）

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全党关心的问题，是社会大家关心的，社会上民主人士，各界人士是关心的。对这个问题在我们同志中意见不完全一致。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可以，赞

成；有一些同志看样子还可以，但是心里总有那么一点不舒服；“百花齐放”那么多花，恐怕有不好的东西出来了怎么得了啊！“百家争鸣”，咱们共产党员只算一“家”，九十九家包围我们，怎么得了啊！有没有这个问题，同志们？就是有比较了解这个问题的，有了解一些但是又不很多的，还有怀疑的，有不赞成的。有各种意见在我们党内。

过去我们党做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工作呢？现在不是有建设工作吗，在过去我们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工作。阶级斗争，还不是建设工作。阶级斗争就是要推翻几种制度，就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那些制度。那是一场革命；社会主义就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些都是属于阶级斗争范围。打蒋介石、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城市里还有一个民主改革，还有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都是属于阶级斗争范围。那个声势很大，是不是？

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前年下半年跟去年上半年这个高潮，那个时候锣鼓喧天，热闹得很。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这一方面。这个斗争时间很长，它从我们祖宗鸦片战争那个时候算起，一八四〇年，从那个时候反帝国主义算起，算到一九五〇年，就一百年了，到去年——一九五六年，就有一百一十六年之久，才把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为新的生产关系，旧的上层建筑改变为新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主要是讲所有制，现在我们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上层建筑就是政府、国家权力机关、军队，都改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斗争。在过去作这个斗争的时候，人们对于我们，在开头也是不相信的。谁人相信共产党能够成功呢？开始有共产党的时候是不相信的，中间也是不相信的，因为中间我们经过失败。经过北伐战争时候的失败，后头，土地革命的失败，经过两次很大的失败，人们都不相信的。现在呢？现在人们就相信了，说共产党行了，行在什么地方呢？说政治你们行、军事你们行、你们有这两门。人们说共产党有这两门，还可以考赢了。还是帝国主义考赢了？跟我们考，跟我们比，蒋介石，国民党跟我们比，谁比赢了？谁胜谁败？我们赢了。你赢了嘛，那就算嘛，赢是好的嘛，你赢了嘛，还有什么话讲，那好嘛！建设呢？历来人们就是说共产党恐怕是不行的，现在怎么样呢？我们一面革命，一面建设。我刚才讲为“主”，阶级斗争为主，不是讲没建设，还是有建设，这一方面，我们是不会。要讲不会，也会一点，因为过去作阶级斗争的时候，在根据地也多多少少学了一点。但是盖大工厂，什么设计、施工、安装，哪一套东西，我们就不会了。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要教大学生，大学教授我们就很少了。在座有没有多少大学教授？（起立向台下问），有没有？大学教授请举手！一个都没有？有没有大学教授？总得有几个吧？（台下有同志举手）一个，那里有一个，少得可怜啊！同志们！（黄火青：有的没举手！毛主席又回原座继续说）有几个没举手？是啊，你们势力不大，你就不敢举手。

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共产党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搞工程，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有几不行就是喽！这个话怎么样呢？你们听得到没有呢？同志们！我听到了一些这样的话喽！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中学里头当教员的也少。文学艺术方面有点儿也是三七开；就是象斯大林犯错误一样，斯大林不是有三分错误有七分正确吗？我们有三分会七分不会。文学艺术方面，优势还是共产党以外，大学教授几乎全是共产党以外

的，医生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以外的。是不是？教育界有二百万人，大、中、小学，所谓公教人员的“教”有二百万人之多，共产党干什么事情呢？共产党就是在学校里名为领导，实际上就是不能领导，因为你不懂嘛！所以应该承认，这是我们不行的一方面。

他们讲得对，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我说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不对。共产党不能领导，这是对的，共产党也能领导，他们没给讲。为什么也能领导呢？我说就是我不懂请你们干嘛！国民党也是不懂，“蒋委员长”蒋介石他也不懂，国民党那个党对刚才讲过的这几门也是跟我们差不多，他也是做阶级斗争的这个党，他是专搞阶级斗争的，他就不搞建设。我们一面搞阶级斗争，这七年搞了点建设。他搞二十年，只有几万吨钢，我们搞了七年，今年八年，有多少吨钢呢？可能达到五百万吨钢，按照计划四百一十二万吨，可能超过。也许不到五百万，就四百多万吨。那么他二十年只有几万吨，我们八年有四百万吨，这就是说我们搞计划，此外，财政部给饭给这些人吃。国民党一无计划，二不给饭。同志们！不吃饭我也不能讲话，你们也不能听，科学家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医生也好，是要吃饭的，国民党有饭不给那些人吃，他专搞阶级斗争，给军队吃了，给那些政客吃了。我说李富春，一个李先念，世界上还有这两个人嘛，一个管计划，一个管财政，把这些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统统放到计划里头，做出什么长远计划，年度计划，在这上面领导他们，以计划去领导他们，此外，还有一条什么可以领导他们呢？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他们，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去领导他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不会的，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可以学会的。我们现在要学，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八大”上面说了，我们全党要求搞这个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大学里头当教授，要学会在科学机关里头做试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跟自然界作斗争，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这个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加以改变之后，必须要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要改变经济面貌，大体上改变一下，跟过去有所不同，也要花几十年时间。象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争一样，阶级斗争谁会呢？没有哪个人会的，比如说我就不会，我是当小学教员的，进共产党也没有想到，相信资本家对我们宣传的那一套，进的是资产阶级学校，相信那一套，后头，大概是逼上梁山了。你们各位呢？老早就打定主意了，母亲生下来，就当共产党？是不是？交代任务就是共产党，我妈妈没有交代这个任务给我，那么是学的，是不是？什么土改，也是不会，各种都是不会的，打仗也是不会的，打了多少败仗，经过多少变化，跟着经验的增多，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争。是不是？经过许多失败，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些？因为我们付的代价很大，有几次革命失败，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万里长征以前的南方根据地都失掉了，白区也没有多少工作了，那是因为“左”。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是因为右。阶级斗争右了，后头是因为“左”。有了这两条我们就学会了。所以陈独秀，王明（陈独秀就到敌人那方面去了，后头这个人也死了。王明还没有到敌人那方面去）不管怎样，这样的人，都给我们很大的益处。不是他们个别的人，而是他们领导的这个运动，在一个时候失败了。这给全党以很大教育，给全国人民以很大的教育，那么代价是很大。现在的建设，是不是也付那么大的代价？如匈牙利从前的领导者，它的阶级斗争也是失败的，它的建设工作也是失败的，因为一闹嘛——去年十月一闹嘛，我（说）是闹得很好，有些人很

不高兴这个匈牙利，我是很高兴。坏事就是好事。匈牙利还是闹好还是不闹好？无所谓闹不闹，总而言之是要闹的就是了，一个脓疮总是要穿的喽！我看可以争取，因为我们曾经学阶级斗争要付很大的代价才能学到，那么现在我们如果是不搞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曾经付很大的代价呢？不是搞左倾机会主义吃的亏嘛，搞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吃了亏嘛，如果我们现在不重复以前的错误，在建设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少的少付代价，可以避免象匈牙利那样的事情（有些语句不通，原文如比）

现在我们好好的想想，很需要想一想，有这么一种情况，作阶级斗争结束，这么一件事。过去阶级斗争高潮的时候，比如社会主义改造，镇压反革命，高潮的时候，我们的缺点，人们不大看得见，我们的缺点，我们还懂，我们在建设方面，科学，办学校，这些事情人们要原谅，人们比较原谅我们。社会上现在那个戏不唱了，×××，有没有？那就是镇压反革命，他的戏不多了，有还是有，在座的有军官，有军事干部，如果没有戏唱，还要他们干什么呢？当然还是有戏唱的，但是现在不唱，叫做养兵千日，现在还没有听见炮响，于是就把现在社会上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了，这个问题是有了，因为这个锣鼓，阶级斗争的锣鼓，热闹得很，自从去年上半年锣鼓喧天，以后“八大”做了结论，那么这个东西就浮到上面来了，就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摆到我们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人们就更加要求我们了，你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们说：“同志！我也有一套本领叫阶级斗争喽！哈哈！你们不要老是看我们不起吧！老子也是干了几十年的哟！”（笑声）但是我们老是讲这个话，就不那么好了。因为人们，承认你这条。他说你政治行，军事行，你是干了几十年，你是辛辛苦苦，那是没问题，功劳簿上有我们的名字，但是，同志啊！现在大学教书是怎么教啊，医院里头是怎么开刀啊，我是没学呀！中学怎么办呀？什么科学问题怎么解决呀，原子物理，什么东西，工程师、设计、施工、安装、运转，这一套我们就不会，我们才开始学习，这种情况的改变，得要有一个时间，大概要远须三个五年计划，至于还要有十五年的时间，才会有一个改变，更大的改变，时间还要多一点，因为这个东西需要学，需要时间，那么能不能学到，我看是一定能学到，没什么巧，自然科学，开刀之类，你没学就不会开，我去开刀，就是象一个相声讲开刀一样的，一定会当那样的医生就是了。但是只要学就可以学到。现在有没有人学呢？现在有人学，我们还要派人去学。比如现在的大学生，现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们就在学，过十五年，他们就是大学教授，就是工程师，也许不要十五年，有十五年他毕业的时候，还有现有的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中学教员有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加入共产党，条件适合的也可以接受他们加入共产党。所以再有三个五年计划是可以学到的。阶级斗争，那个容易学习呢？我看还是这个东西比较容易学习。总比那个打仗，比那个肃反，象那个肃反，看都看不见，你说没有，又有，你说有，他又没写名字叫反革命。抗美援朝打美国人那样的仗，事实没有多少把握，美国这样大一堆，我们拿这么一个指头去打他。我看还是就要是中学毕业以后进五年大学，以后出来做五年到十年工作，就可以当大学教授，就可以当工程师或工程技术人员，开刀也可以。所以有些人看不到这些变化，大概共产党永远学不到。我看是可以学到的，而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学到。那么先生是谁？先生就是现在的党外民主人士。他们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跟他们学点东西，只要我们态度好，不摆官架子，不摆那个老子多少年，革命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啊？不把这一套摆出来，我们把这套装起来，因为那套摆得没有意思，什么几十年嘛，那个是历史家去写的。我们每天见面就

把两句话讲完了，老子革命几十年，此外，就没有了，就等于没有干一样，因为那个事情完了嘛，那个事情基本完了嘛，阶级斗争的问题。咱们现在来讲科学，你有什么长处，我跟你学习。我懂不懂呢？我是一窍不通。首先承认自己一窍不通。那你过去干什么去啦？那么就是因为过去搞阶级斗争喽，就是忙一点喽。这样子答复一句那可以的了，就是少年失修嘛！少年失修，所以不懂。现在你可不可以教呢？有些教员还不那么爽快的哩。但是只要我们好好请教，他会教的。我说从前拜师付的时候要烧香，又磕三个头，现在天津还有没有啊？恐怕也还有吧！还有磕头的？（黄火青：不磕头了）不磕头了，（黄火青：订师徒合同）订师徒合同。现在磕头这一灾难免了，我说假如要的话，怎么办？一定要那个规矩呢？还有要磕三个头才教我们，磕不磕？这个时候发生问题了，我说咱们应该磕三个头。你要学本领嘛，那他的规矩是要你磕头嘛！头现在是可以不磕，但是诚心诚意向他学，要尊重师付啊！要尊重他啊！要努力学啊！这也相当于磕头了。这个精神还是要的。现在我们党里头是有种风气是不大好的，就是脑筋里头还是装满了过去那个几十年，新的风气没有养成，没有事情就是，你们这里是打麻将还是打纸牌啊？或者是看戏，或者是跳舞，横直是没有事情做，没有养成阅读看书的习惯。没有把我们剩余精力放在学习上。这是一般喽。至于在学校里头，在工厂里头，在科学研究机关，在医院里头，我们的工作人员凡能学的，你能学那么一部分也好，了解一下内容也好。你完全不懂，你又要在那里做领导工作，就是无怪乎人家说我们不行了。你完全不懂，你学，你又要摆那么一套架子，这就不好了，应该学习。百花齐放，关于艺术方面，这样的方针，也是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竞赛。放出坏事来怎么办？现在有许多坏事，有许多怪议论。我说不要紧，这些怪议论批评它就罢了。人们很怕开出来的花不好看，这个花有毒。百家争鸣，说是共产党只是一家，其它九十九家把我包围了。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在社会科学，在世界观这一方面的问题上，不是什么百家争鸣。是两家争鸣。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百家里头按其性质分类，可分为两家争鸣。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两家的思想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小资产阶级算不算一家？当然也可以算一家。但是小资产阶级在基本上，它是同资产阶级是一家的，它属于资产阶级那个范畴里头的。在共产党这一家里头，有没有争鸣的？事实上，历史上第二国际这是一家，头上顶着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修正主义，现在还有修正主义——南斯拉夫，我们国家有没有呢？我们国家也有这样，可以找到这样的人，这种人可以叫做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国讲有修正主义，不必去讲，好象我们是有个修正主义派别一样，现在没有。但是过去有，陈独秀就是，陈独秀就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后头王明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错误，同志们知道不知道？第二次，就是打日本初期，抗日初期，那就是修正主义。现在钟惦斐不是写了篇文章吗？关于电影问题，否定一切，对于过去的成绩。另外有些同志就肯定一切，看不到缺点错误，人家批评不得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是什么人呢？就是陈圩、马寒冰，一月七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陈其通、马寒冰，我说这些同志好心好意，忠心耿耿，追求正义，他们是保护党的，看到外面锣鼓喧天反对我们，就是不得命令自动出去作战。这个自动出去作战的这些人，他们是有一股精神，他仇恨那些看不惯的那些东西，应该承认他们这点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方针同方法是错误的。天津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找一找。“左”的右的，肯定一切的否定一切的，这是两种片面性，把我们的工作一切都肯定，不加分析，这个

东西不对，以前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拉科西就是这样，斯大林就是这样，斯大林，说他完全是教条主义者？也不能讲。这个人，他作了许多事，但是他有教条主义，他这个教条主义影响中国，使得我们一个时期革命就是失败，如果照他的办，后头的革命也办不成，现在我们就不在这里开会，这个房子什么人盖的，也还不是我们盖的，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还是国民党帝国主义统治嘛。他是两方面都有，又有教条主义。一切搬苏联，我们必须学苏联，苏联的东西很值得我们学，错误和成绩这两方面，我们现在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没有讲要学习他的落后经验，那一天提过这样的口号呢？但是虽然没有提，有那么一些东西跟着搬过来了，在最后七年里头，但是大体上说，我们不算是完全不加选择，这就是硬搬，因为我们曾经对教条主义有所批评，而教条主义的来源就来自斯大林。

对于社会上各种不同意见，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不满意共产党，说我们不行，这个是我刚才讲了的，本来不行的就应该承认不行。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就具体的业务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的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政治去领导吧！国家计划去领导他们，所以我们有学习的任务，对这些错误的议论，社会上有许多错误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究竟那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我们只有这样一个方法，别的方法都是不要，而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呢，就是记着继续过去那种方法，或者叫做军法从事，你不听话呀，那么就正军法了，拉出去简单的砍了（正军法嘛。因为我们习惯这种方法）×××的办法（指镇压反革命的办法——记录者注）这个办法不行了，这是对阶级敌人的，对付阶级敌人呀，对付那些有血债什么东西的那些人们，就出去砍了吧，正军法嘛。因为我们习惯这种方法，我们习惯了。搞了几十年了，在阶级斗争里头，其实也不那么简单，还有许多细致的方法喽，但是因为是对付敌人，我们很有一股劲，在现在呢，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人民内部的问题，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这么许多人，大学教授、医生，这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行了。这是另外一套。我们要经过学习，他们是对的，譬如科学、技术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而学习是完全可以学到的。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技术上领导他们。至于各种不同意见，分两类，一类是科学方面的，不论我们懂不懂，我们现在不懂，将来懂了，也是这个方针，不能“军法从事”的，×××的那个办法是不行的。只能采取“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大家讨论，一门科学可以有几个学派，去争，以后会得出真理，社会科学的问题，也是这样，凡属于科学的，都是用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我们看不顺眼就去整一下的办法，而要改造这样一个情况，需要经过说服的过程。这些议论完全没什么可怕，有什么可怕呀，胡风怎么样呀，胡风不是抓起来了吗？那是国内他搞秘密的小组织，胡风这个人还活着的了，总有一天要把他放了的了，坐班房坐了一个时期，他的错误，他的罪就满了嘛。但是呢，胡风的思想并没有死，在社会上，胡风的思想活在许多人里头，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的问题，譬如宗教，马列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艺术方面的问题，这些东西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这两个方法里头取一个，还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去想要压一下，这个压么就受不了，压不服的人；只会把问题压得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再来个，他挂笔账，共产

党犯了错误。你对美国人打过三八线，你用压服的方法，那是对的，反革命你用压服的方法，是对的。对国民党蒋介石、地主阶级使用压服的方法，你为什么用压服的方法对付科学呢？如果我们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理，就站不脚住，我们就输了，所以应该采取说服的方法。那么说服我们又不会说怎么办呢？问题是那么就学嘛。我们南方有一句话，叫化子打狗，叫化子你们叫要饭的，他打狗是专门技术，“叫化子打狗，操习一门”，我们乡下有这么一句话。现在我们是不知道的，不会应付，不会说理，我们要学会说理，要学会写说理文章，学会做说理的报告。老子就是一冲。曾经有过一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是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他说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你三冲两冲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文章来有说服力。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特务，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大多数，也就是极少数人是仇视我们的，也不是特务，但是他是仇视我们的。许多人还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学了一点，但实际上不相信，再有一些人，相信了一些，不完全，这里头包括共产党员，我们党里头的同志有一些，但是没有完全学通马克思主义的，还不懂，你看两种片面性的人都有嘛，教条主义的，肯定一切的，别的人说不得坏话，本来我们有缺点，不许人说一说；也有另外一种人，什么都是坏的，否定一切。这两种片面性，这两种形而上学，可见得是存在的。

现在我们发行《参考消息》在座的同志都看过这个东西吧，没有这么多吧，有呀。这个东西人们就会说了，是共产党、人民政府替帝国主义尽义务，一个铜板都不要，给他出份报纸来骂自己，共产党无代价替帝国主义出份报纸骂共产党，是不是这样的？看样子是这样的。我每天都看，许多东西就是骂我们呀，现在要扩大发行三十万份，可能有一百万人看，发到县一级范围看的，城市到什么一级呀？来锻炼我们，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应该见世面，锻炼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么样骂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是怎么样。说会乱，不会乱的。这就是把我们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就很危险，所以有人这么说，这个《参考消息》一扩大发行，那就会使反动气焰嚣张，因此那位同志（这是你们市委黄火青同志告诉我的），希望每一条国际消息都加一按语，那就麻烦了！同志！都要加按语？我们就是叫人们自己去思考，去开座谈会，可能有许多怪言论出来的，怪言论我看是越多越好，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马克思主义，是同他的敌对力量作斗争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譬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那么我们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具体情况来解决。对百家争鸣没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说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我们是马列主义，他们是国民党，我们是共产党。蒋介石那样的“老干部”，他们也是“老干部”，那些“老干部”可是批评不得呀，因为他们的脚是站不稳的，我们本钱大。这个地方没有摆一摆——摆一摆几十年，我们做工作的时候，不要天天挂在面上，说老子干了几十年，但是人民还是

知道的。老干部就是那样容易批评，一批评就批评倒了，吹一口气就倒了？你们都是老干部啊，有没有新干部啊？大概也有吧！现在专讲老干部，我看是吹不倒的，普通的风；除非是十二级台风，十二级台风可以吹倒树，吹倒房子，但是要吹倒老干部我看也还是不行。十二级台风要吹倒共产党，人民政府，马克思主义，老干部不行，新干部也不行，只要他是正确的。至于你有错误，正是要有点风吹一吹，要刮点风。这房子没有风扇哪？这是因为冬天喽！到夏天得搞点风扇，大概夏天人就要有点毛病吧。我们用洗脸打比喻，你们是三天洗一次面还是一天洗一次呀？这样一件事情谁也不去研究它，不去研究为什么人们要一天洗一次脸，有的甚至一天洗两次，这个就是因为有灰尘嘛！既然这个皮肤不仅与外面是一条界限——“三八线”，它是与空气接触，它是“黄河为界”，它搞了一付面孔，它而且是个排泄机关，皮肤是个很大的排泄机关，它排泄那么多东西，人的面部我看周身就是它最脏，因为它有七个洞，出了些东西，另外还有许多小的排泄机关，因此每天要洗。那么党就不要洗吗？党也要洗脸。毒草不可怕，反马列主义思想暴露出来不可怕，而且正有作用，我们需要那些东西跟我们来见面，以便和它作斗争，使我们发展起来，这就等于我们种牛痘一样。刚才讲的《参考消息》，要扩大发行。现在不是提倡种牛痘吗？牛痘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是一种病毒，还是一种微生物，种那么点东西放在人里头，使你两个人打架，就产生一种免疫力量，以后就不出痘子啦！出了麻子就不出麻子了，因为他产生了“免疫”了；一辈子不害病的是很危险的。有个人写文章说我讲什么东西，说是小毛病什么东西，我是讲这一辈子不害病的人，就是有一天他要害病了，就是危险，就是了。因为细菌病毒钻他钻得太少了。经常害病的人呢，那些人比较牢固，因为他作斗争嘛！无产阶级思想他跟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各种艺术的发展，需要百花齐放互相竞争，来比较。百家争鸣，互相竞争，批评讨论，正确的东西才能发展起来。因此我们不要怕这个东西，不要怕，我们要到空气里头去，不要老在有暖气设备的房子里头。

在山東省級機關黨員幹部會上的報告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

刚才舒同同志给我出了题目，要我讲些什么事情。出了题目就要做。但是他出的题目很多，那怎么办？那么多题目，我只讲一个题目：思想问题。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譬如讲：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比过去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同志们最好不要记录，记录就妨碍听，我倒不是要守什么秘密，我给你们交换意见，你们记人就忙了，不记舒服些）。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有一些人讲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也的确有些合作社办得不好，共产党也的确不大懂科学。还有苏联过去是比较好，去年以来就比较坏了，不晓得是个什么道理？总而言之今年比较好，去年比

较坏。今年又好起来一点，苏联还是那么一个苏联。有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美国比苏联好，美国的钢比苏联出得多。此外，人民闹事也发生得不少。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不晓得山东情况如何，听说也有一些），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纪律有些松弛。工厂里头，学校里头的纪律，合作社出勤的纪律，不是一般不好，一般还算好，只有一些不好。报纸上，不晓得你们山东报纸怎么样，北京、天津、上海的刊物上、报纸上，小品文，讥笑、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就看得象舒同同志所讲，对合作社有些人就看得是不好，没有优越性，一片黑暗；有些人员觉得很好，很好就不注意它的缺点了。这一些情况下，就是有一些共产党人也跟着别人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些跟着资产阶级走，就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些。另外一些共产党人就不服气，说这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事？搞不搞这个“百花齐放”？别的地方是搞了一下子，“百花齐放”，刚刚只放了十几朵花，（笑声）还没有放齐，“百家争鸣”，大概有一二十家出来争一争，放的中间，争的中间就说一些事情不那么好了。有一些同志就看不顺眼。他们就想收起来，说放得多了，要收一下，就是不要放了，或者少放一些，“百家争鸣”也收一下，主张收的这么一种思想，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外面讲什么我们也讲什么，跟着人家走；一种人就想收，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是个内因。当然外国的事情也影响我们。二十次代表大会把斯大林批评了一下，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铁托的演说，卡达尔的演说，（山东的报纸登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一些思想上的混乱。还有，我们工作中有许多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工作中，我们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引起思想上有一些混乱。什么大混乱没有，我们中国，我说没有外国那么乱，当然就没有波兰、匈牙利那么乱了。比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他们那么乱，譬如越南就很乱了一阵子。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原因，就是有外国的。但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处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八大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些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全国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这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这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也是阶级斗争。这是向什么阶级作斗争？向资产阶级作斗争，向跟资产阶级有联结的那个个体经济。我们要消灭资产阶级同那个资本主义发生基础的那个个体经济，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这个大斗争的结束，那么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还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就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了，就暴露出许多思想问题了，思想上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我说过去有的，特别是我们新进城来，解放大城市那个时期，同志们都经过，一九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五二年、五三年那几年，那几年还不乱？还是那几年乱些？还是现在乱些呢？实际上，是那几年乱些，你象资产阶级那个时候他们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心里不安。但是过去那些不同的意见分歧就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吓住了，被解放战争、剿匪、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那些东西所吓住了，许多人不敢开腔了。并非没有问题，那个时候问题还很多，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比如，民主人士这六、七年有很大进步，就是因为在这些斗争里头我们跟他们合作，应该承认他们是有进步的。去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表现在意识

形态这一方面，只是基本结束，不是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一个尾巴也掉得很长的，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一家是无产阶级，我说不是“百家争鸣”，而是两家争鸣，这百家里头有两家，一家是资产阶级，这个争鸣是要争几十年的。

所以现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面来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那个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才讲的，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里面的，我们是把它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他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不把他当做一个国民党特务那样的一个问题来处理。资本家！呀你们这里苗海南呀，我们把苗海南跟蒋介石区别，跟特务区别，我们说他不是特务，也不是蒋介石，他就是苗海南。我们跟他合作，这一来，他说可以，他说愿意跟我们合作，咱们两个人就好办事，我们也愿意了，你们也愿意。前面刚才谈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样的方针，在我们党里头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不甚了解。有一些同志就是不大赞成这样的方针，究竟在座的同志赞成不赞成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刚刚来，平时我们又不在一起工作。我在别的地方看的时候，比如北京，许多高级的同志，部长，我说十个人里头可能有一人赞成，一个人想通了，真正其他九个有些相当赞成，但是不那么十分赞成，各种程度不同。至于什么厅、局长，什么科长，这样几级的同志，开头是表示怀疑的多，什么“百花齐放”，放那么多花，（笑声）百家争鸣，那个是危险得很，咱们共产党就是一家，其他九十九家把我们包围起来怎么得了，（笑声）要请解放军帮忙，杀开一条出路，杀出一条血路，才跑的出去哩。长期共存也是不赞成，那个民主党派大概有个什么七八年也就差不多了嘛，让他挖一个坑埋下去嘛，究竟谁监督谁，还要请他监督共产党呀！你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呀？这些同志，你说他没有道理？民主党派有什么权利监督共产党？究竟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还是工人阶级、农民打来的，共产党领导他们，还是你们民主党派打来的？所以听他们的话是有不少道理的。但是还是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比较好。那有什么道理有什么理由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种方法，也是一条方针。它是一种使得文学艺术，使得科学能够繁荣起来的一种方法。不管你多少花，你就得开嘛，那么其中有好看的花，有不好看的花，有很丑的花，有毒草都可以开。那么毒草开出来怎么得了呢？世界上是有毒草的，人怎么样呢？是不是碰了毒草就死了？这样就有比较，有比较好办，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是很复杂的。各种的花都可以开（各种的艺术）。人们就说，是否这样一来鬼就出来了，牛鬼蛇神就跑到戏台上来了。你们这些地方戏演得怎样？有没有牛鬼蛇神？别的地方就有，特别是上海，曾经不演许多的落后的东西，在戏台上打屁股，演包公的时候一定要在戏台上打屁股，现在我们不是讲废止肉刑吗？但是我们的包公仍然在台上要打屁股的。这些东西慢慢地会要淘汰的了。现在让他演一演可以不可以呢？让他演一下我看也可以。这些东西多了，人们就会说话，说话的多了，看戏的人就少了，它那个东西就不演了。过去我们生硬地禁止一下，以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他们演那些戏，就不如让他们互相竞争，“百花齐放”这样的办法比较好。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就是说：我们党就是因为功劳太大的原因，工人、农民的政党，我们党主要成分是工人同贫农的党，按他们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为在中国威望很大，这个威望太大，就发生一个危险，容易包办代替，以简单的行政命令，反正是人多嘛，社会上的威望也大嘛，所以我们特为请那么几位来监督我们，并且长期共存，我们有一

天，他们也有一天。我们就不必说，我们假使共产党有一百年，只准他们五十年，共产党还有五十年，只准他有二十四年。总而言之是要他们先死，先死几十年就是了，有没有那样的必要？它早死了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是不是呢？粮食就多了？（笑声）钢铁就多了？木材就多了？水泥就多了？礼堂就砌得更好了？并不见得。民主党派灭亡了，我们礼堂砌得更好了！不能证明这个道理。就是有一些民主党派跟我们唱对台戏比较好，就是说怪话，一年有那么几次找一些怪话来说，专门指出我们的缺点，这么一个道理。所以现在不是收起来，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把它压下去，而是不要压。思想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和压服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我们应该大家展开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互相争辩，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是用压服的方法。两个方法采取那一种？一个是压服，一个是说服。这个压服的方法是对付敌人的方法。我们打过仗的都知道，从井冈山那时候就打起嘛！什么大别山、什么各地方，对付敌人只能用这个方法。对付美国人在北朝鲜，就是抗美援朝，用压服的方法。对付反革命、特务用什么方法？我们就是压服它嘛，以后再来说服，先把它搞出来。压服这个办法是对付敌人的，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就是动手，人民内部就不是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笑声）人民内部就是讲道理，就不讲打，武力解决就不是个办法。或者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迫禁止，实际上是把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用武力，实际上是它在这边我们用强迫命令，如果没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令也就不行的。谁听你这个行政命令？还是借他们的声势来搞行政命令，我们后面有个解放军，几百万，还有那个老百姓，我们有了基本群众，就是工人、农民。第一我们有基本群众，第二我们有武装力量，所以那些民主人士吃不开也就是这个道理，他们没有这两个东西，一没有基本群众，二没有武装力量。如果我们采取了开放的方法，而不是把它收拢来，采取说服的方法，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兴盛起来。因为现在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采取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人民内部，不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人民，要把这两个东西分开。专政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讲无产阶级专政吗？专政是对付敌人的，而民主就是对付人民的。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是种民主的关系。当然民主要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讲不要领导。现在有些地方纪律松弛，缺乏纪律，这就有些过分。要克服这个问题，要用说服的方法，同他们好好的讲，开会，一次开不清楚开两次、三次会。跟学生们、工人们、农民们能不能说服呢？我们是能说服的。只要我们有理，就是用说理的方法，讲理的方法。如果我们搞错了，把专政的范围扩大到人民内部，用压服的方法，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时候就用压服这么个办法，那么我们国家就要受到损失，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压服不了的时候。君子动口不动手，你要动手，总有一天这个手要收回来的。因为这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那是解决敌我斗争的办法。

是不是可怕？人民内部的矛盾发展起来了，又不要压服，不要行政命令，这样一来，是不是很危险？由我看，没有什么危险。不同的意见只会因为辩论、民主的讨论而正确地解决，得出真理，艺术方面会更活泼，会发扬创造性，文学艺术，科学方面会发展起来。这种功效不是一年、两年看得出来的，或者几十年内，十几年到几十年内看得出他的效力来的。这里就要准备着真正的坏人坏意见，就是讲：艺术方面有毒草，有毒的草，很不好看的花开出来了，开出来怎么办？我们说那东西也有用处，因为让世人看一看有这样的草，有这样的花。一个人硬是每天只都是看见好的不看见坏的，真理是跟错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

不让错误的意见说出来，我们就不知道他的意见。这个美是跟丑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好人是跟坏人作斗争发展起来的。一万年以后都有真理跟错误，都有美跟丑，都有好人跟坏人。有一些坏人，他是坏人，是不好，但是，又是好人的先生。有了坏人，人们就有了榜样了，就不学他们的坏了。有好人就学好人，单有坏人没有坏人比较，人们分不清楚好坏。几岁的小孩子看戏的时候，他首先要问好人坏人，（笑声）所以不怕那个坏人，什么错误的道理那些东西，用不着怕。这样我们党跟政府的错误也比较容易克服。相反呢，倒不好的，倒是很可怕的，就是用压的办法。

我们党习惯了对敌斗争，我们党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我们会搞这一套，结果证明我们是会搞的，是我们胜利了，几十年嘛！所以人们也佩服我们这一套。觉得共产党有什么行呢？你们政治不错，军事也可以。我们有这两条人家佩服的。那么，是不是一开始就佩服呢？那就不见得。我们刚成立党的那个时候谁也不佩服我们，我们那个时候提出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军阀，人们只是听了一下，根本不理。后头又犯了错误，搞万里长征，稀稀拉拉剩下几个大人，我们那时候提出打倒帝国主义那一套，人们也是不大理。以后就搞出名堂来了，到一九四八年那个时候，社会上许多人就变了。共产党似乎兴起来了，共产党就了不起了。特别是到了一九四九年胜负分明了，那就佩服的更多了。但是，同志们，建设人家不佩服，共产党能够搞建设呀？人家还要看一看，看来是行的，这些人就会搞那么几手，有那么一股蛮劲。（笑声）谁佩服我们会搞建设啊！现在在建设问题上慢慢立起了一些信任，看你这个样子搞了六、七年也还有一点本领。但是讲到科学那是另外一回事，物理、化学、数学之类，他说你们不行，还是我们来。这个东西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你们在座的都是科学家，是不是？（笑声）我们党科学家不多，其原因就是科学家不多，大学教授不多，工程师不多，各种艺术家有一点也少，就是这些方面不行。大学校长是党外人士当的多，山东大学什么人当校长？（问下面，回答：晁哲甫），晁哲甫是党内党外的？（问下面，回答：是党内的）党内大学校长还是要听党外人士的话。你没有教授，（笑声）有些当了付校长，人家党外人士不佩服。我们的党员就是学生、助教多，讲师里面有一点也少，教授里头很少。那么究竟是学生领导先生，还是先生领导学生呢？是助教领导教授，还是教授领导助教呢？所以这个问题发生得很自然。我说这个道理是有，他们讲得对，共产党就是不行，就是在教授、科学家、工程师这方面我们人很少，甚至没有。还有许多文学艺术这一方面。什么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忙坏了，我们干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忙于搞阶级斗争，没有机会搞这个。过去你这个东西要有个地盘嘛，过去济南这些地方人家不许我们来嘛，什么山东大学、齐鲁大学他不许我们来嘛，来都不许来嘛。北京我是住过的，三十一年我是不能来的，就是不能进城，进了城他就要请我到班房里面去，（笑声）所以我们承认这些，但是可以不可以学会呢？阶级斗争我们学了二十四年，到了七大，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五年，二十四年才作总结，我们才基本上学会了这个东西。犯过许多错误，又加上七大以来的这么多年。那么，我们搞建设、搞科学、学当教授、医院里面当医生、开方，是不是可以学会呢？比阶级斗争哪样困难些呢？阶级斗争那个东西我看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你一打它就跑了。（笑声）这个开刀好开，那个病人他不能跑的。（笑声）自然科学，五年大学毕业，再干五年就是十年，再干五年就是十五年，他不变成工程师呀！这些人他不能当大学教授呀？可以当的，有个十年到十五年可以学会的。现在设计、施工、安装我

们已经学会相当大的一部分了，管工厂也相当学会一些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呢？就要转入到学这些，搞建设。所以整个社会与自然作斗争，所以六亿人口与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可以学会的。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批评是好的，没有批评，压制批评就不好。斯大林就是犯这个错误。斯大林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他做了一些坏事，他混合这两者，拿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人民，人民内部的矛盾，说不得政府的坏话，说不得共产党的坏话，一说坏话，风吹草动，就说你是特务，把你抓起来。所以现在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示威游行、请愿。但是我们要反对官僚主义，要克服官僚主义，那什么罢工、罢课这些东西就会少的，但是怎样也要有。那怎么办？有就用对付人民内部的方法来对付。那么还要不要解放军？那么就把他解散，是不是？那行不行？“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准备对付帝国主义，解放军是用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不是为了对付人民的。解放军就是人民的儿子，那么人民的儿子对付人民父亲啊？（笑声）你总不能讲吧！人民的儿子对付人民啦！人民打人民啦！那不行。解放军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是专政的武器。我们要跟国民党有区别，什么人比较怕批评，还是共产党怕批评还是国民党怕批评？我看就是国民党，他那个党最怕批评了，什么“百花齐放”这类东西，他们怕得很，只有我们敢提出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我们说要跟他们共存几年他都不干。那个时候他们开一个什么国民党参政会，我也是个参政员，共产党有几个参政员，我们是以什么资格呢？不是以共产党的代表，而叫做社会贤达，（笑声）好听就是了，又贤又达了。（笑声）他不承认我们是共产党的代表。你还说长期共存，短期共存他都不干。（笑声）所以这样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只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比较大公无私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使全人类解放，要使整个人类解放，它自己才能解放。共产党是应当最不怕批评的，我们是批不倒的，风吹不倒的。十二级台风我们都不怕，十二级台风可以把一个大礼堂吹走，可以把这么大的（手势约二尺直径）树吹走，但是要吹走共产党，人民政府，马克思主义，老干部，我看是吹不走的，吹不倒的，（笑声）十二级台风都吹不倒，何况是什么五、六级，六、七级。你们到过青岛没有？我没有去过，我想去一下，我到过北戴河，七级风在海里游泳很舒服，平时没有风浪很吃力，要一步一步地爬，起台风一个浪头就有一两个人高。十二级台风我没见过。批评不倒我们的，批评不倒共产党，工人阶级、农民是批评不倒的。因为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手里掌握着真理，比较任何阶级我们的道理是更正确的。我们有工人、农民、基本群众，有工人、农民基本群众作基础，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怎么能批倒呢？马克思主义怎么能一批评就倒了呢？吹了一口小气就倒了，那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大概是不要台风，这么招一下手就要倒的。（笑声）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那一套东西吹倒一点我看也好吗，那套东西是要吹倒嘛，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这些东西吹掉一些。

刚才舒同同志提到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讲优越性尽是优越性，缺点一点都没有。一讲没有优越性就一点好处也没有。这是两种片面性。我们党内存在着，党外也存在着。两种制度作斗争，那一个胜那一个败，就是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谁胜谁败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你们看，分了胜负没有呢？按照我们八次大会所说的，应该说基本上是分了胜负的。谁胜谁负，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胜利了，基本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就没有。作为社会制度，这两个制度的竞

爭，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但是还没有最后胜利，还没有巩固，还要看，人们还要看，资本家要看，农民还要看，资产阶级要看，小资产阶级农民要看，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还要看，我们共产党里头有一部分人也还要看。两种制度作斗争谁胜谁负，那个胜那个败，基本上可以说胜利了，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有两、三个五年计划。合作社至少要有五年才可以巩固，现在一般的合作社才只有一年多一点的历史。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这样两种思想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谁负谁胜那么就更要差一点的。所以现在相当乱呀，思想方面，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思想还是相当顽固的保守着。特别是关于世界观这一方面，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还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那么这个时期还要更长些。

现在我们全国有多少知识分子呢？大概有五百万这样一个数目，其中学校里头：大学、中学、小学就有二百万人。此外，党的系统，政府的系统，军队的系统里的知识分子，经济系统，商业系统，工业系统里面的知识分子，文学方面的，艺术方面的知识分子，合起来有人说有五百万这样多。其中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只占少数。我们国家是文化落后的国家，但是五百万人也就不少了。因此，我们要好好利用知识分子的队伍。这批知识分子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过资产阶级学校，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过资产阶级学校，受过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至于本人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后来的事。我想在座许多同志们中间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么一种情形。你母亲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交付你一个任务：要当共产党，要信马克思主义。我也有这样的经验，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他并没有讲这一句话的，（笑声）他就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有共产党。这是因为后头社会斗争逼上梁山，我那个梁山叫井冈山。你们各有各的梁山。这个梁山就在你们山东。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是少数，大概百分之十左右，五百万里头大概有五十万左右，也许多一点，这是讲真正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另外总有百分之几是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跟我们采取敌对的态度，但他们不是特务。这一些人是民主人士，但是他心怀不满，根本反对我们，有没有呢？我看是有的，这也是少数。中间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中间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寥寥，叫他下乡没有兴趣，到工厂里面看看，蹓一蹓就回来了。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们打成两片。我们说打成一片。他们说打成两片好，搞不成一片，就因为感情不融洽，知识分子跟劳动人民感情不融洽，隔那么一层。这些人世界观没有改，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这个思想的乱，就是这样。他们为什么思想乱呢？他们动摇着，墙上的草，风吹两边倒，不风吹就站在那里，一风吹就倒，匈牙利一股风，苏联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一股风，还有什么地方一股风。世界上总是要刮风的嘛。他们可以倒过去，也可以倒过来。又很骄傲，那个尾巴翘得相当高，他认为他是知识分子，相当了不起。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值钱的。所以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真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他们，这些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的范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叫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可以，你叫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愿意，但是基本范畴还是资产阶级范畴。这个时期大概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过了几年了），大概还要经过十几年，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要争取他们。要知道现在教书的是谁？就是他们。他们都是教员，他们办报纸，他

们在学校里头教书；他是我们经济机关设计、办各种事情的人，他们是工程师，我们是一天也离不开他们。在座的同志们，你们里面也有知识分子，但是你们里面的知识分子比较少，你们如果说，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离开他们，那就不行，我们离不开他们，没有人教书，大学、中学、小学里头有二百万人工作，教书，有各种报纸，有文学，有艺术。山东唱武生的，山东大鼓，那不算知识分子吧，但梅兰芳要算，梅兰芳是知识分子。你们有个山东梅兰芳（叫什么名字，你们山东人，不知道山东梅兰芳吗？）

我再来讲一讲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工人阶级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地争取了一批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马克思就是这样争取过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替工人阶级服务。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现在有一批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刚才不是讲过了，五百万中百分之十左右，就是五十万左右，这是知识分子里面的核心力量。

各种阶级，哪一个阶级有前途呢？只有工人阶级有前途。我们现在有多少工人阶级呢？革命以前，解放以前只有几百万人，这几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人。现在在工厂里头工作的产业工人有一千二百万人，六亿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万人，就是五十分之一多一点，五十人里头只有一个工人，人数这样少，但只有他有前途。其它的阶级都是过渡阶级，就是走路，走路走到那里，走到他那个地方去。比如农民，农民将来要机械化变成农业工人，集体化，集体化将来进到社会主义，就要变成国有化，全民所有制。现在的农业合作社所有制，将来几十年之后，要改成跟工厂一样，就是农业工厂，这个工厂里头种包谷、种小米、种大米、种番薯、种花生、大豆，资产阶级这大家都知道的，资产阶级现在正在过渡，他们也要变成工人。几亿人口的农民，手工业工人现在已经变成集体农民，将来变成国有制的农民，农业工人，使用机器，现在除了个少数人以外，这五百万人知识分子里头，其他的知识分子，虽然是动摇的，在世界观问题上，在思想问题上。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问题上也赞成，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一般地说，除了少数人他们拥护，他们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那么好吗。工人阶级已经把他们争取，经过中国共产党把知识分子争取到自己一边，跟我们合作了，但是这个合作，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件事，世界观、灵魂世界又是一件事。要他们换掉世界观，改成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就要有一个时间。

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变，或者还没有大变，小变了一些，我刚才所讲的，他们和劳动人民有些格格不入，没有打成一片。文学艺术家不愿下厂下乡，下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了，他的注意力不在那里，他们对农民的兴趣不大，对工人的兴趣不大。他们愿意回到家里面和知识分子搞到一块，我叫这些人是半条心。有半条心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半条心是好的，因为有半条心啦，剩下那半条心可以慢慢来嘛，那半条心还是资产阶级的王国，资产阶级思想。我跟这些知识分子一讲，他们就会跳起来，“你说老子半条心啦！”我说我就这样讲，你跳到屋顶上去，我还是这样讲，（笑声）因为你还是这样动动摇摇的，你们是愿意为工人阶级服务，但你不是全心全意，是半心半意。有什么证明？就是你们跟工人、农民打成两片，不是打成一片。你们在工人、农民里面没有朋友，你们的朋友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跟知识分子交朋友，就不如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但是他们不干，你把他赶也赶不下去，赶下去没有几天就回来了。但是工人阶级要求知识分子全

心全意为他自己服务，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要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而来一个改变，丢掉资产阶级世界观。我在报纸上讲：要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一个破一个立嘛，它那个东西不破，这个东西不能立的。于是乎就发生了一个任务要破，破嘛有点痛，那你资本家现在都提出来嘛。资本家里头有大批知识分子，我们要使用他们，工人阶级要求大量知识分子，心全意为他自己服务，不是百分之百。应该是大多数，相信马克思主义，跟我们有共同利益，我们现在有共同利益。他们听到合作社办得不好就高兴，合作社倒霉他们就舒服，共产党出了乱子他们就开心，有这样一小部分人。但是，多数人他们还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吊在半天上，还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

我们党现在提出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我们先要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中央准备今年开一次会，现在还没有决定，今天我也可以稍微讲一下：我们多少年没有做整风这个工作了，“三反”“五反”很激烈，那个东西没有在思想上面解决问题，准备进行一次整风，这样我们就估计可以争取共产党的作风整好了，可以争取广大的党外人士。谈到这个民主人士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合作还是不合作。这个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跟我们合作不合作的问题，而是我们跟他们合作不合作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合作是好讲，我们跟你们合作，民主人士，苗海南，但是就是使用不使用的的问题。有些人讲，他们没有多少用处，甚至讲是废物，废物也可以利用嘛，废物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我今天不能具体讲苗海南是废物，苗海南大概是一个很有用的人。就是有些用处不多的人，也可以利用，有些人起了一个名字叫废物，废物也可以利用。一开会不是应付了一下，无非是每年开那么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应付一下，过了关就没有事了，大概一年有那么一、二个礼拜吧。这种态度是消极态度，我说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这些民主人士大体上都是党外知识分子，这一些人是老知识分子，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

这批人现在大学生有多少是工人农民出身的呢？全国的统计有百分之二十，一百个大学生里面只有二十个是工人农民出身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中学生就不大清楚了，大概是四、六开，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有百分之六十，工人农民出身的有百分之四十，或者是一半一半。你们有这个统计没有？我在这方面没有统计，中学生升了高中恐怕还是他们的人多，还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多，什么年间大学生百分之百是工人农民出身，高中生百分之百是工人农民出身，至少要过三个五年计划以后，至少还要过十一、二年，这个情况才能起根本变化，也许时间还要长一些，再有两个五年计划还不够，也许还要三个五年计划。他那个种是要绝的，那是没有问题的，他是个绝根问题。这个资产阶级还有什么种呢？地主阶级还有什么种呢？他就没有种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绝种嘛，就是以后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了，没有地主封建制度了，以后一万年都是工人、农民的制度，就是都是工农子弟。

最有前途的是无产阶级，现在这个时候青黄不接，同志们要知道，我们一步也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没有人教书，没有人当工程师，没有人研究科学，大学教授，中学、小学教员，大都是他们，文学家，艺术家，大都也是他们，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我们一步也不能动。所以应该好好跟他们团结。几个五年计划才能起变化。那个时候他们也变了，资本家变成工人了，地主变成农民了，他们的子弟也变了，现在正在变。

整风是用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跟人民之间矛盾的一种方法。

整顿三风，整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行主义。此外，还有一些问题也附带在里头整，比如贪污的问题，政治机关里面有贪污，特别是基层，合作社、厂矿里头的贪污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精神减少，革命意志衰退这个问题。闹地位，闹名誉，争名夺利，这个东西多起来了。过去那个拚命的精神，过去阶级斗争的时候，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那种拚命的精神现在有些同志身上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评级评低了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茶碗里头的水叫茶。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用手形容全坊笑声）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一滴眼泪也不出，一接触到个人利益双泪就长流。（笑声）据说还有几天不吃饭的，据说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三天不吃饭，我们说三天不吃饭也没有什么关系，一个礼拜不吃饭有点危险就是了。（笑声）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衣服，比较享受，这样一些事情出来了。这也算人民内部的矛盾。双泪长流，为个人利益而绝食而流泪。有一个戏，叫《林冲夜奔》，上面说：“男儿有泪不轻洒，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请看：男儿有泪不轻洒，只因未碰到评级这个机会。同志们，这个风你也要整一下吧，我们大家回去劝他一下，男儿有泪不轻洒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伤心处呢？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洒几滴泪，至于你那个几级几级，就是评得不对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流，往里头流，（笑声）要吞下去。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实际上是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是革命同志嘛，要奋斗，一万年也要奋斗，有共产党要奋斗，没有共产党那时消灭了，那时总要有领导者，总有一批管理工作人员，他们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总之，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是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替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振作起来。今年准备，今年是准备阶段，出告示，说要整风了，各地可以试整。有些贪污分子，他今年就要赶快收手。本来要抓到一些东西的，现在我赶紧放到这里，那么我们就不能算贪污犯了。明年正式整的时候，你今年把他吐出去了，今年不贪污了，或者贪污了的怎么吐出去。那么已经吃下去了，消化了，变成屎了怎么办呢？变成屎了看其情况分期吐出。那个农民，合作社里面不吐可是不行，有什么三十块，就是大问题，那么你就分三期吐，今年吐十块，明年吐十块，后年吐十块，今年吐好了的，整好了的，明年就不算贪污犯了。所以今年出告示呀！官行主义整好了，跟人民的关系，跟下级的关系，当个厅长也好不容易啊！厅长底下有好多的人，平时不是不大管的，等到你一整风的时候，那些人就会说话的，你们在座总有厅长，局长，科长嘛，是不是扔一个炸弹就要整风了呀！我看不！我看不应这样做了，改一下就是嘛，我们的缺点，人民内部的缺点，不用大民主，不搞大运动，那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我们是搞小民主，如果一个小还要少，再加一个小字，就是小小民主。总而言之，是和风细雨，台风一定不刮，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微风吹个不停。（笑声）我们来吹他二年。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行主义什么东西吹掉，主观主义吹掉。我们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讲完了，同志们。

在上海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刚才柯庆施谈到，现在是一个转变时期，过去我们是长期从事革命战争，从事阶级斗争。而这个斗争，在国内来说，现在基本上结束了。阶级敌人的统治已经被推翻，社会制度的改革已经基本上代替了过去的旧制度。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报告和大会决议都说到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应该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做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去年四月省市书记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讲到一条敌我问题，一条是非问题。在那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到了去年上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确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方法对待新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这个问题，列宁曾经说过，他认为矛盾是存在的。但是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在斯大林的后期，人们说不得坏话，批评不得党，批评不得政府。斯大林实际上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把说坏话的，说闲话的当做敌人，所以就冤枉了許多人。斯大林在一九五二年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也说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还有矛盾的。并且解决得不好，矛盾也会转化成为对抗。虽然如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斯大林还是说得很少。我以为我们今天应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做出适当的结论，比较好。

比如说人民闹事这样的问题。这当然不会是普遍的，只是一些个别的，但是会经常有，因为官厅主义这个东西总会存在，我们要整风，要解决官厅主义问题。凡是出了官厅主义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民就可能闹事。闹出了事，我们怎么看？应该看成是普遍的事情，不应大惊小怪。应该看到，这是在特殊情况下调整社会秩序的方法，如果按照正确的方法，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直到群众一闹，才解决了，那么，群众为什么不闹呢？当然我们不是要去提倡闹。不闹而解决问题，经过民主集中制、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的主张。实行这个主张，就需要反对官厅主义。如果有某一个单位的领导者，官厅主义十分严重、十分顽固，群众不可去提意见，而上级又没有及时发现、纠正，把

那个领导撤掉，那么，那里的群众就会闹。在这样特殊情况下，闹一点事有什么要紧呢？无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我们党内都有不同的观点；有右有“左”，在敌我矛盾的问题上，右的观点就是看不见敌人。现在不是说国内的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吗？有些人，就把基本解决看成完全解决，因此他们对那些人民痛恨的很坏的人，真正的特务，真正的坏人，也不去处理，这一种思想然当不对。夸大了也不对，夸大了是“左”的观点。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有些人却说还没有，说阶级矛盾很大。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些人忽视了这个事实，以为太平无事。我们共产党就是代表人民跟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的，后来又跟资产阶级作斗争，人民怎么会回过头来反对我们呢？过去没有设想过人民会有不满意，没有设想过群众会对我们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现在也还是不大相信。这是一种情绪。另外一种情绪，就是怕。出了一点乱子就是不得了，天下就要大乱，人民政府就要倒了，就算起了龙卷风，我们共产党会不会吹走呢？人民政府会不会吹走呢？马克思列宁主义会不会吹走呢？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不会的。所以没有什么可怕。不如此如果在客观上真有事非闹不可的形势，让闹反而比压着不让闹好些。这样一种看法，同志们考虑考虑，是否比较妥当一点，这是一个问题。

其次，我想谈一下知识分子问题。全国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其中大约有十分之一多一点加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大约有百分之几。这两部分人合起来，据有的同志估计，大概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十七。在另一方面，也有少数跟我们有敌对情绪的人。他们并不是反革命分子，而且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跟我们还能合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是怀疑的。这样一种人大概有百分之几。其余百分之七、八十是中间状态的。他们了解一点马列主义，但是了解不多；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也容易动摇；至于接受马列主义世界观，就还有困难。他们常说：“你们我们”，不是把我们的党当作他们的党，象多数工人贫下中农那样。从他们跟工人农民的关系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世界观还不是马列主义的，他们到工厂里头、农村里头去看的时候，跟工人、农民不能打成一片。看是看了，但是有距离，互相不能成为朋友，不能谈知心话，也还是“你们他们”的关系。他们也在为人民服务，但是还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跟工人农民不是一条心，但也不是两条心，而只有半条心在人民方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各个世界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方面，在跟工人、农民结合方面，前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进了党或者成为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来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现在似乎还是一个问题，这也是知识分子新的人生观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我们要向他们说明 在我们国家里，除了工人农民就没有别的人了。资本家要变工人，地主已在农民。除了这两种人。第三种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替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的本身性质在变，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你们还能提个地主方向 资产阶级方向，帝国主义方向？那些力量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丧失了社会基础。至于几亿小资产阶级分子也已经进入了集体化，现在还叫小资产阶级就不行，他们已经变成集体农民，集体手工业者了。

当然他们的思想还拖了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特别是那些富裕中农和上中农，他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很严重。现在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思想。但是无论如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现在都只剩了一条尾巴，尾巴无论有多长，终究是要消灭的。因此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要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那么长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现在还流行着一种舆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他们这个话有没有理由？我们说有一半理由。在现在，党员工程师、教授、医生和其他高级技术人员确实很少，一般地说来，我们现在还确实不懂科学。我们的人不但没有时间也没有钱进大学，到外国去留学。还有，帝国主义国民党也不让我们留在城市里研究科学。许多知识分子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搞政治可以，军事也行。其实，这也只是现在的话。在以前我们没有胜利的时间，在我们打游击战争的时候，他们可不这么说，他们那时认为我们什么都不行。总之是成不了气候。人民是要看事实的，因此在我们在科学上还没有占领领导地位的时候，要他们承认我们可以领导科学，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的道理也只是一半对，另一半他们就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显然不懂科学。但是我们还是在用国家计划领导着科学事业，用政治领导着科学事业。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发展了，科学也发展了，这不是事实呢？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如果不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工作，又是在谁的领导下工作呢？而且，科学也是跟政治、经济一样，是可以学习的。我们既然可以学会政治和军事，也可以学习科学。如果说我们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经过了二十八年才取得了胜利，那么学习科学达到一般专家的水平，就不必用这么长时间。进五年大学，再加十年工作，有十五年的工夫就差不多了。

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技术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要在党内做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吗？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放”，主张“收”。这些想法对不对呢？

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发展科学事业，是一个基本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在目前的过渡时期，对于团结教育知识分子，这个方针更有特殊的意义。这就是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的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对于说错了的怎么办？用压服的方法，还是用说服的方法？中央认为压服的方法不好，压服就是压而不服，不可能压服。人民内部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不应该采取压的方法，无产阶级实行的专政，只适用敌对分子。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界限。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说道理，是可以学会的。用了说服的方法人家还要闹怎么办？会不会搞的天下大乱？我说不会，只要我们坚持说理、充分说理，不会乱的。而且

也不要尽是怕乱，出一些小乱子有好处，我们可以取得经验。对于那些有毒素的文章，或者别的有毒素的东西，我们要批判、要斗争，但是用不着怕。我们同那些有毒素的东西作斗争，会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同敌对思想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

我们要同敌对思想作斗争，我们自己的缺点首先要整顿。我们有很大的成绩，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也有许多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的。不应该肯定我们所做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最主要的，正确的东西。同时也绝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一部分错误和缺点。否定一切就是机会主义者，肯定一切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也是形而上学，它肯定一切而不加分析。如果把我们的工作加以分析，就会知道，我们的工作中间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有缺点，所以，我们要进行整风。

关于整风，中央还没有作出正式的决定。准备这样做：今年准备，明年、后年实行。采用延安那时候的方法，从容不迫地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来学习一次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作风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缺点，用适当的方法加以批评。批评是在小组内，不开大会，有多少毛病就是多少毛病。不要缩小也不要扩大，自己反省反省，同志们加以帮助。总之，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用这样的态度来进行整风，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从延安整风以后，实际上有十几年没有进行全党范围的有系统的思想整风了。这次整风的结果，估计会使我们党得到相当大的进步。我们自己来批评我们自己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丧失威信？我看不会丧失威信，会增加威信。延安那次整风就是证明。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得到了教育。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害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挽救了自己。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在我们方面。我们把风整好了，我们在工作中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东西就更多，我们的本事就更多。同时也就会更谦虚一些，原来不会说服人的就会慢慢的增加说服人的能力。党外人士，可以让他们自愿参加。我们先整，他们后整。如果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知识分子参加整风就很好了。

整风的任务之一，就是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的革命的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的热情有些不足。注意待遇，注意享受的人多起来了，要经过整风使这些同志重新振奋起来。经过这么长久革命斗争，有一点疲劳，需要一些休息，这是可以理解的。看一点戏，跳一点舞，穿一点花衣服，这并不需要反对。我们所反对的是追求地位，追求特权，铺张浪费，脱离群众。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凡是节省的都要节省。阶级斗争，几十年革命，都是为建设开辟道路。而要建设，就必须珍惜人力、物力。建设的时间长得多，这是另外一场战争，我们希望在不久的时间之内，中国比现在要好，比现在要富，比现在要强。革命就是为了这个目标，那一仗就是为了这一仗，那个战争就是为了这个战争。这个战争更艰苦，时间更长，比方说至少一万年。为了建设得更好更快，就必须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铺张浪费，追求特权、摆架子等一切坏习气。

跟党外的关系，应该比过去更进一步，这也是整风的任务之一。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

必要的，沒有区别是不好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

我们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会不会妨碍党的领导？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里头有这样几句话：“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而决不能象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我刚才讲的一些话，说是闹一点也可以，登一点错误的文章也可以。我们慢慢来批评教育，讲道理。这两种提法是不是互相冲突？文章上讲的原则性，我们现在说的是属于灵活性。要灵活地运用原则。不然，一个地方罢工了工，我们就去嚷：“嗨，你破坏党的领导！”知识分子批评了我们，我们就责问他：“你要涣散无产阶级的队伍吗？你要破坏党的领导，破坏民主集中制吗？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吗？”到处拿这篇文章做挡箭牌。这行不行呢？这就不行。我们在原则上不提倡罢工罢课，不提倡错误的文章，不提倡有毒素的戏等等，但是事实上发生了一些个别的罢工罢课，报纸上登了一些个别错误的文章，戏台上演了一些个别不好的戏，对于这些现象采取放的方针，采取说服教育的方针，沒有大害，反倒有利；采取压的方针，反倒不利。这样的方针比较容易调整社会秩序，调整领导者跟被领导者，政府跟人民，党跟人民的关系。这种调整的结果，正是巩固了党，巩固了民主集中制。

我们希望把我们国家造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提，不要使人不敢说。我们这些人有错误缺点必须改，不改就不行，因为没有道理，无论党政府（原稿不清）都不实行官行主义，不能强制人们做那些沒有道理的事。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政治、经济，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地繁荣发展起来。

在南京部隊、江苏、安徽二省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现在这个时期，有些问题需要答复，就游说到你们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叫南京，从前也来过。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蟠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二十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各地方的问题都差不多，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过去的一种斗争——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基本上完毕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对官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也是阶级斗争；后来呢？我们又搞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它的性质也是阶级斗争的性质。

那么，合作化是不是阶级斗争呢？合作化当然不是一个阶级向一个阶级作斗争。但是合

作化是由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由个体的制度过渡到集体的制度。个体生产，它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它是资本主义的地盘。资本主义发生在那个地方，而且经常发生着。合作化就把资本主义发生的地盘，发生的根据地去掉了。

所以从总的来说，过去我们几十年就干了个阶级斗争，改变了一个上层建筑，旧的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我们把它打倒了，建立了人民政府，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社会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我们的社会面貌改变了。你看，我们这个会场的人，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从前，我们这些人，这个地方是不能来的，那一个大城市都不许我们去的。这样看来是改变了，而且改变了好几年了，这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改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在最近几年了，现在也可以说是基本上成功了。这是过去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干了个阶级斗争。

同志们，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跟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改变另外事开辟道路。现在，遇到了新的问题。过去那个斗争，就我们国内来说，现在基本上完结了，就国际上来说，还没有完结。为什么我们还要解放军呢？主要是为了对付外国帝国主义，恐怕帝国主义要来侵略，它是不怀好心的，国内也还有少数没有查出来的反革命残余分子，有一些过去被镇压过的，比如象地主阶级、国民党残余，如果我们没有解放军，它又会起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现在守规矩了，资本家还不同些，我们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处理。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跟农民接受合作化不同，他们可以说是一种半强迫，就是说有些勉强，而且是在对他们相当有利的条件下接受改造的，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向自然界作斗争。要改善生活，要搞建设，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

关于思想工作

我们这个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有机器，就要有科学，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用手工，用手使用的工具来做桌椅板凳。用手去种粮食种棉花的，一切都是用手，现在要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这种情况的变化，我想大家也就懂得了，也就意识到了。但是，似乎还有一些人不大清楚，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现在发生一些新的问题，科学技术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人民中间向我们提出一些要求，发生一些人民闹事。这些问题在什么地方？临时工、农村的困难户，学生方面，合作化方面，都发生新的问题。有一小部分工人发生罢工，有一小部分学生发生罢课，或者游行示威，请愿，复员军人也有想闹事的，也有一部分合作社社员，富裕中农，人数不多，但是他们不满意，要脱离合作社，还有些别的事情，他们不满意，向我们闹。

怎么办？人民闹事怎么处理？我们就有必要讲清楚这个问题。

矛盾应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叫做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类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过去几十年就解决了第一个矛盾，现在要解决第二个矛盾。这里面表现在各方面，比如现

在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这也是矛盾。

我们技术不够，没有机器，没有文化，生活不好。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不是讲社会主义已经成功了吗？去年共产党开了大会，说社会主义基本上完成了大概就要过好日子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它作为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我们建立了一种关系，跟过去的关系不同，人民进行生产，过去是资本家和工人的那么一种关系，地主和农民的那么一种关系；现在，我们建立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用这样的一种相互关系去进行生产，也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来进行生产。因为过去旧的方法不适宜，不利于生产，不利于发展，比较差些，弄得中国人民长期地又穷又是文盲，在世界上是人们看不起的。现在这种关系刚改变，还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是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是没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我就不能享福了。那当然不要那么长，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为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象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一百年，是很短的时间，就是搞一万年，人总要生活下去的。

刚刚革命，刚刚搞社会主义，这个生活怎么会好起来？粮食怎么会多起来？粮食多了没有呢？是多了，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年，我们只有二千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我们就有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一九四九年没有粮食，现在还是没有粮食，还是不够。要过好生活，现在我们搞出十二年的生产计划，科学计划，农业计划，工业计划，一步一步来工作、生产。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这个问题容易懂，青年人可不容易懂，好象他一到了世界上，样样要象个样子，因此要向他们进行教育，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特别是对青年进行教育，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

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我们祖宗给我们很少。我们的祖宗是谁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蒋介石，它是我们上一辈子，我们上一个政府。他们给我们的就是把人民身上的肉刮去了，但是，他们走了，也就好了。他们走了，空出一块地方来。我们这块地方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东边从海边起，西边到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北边到黑龙江，南边到海南岛，就是这么一块地方，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它个几十年。长期不说，干它个五十年。……。

要分清两类矛盾，第一类敌我矛盾不能和第二类人民内部的矛盾混淆在一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矛盾的，是存在着矛盾的。这一点列宁曾经指示过，他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的，斯大林在开头，在列宁死了以后的一个时期，苏联的内部生活，还是比较生动活泼的，跟我们现在差不多。也有各党各派，也有一些比如托洛茨基那么样出名的人物，他有很多人，不过他大概是共产党内部的民主人士，而且是调皮角色，跟我们闹。此外，还有一些人，社会上也可以说各种话，可以批评政府，那个时候曾有那么一个时期。后来不行了，后来就搞得很专制了，就是批评不得，谁要批评，百花齐放，那是很怕的。只能放一朵花，百家争鸣也怕的，风吹草动，就都说是反革命，就抓人，就杀人。这就是把两种矛盾混淆了。把人民内部的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你们南京许家屯同志说，很多学生向他来请愿，队伍很整齐，省长彭冲也说，纪律很好，在路上都是很好，一到他那个衙门里头，就喊“打倒官仔主

义”、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拿到斯大林，我看就要抓他几个，难免有几个头要落落地。你打倒官仔主义，不是反革命？其实一个反革命都没有，是很好的青年学生。而是那个问题应该解决，确是有点官仔主义，因为，那些华侨学生闹事，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学生这么一请愿，就帮助我们，学生也得到了教育，很多干部也得到了教育，华侨学生也得到了教育。闹事的、打人的，也不打了，何必一定要天天打呢？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对他们很好地进行教育，没有发动群众批判他们。象这类问题，还有什么复员军人闹事。曾希圣同志，他在你们附近的安徽省，他那个地方复员军人闹事，找到他，他讲了四十分钟的话，问题解决了。开头还有一股气，后来这一股气不晓得哪里去了。总之问题是沒有好多了，问题就解决了。其中已经查出一个冒充革命军人的人，也很坏，他是个领袖。

对于人民闹事，就是不能采取对地主阶级、对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那种做法，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除了那个犯了法的人以外，比如讲，他拿刀杀人，打伤人，跑到办公室把桌椅打得稀烂，这就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那怕他犯了错误，他是领袖，率领人闹事，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出工厂，不要开除出学校，不要开除出机关。你开除他，他跑到哪里去呢？你开除出这个学校，他就进那个学校，那不是一样吗？你开除出这个工厂，他就跑到那个商店，他总要落一个地方。他不能跑到中山陵上去活，那个地方沒有粮食，沒有房子，他不能在那个地方活的，不能在野外活的，总要落一个地方。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可以舒服一点，我说你这样太舒服了不好，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工厂，有这么一点闹事的人，是不坏的。

我们再谈到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敌人同人民，人民同敌人反革命的矛盾。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就是右倾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个不好，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各省应该注意。民主人士中间，民主党派中间，有一些朋友，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也是有右倾的观点，他们比我们右倾观点有时还右得厉害一点。因为有些反革命，就是他们的老朋友，现在有些关在班房里，有些杀掉了，他们有点伤心了，因为杀了他们的亲戚，杀了他们的朋友。有的观点，我们要讲清楚。在党内这种观点是不好的。第二，也有夸大的观点，也有“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可不对。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要肯定。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如果不肃反，那可不得了。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而匈牙利沒有肃清。所以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个观点就是不符合情况了，夸大了。

对于第二类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比较显露出来了，比较暴露出来了。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同志中间的意见也不一致，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还要经过说明，经过讨论，经过研究，使得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统一起来。对于人民还跟我们闹事，沒有精神准备。因为我们过去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那么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过去是向敌人闹事，那就革命，现在这个就不叫革命了。你把我革掉，怎么办呢？又请蒋介石来呵？但是事还是要闹的。因为事情你没有解决得好，凡是解决得好的，十个地方九个地方解决得好，十个问题九个解决得好，有一个地方一个问题沒有解决得好，那个地方就要闹。这个闹事是正常的。你没有解决得好，他为什么不闹呢？请问：他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向“蒋委员长”去闹

吗？他到台湾去了。他们就要向工厂的厂长闹，向合作社的社长闹，向乡政府闹，向市政府闹，向人民政府闹，向学校的校长闹了，因为你没解决得好。我们工作中有官仔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我们人很多，意见也不齐，因此存在官仔主义。这里也是有“左”有右的观点，对于人民闹事，也有主张用老的办法来对付，横竖我们办法是有一套，我们是搞了几十年，你晓得老子干革命干了多久呵！是不是？总是有一套办法，就是拿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有时候也用一下，压一下，叫警察。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国民党就用这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那完全是没有办法。过去对付帝国主义很神气、很威武、就是不怕。小米加步枪，你帝国主义、蒋介石、飞机大炮，不怕。不怕帝国主义，可有点怕人民闹事。我说，帝国主义你不怕，你还怕老百姓？可就是有那么怪，就是怕老百姓，帝国主义他是可以不怕，老百姓一向他闹事，他可没有办法了。因为他没有学过这一条，他还没有学好。过去学的是对付帝国主义的，对付蒋介石的那一套，要讲打土豪、分田地，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所以，很值得研究。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开展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同志们！究竟是对付帝国主义容易些，还是对付老百姓容易些？对付敌人难办些，还是对付人民难办些？敌人，你撵了多久，他就是不走，赖皮得很，特务钻到机关里头、学校里头、工厂、农村里头，他就不走。老百姓无论如何不是特务，他不是帝国主义、他不是地主、资本家，他是老百姓，他是劳动人民，很容易讲清道理，所以我们许家屯同志、彭冲同志对于华侨学生打人，很大一批学生不满意，向他们请愿，他们就来了一个说服，结果是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我说，对于全国，我们的方针是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这个方针可以说是战略方针。因为这是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里包括地主、富农、民族资本家。没有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你总要去安排他；失业的各种人，都要做适当的安排，总要使他们能够生活，有事情做。其中，有大约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太少，但是也有一批，大概有五百万左右。其中不到一百万进了共产党，还有四百万在党外。他们干什么事情呢？他们在我们政府系统做工作，军队里面也有一小部分，教育系统有二百万人，大学、中学、小学都算，财政经济系统有一百万人；还有科学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文学家、诗人、艺术家、画画的、唱戏的，还有新闻工作者，办报纸的，等等。上海很多。

这么一大堆知识分子，有些是工农化了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进了共产党，有些没有进，但是很接近我们。积极拥护马克思主义，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占一小部分，大概占百分之十或者多一点，据江苏说有百分之十七。另外一点，他们是有敌对情绪的，但是，不是特务。他同我们敌对，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勉强地接受，没有办法，大势所趋。这样的人，也是有的，可能占百分之几。中间的有百分之八十，或者没有这么多，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他们是中间派，动摇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些赞成，也读了几本书，但是，没有读进去，就是读在这个上面（指额头上面），没有进到里头去。

考知识分子有个办法。人们说要分别一下，究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思就是说，带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比较资产阶级的要舒服一点。可是我说不然。我就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的资产阶级学校。那个社会的空气，是资产阶级的空

气，搞的那一套，就是唯心论的什么东西，康德的唯心论我就信过，你说那是小资产阶级的？读的是资产阶级，信的是资产阶级，你还能说是个小资产阶级？有的时候，是可以分的，也应该分的，但是讲到世界观，可就难分了。你说，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什么东西呵？是半唯物主义吗？我这个人马克思主义是后来钻进去的，后头学的，而且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跟敌人作斗争逐步改造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考知识分子，就是跟工人、农民一道，看谁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知识分子有一部分人可以打成一片，大多数知识分子，他还离得这么远，想要打成一片，打不拢来。他跟工人、农民没有感情，不是朋友，工人、农民有话也不跟他们讲，他也看不起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你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就翘得很高，它就有些神气。因为他读了几句书，确实有些神气。劳动人民看见你那个神气，看见你那个样子，他就不舒服。

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动摇着的中间派。他们一般的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他们还没完全接受。我说，他们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他们有半条心想为人民服务，这是好的。但是，还有半条心，不晓得放在哪个地方。你要说他拥护台湾，他也不拥护台湾，但他一讲外国，恐怕还是美国好。“你看，美国有那么多钢，美国科学很发达”。我说，外国好，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好，是不是好呢？是好。他们有那么多机器，那么多钢铁，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好是他好，不是你好，你美国有那么多钢，是美国人的钢，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钢。我们天天吹他那个好，有什么用处？它每年生产一万吨钢，我们没有。我们每年能多几万吨钢，我们就高兴。我们现在只有四百万吨钢，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可以完成四百一十二万吨钢，可能超过，可能多一点，可能有四百几十万吨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几万吨钢，最高年产量是一九三四年，主要是日本人的，那才有九十万吨。蒋介石搞了二十年，我说蒋介石该倒，是有道理的，并不是糊里糊涂我们把他赶走了。他搞了二十年，只有几万吨钢，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清朝末年张之洞他们搞的。我们搞了七年，今年来讲八年，可以搞四百多万吨钢。所以我们增加一吨钢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就高兴。你美国增加几百万吨钢，我也不高兴，你越多我越不高兴。你增加那么多钢，干什么呢？你增加那么多钢就很危险，要打我们的。我们有些知识分子，还在那里吹美国钢！钢！钢！那么多！这是我们要说服他们的，我们要说服知识分子。

有些知识分子在作教员。科学家都是教员，大学教授都是教员，中学、小学教员都是教员，教育人民；新闻记者，办报的教育人民；广播员、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教员；技术员，工程师，是我们工厂所必不可少的。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能活动。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我们学校就不能办。我们有许多报纸就不能出，我们的文学艺术，共产党就没有出梅兰芳，就没有出周信芳；现在有个袁雪芬进了共产党，总还没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大学教授就没有，工程师现在开始有一点，很少；技术人员开始有一些进了共产党，大批的还是党外人士。

所以，我们几百万知识分子，不管他多么动摇，但是，是有用之人，是我们人民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现在只有他们当教员，没有别的教员，因为他是上代遗留下来的，是社

会遗下来的。论他们的出身都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但是可以教育过来，我们不要搞唯成分论，鲁迅也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马克思就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列宁也是，那怎么得了呀？这就不能讲唯成分论。因为现在，他们——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没有社会根子了，他们的社会基础，他们的社会根子，我们已经挖了，现在他们落在空中，就象降落伞一样，吊在空中了，所以就便于改造，并不要怕他们。

有些工农出身的同志，工农干部，看到知识分子，有点恼火，恐怕吃不消，咬不烂。知识分子有点麻烦是真的。因为，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麻烦也就是读几句书，我们就是少几句书，你少几句，他的尾巴就翘起来，事情也就不好办，有的就难办。所以讲难办也就是难办。但是讲好办也还是好办。这七年，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进步，应该肯定这一点。你们江苏省可以证明，你们这里知识分子最多，是不是？总算是还有进步。

民主党派是什么呢？民主党派他们还都是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里面工农干部很少，有什么工农干部？民主党派——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都是一些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江渭清同志说，要我讲讲这个问题。

提出这样的方针是有理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要“放”，还是要“收”？现在党外人士就说我们“放”的不夠，他们就深怕我们“收”。而我们同志呢？看那个样子似乎不对，就有一点想“收”。有一点想收兵。那么我们呢？中央的意见，也和各省的同志谈了，去年十一月开了二中全会，今年一月开了省委书记会议，我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是应该坚持下去。应该“放”不是“收”，不对的应该批评，错误的意见，错误的作品，或者一篇文章里头，一个作品里头有一部分错误，那就要批评那一部分，但是要用说服的办法。所以还是用“说”，还是用“压”？还是用“说服”，还是用“压服”？这两个办法里头，采用一个办法。还是“放”，还是“收”？这两个里头取一个。我们认为还是要“放”，不要“收”。那么“放”，就放出许多东西来了。有许多东西就不对头，怎么办？那么就“压”？还是采取另外一个方法，说服它？有些同志，手就有些痒，想去“压”，把对付阶级斗争的那一套搞出来，军法从事，用简单的办法，或者是不调兵，用行政命令，看不顺眼的，就把它“压”一下。中央认为，这样不好，压是不会服人的。从古以来，就没有压服过人的。我们对敌人那是要压，压了之后，还是要“说”。比如俘虏一解除武装，我们就说服他。反革命，只要不杀头的，我们还是争取、教育、改造它。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么一“放”，又是用“说服”，不要用行政命令来高压，会不会天下大乱？我们说不会乱。会不会从各方面进行批评，在报纸上、刊物上、会议上批评我们的缺点，会不会把我们批评得不得下地，把人民政府批倒，象那个匈牙利一样，会不会那样？我说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大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大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老干部也批评不倒，所以，老干部不要怕批评。老干部批评一下很有好处，如果我们身上有官僚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僚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会不会倒呢？不会倒的！人民政府怎么吹得倒呢？上海去年刮了龙卷风，把个什么大东西吹起了，房子还有什么装石油的，吹上天去了。起那么一股风，但是上海人民政府没有吹走，不管刮多大台风，我看人民政府，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吹不倒，半心半意替人民服务的，那要吹倒一半；那一点心思都没有，跟人民政府敌对的，那么该吹倒。

毒素怎么办？百花齐放这一来，放出许多毒素，蛇口里吐出一朵花来。我说对于有毒素的东西，有篇文章叫《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志们大概都看过了，这个里头有这样几句话，说民主集中制，如果有缺点，就应该批评。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而绝不能象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的“涣散和混乱”。这个对不对？这个对了很好。你们拿这个东西，跟民主人士讨论，要大学生去讨论。这篇文章上讲了：批判是可以，但是批评的结果，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绝对不能象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

这些原则性，原则必须如此。但是有一种灵活要注意，让人家说话的时候，会说出一些很不好听的话来，百花齐放，会放出一些很不好看的花。有些什么罢工、罢课、请愿、游行示威，中间可能出一些乱子，它的目的不一定跟这个相符。群众闹起事来，那些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都是没有学会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他怎么会了解这一条？开起会来，批评的时候，会出一些乱子。这时候，如果到处都拿这一条去压：“你看！我有一本书，你看过没有？”也不行。你是要学我们彭冲同志、许家屯同志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这个时候，如果就搬出这一条来念，尽念。就是念这两句，别的话都不讲，保证他这个市长干不成了。因为要解决具体问题，他们有时候搞得过火一点，这是难免的。

文学作品里头，有些是不对头的。上海唱“狸猫换太子”，我是没有看过那个戏，说是各种妖魔鬼怪都上来了，我说上来一点也不要紧。妖魔鬼怪，很多人就没有看过，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今天也搞，明天也搞，尽搞。搞那么一点，见见世面，见识那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这跟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是大家赞成的，没有哪个反对，还有什么“劈山救母”，“水漫金山”，“断桥”之类，那些都是神话。也没有哪个反对。就是有另外一些东西，也不必那么急，让它搞一个时期，会有人批评的。出了几篇小说，写了几首诗，演了一些什么“狸猫换太子”，心里就那么急？我们可以慢一些，让社会评论，逐步地使他们那些作品，那些戏剧，加以适当改变，而不要用行政命令来禁止。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而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要让它出现，让社会上大家公评，总有一天它会慢慢要丧失，要逐步改造的。我们过去就是用命令禁止，禁止了七年，现在人家又慢慢出来了。可见得，我们的那个禁止是不灵的。

最后我讲一下要在党内党外把我们党提出的这些问题开展讨论。讲一样的话，在党内讲，也跟党外讲。比如半条心这样的话，也要跟他们讲“我就是讲你半条心，你怎么样？”“那就不行！你讲我半条心，就不行！”不行，我要打架，打架也不怕。你是半条心，我说你半条心，你还不舒服？你有半条好心嘛！你还有半条心，这是讲世界观，我不是讲你对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你是拥护的，但是有一些也不见得，譬如合作社这个制度，有些是怀疑的。但一般讲社会主义，五年计划，你要问他赞不赞成，他说赞成。宪法赞不成赞成，他赞成。共产党一般他拥护，但是讲到世界观，辩证唯物论，这一套就不赞成了，或者只有一部分赞成。我们讲半条心，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你还有一个任务，还要改造。你有

二重性，一重是赞成社会主义，二重是不彻底，所以是半条心。想跟人民接近，但是又不能完全接近，不能打成一片，从乡里溜一转回来，还是差不多。

听说，你们南京曾经出了一件事，在“三反”的时候闹出来的。有一位作家，是作家协会里头的秘书长什么人，下去体验生活，带了城里的饭到乡里去吃，回来的时候，预先就有报信的到南京，南京作家协会接了信之后，就排起队伍来欢迎，站立两厢，我们这位体验生活的作家，走中街而过。总而言之，很神气就是了。还有一位在“三反”中间，他这个人结婚，一定要在结婚的那一晚，睡总统府蒋介石睡的床，他要去睡一晚。总之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怪事就是了。来了“三反”、“五反”把这些事都暴露出来了。南京方面这些材料送到北京，我们也看到了，那种人心情状态，总是有他的兴趣，这是总统睡过的床呀，这个总统姓蒋，蒋介石呀，我今天结婚，一定要在那个地方睡一晚。我们要使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刚才讲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就是些知识分子。我们要用他们。人们说用是好，可是他们没有用处，是老废物。废物也要利用，废物也有好处。应该用他们，应该开会，这回北京开政协会议，我也跟他们讲过一回，每年不要开会就是应付一下，应付一下过了就算了，而要是利用开会，每个省一年开一回，两回，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做工作，说服他们，使他们替我们去做工作，因为他们联系一些人，经过他们去说服那些人。这样的态度，就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使用他们的态度。就是“利用”、“限制”、“改造”嘛。我们同志喜欢后面两条，一条叫“限制”，一条叫“改造”，就不喜欢头一条那个“利用”。我就“改造”你，我就“限制”你。当然那是对资本家讲的，现在对民主人士不好这么讲，对民主人士不好讲“利用”、“限制”、“改造”，可是，我们的同志事实上就是一个限制，就是不去“改造”，不去“利用”他们，他们可以做一些我们不能做的工作，要同他们讲真心话，有很多事情不要用两套，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象我跟同志们讲的话，我都可以跟他们讲，当然任何一个党，它有一部分事情是不跟党外讲的。民主党派他们也有一部分事不跟我们讲，我们也有一部分事情不跟他们讲，但是，关系政策的事情，都可以讲，党内是这样讲，跟党外也是这样讲。材料都可以看。有一材料，比如讲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暴露我们官厅主义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发给他们看，他们平时看不到，这样一来，反比较好。有时可以开两个党的共同的会议，党内党外同时参加。最近，北京开宣传会议，开的比较好，有一百五、六十个党外人士参加。占五分之一。你们如果开的时候，可以多一些，可以让他们占五分之二。我们在政策这些问题上，艰苦奋斗这一点上，做很多工作。

艰苦奋斗，江渭清同志也讲了这一点，我先也讲了，要有多少年我们人民的生活才能改善？现在要提倡艰苦奋斗，但是不等于女同志不穿花衣服的，在衣服还是可以穿，据他们研究，花衣服便宜，现在做两套，里面穿花衣服，外面穿兰布褂子，那花钱太多，我们要节省，穿花衣服是个节省的办法。各种事情，我们都要从节约这点上，艰苦奋斗这点上，做很多工作。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有些同志精神不振作，就是做那么一点事情，没有事情就是打扑克、打麻将，听说打扑克成风，有时一打打到天亮。要养成读书的习惯。我不反对打扑克，也不反对跳舞，也不反对看戏，就是不要太多。我们的长处使用不上了。我们的长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政治军事。我们现在的缺点，就是缺乏文化，缺乏科学，缺乏技术。我们要在这方面学习。这些话我在一九四九年《论人民民主专政》那一篇文章里就讲到过，说我们过去的长处，我们所会的东西，我们所了解的东西，快要不用了，而我们所不懂的东西，现在摆在面前，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过了七年，更加觉得要提倡学习，要养成看书

的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剩余的时间，把剩余的精力用在那上头，这样想打扑克的那个味道，就没有那么多了，味道钻到书里去了，钻在学习里去了。

有一些同志，表现革命意志衰退，缺乏“拚命”精神。什么叫“拚命”？水浒上有位叫“拚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拚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一种拚命精神，有那么一股劲。现在这几年就慢慢地有一些同志劲头不大了。一闹一评级，有些人闹得不成样子，象什么三天不吃饭，我说四天还可以。你三、四天不吃饭，人送饭去，我说送早了，你让他饿四天、五天，一个星期不吃饭，就相当有问题了。三天不吃饭有什么要紧？急于送牛奶、鸡蛋，何必那么急呢。有些人痛哭流涕，比级别高低，比薪水多少，比衣服漂亮程度。

工资恐怕是要加以调整，中央还没有做出决定，去年不是提出工资改革，增加了工资？工资是应该增加的，但是有些是增加多了一点，如行政系统，也许还有教育系统。这不是讲工人、讲工厂，而是讲行政系统。我们有一百七十万行政工作人员（包括乡干部，不包括合作社），教育系统有二百万人，另外有商业系统以及工厂以外的事业系统，还有三百八十万解放军，合共有一千万出头一点。这就是我们组成为国家的这么一个人数。产业工人过去几百万。现在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人。因为我们国家大，工作人员也是要多一点。所以准备在有条件的时候，就是讲有出路的时候，把一部分人回到工厂里头去，回到合作社里头去。主要的生产是两个部门，一个工业，一个农业。就靠这两个部门来生产。现在看起来工资有一些不很适当，引起人们不满。我说这个问题，如果社会上讲话的多了，倒是好办，因为讲话的多了，我们就有依据来一个调整，要保持过去我们革命的时候，阶级斗争的时候，那样一种精神，那么一股劲儿，那么一股热忱。革命热情，就是要把这个工作做到底。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看你能活多久？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或者九十岁。有一个画家齐白石，他有九十八岁。看你有多长的生命，到那个时候，你真是不能工作，你就不工作，当你还能工作的时候，你多多少少应该工作。而工作的时候，要有一种热情。缺乏热情停滞下来，这些现象不好，应该作教育。有些人就是因为机关庞大，许多人围在一起，没有工作，打扑克，毫无出路。你堆上一大堆，只有那么几件小事办，他不打扑克？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军队里头怎么样？今天军队里头的同志很多，平时的政治工作和战时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和各种制度，一面实行这些制度，一面还要上级和下级打成一片，跟士兵打成一片，还要准许他们有批评，比如开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的机会。陈毅同志讲得好，他在“三反”的时候，在华东军区，说是我们专制了几年，现在让人家向我们专制一个星期可以不可以？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的，现在让下级向我们说一点话，批评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只有一个星期，可以不可以？他的意思是说，应该是可以的。我是赞成这个说法。硬着头皮，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个星期，在他们批评之前，先准备一下，做点报告，自己有什么缺点，无非是一、二、三、四……有那么三、四条，然后让同志们发言，补充一点，批评一下。有功劳的，人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的。战士们对连排长，也给他们一个机会，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我们曾经做过，结果是有益的。军事里面的民主，军队里面的民主，这样不因为我们军衔制度，有各种制度，而使上下、官兵以及军民、军队跟地方这个密切的关系受到损失。毫无疑问，上下应该密切，应该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官兵、军事干部跟战士们，应该密切地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应该密切的。

全党应该强调思想工作，我们今天讲的总题目就是思想工作，思想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近来比较突出，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人们就说，是不是要“放？”恐怕危险。长期共存，为什么要怕长期共存？“你那个民主党派，我们革命的时候，你在哪里？”只要搬出这一条来，那他就没话说，他就遭殃，我们说这个时候还不要搬这一条，不要靠官职，靠职位高吃饭。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几十年，都是真的，可是有一天，你办了一件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这个时候，人们也不谅解。你解决的事情解决得不对尽管你过去做过许多好事，职位有多大，因为你今天的事办得不好，你对人们有损害，这一点他不能原谅。因此，我们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来吃饭。靠正确，不靠老资格。你还是靠正确、还是靠资格？靠资格就吃不了饭，因为你搞的事情不正确，你解决问题不正确。你虽然有资格，但是人们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索性都不靠资格，还是一个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资格架子。老资格架子不要摆。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不摆官架子，不靠老资格吃饭。这一条，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新干部他们没有这个包袱，他们比较自由。他讲“老并不是你们好呀，你们就是革命几十年，我就是那个时候，你们革命的时候，我还在地上爬呀！”这一条他讲我们不赢，因此他就没有这个包袱。

那些新干部，我们对他们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如他们。比如讲知识，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现在这一代，只有他们能够在知识上教育工人阶级、教育农民。因为现在我们还有什么知识分子呢？没有嘛！现在的大学，约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儿女；中学据江苏省统计高中百分之六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初中也有百分之四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只有小学倒过来，大概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占百分之二十、三十，工人、农民子弟可能有百分之七十、八十。这种情况，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要一、二十年，才能改变。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耐心争取他们，一面要说服他们，使他们进步，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教育他们，他们要做教员，必须学习，另一面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要向现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因为，除他们就没有知识分子了。

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只有它有前途，其它阶级都是向它过渡的。比如说农民，将来要变成农业工人，合作社几十年之后，就要变成国营农场，社员要变成农业工人，资本家现在正在变，再过若干年，他们也变成了工人。整个社会都是工人，所以只有工人才有前途，其它都是过渡的阶级。无产阶级要有他的知识分子，要有全心全意为他服务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半心半意。大概估计，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我们可能从五百万知识分子中间，由现在的百分之十几或百分之十五，或者百分之十七（这里包括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而不算在里头的），因为进了共产党，他并不一定等于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共产党有一部分人倒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比如过去鲁迅就是这样的人。鲁迅好？还是陈独秀好？还是张国焘好？还是高岗好？我说还是鲁迅好，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非党人士，就个别人而论，进了共产党，并不等于比党外人士好（有一部分党外人士比共产党员好），争取扩大到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者是进党，或者在党外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跟工人农民接近。还有三分之二，在这十几年当中，也会有些改变，由半心半意改变成再多一点，三七开，尾巴掉一点，有些进步。我们要争取这个前途。因为讲思想问题，就联系到知识分子问题。

至于合作化许多问题，我就不讲了，合作化是个好事，是确定它有优越性的。因为我们许多合作社证明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有一部分同志，还有疑问，党外人士还有异议，这一点要向他们作解释。

在上海局杭州會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四月)

(思想問題討論時，毛主席插話，整理成五個問題。)

一、最高國務會議、宣傳會議以後，知識分子情況：緊張空氣比較緩和，黨外知識分子初步和我們接近起來，猶豫情緒比較開朗，報告不是萬靈藥，還要用各人的藥，要的東西不給他們，就處於被動，給了以後，鳴好鳴壞由他們自己負責。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頭上來的。我們的辦法是先整自己，把黨整好，整得謙虛一些，講道理。現在的問題就不是我們的問題。知識分子左派向我們要民主（放），學生向教授要民主，那時就要求救於我們。我們一放，他們自己就鳴起來，我們一緊，就向我們要。

民主黨派，上海去年發展一萬一千多，他們內部的问题就多起來，只有無產階級不怕政變，錯了，就改。他們中間問題就多起來了。

我們要放，要硬著頭皮讓他們攻！攻一年。誰讓我們有教條主義，攻掉就好，攻得過火，“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共產黨要讓罵一下子，讓他們（不清）月，我們想一想。陳毅同志三反時說：我們專政專了這麼多年，讓人罵一個星期也可以。問題是你傾盆大雨那樣向我們倒來，我們也會大吃一驚。有些知識分子還怕放長線釣大魚。有人說，對。共產黨威信高，報上只要一兩句話，風吹草動，就有人怕。黨外怕，黨內也怕。事情對，也要謙虛三分。壓力大，自己要懂。有人說，放長線釣大魚，也有一些道理。我們現在讓人批評，以後再去分析。知識分子象驚弓之鳥，一定要看，可能看二十年。黨內也看，例如治病救人，有人不相信，直到後來看了事實，才相信。要經過許多考驗，共產黨的政治要受考驗，領導者要受被領導者的考驗。過去知識分子為舊統治者服務，現在生產關係改變，沒有社會基礎了。知識分子過去是寄托在封建、資本主義、個體生產制。知識分子出身哪個階級，為哪個階級服務。出身的階級現在已破壞，吊在半空中，腳不踏實地。他們現在爬在我們的身上。工農通過共產黨讓他們做事，幫他們吃飯。我們還要用十幾年洗腦筋，辦法是團結——批評——團結。他們想不要批評，說不出口來。現在有一千多萬人懸在半空中，他們的腦筋是舊的，沒有什麼可怕。吊在半空中，很需要我們伸出手去接一把，如果我們熱情地伸出手去，可以快一些。大部分過來，就不那麼簡單了。最歡迎變化的是無產階級。農民最希望蔣介石、美帝、地主起變化，但不希望小私有制起變化。民主黨派、知識分子看到文化革命來的太突然太急，也可能變。毛脫了皮，但魂還在舊的皮上，毛附在無產階級身上，他們常常魂魄不安。不變不會不安，不安是變的表現。有些知識分子的世界觀長期不可能改變。……考驗作家的世界觀，就是要考驗他們能否與工農打成一片，還是二片。下鄉不能和農民說真話。黨內的官衙主義者世界觀也成問題，脫離群眾。他們贊成馬克思主義，又與群眾格格不入，那是什麼馬克思主義？社會上有一批人，唯恐天下不亂，有反共思想，主張打出去。改

造要几十年，有些人到死不改，大部分可改。有那么一部分老顽固，到死不改。

二、一定要放。怕放是道理没有讲通，或没有说服。这是有领导的反官厅主义。凡是不让放，毫无准备，结果大放。我们主张放，最大乱处无非是乱一阵。为人民办事，人民还是不满意，有人想不通，苦恼的很。总有人不满意，有满意有不满意。比过去他满意，比将来或比现在好的那些人他又不满意。这种情况一年以后也还有。如果都满意了，我们只要去睡觉好了。现在还没有放，怎么知道就要乱呢？过去阶级斗争，警惕性太高了，现在右一下子。一家独鸣了多少年，让他乱一下子看看。明显的错误，长期不批评是不好的。草多可以用拖拉机；蒋介石不是草，三年就打倒。中国知识分子，百分之十懂马克思主义，百分之八十是爱国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可见毒草只是少数，似毒非毒、野草香花中间的是多数。这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这个问题是新问题，干部还没有试过，试一试，试出味道来，顾虑就没有了。就是没有讲清楚，人民还会反对共产党吗？似毒非毒的是大多数，毒草是少数。

我不是鼓励人民闹事，搞闹事促进会。闹事打办公室要处分。乱糟，偏有一点。现在是党外情绪高，过些时，党内情绪也会高起来，先低后高。

解决一些问题，取得了一些经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政策都是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的，应该让干部去工作中试一试。

又怕又怕，又高兴又不高兴，问题解决又不解决，这就是辩证法。比如打仗，开始提心吊胆，越打下去越大胆，没有几次路线错误，就不会现在这么好。好事多了，会骄傲，就会出坏事。苏联就是如此。王明错误大，没有自我检讨，没有威信。错了，紧张一礼拜，检讨了，就好了，还有免疫作用。邓老对合作化问题，我想彻底攻他的。对干部帮助的办法，就是攻。最多失掉一票，不想提名我。

巴金说杂文难写。一、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风气。二、彻底唯物论者是不怕的。王熙凤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大家应帮他，不帮忙是站不住的。

鲁迅摹搞个运动场有什么不好？陈其通、钟惦斐代表两个片面。我也是片面无忧论……可以变成循环论，但辩证法不是循环论。

片面性多了，就要出辩证法。这些人无非要我们倒霉，我们就想得更坏一点。现在好象右了一些，但说服群众，不能简单化办法，对闹事不是彻底解决。事情处理过分了，不行。谁说要牛鬼蛇神？是群众要看。不能压，只有多演好戏。应该让社会复杂一些，把重心放在科学上面。有人说不开除闹事学生比国民党还毒辣，我们应该比国民党高明一些，有一个国民党和我们比较，很好。他们是在掘坟墓，我们不要学国民党。阻止广东学生来京请愿，我至今也难受。国民党对人民专政，共产党讲民主，这点应清楚。有人拿专政的原子弹向人民的头上幌一幌，这是不好的。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改变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有人认为不是时候，与政治思想工作有矛盾。大规模政治斗争已基本结束，八大做了结论。这个方针提出正是时候。

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很深。我想是说没有一条沟，没有界限是不好的，但不能成为一条沟，有沟，就脱离群众。

上海工厂有千分之一，没有万分之一闹事，有百分之一就好了。可以清除官厅主义。

从党内到党外。党内党外一起讲，戏就唱起来了，这样，可以把许多人推上政治舞台。

《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要整一整。

有人感到左不行右不行，难办。知道难办就好，就会动脑筋，否则就只说专政，说集中（即压）。

党内要不要斗争，当然要斗争。农民年年锄草，批评错误要有说服力，不能靠压；靠几篇文章不行，要以理服人，不要靠资格。

对敌讲力量，对人民讲理。没有理，不会历史主义，地位多高，不行。要多学习，多研究。干部摆资格，讲势力，是很危险的。

没有民主党派行不行？也行，苏联就没有。听不到反面意见，但打仗还是打胜了，也没有杀知识分子。苏联不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主党派都是大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并没有农工。要给他们事做。

两头团结，中间批评。没有批评就是右倾。钟惦棐文章出来很久没有批评。

《文汇报》上批评要全面分析，这批评是有益的。

对民主党派人士要讲真话，有缺点就说。当民主党派也有苦处，听不到，看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也可以讲一些党的缺点。我们要打倒民主人士，他们就反起来。虚心学习，很有必要。

开了许多会议，不发消息。人民日报这是国民日报。

陈其通代表百分之九十党内同志，我就没有群众基础。

党内外应当有一条线，不应当有一道墙。第一书记要经常接见党外人士，把底亮出来，诱敌深入，也可以讲，不讲是不民主。让讲又是诱敌深入，怎么办？要从六亿人口出发，我们野心要大一点，知识分子有五百万，要争取他们。莫朴是宗派主义者，要交审，要审查党籍，为什么不要国画？他是搞丑术，不是搞美术。国民党还有国画。他是什么党，大概是第三个党吧？社会存在不能否认。社会存在有反革命，我们就要肃反。民主范围内的问题早已存在。火烧红莲寺也要采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怎么行？江丰、莫朴搞辩证法，为什么不要国画？只搞单干户？夫妻也要配对吆！老干部要考虑，过去是一套办法，现在要解决人民内部问题。《新民报》看了几张，不是黄色报纸，软一点。不能领导科学，不要一下子顶回去，要请教，刘备还要请个诸葛亮。党外人士讲话是考虑过的。有时有错误，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不要说死了。

四、关于几个问题的认识问题

范瑞娟文章有二百多封信反对，我看没有黄色，天天上甘岭，没有我的丈夫怎么办？写文章要有逼，毛骡子没有人骑不行。领导、选报、准备、说服力、有利、五个条件。这么多条件，只有说服力比较具体，其他的都很难改，但不要教条主义。

对党的政策能否辩论，《人民日报》的文章组织都对？陈其通等的文章就不对。我看每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

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总有些难办的事情，不成堆也不行。上海六百万人口，只有二百多××反对，可见是少数。报纸上也不能天天打气。一年开次会，春夏秋冬。文教事业是教育人民的東西，要经常管，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电影厂有人说力争香花，不出毒草。这精神不对，我们不怕出三分之一毒草，避免毒草是一句空话。

片面性。要求党外都避免片面性，都成为辩证法专家，一万年也是不可能的。上次我从自己谈起过。工作做得好，做得不好，永远存在。

知识分子入党问题。应该争取三分之一到党内来。民主党派可以跨党，领导人员不要入党，六年之内搞四分之一，三个五年计划三分之一入党。今年争取百分之十五入党，要稳步。今年如果不争取一批知识分子入党，对社会主义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方针，如果组织上关门，那是不相称的。我们党没有大作家，大诗人、大教授，要招兵。过去办不到，现在要努力。高尔基只读二年书，孙中山也没有受很高的教育，人是可以培养的。

教育上摇摆不定，有道理。没有经验，摇几次，就不摇了。初中教材中，应当有历史、地理、文物等等。过去中小学就学外国文，应该学。初中课太多，应该砍掉三分之一。学校教课怎么百家争鸣？应以一个为主或几个为主。

肃反检查是查五五、五六年的，过去的可不查了。

先进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矛盾，这句话不对。

节育问题。马尔萨斯结论不对，可是人多是否一定要打仗？中国节育要看省份。江苏人多，东北人少。婚姻法不要改，多劝说不要早婚。

一千年还有革命，我说过，但不一定。

一万年以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将来不叫国有化，是球有化的问题。

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好，就会被推翻。现在已有个别的乡政府、支部。

五、领导问题

要改善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共产党的责任。不怪宣传部，要第一书记负责。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领导，还要看文章，要看历史、哲学、文学……历史分期。人家锣鼓喧天，第一书记什么都没有看，怎么解决？有人说，旁的事少干一些，抓思想工作，要看刊物，看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养成习惯，慢慢就有兴趣。党内也要讨论，讨论没有时间，不讨论也会没有时间。有人把“百家争鸣”唸成“争鸣”。不懂要接班，周瑜二十多岁，程普五十多岁，大敌当前，谁挂帅？搞文教工作，要有文化。诸葛亮初时不被重用，后来用了。那时能破格任用，现在为什么不行？去年评级，有人意见很多，破格提升有很多阻碍。当兵的没有文化，可难，可也要业余学习。现在是打另外一个仗。各级的将、校、尉、官兵要重新配备。各级干部要学会社会科学、文学、自然科学，不然，大将出马，耍了两下子，枪杆子就掉到地下去了。大学党委会要改组，接受干部任务完了，现在可调出来，有个把留在学校里搞搞事务，“百家争鸣”，不要去当校长。

要做宣传工作，逼上梁山讲，要到大学里去讲，先与教师、学生谈谈。今天不讲，明天不讲，今年不讲，明年不讲，一万年不讲，怎么行？

高教部长、宣传部长、党委书记都请去讲，总比政治教员好一些。

定息问题。企业性质改变了，两重性质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是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但灵魂还在。定息搞短搞少，长期留一个口实，不合算。现在一年还一亿，还十年，将来还一千万。他们不要求取消，我们就还下去。小的资产阶级要摘帽子，不要小的一摘，大的不安，最后总归自动取消。

六亿人口中有缺点的，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不对可以不听，对的要接受。反对肃

反，反对合作化的文章，可以驳一驳。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孙大雨说人家是反革命，最好在报上登出来。胡风、铁托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就脱离群众，这也是帮助的一种办法。做政治工作要有一点办法，不怕发表，要驳他。

各省要交流经验，不要不相往来。

在接見共青团八大部分代表時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就是能掌握马列主义，站得高，看得远；立地就是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打成一片。

接見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時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沒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約集各民主党派負責人和無党派民主人士談話紀要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沒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

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个队，算一个账。过去好象一讲矛盾，就不得了，其实有什么不得了，蒋介石四百万军队，美国军队到了鸭绿江，也沒有什么不得了。每天都在矛盾中生活，到处都是矛盾，都在唱对台戏，但是就不肯承认或者混淆两种矛盾。要承认它，然后分析它，找出解决办法。现在报纸天天在讨论矛盾问题，有人就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二、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

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类。要攻就趁此机会，只要找出证据，就能站住脚，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辩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人们并没有提议要打破你的饭碗，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要求改善关系。把矛盾从各方面分一下类，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等。卫生也很值得攻一下子，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找出办法，要党内外一起来，以往开小会不灵，要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和宣传会议一样的大会，党内外一道开会，两种元素合在一起，起了化学作用，成了另一种东西，就灵了。各省、市都要开。报上登一下，就可打破沉闷的空气。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劳动。这并不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扫扫街总可以。主要是表示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农民说，过去你们和我们一道土改，现在你们作了官了，不理我们了。过去合作社主任不参加劳动，很不得人心，群众很不高兴，不劳动，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就不信任你，不和你讲真话，现在区乡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群众马上同他们讲真话。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比方在南方打秧锄草并不困难。当然，年老的有病的可以不去。我国有一特点，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同共产党一道混，民主人士确是不好当，很有点恼火，不好办事。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那一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马寅初：过去好在有组织，我的一切都是旧的，如果真管，不能有现在。主席：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

现在不要搞唯物辩证法，要搞政治关系，搞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唯物辩证法，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马列主义世界观。希望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有三分之一，即一百五十万左右的知识分子能接受唯物辩证法就很好了。今后学习都要自愿学习，自己研究，可以自愿结成小组。关于辩证法的课本要一年编一本，有些过时了，旧话要新讲。世界观是长期的问题。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五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要转过来为新社会服务，他们有的是旧的世界观，有新的世界观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很快的时间内就有很多人相信新世界观是不自然的。不可能的。估计十年之内，还会有三分之一多一些三分之二少一些的知识分子，还会有旧的世界观，但这些人一是爱国，二是相信社会主义，这样就可以。有些教授讲课讲马列主义，这是为了吃饭；但对自己讲，就说自己并不相信辩证法了。上海有一左翼教授说，解放以来“魂魄不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教

社会科学的天天处于被动，历史要重写重教，在旧社会教书拿出来就行，一个课本可以教多少年，又没有这么多的会议。自然科学家好一些。”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早已推翻，连民族资本主义也根本没有了，个体所有制也破坏了，有人说，私有制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旧皮不存，毛要附在新皮上，不能吊在空中。要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产业工人有一千二百万人，党、政、军、教育和经济工作人员（厂长、合作社社长不在内）等共一千四百万人，合计二千六百万人。这一千四百万人不是直接生长的，真正直接参加生产的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其余所有的人都要向工人过渡的。解放时产业工人只有五百多万，苏联初期也只有三百五十万人。社会前进不决定于人数，农民有几亿，并不能解决社会的前进不前进，农民最后都要变为农业工人，合作社变为国营农场，这可能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五百万知识分子的毛要附在一千二百万的工人阶级的皮上，毛脱离了皮是不行的，总要在一家吃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脚（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过去的经济基础，一经地震，他们就悬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思想是多少年钻进来的。现在毛已经附在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一个，说小资产阶级出二元论，资产阶级出一元论，有人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舒服些，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不舒服，其实这是一种迷信，是一种社会风气，如我原来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资产阶级的社会风气影响，受资产阶级的教育，我信过佛教，信过康德，信过无政府主义，这些都是唯心主义，因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的世界观只有一个，另外分不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工商业者政治常识课本可学，但课本就是课本，思想还是思想，总有一部分人永远不会变的。条件反射，生孩子本来不痛的，就是社会舆论说会痛就痛起来了，要变痛为不痛，要医生作许多工作，要另外一种条件反射。不要相信所有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员都相信共产主义。共产党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不相信共产主义而且不相信社会主义，他们相信的是民主主义，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准备。原河北省付主席薛迅就反对统购统销，主张自由贸易。统购统销不搞不行，多搞也不行，明年准备除经济作物区以外，大多数合作社的粮、油、肉由合作社自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不信社会主义，他们搞社会主义是随大流卷进来的。我就不相信民主党派都信社会主义，有一大部分人不相信社会主义，但也不愿公开讲，共产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农民中一部分，工人中一部分（工人也成分复杂，由五百万发展到一千二百万，人心不齐），对社会主义成不成功，共产党行不行，还要看一看。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上了贼船（共产主义之船）没有办法，会不会翻船要靠天。这是很自然的。

过去作的是阶级斗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如此，是人与人开战，人打人，人内部造反，花了几十年的精力，如从鸦片战争起算，已经百余年了。鸦片战争，就群众来说，是阶级斗争，对林则徐来说，是中国剥削者与外国剥削者的斗争。单就最近几十年说，从共产党成立起，已有三十年，精力都耗在这上面。有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就只会搞

阶级斗争，共产党有术无学，这说对了一半。说我们有术无学，要看是什么学，譬如阶级斗争是一门大学问，不能说我们没有。这是经过多少年犯错误作检讨学来的。阶级斗争，以后还会有，如同帝国主义战争，同资本主义国家办外交，都是阶级斗争性质的。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要懂得自然界科学，不懂怎么办？我在一九四九年的文章中就说过了：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不懂就不懂，不要装懂。要老老实实地学，可能要同过去学习阶级斗争一样，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从党的成立到七大（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五）共花了二十四年时间，流了那么多的血，受了许多挫折才学会阶级斗争，现在学建设的新战争，要从头学起。能不能学会？肯定可以学会。有些党派专家多，如民盟、九三，民建也不少。总的说来，是新时代和新的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现在还在过渡时期，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新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巩固，打这个仗，要几十年，大概要二三十年。因为我们无经验，无干部。有苏联经验在前，可能我们比苏联略好或略差或一样。搞得怎么样，大家要看，我也要看看，不能吹百分之百正确的牛皮。有人说共产党朝令夕改，特别是高教部。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会多就要变，今年基本建设就变了二十九亿。预算头年十一月就需要确定，提到人大常委，十二月就要发下去讨论，一月就要生产。提到人大是实际上的事后批准。缺少经验，需要学习，学自然科学，学计划经验，要积累经验，需要积累几十年经验。有些朝令夕改，是因为没有经验。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的同志谈话，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了十大关系，其中有五条属于经济方面的。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在上海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記錄要点)

(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

同志们：

你们好。

今年三月下旬，就是一百天以前，我在这里同党内的同志们讲过一次话。那时我是来点火的。这一百天左右的时间内，局势有很大的变化，人民觉悟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就是打了仗嘛！当时我们是料到这些事情的，我在这里就讲过，不过当时没说过烧火这句话，而是说人家批评，我们要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以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就加以批评。我们总要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全世界也好，全国六亿人口也好，共产党也好，青年团也好，民主党派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工商界也好，学生也好，工人、农民也好（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多数人都是好人。他们的心都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而是百分之九

十以上。比如这一次，以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教授与学生一起，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百分之一，只有七十几个人。经常闹得天翻地复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还不到百分之一。他们组织小团体，什么“百花学社”、“爱智者学社”、“黑格尔——恩格斯学社”、“孔夫子——毛泽东学社”，后来觉得还是不大妥当，还是叫“百花学社”。学生的“领袖”名叫谭天荣，现在是有名的人物了。这回可出了些英雄！左派、右派都出了英雄。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人后悔了，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瘾。早知这么妙，何不大大开放？让那些毒草长出来，让那些牛鬼蛇神出来，怕它干什么呢？那时，我们讲不要怕，可是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如×××等，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怕天下大乱。就是没有看到这个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百分之九十几是好人，他们是跟我们一块儿的，用不到怕。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打我们，他们用口骂，但是不用拳头打。至于那些极少数的人，譬如刚才讲北京大学学生中，百分之一不到的右派骨干分子，另外还有百分之一、二跟他们拍拍掌，拥护他们的。教授付教授中间，情况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有百分之十左右是左派，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对这些中间派，我们不要怕。我们有一些同志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少数人怕天塌下来，就是河南的“杞人忧天”，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都不怕天塌下来。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小组长、班长、学校里的校长、教授、助教、讲师、党委书记、党委委员、支部书记，包括我们在内，都是领导人物。我们这些人，总有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就是要把我们烧好。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毛病，包括我在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要定期放火。以后我看至少三年一放，五年再放，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放火烧二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不就更好了吗。我们不是讲要锻炼吗？锻，是打铁，炼，是高炉里面炼铁，平炉里面炼钢，炼出来的钢还要锻。那个汽锤可厉害，我在苏联看见过了千吨的汽锤，一万吨的汽锤。我们这些人也要锻炼。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时讲锻炼舒服得很。“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但真正要锻炼，他就不干了。这回应该锻炼一番了，虽不是万吨汽锤，至少也有五千吨吧！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这是二股风，一个是大多数好人的批评，我们是欢迎的，他们批评共产党的缺点，要共产党改。另外有极少数的右派，他们是向我们进攻的。多数人的进攻是应该的，攻得对，这是一种锻炼。右派进攻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锻炼。真正讲锻炼，还是要感谢右派的进攻。对于我们党、对于广大群众、各民主党派、青年学生、工人阶级、农民，右派对我们的教育最大。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是“围剿”。每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他们是要打倒我们的。

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一个党怎么革得起来呢？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他们要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第二，走什么方向，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这个方向？第三，要搞社会主义谁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那么多，先锋队是共产党。资产阶级也有一群，它也组织政党。是共产党领导，还是右派领导？共产党好不好？要不要？人民说要，右派说不要，我看在三个问题上进行一场大辩论，很好。革命

对不对？建设对不对？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不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现在不是展开大辩论吗？这个问题是没有辩论过的。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民主革命从清朝的末年起，经过辛亥革命，到反袁世凯，到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一直是在辩论的，抗日战争时，要不要抗日？也经过辩论的，一派人说不能抗，因为中国的枪不够，这是唯武器论。另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我们还是可以打，以后重庆谈判，旧政协，南京的谈判，这都是辩论。蒋介石一刻都不停地要打，打的结果是他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是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短促突击，在六、七年之内，社会制度的改革已基本完成，人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但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但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就是政府、政府机关、意识形态。譬如报纸是属于意识形态的。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句话讲得不对了。至少在这几十年内，全世界帝国主义没有消灭以前，这样讲不好的。报纸以及别的东西，如哲学、意识形态，它们都是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事业、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自然科学分两部分，纯自然科学，它是不分阶级的，但是利用自然科学，谁利用自然科学，这是有阶级性的。北京大学“百花学社”的首领谭天荣，他就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现在讲物理学的人唯心论可多啦！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也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这一些，社会科学这一方面，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唯心论也多，而且自然科学里头也有许多唯心论，他们的世界观是唯心的。你若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是照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讲社会怎么改造，共产党怎么整风，他就要消灭共产党。我们说要整好共产党，他说要消灭共产党。当时我们的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只听不说，说几个星期内硬着头皮，但把耳朵扯长一些，自己一句不说，我们也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也不通知支部干事会，也不通知团员，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清华大学党委会内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报告敌人了，叫做“起义”分子，共产党员“起义”这一件事，两方面都高兴。北京大学学生党员里头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内崩溃的多一些，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些。这些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们高兴就是了。那种资产阶级思想，唯心论，钻进共产党、共青团，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摇摆分子。他们“起义”我们高兴，不要我们清理，他自己跑出去了。敌人方面，也很高兴。我们把右派一包围，事情就反过来了，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来揭露他，不是起义了吗？还有一些右派也要起义的。现在右派也不好混了。

几个月以前我在这里讲话，到今天不到一百天，时局起这么大的变化。这个斗争主要是政治斗争，斗争的性质是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这一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成份有没有？有，但政治斗争占主要的成份。思想斗争还在下一阶段，要和风细雨，共产党整风，青年团员也整风，经过思想斗争，提高一步，真正学习马列主义，真正的互相帮助。主观主义有没有？官僚主义有没有？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就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斗争还要个把月，右派分子尽是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不好办事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了，右派就是那么多。登得也差不多了，以后就阴登一

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七月，是反右派紧张的一个月，过了七月到了八月就要和风细雨了。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而我们主张和风细雨的。他们说共产党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即使我们从前搞的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在内，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地前进的。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这个时候的右派，那里有一根草，他就想抓了，因为他要沉下去了。现在他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以前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说和风细雨，天天下黄梅雨，秧菖烂掉了，粮食就没有了，就要闹灾，不如急风暴雨简便。现在是夏季，是暴雨天，到了八月，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可挖了。

我们中国历来受到两方面的教育，正面的教育跟反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又是第一个大好“教员”，从前有清朝、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以后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教员不够。我们有许多话，中间人士不听，要另搞一套。譬如“团结——批评——团结”他就不听。譬如讲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又不听。譬如讲民主集中制，他又不听。讲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又不听。讲要联合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他又不听。还有一条，他特别不听，就是说“毒草要锄掉。”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让他出来。让大家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认为这些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长出来，就要锄，农民每年都锄草。锄掉可以做肥料。这些话讲过没有？还不是讲过吗？可是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锄草，就是跟他讲话，可是，草根本不听的，它明年还要长。锄了一万年，一万年还要长，一万万年，年年要长草，认为毒草是我们，他自己是香花。因此，他并非被除之列。他要把我们锄掉，他就没有想到他正是应该锄的东西。

社会主义来的急促。总路线各方面都学习过，但没有辩论。党内没有辩论，社会上也没有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吃下去，然后慢慢再回头来嚼。我们的革命，在制度方面已经基本上改革过了，首先是经济基础，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就是权力机关，意识形态等，这些都基本上改了，但是没有展开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展开大辩论。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你看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传下来了，“十五贯”也传下来了，大字报我看也要传，譬如讲，工厂里整风，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如果是一万张，那是头等，如果是五千张，就是二等，如果只有两千张，就是三等，如果稀稀拉拉只有几张，吃丁等。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白话文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也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也有话剧，资产阶级也有话剧，汉奸也有话剧，抗日时期也有话剧。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并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像是利于资产阶级。所谓一个时候，是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只有那么一点。所谓硬着头皮，也就是那么二、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不是讲要锻炼吗？人生在世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真的把你送到高炉里去烧。有许多中间人士动摇一下，这也很好，动摇一下，他得到经验。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一头是无产阶级，另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很多

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是归根结蒂中间派都是好人，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想争取他们做同盟军，一个时候有点象。无产阶级争取他们做同盟军，一个时候也有点象。中间派也批评我们，但是，是好心的批评。右派的批评是借着这个事来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刚才讲大字报，是方式的问题，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是轻武器，象文汇、光明日报，还有些别的报纸，是飞机大炮。光明日报，文汇报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过去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报纸，什么是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分不清楚。一个时候即使分的清楚，可是这些报纸的领导人要把它办成一个资产阶级报纸。他们仇恨无产阶级报纸，仇恨社会主义报纸。一个学校把学生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把学生领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工商界还是把这些工商业者（大、中、小资本家）引向无产阶级方向，还是把他们引向资产阶级方向？要不要改造？有人非常怕这个改造，说改造就有那么一阵自卑感，越改造越自卑。我看不应该这么解释。应该是越改造越自尊，应该说是自尊心，因为自己有觉悟，才要改造。有些人，自认为有很高的阶级觉悟，认为自己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要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这个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目来改造。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愿意改造的，当然，中间要经过踌躇、考虑、不断犹豫、摇摆的过程。越改造，他就越觉得要改造。共产党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三年一整，五年再整风，你说整了这一次风就不整了。难道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厅主义了？只要过了二、三年，他都忘记了，官厅主义又来了。人就容易忘记。所以过了一个时候还要整。资产阶级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难道就不需要整风？不要改造？你说不要改造，调个名字，叫整风也可以。现在各民主党派不在整风吗？整个社会整风，为什么不好？

现在民主党派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看整得对了。共产党不是路线问题，而是作风问题。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那一条路，走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陈仁炳、彭文应、陆治、孙大雨那条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这三个问题要搞清楚：革命的成绩、建设的成绩问题、几亿人做的事，究竟做得好不好？将来的方向，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走社会主义的话，那么要受那一个党的领导？还是要章、罗同盟来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搞清楚。共产党内有一个路线问题，就是那些“起义分子”。那些“起义分子”是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对他们来说这是个路线问题。教条主义现在不是个路线问题，因为它没有形成路线。我们历史上有一次教条主义是形成路线的，因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政策、纲领，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东西，现在打上一锤子，火这么一烧，它也就软了一点。各个机关里头，学校里头，工厂里头不是在讲下楼吗？不要国民党作风、老爷习气，合作社主任下田同群众一起耕田，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到车间里头去，这样官厅主义就大为减少。出大字报、开会、开座谈会，把应该改正的，应该批评的问题，分类来解决。再学点马克思主义，提高一步。

我们中国民族，是个好民族。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们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既集中统一，又是生动活泼；有民主，又有集中；有自由，又有纪律。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要把人家的嘴巴封住，不准人家讲话。应该提倡讲，应该生动活泼。对大多数人是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样尖锐，怎么痛骂一阵，也

沒有罪。不受整，不给穿“小鞋”。“小鞋”要给右派穿。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你们游水不游水？只要一百天，每天一小时，不间断地搞，你本来一点不会游水的，保证你会游水，一不要先生，也不要那个橡皮圈，有了橡皮圈就学不会，人民就象水一样的，打譬方，领导者从各级小组长起一直到我们这些同志，就是象游水的人一样，不要离开水，不要逆那个水，你要顺那个水，顺着水性。不要去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不要和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犯错误的时候要好好讲，他不听，你就等一下，有了机会再讲，就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不要脱离水，不要逆水，要顺着水性。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认为老子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你们这些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可是决定问题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一部分，就是工人阶级决定问题。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我说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上海有个资本家讲的，我是引伸他的话。他讲的跟我讲的意思不同。他说自己的东西都交出去了，公私合营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说我是资本家？还说我是剥削者？知识分子从旧社会中来，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过去知识分子的毛，是附在这五张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订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过去或者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现在是“皮之不存”皮没有了，帝国主义跑了，东西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打倒了，土地归农民，现在归合作社了；官订资本主义企业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公私合营了，基本上变成社会主义了；小生产（农民、手工业者）所有制现在也改变了，变为集体所有制了。虽然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尤其是人的改造，人的改造时间更要长一些了，因为这五张皮影响着这些资本家，影响着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老是记着这些东西，做梦也记着。旧轨道过来的人，就是留恋那个旧生活习惯，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就是附在公有制这个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请的先生，可是你要教你的那一套，要教八股文，要教孔夫子，要教资本主义，让你吃饭拿薪水，那工人阶级是不干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社会经济基础，也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现在他除非落在新皮上。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在天上飞。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空中飞。五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可是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有无产阶级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搞好，要拉朋友。可是他不干，他还想那个旧的东西。我们现在劝他们，经过这一场大批评，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我们现在在劝中间形态的人，中间形态的人应该觉悟，尾巴不应该翘得太多。你的知识是有限的，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那个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你就犯错误。你那么多知识，为什么犯错误？为什么动摇？“墙上一根草，风吹两边倒”，你为什么动摇？现在不去讲右派的知识分子，那是根本错误的。中间派知识分子也犯错误，他犯的错误的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头脑不清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农民里头的过去的半无产阶级。他一看就知道孙大雨这一套东西，他一看就知道不对，只要谈三句话，他就知道不对，用不着写这么长的文章。你看谁的知识高？还是

那个不识字的人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是听无产阶级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这些人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他们不可，就非到各个地方跑一跑，跟他们谈一谈，看此事能行不能行，跟他们商量，以及跟他们接近的干部商量，就要到地方上来。北京是什么东西也不出的，他没有原料，原料都是工人、农民那里拿去的，都是地方拿去的。中共中央是一个加工厂。就是把这些原料制造好，制造不好就要犯错误。知识的来源，是出于群众，归根到底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什么叫真正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讲不要脱离群众的。象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孙大雨那些人怎么办？打他几棍子是必要的。攻得他想回头，切实地攻，使得他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因为他们还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这样的人争取过来是有用处的，多少可以做点事情。而且他们这一回头又帮了大忙，给我们当了“教员”，教育了人民。他是以反面的方法，从反面教育了我们。我们并不准备把他抛到黄浦江里，还是要治病救人。也许这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他不愿意过来那末也好，那就带到棺材里头去，孙大雨现在多少年纪？算他活一百岁，还有五十年他坚决不改，巩固得很，这个堡垒攻不破，也就算了。尽攻他，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气，我们现在要办事，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了得。有那么一部分人不肯改，就让他带到棺材里面去见阎王，他可以跟阎王说：“我可是有骨气，我是‘五张皮’的坚持者。我跟这些王八蛋、共产党、中国人左翼、同广大群众作过斗争，要我检讨，我都抵抗过来了。”可是现在阴间的阎王也改了，阎王第一个是马克思，第二个是恩格斯，第三个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地狱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地狱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这些人到阎王那里也是要挨整的。

讲的多了，不讲了。谢谢你们听我这个讲话。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整理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

（据新北大“雷达”战斗队翻印稿翻印）

在青島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

（谈到工商界）现在是过第三关，过第三关顶少还要十年。历史上包下来一批王八蛋，一路来敲锣打鼓，拥护了七年是假的，只是到了现在，他们就翘尾巴了。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坊。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他们就找岔子，并且搞组织活动。估计到他们有一部分人随时会叛变，但历来都没有暴露他们的办法。现在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上整风，右派分子的头子就翘尾巴，反共反社会主义了。把孙行者的尾巴打下去，花果山的猴子就不神气了。抓住改造，逐步把领导权转到左派和中间派手里。各省市基层把民主党派，教育界的领导权拿过来。学校实行党委制可以考虑，但我们必须领导学校，领导权过去是不巩固的，有一部分领导权是在人家手里，缺乏战斗力，一时

搞得天昏地暗，例如清华大学党团员占百分之八十，但党的领导并不巩固。科学技术界，新闻，艺术，出版，教育，卫生界，都有左中右，我们不占领导阵地，就搞不成社会主义。总之，要搞意识形态，要搞知识分子。过去搞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没有好好搞教育界。过去省委书记怕见大学教授，现在见了一下，见出名堂来了。再摸一个时期，就更清楚了。

敌我双方对政治形势的估计都不大对头。敌人方面对形势估计错了，我们对自己的估计也不是那么正确，在鸣放期间，觉得我们的力量比较小，对工农兵——我们的基础估计不足。现在看来，在工农党团员中只有少数，大部分是好的，我们也为假象所迷惑。

多次人民代表大会，政协都要斗一坊。名义上在台上参加政权，大体上顺着我们，实际上是反对派，拥护是假的。到去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提出的“两百”方针，加上匈牙利事件，他们开始翘尾巴了。首先看出这个问题的是陈××等几个同志，说百花齐放可以，但放的不妙，放出牛鬼蛇神了。周恩来二月回来以后，罗隆基公开批评总理的外交报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还有几个学校闹事，工厂闹事，农村闹事，以为形势不妙了，其实就那么几个人，就是大学也是九个指头是好的，只有一个指头不好。反右只有一个多月，就看出来了。民主党派打他百分之二十，也还有百分之八十，经过六月，七月半个月，我们就完全清楚了。凡事皆要加以分析。分析了就有底了。这一下我们的心就放下来了。

敌人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工农估计不足，对左派也估计不足，这一点右派同我们一样。在中国搞匈牙利是搞不起来的。放，还应当有决心，不然就放不起来。

还有，广播，电话，电报，邮电要抓住，不让民主党派去发展。民主党派要抓住其中的右派，狠狠的打，在打的当中，建立领导权。抓住这个时期搞他一年。如果搞到明年六月，全国人大改选，我们假如再提他们的名，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的。经过反右派，一定要换掉一大批。地方，明年年初就要开始政治改组，三月各省把改选搞完。我们这样估计：打算打一年。现在报纸上这样积极地吹，总吹也不行，还要搞点别的。右派分子虽然多，但头儿已经打了，打右派主要是打头子，把头子打了，就不好作怪了，以后采取剥笋政策。其他的人，那怕也有些错误×他是领头××，×××，×××怎么打法？×××反人民，不公开反共不闹事，但死也不改。右派分子人数虽少，但不可小看，对右派分子要剥笋。

知识分子多数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工农事业不那么有感情。但他们有这样种种倾向，只要他们今天倾一点，明天倾一点，再过十天功夫就改造了。山东提议：要反右派的事情向工人农民作宣传。地主、资产阶级好象都在替工人，农民说话，我们要讲右派怎样进攻，我们怎样捉住了一批右派（如广东罗翼祥）。对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

合作化没有希望？有这样一些富裕中农，本想叫他们慢慢进社，也挡不住，进来了又想退出去。是否让他们退出去？从阶级路线来看，少数不愿在社的，可以让其退出。山东临沂地区一百多万户，退了一万户，过去闹事最多，现在是全省比较太平的地方了。退出去的不要挖苦他，也不扣右派帽子，将来愿意来的就来，要退的大体上有百分之一。愿意退的就允许退。今年秋天下这个决心看如何。

农村、工厂整风如何整法，要把解决的问题收集一下，准备意见。中央拟于八月十五日到二十五日开一次中央全会，地委书记也参加，研究整风与体制问题。党代表大会可在一、二月底到春节前召开。

整风问题，头一步以政治为主，结合思想（阶级敌对的、内部的）；下一步以思想为主，结合政治。这里讲的政治，主要指反右派斗争。其实，同敌对阶级的斗争，多数人向我们提的意见，如傅鹰，和我们不是敌对阶级的关系，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是政治关系。如权限下放，也是政治关系。但象张轸那样的家伙，写信批评周，×，就要狠狠斗，要登报。这些人要告诉他好好重新做人，留一碗饭吃。民主人士的职务要重新安排，代表，委员，部长，厅，局长，在这次运动中有功劳的要上台，右派要下台。他们由长期共存，变为短期共存，由互相监督，变为无权监督，自己否定自己。

有职无权，人事制度，评级评薪都是政治性的问题，调整关系的问题。

每天都有高潮低潮，上报的人数要增加，并且要各行各业都反映到报上去，这样就不单调。下一步整风，思想要搞得深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也要费点时间，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

今后反右派斗争就是两个字：一叫深，一叫改。对内和，对敌狠。徐州地委有百分之五十的基层干部是好的。另外百分之五十分三类：轻微错误的有百分之二十，比较严重错误，手头不干净的有百分之二十九，严重违法乱纪的只有百分之一。前两类可以主动下楼。办法是开开干部会，肯定成绩，检查错误。

什么叫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总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倾听群众意见，加以分析。好象游水一样，要顺水性，或者说是鱼水关系。干部脱离群众，就不能活。过去军队在战争中都是搞三大民主，为什么现在工厂、农村里搞三大民主呢？军队是拿着枪的，都不损害干部威信，为什么县、区、乡干部不能这样作呢？对干部一个是撑腰，一个是帮助。毛病要改，又不要伤害干部。大家批评一下，一篇检讨就可以过关，要教会基层干部过关。农村，工厂不能采取市机关，学校的办法。而采取三级干部会，社员代表会，支部大会，职工代表会等，就是陈伯达同志的办法。陈伯达在福建的办法，开始区、乡干部都不赞成，后来大部分的干部选上了，选举不要党团员保证，而是充分酝酿，群众提名。各省可搞点经验。

工厂干部要下车间，还要到宿舍。

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该是讲道理的关系，不是我打你通，我压你服。共产党不怕群众。实行民主的结果是增加威信，而不是降低威信。过去军队实行民主，就打胜仗。

反革命搞得厉害的地方，要镇压。肃反不彻底的，要杀一些人。少杀不是不杀，杀少数人是完全必要的。浙江仙居，临海两县，合作社解散百分之八十。每年准备一百万人闹事，或者还要准备多一点。

河南长葛县修飞机坊赶走农民，打伤四个人，这是国民党作风残余。有些国民党作风残余的是合乎实际的，一定要整好，虽然是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彻底整好。这次整风，要想一次整好，一劳永逸，我才不信。现在要把闹事的数目扩大一点，六亿人民每年准备有三百萬闹事，百分之零点五的人闹事，经过几年右派一闹，我们摸了底，就不怕了。过渡时期有个不稳定的时间，再有五年半能把社会秩序大体稳定下来，就是好的。总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陈伯达讲的不是狭隘经验。

（以上是7月17日上午会议上讲话）

（谈到打右派）北京打击了一千五，全国要打出十个北京来。大树是有根的，

大地主的儿子。这是新式肃反，要好好交待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的斗争策略。

大字报是好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怕大字报？因为我们总是多数。

工厂一定不要妨碍生产，那个地方烂，崩溃越多，那个地方就越好办事。省要派有经验的干部下去，硬着头皮，大放大鸣两个星期，只听不说。

（谈到区、乡、社整风问题）每个五年计划搞两次整风，一大一小。

不要搬石头，现在我们还靠这些石头。粮食年年增产，但是越来越少。去年动用库存七十亿斤，今年一定要搞八百五十亿斤。穿也是大事，现在折半了，越搞越少。怎么得了？

有反必肃，抓起来再说。不能象胡老头一样、罪已诏千万不一下。

手工业社脱产人员太多，浙江兴登县七万人有三千五百多官，真是太多了，应该成三千，留五百。工厂非生产人员也太多，占百分之三十。苏联百分之二十五，美国只百分之三至五，现在要考虑。多的人要养起来，几年内转到生产中去。用节约下来的钱扩大经济事业。

整风范围扩大，党、团、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学校，艺术界，经济事业机关，合作社都要整。

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

共产主义者协会要大于共产党，中央领导同志去当会长。

地、富、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调皮再给戴上。搞个劳动教养条例。死刑不要轻易废除。地、富、反革命的选举权，不要给得太早了。不搞大，只搞小，这些关口要卡住。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反右倾思想，右派，极右派，合乎人情，顺乎天理。各省市对民主党派，不管其中央，予以腰斩。

（以上是7月18日会议上的讲话）

在上海听取整风情况汇报时的指示(摘录)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

要青年学生打杂扫地，也不是一件坏事啊！我看对青年一定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教育青年不再轻视劳动，要愿意参加体力劳动，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摘自《毛主席关怀我们》一文，《中国青年》一九五八年第二十二期）

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

中国两次革命，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思想只是在党内作斗争。当时有两条道路，解放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是无产阶级革命。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主要矛盾，我认为在理论上是沒有问题的。

一九五三年在财经会议上提总路线，开始还不敢在全党宣传，先讲到县一级，五三年底在政协上讲开了。跟着宣传部起草了一个总路线宣传提纲。三年半以来，给资产阶级以严重打击，对个体经济也给了打击。因此反映到八大决议上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这句话也沒有说错。基本解决不等于完全解决。政权问题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经济上和政治上沒有完全解决。

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的右派，一部分富裕中农，站在人民中反映人民。那时不是完全看得那么清楚，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看到（那时还是提了改造）。当时他们服服贴贴，所以说基本解决了。今天强调这个矛盾是因为他们要造反。到今年青岛会议时就看清楚了，提出了城市和农村还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沒有熄灭，这次右派分子疯狂进攻，就应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但策略上还是按青岛文件上那样讲的好，到会的人晓得主要次要就行了。很长时间不讲了，如果现在加上去，闹得天翻地复这不好。现在应再按青岛的讲法说他三个月。

工人中也有资产阶级思想。党内的三大主义也挂在资产阶级账上。两条道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暂时不在报上讲。讲了有可能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冲淡了；另外是内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任白戈讲的，可以从理论上写这个问题。

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个人与集体、青年与老年、工人内部等矛盾，是大量的东西，突然提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是主要的，是否会影响鸣放？也不一定。但是要影响劳动人民内部吵架。

人民有两部分，一部分剥削过人，一部分沒有剥削过人。受资产阶级影响，一部分人少，一部分人多。过几百年后就不能再挂在资产阶级账上，那就是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矛盾基本解决，说的政治制度和所有制问题。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势力的问题大量的还没有解决。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唯心主义也是上层建筑，也得解决。

去年资本家敲锣打鼓之后，马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说不出口，不得人心，于我不利。以后鸣起来了，就好办了，取得经验就好办了。我们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们就放出来了。过去资产阶级是服服贴贴，现在是大吵大闹，我们提鸣放，右派提大鸣大放。我们说在

文学艺术和学术上鸣放，他们要发展到政治上。今年共产党与右派合作找出一个好办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形式。在延安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胆子，没有经验，没有禁止，也没有放。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这次大鸣大放增加了我们的经验。将来还是鸣放的。百花齐放不包括反革命在内。一年一放还会放出来。把人民当敌人压是很危险的。论人民矛盾正是防止采取压服的办法。

第一条：在过渡时期肯定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

第二条：在一定时期在报纸上不讲，继续宣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加这两字，免得引起许多麻烦。

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目前正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中解决，一提出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将影响整改。

人民内部包括三个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存在这三部分人中，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是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有区别。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是非对抗性的，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中心问题是三部分人之间的矛盾。其中有一部分是暗藏对抗的，如和章伯钧等的矛盾就是对抗性的矛盾。对待这种对抗性的矛盾是采取剥笋政策，每年剥一点，今年剥了一些笋皮，但是剥不完。有两年不宣传社会主义就出来了。以后还要剥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没有错误，但是没有青岛的一篇就不够。现在主要问题不是封建残余、帝国主义残余（矛盾还是存在的），湖南捉了七千地富谁也不说话，但捉一个章伯钧就有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问题。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家属三千万，是大问题，工人阶级三口人家，最多四千万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农村富裕中农）。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有左派，大量是中间派，右翼只有百分之一、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教育问题，批评问题。我们所提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资本家还有公民权。社会主义不能说是反帝反封建了，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余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同盟军。所以地主爱文汇报，是反社会主义的。

右派分子现在六万（一作五万——编者），将来顶多十五万到二十万，其中可以分化，应该去分化。如对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自然科学家、学者，能分化出来更好，要对他们进行工作。对一部分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

现在明确：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主要（或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基本上解决了，但没有完全解决。地富反坏赞成资本主义，剥削人的人赞成资本主义，也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两条道路斗争是经过长期斗争来解决的。“主要”和“基本”是一个意思。

八大决议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讲道理不能这样讲。现在矛盾，将来也还是要矛盾的，到合作社都改为国营农场发薪水的时候，也还是有矛盾的。社会主义由两部分组成、公有制、集体制，将来二者也要发生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基本适合，也有不完全适合的地方，还有缺点，讲完全适合不对，斯大林提完全适合，就出了问题（报告第十四页）。宗教这种意识形态就不适合社会主义，但是还要修庙，修庙是为了达到毁庙的目的。为什么说大体适合呢？因为可以发展生产力。印度搞五年，增加了三十万吨钢，我们增加四百万吨。我们的制度不妨碍生产力发展。几十年后，集体与国

营矛盾解决了，还会有新的矛盾。到共产主义价值法则不要了，军队不要了，当然也要国际环境许可。八大决议这句话，马、恩、列没讲过，但也沒有害处。意思是要赶快发展生产，充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是沒有讲清楚，带语病的性质，沒有认真的讲清矛盾，是比外国、比将来，这句话现在也不必改，现在可不谈这个问题。列宁讲过苏联政权与落后的技术有矛盾。现在不讲，以后解释清楚就行了。严格地讲，说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不适合当然是不对的，我们恰好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生产力。许多经济学家说我们的制度与生产力有矛盾，说社会主义制度落后于生产力，这种说法不好。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领导方法，基本上有两种，按照一种方法领导，我们的事业可以进行得多快好省，按照另外一种方法领导，我们就会进行得少慢差费。

不仅革命工作有两种方法，建设工作也有两种方法。我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是个正确的计划，它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可是，这个计划能否再进一步作得更好一些？看来是可能的。例如，我们如果一方面充分发展大型企业，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中型小型企业，一方面抓中央管理的企业，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地方企业的积极性，速度就可能更快一些。现在看来，我们能否以十八年的时间，即三年恢复时期加上三个五年计划时期，达到年产钢一千八百万吨，甚至两千万吨呢？如果我们的方法正确，经过努力，有此可能。

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是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两种方法。不进行斗争，不反对少慢差费的方法，多快好省的方法就不能实现。我们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除了提出“多快好省”的口号，还提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这个纲要，是一个多快好省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纲领。我们还提出了一个“促进派”的概念，就是说，大家都应当作促进派，不作促退派。由于有了这几个东西，一九五六年我国整个经济文化事业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当然，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多用了点钱，多招收了一些工人，市场供应有某些紧张。这个缺点并不大，很容易克服。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一九五六年“冒进”了。吹起一股风，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四十条”、“促进会”这几个东西都吹掉了。结果就影响今年经济建设的进展，特别是农业的进展。这个经验教训很大，不能不接受。总之，给群众泼了凉水，损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论作什么事总要发扬群众的积极性，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对于工作中的缺点也要批评纠正，但是要在保护干部和群众积极性的条件下批评纠正，既批评他们的缺点也批评我们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一股劲了，我们的工作就可以作得更好了。我看，一个“多快好省”，一个“四十条”，还有一个“促进派”，都是好东西，不能吹掉，必须恢复。

我高兴的是这个会上有同志讲到“多快好省”的口号。

多和快有了好和省的限制，就沒有弊病了。多和快，就是要求多办事。好，就是要求质量好。省，就是要求少用钱。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么，多和快就沒有毛病了。当然，“多快好省”应该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不应该是主观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不是在主观主义的条件下，总应该尽可能争取多一点、快一点。

中國共產黨八屆三中全會總結時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一、这次会议评论一下究竟开的好坏？省委书记说很好，怕有的同志，不一定这样看法，开的很长很累，有些同志害了感冒，我也感冒了。恐怕成绩是主要的吧！交换经验，明确方向，统一意志，有很大好处。这次会议有两天没有参加，发言也未看完，我打算全看一遍，有的要看两遍，也怕你们没看完，希望你们也看一遍，这次发言有很好的经验。这样的会有必要一年开一次。我们是大国，工作复杂，一个也要开一次这样的会，省、地、县、区四级参加，加一部分社主任，中央明年打算一部分县委书记参加，我建议一年一次。去年未开吃亏了，来个右倾，工作松了劲（因开八大，无时间）。一年一次大概需一个月时间，各省可开一次四级干部会，把问题扯清楚。

二、整风讲几句。湖北提“大胆的放，彻底的放，坚决的放”的口号好，广东南方日报用这样的题目写了一篇社论，很好，还说要大胆的放，彻底的放，坚决的放，认真的放，也得认真的改。反右上了轨道，不必提大胆的反（主要是县以下基层还要反右派），省、中央也还要放，但主要还是要改的问题。今年整风创造了一种革命的形式，即几大：“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现找到了这种形式，过去是找不到的，不能产生的，层层辩论那时不许可，因而土改打仗不能采取这种形势。现在我们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政权是巩固的用摆事实讲道理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找到了适合阶级斗争的形式，今后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大事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整风也好，建设也好，都可以用辩论形式解决。不仅与中间派一道，也与右派一道，农村与地主、富农一道，上报，骂的狗血淋头，“党天下”、“下轿”等，这是好的形式，容易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责任心。过去也有扎根串连商量，连长与战士平等友爱的谈话，这是民主的传统，无此传统是不可能有的“几大”的，延安整风是写笔记，开小组会、反省，大家都感到帮助很大，搞了几个月，那次克服了主观主义，以后三查三整，三反五反，扎根串连都表现了一定民主形式。但大鸣大放和大辩论，这种更大的民主形式则是这次产生的，找到了这种形式对党的事业，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有极大的好处，这是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发展，要传下去。社会主义一定要能充分发挥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别的阶级是没有的，在此基础上实行集中，就可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巩固的集中制。民主是为着加强集中制，而不是削弱它。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只有几千万，专政靠几亿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贫苦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发动他们的积极性，就可以巩固专政，加强集中。

三、农业。四十条修改后发下，在农村中希望很好组织一次辩论。提高认识，作出规划，省、地、县、区、乡、社我都问了一下。省、县、乡、社应该作出规划，专区和区也要作规划。这六级要作，抓紧搞。全面规划（即计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去年下半年不大强调了。这个老口号，现在还要强调做，何时作好规划？我问了一些同志，有

的已做好了，有的还未做好。是否在明春，省、地、县三级做好，或明年“五一”前做好，不行就在明年底，这是长远规划——十年至二十年，定出后可能不完全合适，做了不合适将来修改，总是要修改的，大概是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有规划比没有好。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五、八”就有危险，抓紧即可完成，要靠精耕细作吃饭，我国将来要是世界上最高产国家，现在已拥有潮汕千斤县。”四、五、八”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还有二、三十年就行。二十世纪速度快，不要照旧历书行事，最多也是廿一世纪初就可以达到，我看农业生产，地也不要那么多，有人就好办事，每人有几分地就够了，三亩地有些多了，当然还有节制生育，我不是奖励生育，各级规划都要到农村去讨论，规划很多，可分级分批的去讨论，粮食已有底，大小口平均四百斤就够了，种子、饲料不在内，湖南湘潭地委发言说，有一家七口人，每人五百零九斤，只吃四百斤，每人还余四百零九斤，南方四百斤稻就可以了，河北只有三百廿斤，三百一十斤，二百八十斤，豫北辩论的结果，过去富裕中农才吃到三百六十斤，还大喊大叫不够吃，饿死人。要很好的提倡勤俭持家，节约才能积累，国家、社、家庭都要积累，否则都吃掉如何能富裕。今年未受灾和收成好的地方要坚决做到“以丰补欠”，多搞一些积累，湖南提出搞百分之二十的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在外），全省共六亿元，不是平常的生产费，而是买肥料修农具，内有28%的基础（山区、平原不同，有多有少）即每年一亿二千元，这样做到很好，你们看可以则行，不然扣多了，就无优越性。管理费一定收缩在1%之内，以之增加到基层上面。要教育全国每个人要有志气，有远大目标。到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情况会大变，要看这一点，大吃大喝不算什么志气，还要勤俭持家，大约有十年就好了，你死了还有儿子、孙子、红白喜事应该少办，棺办农民大概还要的（我们中央的同志死掉烧掉，已经签了名的，要火葬否自定），但要节省，慢慢来，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也可以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解决，也搞个十二年规划狠狠改一改，要不要赌博，也只有通过辩论，改变风气。关于除“四害”我是有兴趣，但无人响应。同志讲的不多，幸喜有广东省韶关地委乐昌县搞的好，已做出榜样，消灭“四害”，把卫生搞好，这是文化，要提倡，两双筷子吃饭很好，可是费点竹子，但这样对手工业有好处，就多做生意。我提议：从明年起，两年试点、五年普及，三年扫尾，行否？或者三年试点，五年普及，二年扫尾，两头小，中间大，各地可参差不齐。我对这四样东西很感兴趣。中国要变成四无国好不好？过去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三无，“即无政府、无家庭、无阶级”。将来无政府是可以实现的，无家庭几百年之后也会不存在的，家庭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现在生产单位已不是了，条件全部改变即没有家庭了，大概需一千年，现在首先搞“四无”，把“四害”除掉，使我国变成高度文化的国家。

人口节约，要三年试点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计划，不然人口达八亿再搞就晚了，初步达到计划生育。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推广，山区人口过少的地方也不推广，也要大鸣大放大辩论一下。我主张中学也加一门节育课，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有计划生育。还有各地搞规划，有个综合规划很重要，即工农商学（无兵）的计划要结合起来搞，不是各搞各的，请你们看浙江的文件，红安县的经验很有用，各级农村工作领导同志都搞点试验田是好办法，我也很想搞点试验田，县、区、乡、社干部各搞一块试验田，这样搞技术就摸底了，无业务不行，要学点，内行光政治不行，工、商、农业都要懂点业务。今天讲的是农业，也搞个十年规划，十年，技术业务都要熟悉。我们不要先红

而后专，一定要又红又专，现在的干部是先红后专，有些红也不红变成右倾机会主义，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不专。有些人提出先专后红，这是资产阶级观点，我们不要，但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建立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知识队伍，斯大林说：“干部决定一切”，就是说的技术，业务是可以学的，五十岁也可以学，不要胆怯，问题是在肯学，我们能的就是红星旗很红，政治上行，技术还是不行，右派和我们争的不可开交，说服不了人家，所以还要学。组织科学技术队伍，省、地、县都要有计划。十年内党委就是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都要有计划变成专家，百年树人，现在要减少九十年，要十年树人，在北方十年树木不行，树人是可以的，无此一条，没有庞大的技术队伍是不行的，社会主义是建设不成的，我们已解放八年，再十年，即十八年树人，基本上造成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技术队伍，以后就是扩大加强科学技术队伍再有十年，即二十八年达到苏联四十年的水平，缩短二十年，行否？这是可能的，因为有苏联的经验。

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同志讲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动摇，在此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建成现代化的工业与现代化的农业。光说现代化工业（其中包括现代化农业）还不够完善，过去宣传工业是对的，今后要着重多宣传农业。

四、两种方法。凡事至少有两种方法，才能有所比较，一种是比较差的慢的方法，一种是比较好的快的方法，我们就可以选择比较好快的一种，如修铁路，一般都要选择几条路线加以比较，最后才确定。如大鸣大放好，还是小鸣小放好，要大字报不要？大字报哪个好？这里都有比较。不要大鸣大放总是放不开。北京市有几十个大专院校没有一个顺顺当当放得开，做了许多工作，一次两次会最后逼上梁山，不能不搞，否则引火烧身。过去革命也是有两种方法两种政策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才摸到一套正确方法，进步比较快了，建设有两种方法两种政策的，也可以有这样那样，如苏联、南斯拉夫、波兰……等国家的方法就不一样，这些国家不同方法，我们可以选择做参考，但比较起来，苏联的建设道路是最正确的。我们革命有经验，在建设上经验甚少，苏联已经四十年经验，我们只有八年，苏联经验基本上是成功的，是较完全的，将来还会有错误，当然成绩是主要的。苏联比我们强，我们要学习苏联，学习有便宜，不学习有损失。学习有很大好处，不学习有很大坏处。特别在我们反了教条主义后，学习苏联还不会有什么危险，学习对我们只有利而不会吃亏。因为苏联的经验最完全，比如人造卫星，现在大家都说它行，过去中国就有人（龙云）说它不行，美国也看不起它，可是他就放出了这个东西，五天了还在转。我过去也不相信什么人能到月亮去旅行之类的宣传，现在相信了，因只懂社会科学不懂自然科学，我不是专家，只红不专，现在看来，月亮可以去，金星、火星也可以。他们说五年到十年可以去月亮，我现在如还不相信，那就变成顽固派。但是，是不是可以将苏联的弯路撇开，比苏联搞得更快一点，质更好一点，苏联从一九一八年底才有四百万吨钢，再经过二十年只搞到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点时间达到二千万吨钢，这就说明我们可以搞得更快一些。我主张今后小钢厂多开一点有好处，比如二、三十万吨，三、四十万吨很有好处。

五、去年扫掉了，把多、快、好、省扫掉了。好省没人反对，但多快不提了，实际上多、快、好、省是互相制约的，好省是限制多快的。不象卫星跑的那样快，不切实际的多快，即不可能多快，那不能搞。但反过来，好是好，省是省，就是那么一点点，慢得要死，那也不行。我高兴的是这次会有个别同志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完全的口号。我看要实事求是

是，要提倡合乎实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去年把这个口号扫掉了，现在要恢复这个口号，你们赞成吗？还扫掉农业纲要四十条，四十条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共产党应该永远是促进会。我们有许多委员会，最根本的是共产党委员会，究竟你是个促进委员会，还是个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去年二中全会组织个小组促退，就是去年多花了三十亿，就只能在这点促退一下，多促退就要犯错误，也就是说，不可过分强调反冒进。因右派是促退派，我们与右派的根子不同，我们永远是促进派，要促退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如农业发展纲要上的六百万部双铧犁被促退了，消灭蚊子、苍蝇、老鼠、麻雀我是始终坚持的。

六、关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问题。这是主要矛盾，毫无疑问。过去是反帝反封建，已经解决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消灭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在农村中是改造小资产阶级，中心问题是以合作化解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七、八大决议没有否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为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八大分析是指生产力讲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来是非常正确的。

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这一套。在群众中间创造了这么一个方式。这个方式跟历史上有所区别的。在延安那一次整风，也有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敢推行，恐怕也是有点怕。后头有一个三查三整。三查是查历史，查工作，查思想，三整是整什么我忘记了。那个时候我们新华社社长范长江就下不了台，整了他两个月，然后才翻身。因为发动了群众。三反中间有多少个部长下不了楼，后头我们摆了梯子才接下来。从前军队里头，在战争时期，依靠战士们，依靠当地人民，没有那个地方发响，没有那个地方创造枪炮的工厂，就只好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军队，地方都形成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整个革命时期，就没有现在这个大放，大鸣，大争，大辩，大字报。三反五反没有搞大报。三查三整没有搞大字报。再上去，延安那个时候出了一点大字报，我们也没有提倡。这是什么理由？我想或者是我们这些人那个时候蠢一点吧？恐怕还有客观原因，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内部又这么大吵，那就不好了。现在就不同了，那样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基本上结束了，全国和平了，所以才出现这样一个东西，找到了这么一个形式。这种革命的内容，它要找到这种形式的，现在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了建设，而找到了这种形式，就可以很快普及，

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虽然有几怕，主要是两怕：一个就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你们胆子那么大？我就不那么十分相信。因为我们有许多人也是怕乱的，你说我一点也不怕乱呀？各民主党派是不是也有一点怕乱？还有一个是怕下不了台。当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这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好说了，比如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科学校，开了多少会才放开。北京大学的江隆基算是愿意放的，也开了多少会。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除开个别人，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了。比如冯雪峰，他是个出版社的社长，他在那里放火，他就下不得台了。那是少数人，就是右派。他放的火，他的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冯雪峰是个共产党。其他的人就不要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多数，要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人是好人。应该讲，工人多数人是好人，农民多数人是好人，资本家多数是可以改造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成员，共产党，青年团，应该相信多数，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的。所谓多数，究竟什么叫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就叫多数呢？不是这么个数目，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现在全国，我跟地方的同志摸一摸底，究竟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这个事，什么人都是生的，我们都是生手。我们过去只是搞好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但是破坏封建阶级所有制，买办阶级（蒋、宋、孔、陈那套人）所有制。所以有许多人在民主革命阶段，他可以过来。某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也不热心，但是他可以过来。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他肯干的，比如湖北省有那么一个雇农叫刘介梅，报上登了的，他是三代要饭，后来翻了身，发起来了，现在当了区长一级的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这个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社，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他开了展览会，痛哭了，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愿意改。他是湖北黄冈县的，在那个县里开个展览会，他就当指导员，分两个阶段，要饭的阶段，同后头发起来的阶段。象那样的人，我跟湖北同志商量，恐怕可以不开除党籍，因为他愿意改嘛。民主革命可过关，而社会主义这个关就有些人难过。因为这是最后一关，它是要破私人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少时候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大体上我看要三个五年计划或者还多一点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五年计划，还需要十年左右。但是我看今年这一年是一个高峰。以后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洪峰？象每年七、八月，八、九月间，黄河的洪峰要来，以后这十五年是不是年年要来洪峰，你们水利部要筑堤，（笑声）我看恐怕不是那样，这个峰越搞越小。六亿人口中间，出了十几万右派，也是很少。我说全国人民中间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赞成社会主义，他们许多同志摸了这个底，有人说百分之十五，有人说没有百分之十，只有百分之几。大概百分之十可靠。对于社会主义，按他本心是不赞成的，这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于个别的贫农、下中农、工人，刚才讲的刘介梅那样的人。六亿人口中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有六千万。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他看小了。在这上头，我们就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第一个同盟军是在农村，有贫农、下中农和一部分富裕中农。刚才讲，有人说百分之十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插话：是中农里边的百分之十五）我是讲全国人口，我跟一些省委书记摸了这

样一个底。但是所谓坚决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的，很坚决的，可能要带到棺材里去的，他就不改，什么社会主义，他不听，月亮还是美国的好，中国的月亮差一点，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刚才你（指×××）讲了，三百万人里头的比例是百分之二点二，全国人口里头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一千二百万如果集合起来，那是个很大的军队，如果他手里拿了枪，那是一千二百万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不会大乱？因为它是分散在这一个合作社，那一个合作社，这一个农村，那一个农村，这一个工厂，那一个工厂，这一个学校，那一个学校，这一个共产党支部，那一个共产党支部，这个共青团支部，那个共青团支部，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他不能集合。所以我们的基础，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我们把地主同买办这两个阶级不算，那两个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对象。我们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厅资本主义吗？帝国主义在外国，现在我们已经赶走它了，在国内就有一个封建主义、一个官厅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同买办阶级，那是一个革命对象。这一个革命是在什么范围之内呢？是一些什么阶级发生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样三个阶级。

无产阶级数目很小，但是他有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同盟军，就是贫农、下中农。贫农是半无产阶级，下中农是中农，是有产，但他是比较苦的，这个数量，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富裕中农大体占百分之二十。现在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一部分是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两可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地主也有分化，地主现在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因为这几年的教育，出来了一部分不闹粮食，赞成统购统销，赞成合作化的地主，富农也出来了一部分。不要以为现在的地主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富农都是反对社会主义，资本家都是反对社会主义，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反对社会主义，事实不是那样，要加以分析，这里面坚决分子是大概百分之二。所以我们就要相信多数。你看，百分之九十嘛！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以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那个坚决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当然要注意，刚手×××同志讲了，他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呀。地主更没有威信。买办资产阶级是丧失了威信的。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威信了。比如农村的富裕中农是有威信的。因为富裕中农生产是比较强的，贫农赶不上它。至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国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不是说过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财富吗？的确是，你那一样都是缺不了他，没有他，不能开学校，教授离不了他，中学小学教员离不了他，办报纸要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这个阶级人数不多，几百万人，连他的家有几千万人，大概有三千万人。听说真正的资本家七十万，不包括家属。知识分子可能有四、五百万，我说一共打他六百万，五口之家（因为他们比较富裕，生儿育女比较多），五六就是三千万。这个阶级比较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自己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来，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无产阶级，大字也不认得几个，就比罗隆基高明。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

同他们的知识分子，包括中间派，他们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是不服气的。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实际上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但是这里头就要分析了：右派是对立的，非右派是半服半不服。不是讲这样也不能领导，那样也不能领导吗？不仅是右派有这个思想，别人也有。总而言之，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就非搬外国去不可，无产阶级非上月球不可。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讲那一行，他都说你不行。我说经过这一次辩论，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那个文化不高明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讲文化，讲本领，贫农不如富裕中农，但是讲革命，就是他们行。这可以不可以说服多数人？可以说服多数人，多数人完全可以说服。资产阶级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我刚才讲，富裕中农只有百分之四十是赞成合作化，有百分之四十是动摇的，只有百分之二十是不赞成的，这个动摇的就可以说服他。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这许多人，多数人都可以说服的，用说服的方法，不大服气，慢慢他就会服气。我看还要过若干年，大概经过十年。比如对苏联总是不服气，现在放出一个“月亮”来，好象又有点行了。（笑声）在苏联也是经过这个阶段的，说共产党不行，这样不能领导，那样不能领导，现在他们早已解决了，革命四十年了，我们还只有八年，所以难怪。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拥护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只要不是冯雪峰、丁玲这种人，也不要怕下不得台，怎么下不得台呢？可以下台嘛，无非是三大民主，有则改之。

在这个基础上，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在这个时候出现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字报，什么大鸣大放，右派也可以搞大鸣大放，右派也可以出大字报。我说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鸣放是我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没有这个“大”字。去年×××有一篇文章，我们去年五月在这里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是没有那个“大”，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是百家争鸣，就涉及政治。后头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叫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右派也可以用，中间派也可以用，左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右派不利。问题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这样大鸣大放的口号，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这样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我说，等于演话剧一样。从前抗日时期，北方有个新民会，是那个缪斌在这里搞的。缪斌也是我的老朋友，他是改组派。缪斌他后头当汉奸了，搞新民会了，他们搞话剧，报上登了，在太原演话剧，来赞扬日本的皇军，反对中国人。那么因为汉奸演了话剧，我们就不演了吗？我们还是要演。还有旧诗，黄老你是专家，这个东西什么人都可以用的。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写的那几首诗里有什么“××××乱横行”，什么东西，他可以用来反对革命的。那个时候我也说，这种人不要十分去追究他，那个时候他那种思想，就是要写一点诗骂人。我也很赏识他那几首诗。（笑声）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当然，右派是下不了台。但还是可以下台的，右派总要下台吧。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是一分为

二，两点论，一部分右派将来可能把右派帽子摘掉。永远戴下去吗？从此不得翻身呀？我看不一定。可能有相当多数的右派分子，他想通了，大势所趋，他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置工作。右派因为他反对社会主义，他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当作过去对地主，对反革命派那样来办，基本的标志就是不取消他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总理：劳动改造。）譬如林希翎那样的人，现在做什么工作呢？她在人民大学扫地。听说她很愿意干那个事。那种人，娃娃，二十八岁了，也不娃娃了。自己撒谎说只有二十一岁，确实有二十八岁了。进青年团进不了，她就不高兴。现在孤立起来了，在学校里做点工作，劳动改造。那是个别的人。但是你要费孝通，还有人民大学的吴景超去劳动改造，那怎么行呢？那总不好吧。这么大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现在我们的干部许多要去劳动，北京就放了几万人下去，一定要做几年工，也算劳动改造吧。将来大学生要先做几年工，不然一辈子就没有做过工，没有种过田。当然，我不是在这里宣布吓你们，要你黄炎老、陈垣先生、张文伯都下去做苦工，（黄炎培：家里头做做也可以）老人不是说：“洒扫庭除，应对进退”吗？

（笑声）这些话我们过去都说过。当然没有现在说得这么透，尤其没有摸这个底。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一下底，一方面是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是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用我们这个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波兰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他要封一个报纸，我们不需要封报纸，我们只一篇社论就行了。《文汇报》写了两篇社论，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第二篇社论就自己攻。《新民晚报》是自己攻。赵××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搞得很好。他说实在是犯了错误。我说，你犯了错误，你改了，就行了。《新民晚报》很小一个报，你们都不看的？这个报值得一看。在波兰不行，他要封一个报纸，封这个报纸，就惹起来来了，不晓得这两天结果如何？（总理：还没有完。）他那个问题，总而言之，还没有解决，他是反革命没有解决，右派问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思想、两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

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你们各位听了是不是吓一跳？因为你们许多人又不是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虽然少，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八年以来增加了八百万，不要看这么少一点人，只有这个阶级才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全部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坊。至于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都是过渡阶级，资产阶级就不要了，这个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要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慢慢变的。我在四月三十日就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然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那一次主要问题是讲这个问题，讲阶级起变化。这几个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说进了工会岂不是变成工人阶级了吗？进了共产党，他要反共，共产党反共！丁玲、冯雪峰不是共产党反共？进了工会不等同于就是无产阶级了。学校里的教职员都进了工会，钱伟长不是工会会员吗？钱瑞升不是工会会员吗？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倒还相当赏识他们。不过他这个才干用来反共反社会主义就不行了。怎么样把他们改造一下？比如费孝通，我跟他谈过，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下呀？（笑声）他学了我们土改里扎根串联的办法，他一共有两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朋友，什么北京、成都、武汉、上海、无锡各地都有，他说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他在那圈子里就出不来，他不仅出不来，他有意识组织这些

人，代表他们大鸣大放。我说，你不要搞那二百个，另找二百个，到工人，农民里头去找二百个，他说不晓得还要不要我。我说，你不讲去调查吗？你再可以去调查，你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去调查，谁人不要你呢。这是我在六月初跟他谈的。所以有几个右派朋友是好，要交几个右派朋友，了解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各界都要有朋友，左、中、右，都要有朋友，工人要有朋友，农民要有朋友，现在民主党派，大学教授，文学界，许多共产党的作家他没有工人的朋友，没有农民的朋友，这是很大一个缺点。我看到那里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个地方。在农民中你不要轻易去找富裕中农当朋友，那个刘介梅你不要找他当朋友，他代表富裕中农的，要找贫农、下中农、找老工人。老工人他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贫农、下中农容易辨别方向。所以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从来不悲观的。我在二月二十九日不是谈了吗？乱不了。不是讲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师范大学鬼叫一个时候，天下大乱，我看事情就好办了。

整风准备有四个阶段，刚才邓××同志也谈了一下，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风，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字，检查思想，学点马列主义，和风细雨，开小组会，搞点批评自我批评。五月一号整风文件讲和风细雨，许多人不赞成，要来一个急风暴雨，结果很有用处。这一点，我们当时也估计到了，因为我们延安那一次整风是那样，你讲和风细雨，结果要来急风暴雨的。但是最后还是要归结到和风细雨。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贴几千条，那个工厂当局也是很难受的，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车间主任就想辞职，就是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时候右派他们说，你们不能驳，只能他们鸣放，我们那时候也对他们讲，要让他们讲，不要驳，所以，五月我们不驳，在六月八号以前，我们一概不驳，充分鸣放出来了，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鸣放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就是右派言论，在这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恐怕你们各民主党派现在也有了经验了，每个单位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每一个合作社，每个工厂，现在军队也是这样搞。明年搞不搞，明年再定，我们再商量，因为明年搞到五一，下半年再来搞一次，是不是有这么必要，但是只要你不搞，自由市场又要发展的，世界上有些事是那么怪的，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工程师，科学界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等于我们扫地一样，这个房子最好每天扫，我们洗脸一天总要洗一回，以后我看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只个把月就行了，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高峰，也许那时候要来一点洪峰。这个洪峰不是我们造成的，有些东西我们没有估计到。我们不是讲过吗？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

整风的四个阶段，一个是放，一个是反，一个是改，一个是学，这样四个阶段，大概还要搞几个月。

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认有改造的必要，他们不承认还要改造，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愿意改造，说我们已经改造好了。章乃器说，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你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会抽筋剥皮。我们中国许多人都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思想改造为什么要搞？就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观点，知识分子要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老知识分子将来还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什么助教、讲师，他将来总有一天当教授，你讲学问，他说他现在不行，他

将来也可以行的。工程师、科学家，新的人出来了，那么这就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教员将了一军，非得前进不可。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知识分子能够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必须造成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跟资产阶级造成他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它没有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他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无产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这要写一篇社论，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右派中间那些不变的，不愿意脱胎换骨的，大概章乃器就不能算，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我们说你还不行，你是白色，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他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你是什么颜色呀，你还不是白色，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起来也很容易，并不困难，你就下一个决心，并不要读很多书，主要是着重在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阶级，我们这个国家要向什么方向去，他们不懂这个，我在四月三十号讲的那些，他们就听不进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厅资本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我们上一回民主革命，不过革那三张皮而已，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革两张皮：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制同小生产者所有制（小资产阶级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存，新皮二张也不存了，现在剩下什么皮呢？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个公有制这个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现在靠谁吃饭？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工人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是吃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饭，吃公有制的饭。那个皮没有了，这个毛呢，现在就在天上飞，落下来也不扎实，他还看不起这个皮，什么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这个实在是太高明了，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三教九流都不如他。那个时候（四月三十日）我就劝大家，我打了一个比喻，我说这个事情也不容易，比如吃狗肉，我就有这个经验。从小不吃狗肉，我又没有吃过，但是我就反对吃狗肉：你没有吃过，为什么反对呀？你没有经验嘛！你说狗肉不好吃，你吃过没有呀？你何以见得狗肉不好吃呀？你吃都没有吃过你却到处发表意见，说狗肉不好吃，并且把狗肉送到你面前，你闻一闻就跑，这是因为社会上的舆论历来都是这么讲，狗肉古人是大吃特吃的，孟夫子的经济纲领就有一条：养狗。他说：“鸡豚狗彘之富，无失其时，七十可食其肉矣。”七十岁的人才可以吃肉，六十九岁不行，因为那个时候生产力很弱，只有那么多东西。马克思主义，因为过去反对的多，帝国主义反对，蒋委员长天天反，害得大家生怕这个东西。有一句话，说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就是说狗肉不适合人民需要，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个运动。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右派反过之后，风平浪静，提出来的许多意见就不肯改了，我看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把大字报贴一贴，将一军，这个将军很有作用。要改，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两个月。要学，这个学，当然不是一两个月了，只是讲这个运动告一个段落，这个，右派估计到了，他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很正确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年年反，天天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的差不多，不过没有完结就是了。不要松劲。有些人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将来

还说服他，说几次，他一定不服，你还天天开会呀？摆到那里，听他怎么办。我们采取不捉人，而且又不剥夺他的选举权的办法，对于这些人，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分化他，那么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怎么办呢？那也就算了，他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多数人要向前进，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面貌会有改变的。

现在我讲农业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还是那个目的，就是四、五、八，就是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的，这是基本之点，整个纲要基本上都没有改，但是有些东西改了，譬如有些东西已经解决了，合作化问题就是基本上解决了。还有，这个条文次序都有些改。还有，过去有些没有强调的，譬如机器、化学肥料这两个东西，过去没有强调，现在要大搞，要加以强调。过几天开一次人大常委同政协常委的联席会议，讨论一下，讨论后就可以登报，拿到整个农村中去讨论，工厂也可以讨论，各界、各民主党派也可以讨论，今年冬天或者十二月什么时候共产党要开全国党代表大会，那个时候再通过。这是共产党提出的，这是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东西，就不是章伯钧的那个政治设计院。共产党要提到国务院，国务院再提到人民代表大会。今年冬天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早一点通过明年的计划和预算，过去我们不是总搞在五六月吗？现在要改一下，要提早。同时把农业纲要在那个时候通过。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来。现在已经开始有劲了。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开始泄了劲，现在整风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我向同志们说，这四十条以及工业计划，文教计划，完全有希望，比较还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这里头有些主观主义的，我们改掉就是了。比如农业纲要四十条里头有一个六百万双铧犁，这是主观主义的，我们现在把它去掉了。此外还有些修改，经过两年的实践嘛！但是总的说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

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有人说麻雀可以吃虫子，我看把它消灭，它与人争食。一方面它可以吃虫，但它也吃粮食。老鼠就没人赞成它，还有苍蝇、蚊子，是没有人赞成的，名誉不好，现在北京的苍蝇蚊子不很多，但是又有了。过去没有搞蚊子，去搞苍蝇麻雀了。这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把这几样东西也搞掉是不容易的，如果动员全国人民来搞，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就为之一振，我们要把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三个五年计划搞到两千万吨钢，再有十年就可以了。今年就是五百二十万吨，我们五年增加三百多万吨，拿一九四九年算，只有十几万吨，恢复的三年（一九五〇、五一、五二）就搞了一百多万吨，现在又搞了五年，就达到五百二十万吨，再过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可以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两千万吨，跟打麻将一样，加它一番。

除四害，也是要求几年试点，大概要三年试点，五年突击，两年扫尾，十二年已经过去两年，还剩下十年，如果在这方面搞出一点成绩来，人民的心理状态会变的。如果这个事情搞起来了，节制生育我看就有希望了。我看节制生育也是几年试点，几年突出，几年扫尾。这个事情也可以经过大辩论。

除四害要大搞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在农村里头，在城市里头，究竟灭得了灭不了苍蝇、蚊子、老鼠？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不对的。

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没有信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是不想搞这个事，那也当然没有信心。我们是想搞社会主义，我看是完全有希望的，包括灭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包括扫盲，包括有计划的生育，要做的事情很多，那四十条里头有好多事情。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还有文教计划。

至于是不是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不是刚才讲了两种人了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取消，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一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爷你看我是多么有骨气呀！这是资产阶级的忠臣，他不投降。右派是跟封建残余有联系的，通气的，他们并没有通信，没有开什么会，但是彼此呼应，那个文汇报，地主非常高兴，地主就买了报，对农民读，你看报上登载了的呀！他们就想倒算。所以封建残余，反革命残余跟右派，他们实际上是通气的，还有外国跟中国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还有葛佩琦，最出名了。还有美国，他们很不赞成我们反右派，很同情右派。我曾经跟各位也讲过的，我说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你们怎么办？采取什么态度？你们怎么做准备？还是跟它一起组织维持会？还是上山？我说，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张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我不是在二月二十九号的前两天谈过那个话么？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把问题讲透不怕乱。你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吗？然后不是搞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呢？我们说感谢日本人，我跟日本人谈过，我说你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你们这个侵略，激发全民族反对你们，提高了觉悟。

此外还有几个文件，就是劳动工资，体制问题，这些会跟大家商量的，要提到人大常委。还有一个工资同劳保福利，这个也要商量的，恐怕先还要去试验一下，作为草案在工厂里头搞一个试点，然后才能够决定。

右派不讲老实话，我们讲老实话，他不老实，他瞒着我们搞一些事情。谁晓得章伯钧搞那么多事情，这种人我看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部长怎么样？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吧？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个人民代表如何安排？右派如何安排他的工作？工作总是要有一点工作。这些著名的右派，人民代表恐怕难安排了。丁玲是不是选人民代表呀？人民代表不能选。明年要选举了，明年选举还要跟各位商量选举的名单。有些人，你一点职务也不要恐怕也不好。对右派的安排也是个问题。要好好考虑一下。有些教授，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当不成了。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当，学生不听。那么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当教授。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是一个麻烦问题。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事情。

各民主党派什么情况，基层什么情况，恐怕你们这些人也不摸底，等于我们对于许多地方不摸底一样。这一次，百分之二的坚决的右翼分子，可以在一个时候把水搞得浑，使我们看不见底。一查，其实只有那么百分之二。一把明矾放下去，就看见了底。这个整风就是放一把明矾。大鸣、大放、大辩论之后，就看得见底了，农村看得见底。工厂看得见底，学校、党、团、民主党派，这些都有底。章乃器这些人，你要长期共存，他是短期共存；互相监督，他是不相监督，章罗联盟，对长期共存这个口号最高兴了。一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个百花齐放，一个百家争鸣，他们最喜欢了，结果就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对右派的处理问题，请诸位去考虑一下，议一下，如何处理法。

今天是个通知性质的会议。請大家回去研究一下：整风问题，农业纲要。农业纲要会发给大家的。

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没有强加于人。在人民内部，尤其是在同志内部，采取强加于人的态度是不好的。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比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义。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作工作了，他们成熟了。你看，苏联共产党，我的后代，他们召集这样一次会议，是召集得很好的。不仅各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他们，感谢我的后代。他也会说，起草委员会作了辛勤的劳动。这个宣言有没有冒险主义？马克思他们会这样讲？无非也是两种可能：一说有，一说没有。但是我估计，他们会说没有。研究一下，这里头有甚么冒险主义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看不见冒险主义。由此观之。冒险主义的性质也没有，机会主义的性质也没有。那么是一个什么宣言呢？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那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是不是呢？

向莫斯科的全体中國留學生、實習生、 使館机关干部的話（摘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莫斯科大学）

同志们：

我向你们问好。（热烈鼓掌）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鼓掌）我们都老得这样了。但各有各的长处。我们老的有经验，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热烈鼓掌）

世界的风向变了。去年气候不好，今年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你们读过《红楼梦》没有？（有人答：读过。）这句话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说的。二个阵营，其中有中间地带，西方世界有四亿人，其中有很多我们的人，我们可以挖它的墙角，那里会发生地震的。我们有十亿人，我们中间也有它们的人，譬如中国的右派。这种人比较少，在中国约占百分之二左右。二方面都有对方的人。就好比宋末元初的赵孟頫妻子的一首词里所说的：“二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调和，再做成二个泥菩萨，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这个比喻虽然不完全恰当，但有点是对的，即帝国主义阵营中有我们的人，我们这里也有他们的人。但他们阵营中我们的人多，在我们阵营中他们的人少。

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我们约有十亿人，帝国主义约有四亿人，还有几亿呢？（台下有人说：十三亿。）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就算出来了。这十三亿基本上分布在三个洲：亚洲、美洲、拉丁美洲。十三亿中七亿多已取得民族独立，如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黄金海岸等。还有六亿在那边，如日本、伊朗、台湾、南朝鲜、南越、土耳其等那一套。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德、意、日不想打仗，也打不起来。美不合作，这中间地带的十三亿人由二个阵营争夺，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鼓掌）因为英法有老殖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我们什么殖民主义也没有，也没有在那里搞军事基地。

我们中国是个大国，（热烈鼓掌）又是小国。在政治、人口上是大国，但是经济是小国，还比不上比利时呢！你们大概不高兴吧！（台下有人说：不高兴。）但又有什么可以不高兴的呢！比得上就比得上，比不上就比不上！

马克思、恩格斯以后一百年来这次大会是最大的一次，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参加了。这几天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开会，商量了很多事情。这个会开得很好，决定了很多事情，决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不反对吧！（台下说：不反对。）（热烈鼓掌）这两天在开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今天是星期日，休息一天，估计明后天就能结束。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转折点，如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二个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在一起开会，这也是大转折点。这是世界的战争，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暴风雨般的掌声）

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不对，应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所有制的改变是比较容易的。就这么一提，好比人民政府在这头，工农群众在那头，资本家在中间，二边一挟就挟过来了。

有些外国人说：我们思想改造是洗脑筋。我看也说得对，就是洗脑筋嘛！我这个脑子也是洗出来的。参加革命后，慢慢洗，洗了几十年。我从前受的都是资产阶级教育，还有一些封建教育。孔夫子的书读了不少。我们那时根本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只知道华盛顿、拿破仑。你们就好了，你们很幸福，象你们这么大的娃娃就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赫鲁晓夫、多列士、杜克洛、陶里亚蒂等。我们那时对于中国革命是怎么搞法，有谁知道？！

我们大家都要割尾巴，我也劝你们割尾巴。中国有句古话“夹起尾巴做人”，这句话很有道理。现在人都进化了，摸起来就没有尾巴了，但无形的还有。右派就是尾巴翘得太高了。（大笑）青年人应该具备二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热烈鼓掌）

今年国内五月到六月是满天乌云，我们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让右派骂。他们骂共产党是王八蛋，共产党不能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少错误多。我们把它都登在人民日报上了。我们还给机关学校下了指示：硬着头皮，别开口，国内贴了许多大字报，你们这里没有贴吧！北京大学贴了几万张，人民日报是“小字报”。好，鸣放就鸣放，就到人民面前去报帐，让人民去讨论。右派是打垮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有的。你们没有做过工作，不知道。你们去当厂长、党委书记、校长、付校长、教授、工程师试试看。一做工作，就会有错误。八年来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是件很大的事，我们要认真的改。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干部放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农民都说：“老八路又来了。”基层干部中只有百分之一有严重缺点，脱离群众，绝大部分都是好的，其中一部分有错误，但可以改正。

我国人口现有六亿四千万，已经不是六亿了。（鼓掌）要六亿四千万人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世界。要做到这一点，问题很复杂。你们看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回答：看过）现在新的四十条出来了，老的四十条基本上是正确的，但部分有主观主义成分，在新的纲要中化学肥料增加到一千五百万吨。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上和消费上超过富裕中农。我曾召集不少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谈话，问他们能否做到，他们都说完全可能，有的还说能超过。又如除四害的问题，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人建议麻雀不要打，那就网开一面，城里的不打。这里有没有四川人？（回答说：有）四川的老鼠是多得很。北京的苍蝇打完了，过了两年又有了。这个问题也要有决心，大家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这类事情上也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五百二十万吨。过了一个五年计划后，将有一千二百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后，钢的产量就有二千二到二千四百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四千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他说十五年后英国约能生产三千万吨，那么，

再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我们就超过英国，苏联就会超过美国。（热烈鼓掌）那时世界面貌就会大大改变。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要十五年或者多一些，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热烈鼓掌）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再活五年，如再活十五年我就心满意足了，（高呼：毛主席万岁！）能超额完成，当然更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要是孔夫子现在还不死，二千多前的人现在还不死，那还成什么世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所以，我开始就和你们说了，世界是属于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句，祝贺你们，世界是属于你们的。（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呼）

毛主席的三项嘱咐：

- 一、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 二、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
- 三、祝同学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

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同志们：

我讲几句话。請同志们允许我即席讲话。因为我在几年前害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两年好一些，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

我想讲两个问题：形势问题，团结问题。

现在我感到国际形势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还是有的。打希特勒，在一个时期，有一、二年时间，希特勒占了上风。那时，希特勒不但占领大半个欧洲，而且打进苏联，苏联让出了一大块土地，可见希特勒一时占了上风。斯大林格勒一战成为转折点，从此希特勒就走下坡路，苏联就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这不是一个转折点吗？据我看来，斯大林格勒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去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擦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但是匈牙利反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在苏伊士运河中，苏联的警告也起了制止侵略战争的作用。西方擦黑我们的脸的目的，依我看，主要是想“整”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达到了一部分目的。例如美国的法斯特，共产主义的可耻的叛徒，就跑出党去了。还有一些共产党也跑出去了一些人。帝国主义对此大为高兴。我想我们也应该高兴，叛徒跑出去有什么不好？

今年，一九五七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

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惶惶不安。两个卫星上天，使他们睡不着觉。六十几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是从没有过的事，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在各国共产党中，特别是在各国人民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总是相信美国了不起。你看，它还有那么多钢，有那么多飞机大炮。我们的比他们的少。西方国家无数的报纸、广播电台天天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吹得神乎其神，于是乎造成一种假象，欺骗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我们就要揭穿这种欺骗。我有十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一件，打希特勒的时候，罗斯福和邱吉尔的手里有多少钢呢？大约有七千万吨。可是吃不下希特勒，毫无办法。总要想个办法吧，于是采用了旅行的办法，一走就走到雅尔达，请求苏联帮助。那时，斯大林手中有多少钢呢？在战前有一千八百万吨。因为在战争中损失了许多地方，据××××告诉我，钢产打了个对折，剩下九百万吨。有七千万吨钢的人，来请求有九百万吨钢的人。条件是什么呢？易北河以东划为红军的进攻区，就是说，他们忍痛下决心让这一大块区域脱离他们的体系，让这一大块区域有可能为社会主义体系。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资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雅尔达又谈到打日本。又是美国人吃不下日本，又是要请共产主义帮助。中国的满洲，朝鲜的一部分，作为红军的攻击区。并且决定让日本退还半个库页岛、一个千岛群岛。这也是忍痛让步呵！为了吃掉他们的同伴——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件，中国革命。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被我们打得呜呼哀哉的时候，向杜鲁门大喊救命说：美国老爷呀，你出几个兵吧！杜鲁门说：我一个兵也不能出！于是国民党又说：你可以不可以讲几句话呢？说：长江以南这块地方，如果共产党到了那里的时候，美国就不能坐视。杜鲁门说：这个不行，讲不得的，共产党很厉害。于是乎蒋介石只好开跑。他现在在台湾。

第三件，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象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进行反攻，我们和金日成同志退到了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美国的飞机就象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没有。双方同意讲和。在什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在我们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说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点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又谈了年把，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这个战争，实际上是三国打的，朝鲜、中国、苏联。苏联出了武器。但是敌人方面呢，有十六个国家。

第四件，越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打得呜呼哀哉，屁滚尿流。有人可以作证，胡志明同志在座。法国人不想干了，美国人一定要干，因为他的钢多。但是美国人也只是出武器，维持紧张局势，出兵就不来。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两个帝国主义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

第六条叙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叫作罗科索夫斯基。作了这两件事情，他们说不好打了。这件事还没有完结，还要警惕，可能将来还闹乱子。但是现在总算没有打。

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五千一百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旦还没有抛上去？你有一万万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作出了先锋计划。先锋计划要改名了，得改成落后计划。

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抛得很近还是抛得很远？照我讲——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冒险主义，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人们说，美国也会赶上来的，他也会抛卫星的。这是真的。××××的告诉讲了美国会抛卫星的。但是他们现在正在争论究竟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才能赶上苏联。我不管你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你总是被抛到后面去了。我们的苏联同志，大概只是晚上睡觉，白天不睡觉。所有苏联人不会白天晚上，一年、二年、五年总是睡觉吧。你一年、二年、五年赶上苏联，但是苏联又前进了。……

……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我讲十件证据，刚才讲了七件，下面再讲三件。

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

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

第十件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

落后国家强些，还是先进国家强些？印度强些，还是英国强些？印尼强些，还是荷兰强些？阿尔及利亚强些，还是法国强些？我看所有帝国主义就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于是乎转折点就来了。就是说，西方国家抛到后边了，我们大大占上风了。一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是那么微弱。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支枪也没有。苏联同志告诉我，二月革命的时候，只有四万党员；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二十四万党员。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节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

国。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几个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几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发展成一千二百万党员。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还要讲个纸老虎问题。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过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人就是在苏联住了二、三十年，后来被斯大林赶走，以后又被××××同志恢复了名誉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Paper tiger）。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讲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作各个击破。

回答记者关于中国前途的谈话

记者问：生活在比以前舒服得多的条件下的青年一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您的看法怎样？

主席：我自己也无从知道，这恐怕谁也无从知道。可是能够想到两点：一点是继续革命，也许会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外一点，也许现在的青年们会否定革命，表现不好，也就是说，或许会和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领回大陆，投靠现在国内存在的少数的反革命分子。

当然，我不希望他们反革命，可是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一代根据当时的条件决定。是什么样的条件，现在我们还不能预想到，正象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广泛知识超过了封建时代的人们一样。从长远看来，将来的一代应该比我们更聪明，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而不是我们来判断。今天的青年以及他们的未来的青年，将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来评价中国革命的结果。

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下午五時于懷仁堂)

這次宣傳工作會議開得很好，提出了很多問題，使我們懂得了很多事情，這些問題，不可能在一次會上全部解決，某些問題可以解決，現在我講幾點意見：

(一)上次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我講，在我們面前，提出一個新的問題。現在是處在社會大變動的時期，這個大變動很久就是。解放戰爭，是一個大變動；上溯到抗日戰爭，也是一個大變動。解放戰爭，推翻蔣介石政府，現在變動更深刻，搞社會主義革命，幾億人口進入這個運動，在幾億人口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國家又廣泛地進行經濟建設，辦了很多工廠，辦了很多水利事業，交通運輸事業擴大了，辦了很多的學校和科學研究機關，辦了很多報紙，這在過去根據地時候是沒有的。報紙過去是有的，五年計劃的四年中，特別是最近兩年，突然學校、工廠多起來。這麼大的變動，會反映到思想意識上來，存在決定意識，全國各個階級的相互關係都在變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使國民黨政府發生變化，一個上台，一個下台，地主與農民的關係，在土地問題上，一個起來，一個下去。過去被國民黨統治的企業，官資資本起了變化，最近私營工商業，又起了變化。幾億的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都在起變化，個體變為集體，私有變為公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在思想上有反映，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樣大的變動基本上是健康的。推翻一個舊制度，建立了一個新制度，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需要好幾年才能鞏固。現在是未鞏固的時期，例如合作社，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才能鞏固。需要到第二個五年計劃，今年一年，再加上五年，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鞏固起來。不能認為建立了合作社，就鞏固了。這是不可能的。建立新工廠都有個鞏固過程，辦個學校，辦報紙刊物，都有這個問題。但是應該看到，會鞏固起來的。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偉大的工業國，這個前途，應該看到。

(二)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有多少知識分子，還沒有精確統計。大約的估計，各類知識分子有500萬左右。可以作個粗略的分析，無非是左、中、右，少數人對社會主義不那么歡迎，甚至有敵對情緒，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沒有優越性，走社會主義，不那么高興，甚至有敵對的情緒，認為社會主義制度長不長，會失敗，或者希望總有一天會恢復到資本主義制度，這種人是很少數，有人說占10%，恐怕沒有那么多，可能有1%、2%，或者更少一些。總而言之，有這麼一些人就是。他們都是從舊社會來的。除此以外，90%以上的人，是愛國主義者，他們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但是，也有許多人，對於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工作，許多新的問題如何解決，如何答復，還不大清楚。其次，有些人對馬列主義不那么都習慣，不那么熱心，不那么歡迎。但是多數人是想學習馬列主義。所以在500萬左右知識分子中，大概有10%左右，包括共產黨員和黨外人士在內，是比較熟悉馬克思主義的，是贊成、擁護的。只有10%左右，或者還多一點，或許少點，這只是一種估計，對500萬知識分子來講，這畢竟是少數。多數人是想學習，也學習了一點，但不那么熟悉，有些人

有些怀疑。拿爱国主义来说不同，有许多人，他不赞成社会主义，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在外国人面前，他是爱国主义者。另一种是中间状态，是占大多数。少数人是反对的。这种不赞成的人，很长时期都会有的。如宗教家，他可以赞成社会主义，但他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我们是无神论者，可是宗教存在一天，他们就是有神论者。有些人心里不赞成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他不敢公开说，实际上是不赞成的，不应该强迫他接受，应该容许。大多数人当中，赞成的程度也有区别，赞成或者有几分赞成，或者还有一定的怀疑，要承认这种状况在很长时期内都会存在的。要求过高，就不符合事实，就会把任务减低，外国有一个马克思。中国怎能出几亿马克思，大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我们就没有宣传的任务了。我们开宣传工作会议，同志们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们有宣传的任务，要宣传得好。在几十年后使知识分子中更多的人接受马列主义的世界观，通过科学研究、生产和工作的实践，懂得比较多一点马列主义，这样也就好了。但不能强迫人家接受。只能说服人家接受。

（三）我们都是教育人民的人，无论办学校，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都是教育人民的人，都是人民的先生。500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没有这500万知识分子，我们一件事都做不好，我们国家的文化不发达，但有500万知识分子，这些人是先生要教出许多学生，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科学技术人员和他们的作品，报纸，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的国家只有三部分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教育人民的人。因此，他们有个任务，教育人民的人就要先受教育。尤其是在大变动的时期，500万知识分子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遗产，须接受教育。如果说没有学习的任务了，是否恰当呢？有人想：“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改造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恐怕是不恰当的。所有我们这些人，都有学习的任务。共产党员，如果不研究新的问题，过去旧了的不恰当的东西不丢掉，不接受新事物，不研究新道理，那么，教育人的任务就会作得很差了。这一点是否可以肯定下来，就是所有的人，包括500万知识分子，都要学习。说已经改造好了，不对！我看还要改造。在几个五年计划以后，还要改造，因为，那时，又有变化了，又有许多新的问题出现。这时期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懂得多的人仍要学习。我看，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在这个基础上，有别人好心的帮助，而不是强制的学习，人家怕是大会搞思想斗争。欢迎个人研究，小组帮助。只能一面教，一面学，一面是教员，一面又是学生。并且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是学不好的。要向工人，农民，学生学习，要向教育的对象学习，要在生产、工作中学习。

（四）整风。共产党员要准备整风。我们在十几年以前做过一回，后来也整过几次，那是检查工作性质的，不是延安那样的整风。准备今年开始，中央做出决定，做试验，明年普遍地推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时候是要批判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其次是整宗派主义，不以六亿人口和500万知识分子为范围来帮助、团结这些人，不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就是宗派主义；再一个是官仔主义，现在官仔主义相当严重。克服缺点，纠正错误，要在全国造成一种自由批评的环境和习惯。整风方法与延安那样，研究文件，看点东西，自己有错误，有缺点，批评一下，不管什么人，（包括中央委员）有错误缺点讲一讲，不用大民主，只用小民主，小组会上用小民主也可以，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人”的办法。也就在整风中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前推进一步，多学习一点马克思

主义。陆定一同志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说整风运动是思想运动，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很对的。有许多问题，马、恩、列、斯没有讲到，也没有看到，我们应该不限于他们讲过的范围，可以按他们的基本方针，按照他们的基本方向，有所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发展，不能停滞，不发展就没有生命。基本原则不能违背，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但是停滞不前是教条主义。

(五)为人民服务的问题。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除了这两种人外，就没有什么人了，资本家要变工人，地主要变农民。现在要提倡知识分子下工厂、农村去。最近有几个同志下农村，陈伯达、邓子恢两同志到农村住了几个月，很有益处，看了很多东西。走马看花，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下马看花。陈伯达、邓子恢同志下马看了几个月，做了调查，交了朋友。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是否应该下去，应该去，科学技术人员都下去那也不必，他就在工厂，研究人员是实验室的，都去这也不必，但有时下乡下厂转一转，也有好处。家在乡下，从不回家，一辈子见不到工人、农民是不好的。希望这些人，十人中有七个人到乡下、工厂去跑一跑，看一看。还有三个人因为年纪大，或是不愿去。有70%的人下去看看，了解情况。考察小学、中学，顺便看看合作社，人民代表，政治委员都下去看嘛，如果能办到这样就好了。也不是今天开了会，明天就70%的跑光，那么合作社就会成灾，新闻记者这么多，他们招待不起。逐步的，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时间，争取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直接接触，看一看，跑一跑，与工人农民一道，混几个月，一年、两三年，在哪儿住去，安家落户，两三年再回来，在延安曾经这样作过，那时知识分子很多，有一个时期，思想混乱，有怪论，闹得天下大乱，后来开了一次会，讲了话，也有一批人下去，就好得多了。知识分子照道理来讲是没有知识的，一不耕田，二不造桌椅板凳，知识分子只是看书，书当然不可不看，可以学习前人的经验，但光看书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有朋友，还要研究当前情况。现在有些人下去体验生活，有些有成绩，有些没有成绩。工人农民不和他们讲真话。一看“你是知识分子，你跟我又不一样，你是来搞调查的，大概想整我一下吧？”他就不和你讲真话。看你采取什么态度？这与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是有关系的。马列主义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现在，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小资产阶级变为集体劳动者，资产阶级变工人，这就有可能向他们宣传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知识分子按其出身来说，许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进过资产阶级的学校，学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如我，就进过资产阶级的学校，学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后来学的。要改变过去的世界观，换成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下去跑一趟，工人和农民不会和他讲真话，我们要造成风气，要有30%，40%，50%，60%，如多少年有70%，十一年之内，有70%的知识分子去接触工人和农民，研究问题，这样就可以把在书上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看到的常常会溜走，等于我们每天看报纸忘记了一样，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学到，主要是在工作中，实践中，才能真正了解，如果这样，书本上看了马克思主义，又接触工人农民，在工作中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许多人就有了共同语言。有较多的人，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不只有爱国主义共同语言，而且也有社会主义共同语言。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如果不这样，我看，许多问题还是不好解决。作品也还是不能写好。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还是少学为好，学多了文章反而写不好”。这是一种说法。马克

思自己说过，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妨碍创作，这是一种抵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思想，他脑筋里有一种旧的世界观，或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不赞成新的东西。这要慢慢来，而且要有很长的时间，要造成风气。我们建议文艺上工农兵方向，如果说不是工农兵方向，还有什么方向呢？在延安时都是工农兵方向，今天仍然是，有人说如不是，那是什么？那只有资产阶级方向了。有人说：“百家争鸣，马克思一家，其他还有99家”。依我看，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西方世界是一家，我们是一家。还有民族主义是一家，是中间地位。什么叫百家？新闻是一家，教育是一家，新闻中我这样办报纸，你那样办报纸即有两家。办学校，大学一家，中学一家，大学中的家可多！科学院的家可多了，技术人员的家也很多，其实不是什么百家，而是千家、万家，所谓百家，无非是言其多也。我说现在世界上基本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马列主义也有几家，马列主义一家，修正主义也算一家，挂了马克思主义的牌子，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例如英国的工党，也在说什么社会主义。另外教条主义也是一家。三家。

（六）片面性问题，有两种片面性：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陆定一同志的文章讲了这个问题。一种是肯定一切，一种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肯定一切，所谓100%的布尔什维克，不是99.9%，硬说是100%，经过十年的功夫，1935—1945年中，后来一查，“正确”没有了。教条主义外国也有，是将马克思主义片面化了，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工作，肯定一切，只许赞扬，不许批评。只许讲好，不许讲坏。北京最近发生了一次“世界大战”，好多人包围青年作家王蒙，我们替王蒙解了围。把他救出来，虽然他的作品有缺点，但是，讲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揭露了官僚主义。总而言之，讲不得，一讲就军法从事，违犯了军法。我们过去军事时期，搞阶级斗争，有些学问，有些办法。但产生了简单化，行政命令，因为领导人民向敌人作斗争，有许多事情不能那么从容讨论，要迅速，这地养成了一种作风，只有那么一条经验，一条办法。在新的环境下还用这个办法，那是不对的。特别在军队工作久了的人，容易简单化。现在围剿王蒙的也是解放军，开了几个团，把他包围起来，那不好。

另外一种右倾机会主义，否定一切。没有一件好事。工人、农民的事业，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是几亿人民的伟大斗争，没有什么好的可说，漆黑一团，使人丧失信心，这不合乎事实。一切都好，没有困难，也不合乎事实。也不是一一切都好，要加以分析。例如钟惦棐揭露了电影中的缺点和错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要把他们揭露的加以改正，错误的要批评，正确的要改正，但他的批评是片面的，台湾很欢迎。陈其通等四人在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有的传达错了，说我赞成，我再讲一遍，我很不赞成。这几个同志他们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想保卫党、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不过，有这么一种情绪，是讲毒草务必去尽；他们认为“百家争鸣”提出来，好处甚少，坏处甚多。据他们估计，成绩太少，缺点太多，放出了王蒙，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大势不好大有不可终日之势。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文章里面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似乎是赞成，其实是反对这个方针的，对这个方针不通，有怀疑。他们的文章是没有说服力的，没有分析，简单从事，短促突击，人家看了文章是不会服的。我看了就不服，我不认识王蒙，我和他又不是儿女亲家，我就不服嘛！这两派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片性，都是毒草，都要批评，但要治病救人，帮助他们。其实，共产党员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过是代表很多的人，不单是个人

问题。难道共产党以外，就没有了吗？有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500万知识分子当中，也有“左”派，有右派。不是真正的左派，是带括弧的。也有肯定一切，否定一切。这也难免，事实上，在工作中，在文章中，不可能不带有片面性。要求写文章不带一点片面性，有几万万马克思，那里有这么多！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片面性，是过分的，事实上，批评起来，各人站在各人的角度，各人根据各人自己的经验来说话的，但是，可不可以要求逐步多一些辩证法？所谓片面性是违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也是违反辩证法的。是不是辩证法可以逐步推广，逐步多一些呢？提出这样的要求，要求一年一年，一天一天，比较全面的来看一些问题。这样多的作家、教师、新闻记者、科学家，都存有片面性，那就不好办，所以，承认有片面性这是事实，不能不承认，这是第一；第二，要逐步克服。一万年还有片面性，不然六亿人口，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成了辩证法家，总不会那样。要逐步推广辩证法，对事物要有分析，文章要有说服力，讲道理，不靠官僚架子来压服别人，不靠行政命令办事，要把做了几十年的什么局长、处长、部长抛在九霄云外。写文章要与人平等，官虽然大的话讲错了人家还是要批评。斯大林的官还不小？有了错误，人家还要讲。老资格，“革命的时候你在那里？你还不是在桌子底下爬！”或者是“当国民党”。摆出这一套，人家就不爱听。辩证法应该使他逐步地多一些，形而上学逐步少些，两种片面性逐步少一些。

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人们说：“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可以，搞自然科学不行。”有些人听不惯，听了不舒服。我看他们说对了一半，现在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因为你不懂，他懂，他能够讲，在一门科学的具体内容上，你不能具体领导。你讲不出来嘛！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他们也是针对这些事实来说话的。我说一半对，道理就在这里。一半不对是党既然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说，共产党只能领导阶级斗争，不能领导向自然斗争，这个党就要灭亡。这要有一个过程。过去忙于阶级斗争，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问题都要他处理，说有一百万知识分子入党，忙不过来，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种情况要改变，需要几十年，要三、四个五年计划，可以改变。科学要学会，要花很长时间。阶级斗争学会，也花了24年的时间，从1921年——1945年，24年才总结，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战略策略。自然科学也可能要这么多时间，无非是要进中学、大学，大学毕业了，研究一个时期，工作一个时期，也就学会了。象我过去不会作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也有很多人不会的，后来是逼上梁山，一教就会了。搞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年纪不大的人，都可以学，还可以调一些人去学习，学生中也有许多党员、团员，有十几年功夫，就懂得了，只要能够领导阶级斗争胜利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再有十年，二十年；是可以学会的。现在科学家是先生，要向他们学习。是学生领导先生，还是先生领导学生？当然是先生领导学生。因为你是学生，他是先生。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好几个地方提出这个问题。好些同志一定要讲个为主，我看不讲也可以，似乎讲个阶级斗争为主舒服些，讲到人民内部矛盾为主，似乎不好。恰好我犯了这个讳，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题目，就是这个问题。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在内，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有斗争，有人说，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好些，不愿说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为详细说明。现在的情况下，是难解难

分的。无产阶级思想之外，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有资产阶级思想。你们说，谁为主？除无产阶级思想之外，谁为主很难分。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已作了总结，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人民内部问题，资产阶级思想也当作人民的内部问题来处理。现在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有些时候，可以放在一起讲。你说那些是属于小资产阶级，那些是属于资产阶级，很难划分，一定要分也可以。今天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要扣大帽子。似乎扣大帽子就好办事了，加他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许多文章都是扣帽子，当然也不是每篇文章都扣帽子。人总是要戴帽子的，在冬天不戴帽子，在外走不感冒我就不相信。但各人的帽子要适合自己的头，别人的帽子是没有量过尺寸的，往往检了一顶即给扣上。

杂文如何写？是否一定要带片面性？前面讲了片面性是难免的，不要那么要求全面，那样是阻碍批评的发表。长文、短文也好，可以要求有不带片面性的杂文。比如，列宁有些文章是杂文性质，很有点象鲁迅，有些很尖锐，很讽刺，谁象谁，不去管他，你能说它是片面性吗？鲁迅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很多是对同志的，也有对敌人的。鲁迅的对付敌人，可否反过来对人民内部呢？倘若鲁迅活着，我看是可以的。“不敢写文章，摸不到领导的底子”，我看底子，就是马克思主义。合乎马列主义就是好的。现在的环境不算太坏，不象国民党时期要检查。编辑部要修改文章，但有些人的文章不要修改它。政府也没有设检查机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更宽了，但有个问题，即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怕什么的，是无所畏惧的，要讲道理，即辩证唯物论者，是很革命的，还怕官僚主义？我看不要怕。但是也不能否认环境问题，现在的环境还有些人不敢写文章，所以共产党要整风，对“老子天下第一”的人，要整得他们谦虚一点，以平等的态度来看问题，作者与读者都要有平等态度，鲁迅即以平等态度对待读者和作者的。真正好的文章是会受读者欢迎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诚心为人民服务，立志改革。清朝末年写文章，有文字狱，如章太炎的“九音书”、“殊天华”、邹容的“猛四头”，“革命军”，都是人民喜欢的。但章太炎与邹容同时坐班房，当时章太炎是唯物论者，章太炎很有唯物论，写了一篇驳康有为的文章，说“南海小丑，不辨菽粟”，就因此坐班房三年。章太炎有篇文章叫“虬书”，里面讲了很多东西，是直接骂康熙皇帝。章太炎的“民报”，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还是办，我们虽然纸张困难，领导也有缺点，但比章太炎办白话报条件要好多了。现在要改革这个国家，要有这样志向，要有仁人志士，使我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好起来。想到这方面，就不要怕什么。又要改革，又要怕，就不好办。也要创造环境，使写文章的人能立志改革，有条件。

（七）是“放”还是“收”？这是一个方针问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放了这么久，有人想收。在讨论中同志们不赞成收的，这个意见对。中央即要放。会不会乱？有些人怕乱，乱即治，一乱一治。会不会变匈牙利？变不了，变了也不怕，匈牙利变好了，如果我们象匈牙利，有那么多的错误，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帝国主义在那里指挥，该变就变，怕有什么用处。我在1月18日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过真善美，真理是与谬论对立的，一万年还是会有错误的思想，总是有丑恶的现象。好与坏，美与丑，真与假，总是相对的，没有好，就没有坏，没有坏，就没有好，没有大坏人，就没有大好人。香花毒草是对立的，毒草长多了，即会有人把毒草挖掉。真理是与错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善与恶，美与丑的斗

爭，总有个比较，是从比较里头发展起来的。社会上好人与坏人的斗争，好人增多了，坏人就减少了，毒草不怕它多，多了可以肥田。什么叫毒草？我问过布尔加宁，欧洲一百年前洋柿子是不是毒草？他说：是有这回事。一百多年以前的毒草，现在变成香花了。我讲过耶苏，马丁路德，哥白尼，伽利略，孙中山，共产党，这个阶级认为是香花，那个阶级就认为是毒草；那个阶级认为是毒草，这个阶级就认为是香花。杜勒斯是美国资产阶级的香花，是全世界人民的毒草。蒋介石是不是毒草？是不是现在有点香了？以前他香过一个时期，北伐时香过，后来他反人民，抗日战争时期，还喊过：“蒋委员长万岁！”是我的老朋友，借过粮食。香花与毒草是对立物的斗争，对立的统一，有比较才能辨别，才能有发展，没有即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与资产阶级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我说可以批评。如果批评倒了，那就该倒。我想是难于批评倒的，批评倒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如果把人民政府批评倒了，请蒋委员长回来老百姓就高兴？那不会的。所以不应有害怕批评的情绪。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的作品，批评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发展时期不怕批评，没落时期怕批评，如英法资产阶级在十八世纪不怕批评，在十九世纪也还不大怕批评，十九世纪下半世纪就怕了。但还能容许肖伯纳这样的人。到了20世纪，很怕批评，美国在20世纪，对批评有如惊弓之鸟。在美国住过的人知道，美国那有那多的自由，他们控制得很严，合乎它的，无伤大局的，还容许一点，罢工不是总同盟罢工不带政治性的个别罢工还是容许的。人民政府刚建立不久，70%、80%多数人都是拥护的，10%的地主、富农、特务反对、不赞成。没有办法。民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有些勉强，××同志说的话，不太勉强接受社会主义，就是说，有点勉强。经过教育，他们才服。五百万知识分子，和他们有关系的，那么服，不见得。怎么办？有两个办法，有两种政策来领导这个国家；是放还是收？还是放。罢工，就让他罢工；罢课，就让罢课。官行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没有，小小民主也没有，逼上梁山，不罢课罢工怎么行？在那种情况下，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调整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这样可以使90%或者更多一点，99%是好的，官行主义比较少一点，但1%或千分之一，估计到那一年总有一些官行主义者。人民对严重的官行主义者不得已才举行群众斗争的，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百家争鸣”是一种科学方法，是发展真理的方法。“百花齐放”是推进文学艺术事业的方法。牛鬼蛇神，都搬到舞台上来啰，搬一点，也是可以的。搬了几十年，几百年，没看见毒死多少人，让它再搬一下，又有什么关系。我劝我几个孩子，去取得算命的机会，过了几十年，就没有命可算了。他们去算了一回，不诚心诚意，又讥笑人家。在杭州，我要他们抽签，他们到了什么寺去抽签，有的抽得好，有的抽得坏。我说，几十年之后，你想要体验这个生活，也不可能了。禁止人们接触丑恶现象，禁止人们看牛鬼神蛇，那是不好的。我并不是提倡每一场戏都要有牛鬼神蛇，有一点也可以，让它存在几年，能天下大乱？存在这么久了，中国人并没有毒死多少。四川省流沙河写了一个“草木篇”的诗，草木篇是毒草，出了这么一篇，以为天下就会乱了，我看出一百篇也不会乱，如果有一百篇，问题即解决了。在座的看过没有？好文章呀！可以再印一下，最好今天晚上就把它印出来。向草木篇开火，开的对；四川的同志，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是，批评的方法有问题。你们四川同志，不要以为我是赞成“草木篇”，反对你们的批评，我是讲，你们可以让它放一下，征求读者的意见，让懂得的人去批评。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

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不要怕毒草，不要怕犯错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真理的，是发展文化艺术的，是发展科学的，是使我们少犯错误。是辩证法的。有许多事情，开始我们是不知道，不会解决，要在辩论斗争中，才能学会。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我只是试答这几个问题。现在是放的不夠，用这样的方针，我们企图团结500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变现在的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的知识分子的情况，是又好又不好。好，是爱国主义，愿意工作、学习。但不完全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差很远，接近工农群众，更差得远，对马列主义不熟悉，对工农不接近，这是可以经过教育改变的。首先要求共产党员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态度，面向500万知识分子，几亿人口。有官僚主义存在，说服与压服，二者必居其一，是要说服。不能压，只能放。以力服人不行，要以理服人。对付敌人，可以一刀一枪，简单明了；对待同志不能用粗暴的办法，甚至对待“草木篇”，是思想问题也不要粗暴。抗美援朝，对美国是用粗暴的方法，对蒋介石，也是用粗暴的方法。我们对蒋介石打了那么多年，粗暴的方法就是打。可是我们在对500万知识分子，几亿农民，对多少万民族资本家，和民主人士，打的方法是不适宜的。有些同志，习惯那种方法，“你还调皮呀！”那是错误的办法，错误的方针。因此，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草木篇”、包括有杀父、杀夫、杀子之仇的，有些亲戚朋友血肉相连被镇压的，这些人要他们那么舒服，不容易。一有机会，“草木篇”一篇，所以要提出统一战线，团结教育。

(八)对各省、市委意见。希望各省市也开这样的会，把思想问题都抓起来，现在没抓，不是忙的问题，是面对500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人民的教员，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有很多新问题，关系很不正常。内部矛盾突出，要研究，要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地方党委第一书记要出马，我就是第一书记，陆定一同志把我找了出来，讲了一通。我不是讲第二书记，我是讲第一书记，做了第一书记，你就有责任抓。希望也召集这样的会议，党内、党外的同志都参加，这次没有解决的问题带回去。这样的会议，证明有好处。过去开会，共产党员开一次，非共产党员、民主党派开一次，各开各的。这次会是第三种形式，党内党外一起开。希望地方召开这样的会，把思想问题摆在议事日程上来。

同科学家、文学家谈人民内部关系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

对王蒙调查一下，青年人才开始写小说有缺点，要帮助，对起义将领也是帮助。现在有许多作家，和胡风有区别。应又保护又批评，在保护下批评。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生动，生活上的原因，观点上的原因，也不单是王蒙的问题。有同志批评中央附近不能有官僚主义，这个观点不对。为什么中央附近不能产生官僚主义，中央内部也出了坏人。如果照这些同志的观点，写这种文章的人要刮肉。总之，我们对待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在许多同志中未弄清楚。实际上许多人是反对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

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这篇东西，说地点不对，时间不对，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没有说服力，党里面经常有不正常的东西，在全国有很大的成绩和威信之下，滋长了一些坏的作风。这是违法乱纪，横行霸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真正的无产阶级不到一千二百万，还包括有真假，为什么说共产党的缺点不能揭发，这种概念就不对。党的统一战线，党内实际上赞成的还是少数。再三讲过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有些同志不从帮助出发，一脚踢开。这种办法很简单，是简单开枪，这是国民党作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最大量是小资产阶级，这是客观现实。合作社主要的一部分富农中农不满，学校里面百分之八十出身小资产阶级以上，但多数人都搞匈牙利。我们有许多同志就怕匈牙利事件，事物有两重性，任何事情都有两种属性。匈牙利事件又好又不好，不好的事反过来就是好的。用片面性反对片面性，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方法。王蒙小说未写好，需要帮助他在实践中改正，李希凡开始写文章是好的，后来的东西无多特色，是否到人民日报脱离了生活，应生活在实际生活中。当小媳妇时好，当了婆婆就不行了。用教条主义方法不能批评人家，因无力量，请看一下列宁是如何写《经验批判论》的。斯大林在后来就不同了，不是平等讨论问题，搜集大量材料发表意见。有些东西写得好，有些东西是坐在山岗上，拣起石头打人，使人看了后不大舒服。当了权，作了官，要警惕，不要骂人象骂儿子一样，不应是老人和小人的关系，不能以片面性反对片面性，教条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开始批判胡适有好文章的，以后一笔抹杀。过一个时期后，可补救补救。康梁也不能全部抹杀，自比有史以来的六大政治家。

就是这样的人，思想上面有严重错误 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写文章也要安排，大喝一声，笔下留人，要有说服力，应该坚决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要如此，党内百分之五 六十不了解这个方针，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好不好？要靠他们搞社会主义，要用适当的方法 使他们得到改造。就是武天保，也不开除他。我们不提倡全国性的罢工、罢课来对待政府，要照顾到历史情况，我们的人民用这个对敌斗争的方法用惯了，宪法是也有规定这种自由。闹事不等于造反，六万万人口每年有一百万人闹事，我看来是正常情况，百分之一的人闹事可能是永远的，至少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内。闹事的人可能也有反革命，不能说都是反革命。闹事中不合理不应答应，合理的应该答应。凡是合理的东西 应该和群众站在一起，否则就要脱离群众 “你们都是公家人”，人民没有什么武器，拳头和扁担。此起彼伏是完全可能的，是正常现象，资产阶级也允许闹事 为什么我们不允许。

我们的矛盾是临时性的，但是矛盾不解决，潜伏下来不好，冻疮割了好。不能说我们是老革命就不许闹事，国民党也是老革命。

马列主义不能从真空中生长出来，只能从向敌对思想作斗争 中并从其中吸取合理的东西，才能生长发展。

我们的危险在于革命成功、四方无事。片面性的打不能锻炼出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个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和毒草作斗争中成长的，田里面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过来，就是肥料，粮食和野草一起生长，“落霞与孤鹜齐飞”。不能只允许粮食，应该是香花和毒草齐放。

斯大林基本上是唯物论，也有辩证法，但辩证法不是那样多。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

而是一点论。我们同志看事物，应是两点，一点里面又有两点，最近有个姚文元写了两篇文章（文汇报二月六日）：教条与原则。我看不能。过去提倡一家独鸣，历史条件限制，不如此不能打倒二十年的一家独鸣。

我们要写东西，要搜集充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有这么多出身小资产阶级的人，就必须教育，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容易，很简单，这决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产生、发展和灭亡。也许一千年以后，就不叫马列主义了。如果永恒，就不叫马列主义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三个留学生推翻永恒论，推动原子能来个新的革新）

有些东西能推翻，有些东西不能推翻。如地球总是转的。人类总有一天要自己否定自己，被否定掉，总有不适应的一天，变化成为另外一种人，现在人类本身就经过了多少变化。三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纯、青），后来又铁（旧、新）。动物可能反对我们，不会讲话；植物可能感谢我们，互相依赖。马克思未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到不久，社会主义的时间还不长，还无充分经验，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要不断积累经验。

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歪风，不要怕潮流，没有两个流就不行，需要交锋，越斗就越丰富，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应特别想到，掌握政权之后，不能用简单办法把人打倒。百花齐放为什么怕放，怕饭甄子过河。青年人反对官仔主义不那么可怕，因他们还没有当事，官仔主义还未轮到他们头上。

大官仔主义也可以反，凡是怕骂官仔主义的人，就是怕骂自己。

哲学，杜林，黑格尔，马赫的著作能否找到看一看。《新建设》周谷城论大逻辑，有点道理。学校只听校长意见，不听学生意见不对。

事情正在起变化

（一九五七年五月）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多是忠心耿耿的，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应当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评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来说，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

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为“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来说，“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因为是执行中央的方针犯的，不应当过多的责备下级。我党有大批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行计划经济所必须的对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须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兄弟。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内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70%左右，左派大约是20%，右派大约占1%、3%、5%到10%，依情况而不同，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在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最坚决，最猖狂，他们认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作梦。中间派有一些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他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新闻界、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

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相争夺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是先争局部后争全局，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学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肃反、三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些可能。对于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作梦。新闻界的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他们反对扣帽，这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中的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和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

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来多少帽子，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凡是对中间派过去所扣的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肃反中，在三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作错了，都要公开纠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实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1%、3%、5%、10%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

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强烈地表现他们自己的，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的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有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大多数批评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任他们。必须给予职权。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是对的就应该接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一遇空子可钻，如象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完成，我们的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对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同他们的联系，以便让他们更有效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的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

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多数的批评合理或基本上合理，包括××大学××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批评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互相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香花与毒草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除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庄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作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们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二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时间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真伪善恶，有几条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纸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

你们这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你们把人们划为左、中、右，未免不合理吧？除了沙漠，凡有群众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这样。为什么不合情理呢？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企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有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的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又是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诫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错误的人，更加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切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把党的整风任务完成，现在情况进展甚速，党群关系迅速改善，看样子几个星期，有的几个月，有的一年左右（例如农村）就可完成，至于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思想水平，则时间就要长些。

我们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但有两三个五年计划估计就差不多了。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以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人们正是这样希望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

（一九五七年）

关于主要矛盾这个问题，提不提？提了有好处没有好处？（康生：和××、庆施同志谈过，人们认为过渡时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为主。但也提出一点疑问，是否影响整改，其次，是否引起对八大几句话的争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是主要的，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我们进行了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对于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是不动的；第二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革命中有两条道路，即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两条道路，与现在两条道路性质不同。现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问题了。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行了一段了，从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宣布总路线以后，到冬季又让中宣部写了个总路线宣传提纲。如果不算今年，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只有三年半时间，算今年只有四年半，给了资产阶级以严重打击，个体农民问题也解决了。这种情况反映在八大，八大说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胜利，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能说不对吗？所有制解决了，人家服服贴贴打锣打鼓嘛！八大指出在经济制度上也还没有完全解决（资本家拿定息），在政治斗争上也还没有完全解决（思想斗争）；还要继续改造，民主党派的一部分——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

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意，这在八大时并不是完全没有划清。八大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当时他们服服贴贴，现在他们要造反嘛！青岛这篇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即讲清楚了。今后为了策略，还是青岛的讲法好，即城乡都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没有熄灭等都讲了。这个问题到会的人知道就算了。不要因为“主要矛盾”那两个字，闹得天翻地复。

×××讲的重庆那个工厂干部被工人斗得过不下去了，新工人有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干部有官仔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思想，都挂到资产阶级帐上，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剥削人民的人，一种是不剥削人的人民。最大量的是中间派，没有中间派就不行了。这个问题最近不在报上搞，过几个月以理论文章的形式写东西。几十年以后没有人剥削人了，总不能再挂到资产阶级帐上了。但还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湖北有个刘介梅就不是资产阶级，他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明朝朱元璋、南北朝时代宋刘裕也是那样的人。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解决，党内三个主义也属于意识形态。

大鸣大放是最好的革命形式。革命是要取得经验的，有人要大吵大闹就让他闹。革命这么多年就没有发明这个办法，今年和右派合作发明了这个办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鸣大放这个办法，是他们提出，我们接过来的。在延安时有兵的报和轻骑队，当时这个办法没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在艺术、学术方面讲的。在政治方面右派提出来大鸣大放，我们接过来这很好嘛。××同志过去看过新乡工厂，从那个工厂的情况和现在的报告来看，用后的方法是不行的。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是主要矛盾，这一个是肯定对的了。第二个，在几个月内不在报纸上宣传主要矛盾，免得引起新的混乱，惹起麻烦，影响整改。报纸上只宣传两条道路斗争。

所谓人民内部有几种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党内也有几种人。实际上人民内部矛盾，就有阶级矛盾。所谓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人民，但有对抗的一面。现在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与地主的矛盾。而是三部分人民的矛盾。这三部分人民之间，内部有一部分暗藏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如章伯钧等。今年把他们暴露了。我们用剥笋政策，今年是剥不完的。现在主要矛盾不是与地主的矛盾。湖南捉了七千人，没有人民反对。如捉章伯钧就不行。今天敌我矛盾是次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加上家属有几千万人，小资产阶级是几亿，对这些人主要是改造问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大量的中间派。对这些人不能说是对抗性的矛盾。如章伯钧之流是對抗性的。百分之九十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敌我矛盾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工农也有矛盾，工农矛盾也称两条道路的矛盾。右派有多少呢？最多有十五万左右，不是那么多，不能说主要矛盾。估计还要分化一部分出来，对我们有利，特别是有知识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

八大讲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那是讲生产问题，不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还没有完全解决。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讲是大体适合，斯大林讲完全适合有毛病。将来若干年之后生产力发展了，集体所有制和发展生产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适合的。为什么适合？合作社是发展

生产的嘛！我们这个制度比起印度来，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三百一十万吨钢，我们增加了四百多万吨，你说我们的制度不好吗？我们的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但也有缺点。到几十年以后，生产力发展了，价值法则没有用了。货币可以不要了。

八大那句话（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没有什么坏处，不妨害整风、生产、反右派，改进工作。这句话是好话，意思是让我们发展生产，充实我们的物质基础。不是讲人良间的矛盾，这是和外国比、和我国以前比。（康生：原来写这句话时，当时考虑写不写？反复考虑了列宁的一句话。）这句话有语病的，但没有坏处，实际上没有发生坏作用，这句话不必去改了。将来在适当时机讲一下子。当时本来想改，已印发出去了。